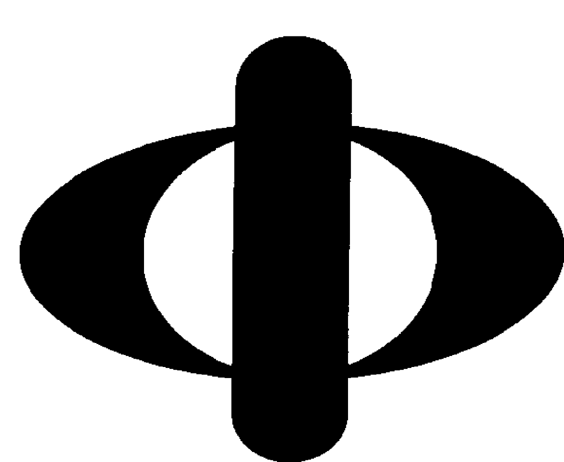


土耳其卷

黄维民▷著

TU ER QI JUAN

商务印书馆



西北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

主编／彭树智

东国家通史

土耳其卷

黄维民▷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东国家通史 土耳其卷/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ISBN 7-100-035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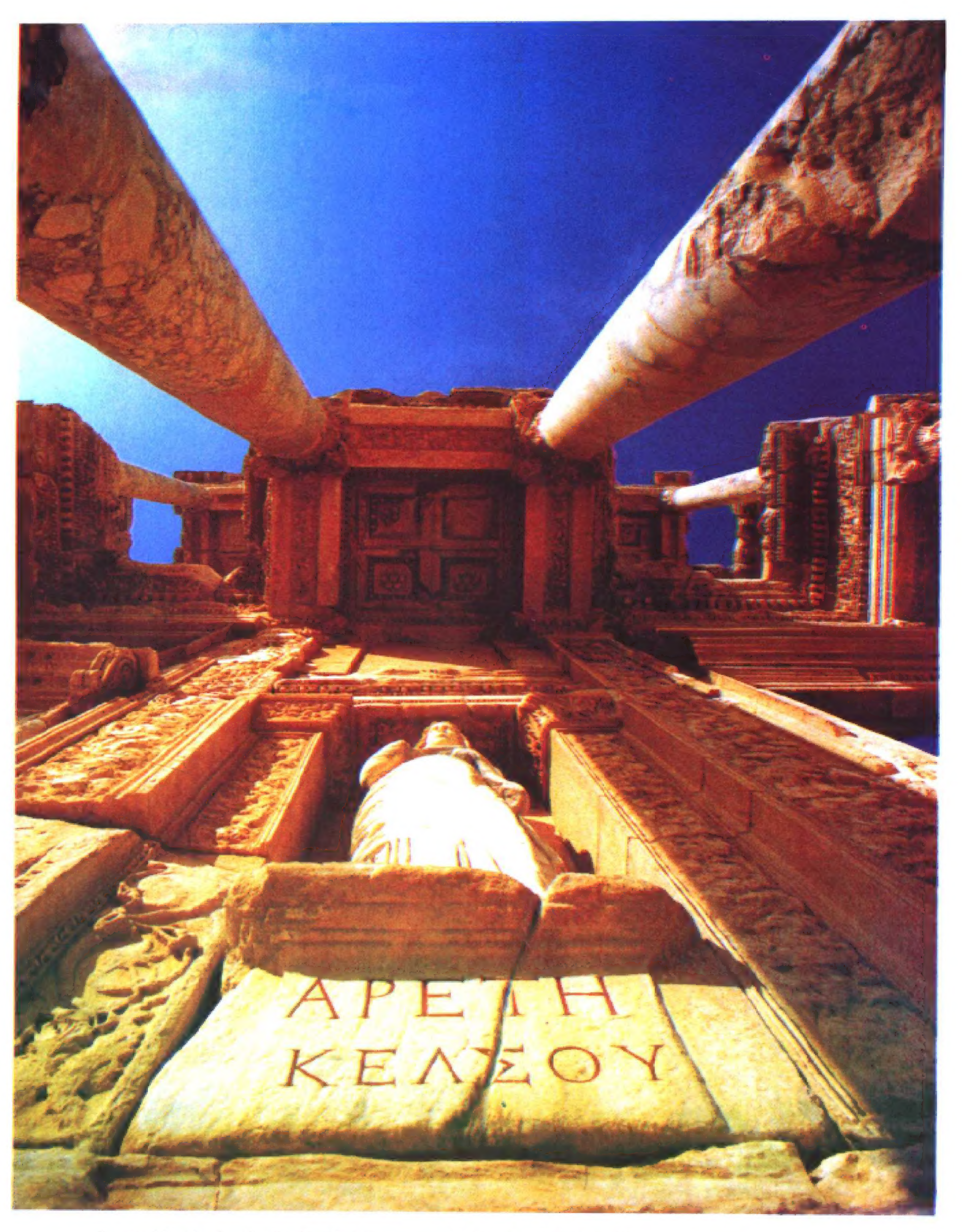
I.中… II.①彭…②黄… III.①中东-通史②土耳其-通史 IV.K37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299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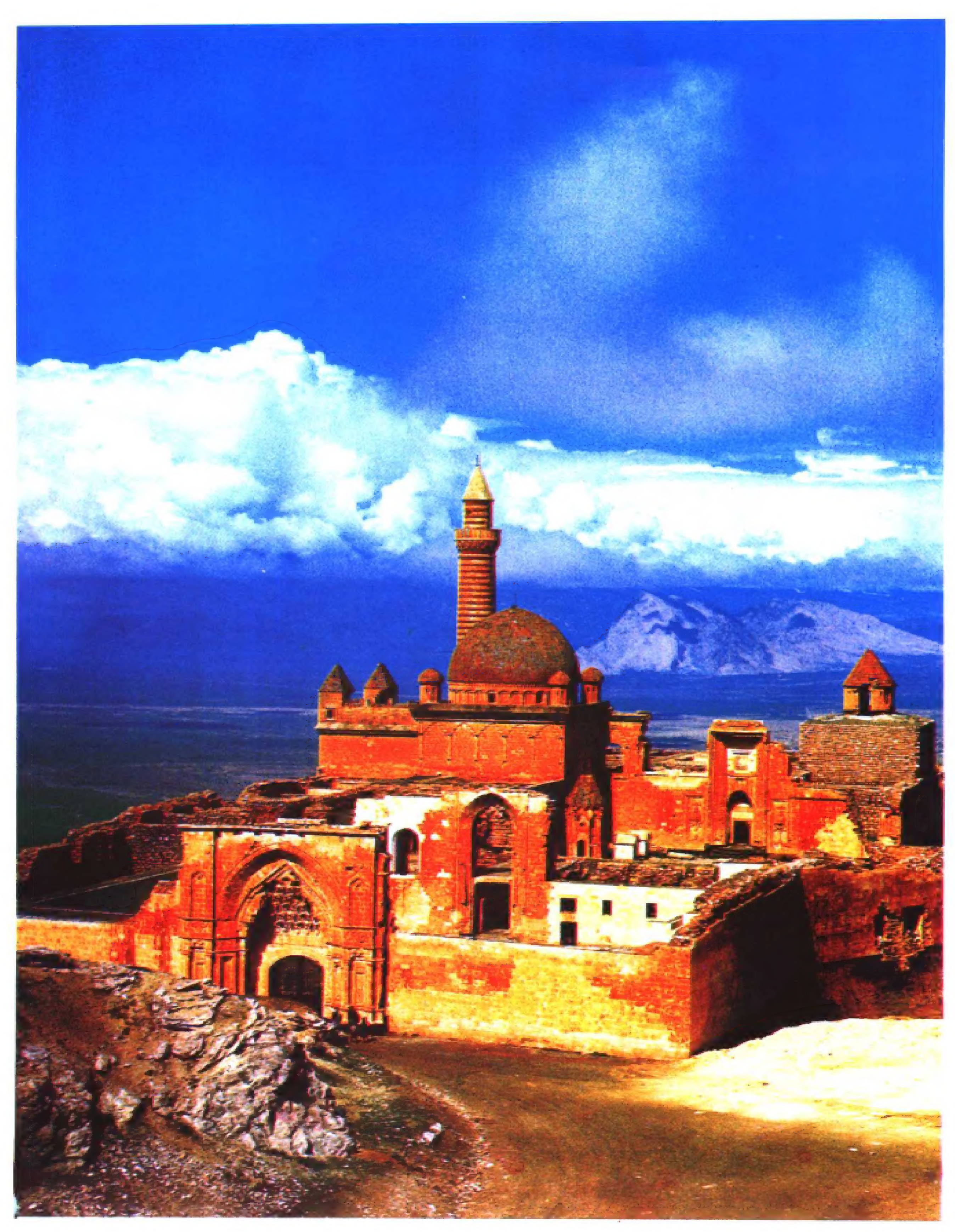
ZHŌNGDŌNG GUÓJIĀ TŌNGSHǏ
中东国家通史
土耳其卷
彭树智 主编
黄维民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516-3/K·737

2002年12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3⅛ 插页8
定价:27.00元



土耳其著名的古代遗址——塞尔舍斯图书馆



土耳其著名的伊沙克帕夏官殿



土耳其著名的齐切克商业大道



土耳其著名的爱琴海海滨——斐塞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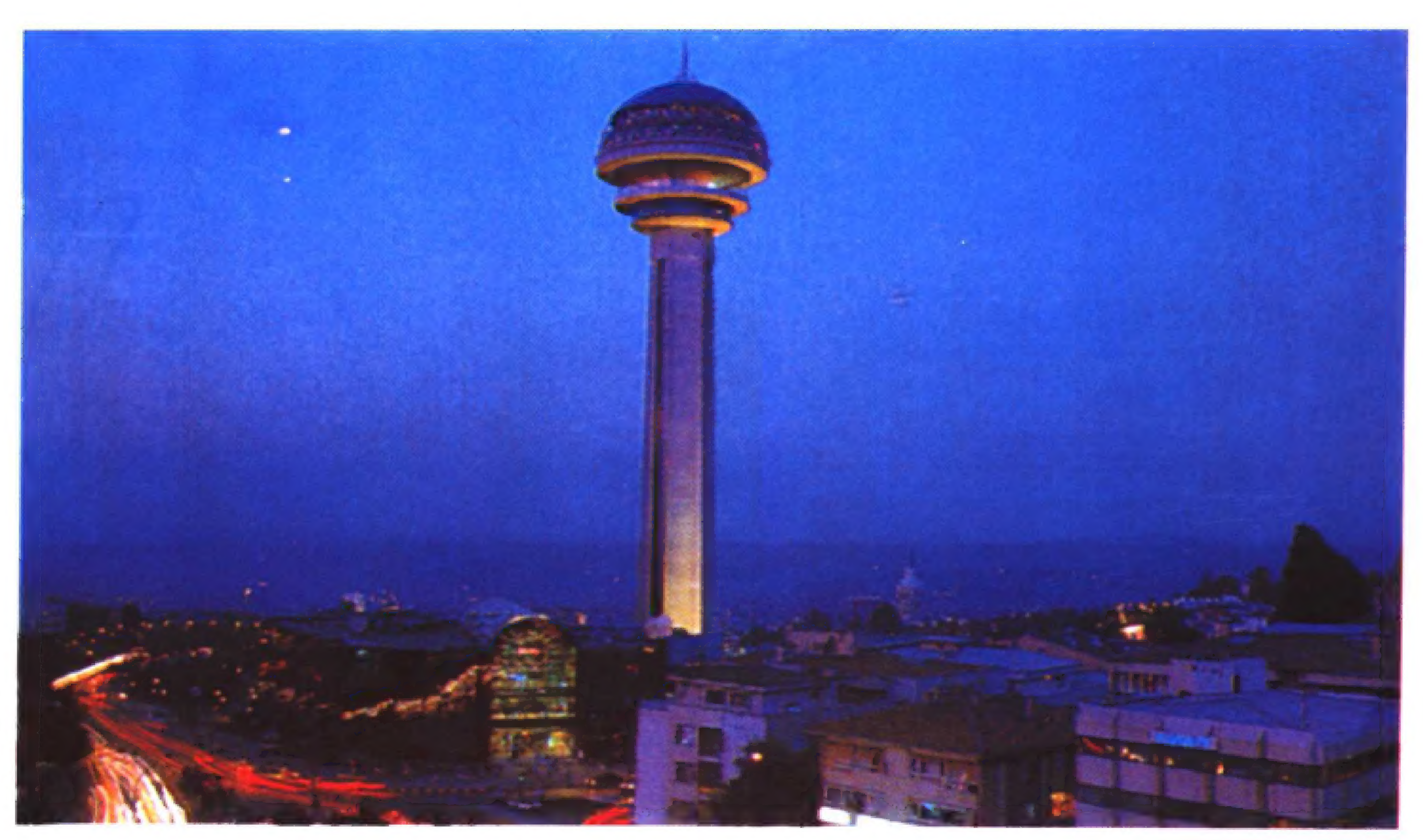
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风貌



土耳其著名的古代遗址——爱菲索斯



在土耳其考古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母神体



土耳其共和国首都——安卡拉

土耳其著名的海滨城市——伊兹密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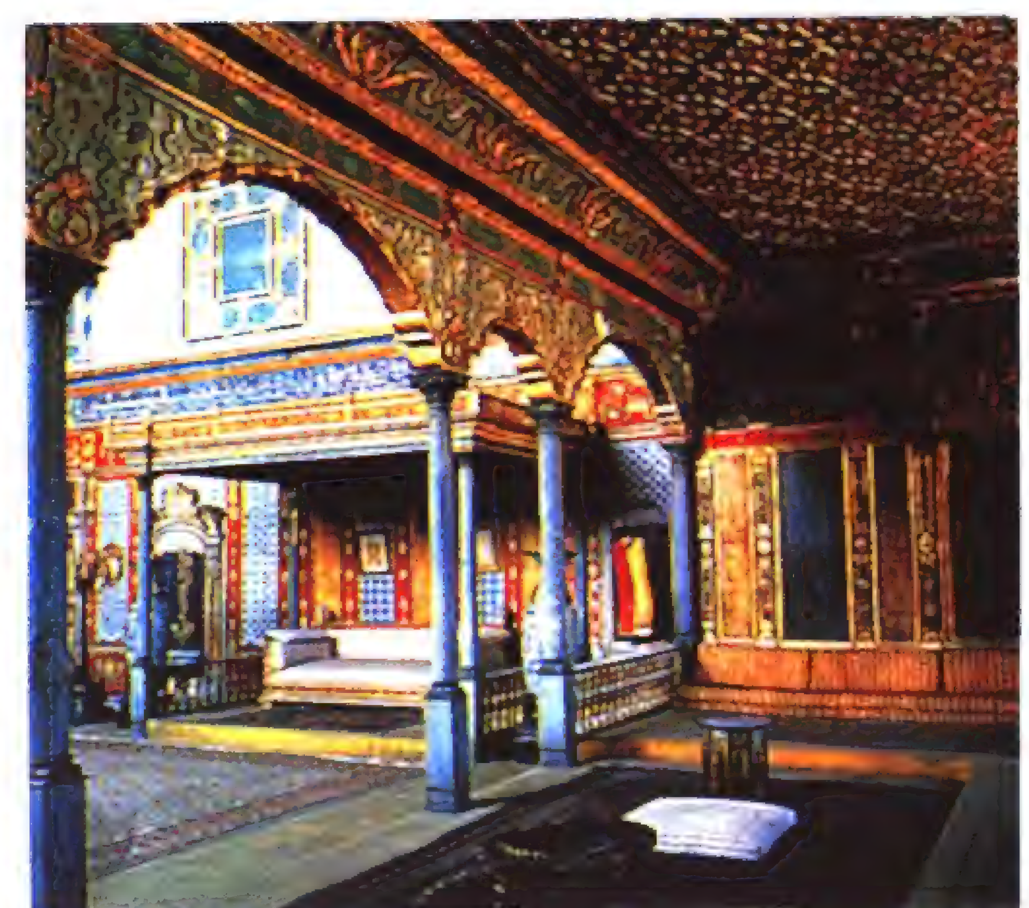


土耳其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艾哈迈德素丹清真寺

土耳其著名的阿克未克兹购物中心



土耳其著名的托普卡普宫



世界闻名的土耳其浴



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凯末尔



土耳其共和国第二任总统——伊诺努



土耳其共和国第三任总统——拜亚尔



土耳其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古尔塞勒



土耳其共和国第五任总统——苏奈



土耳其共和国第六任总统——科鲁蒂尔克



土耳其共和国第七任总统——埃夫伦



土耳其共和国第八任总统——厄扎尔



土耳其共和国第九任总统——德米雷尔



土耳其共和国第十任总统——塞泽尔

目　录

绪论　土耳其概况

一、土耳其的自然环境

复杂的地形与地貌

土耳其共和国，位于亚洲的最西部，横跨欧、亚两大洲。土耳其的面积为 814 578 平方公里，就其面积而言，它比意大利大一倍，大约两倍于英国。其亚洲部分坐落在小亚细亚半岛，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96.9%。欧洲部分处在巴尔干半岛的东南角，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 3.1%。土耳其境内绝大部分为高原、山地，仅沿海地区有狭窄的平原。土耳其三面环海，北为黑海，西及西南为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南为地中海，连接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是世界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它们横贯土耳其西部，把黑海和地中海连成了一片，成为沟通黑海与地中海的大动脉，通常人们也将它们合称为“黑海海峡”。因该海峡地形险要，历史上素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地理上，作为欧洲和亚洲的桥梁和交汇处，土耳其东临伊朗，东北部与年轻的阿塞拜疆共和国为邻，在东南方向同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壤，它的欧洲部分同保加利亚、希腊毗连。土耳其在地理

上的这种特殊性，使其成为东西合璧、南北荟萃之地，在中东、巴尔干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有着重大的影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土耳其就其地形、地貌而言，可谓复杂多变。在北部，从黑海向内陆延伸大约150～200公里的土地，是土耳其的北部褶皱带。该地区分布最广的是白垩纪松散沉积物和火山喷发物，也有多种多样的黏土、砂岩和石灰岩。在马尔马拉海的四周，地势的起伏变化不大，也很少有超过1 000米的高地，但在萨卡黑河以东，山体变得又高又陡，三列平行的山脉如同巨龙延伸至克泽尔河。在克泽尔河与耶库尔河之间的地质比较易碎，据地质学家们分析，这是由于岩石的抗蚀力逐渐减弱而造成的，但这里高达2 000米以上的矮小山脉并不鲜见。耶库尔河与阿塞拜疆共和国边界之间，是地形起伏变化较大，轮廓也较分明的地区。

土耳其的中央地块大体呈S形，它从伊兹密尔以南的爱琴海海岸向内陆延展，绕过首都安卡拉，穿过图兹湖和科尼亚，直至锡瓦斯附近，构成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主体。这一地块的地形大致可分为三条线。从爱琴海海岸向内陆到布尔萨至德尼兹利一线，是由一系列非常清晰的东西走向的断层构造形成南北排列的断块山和地堑。从布尔萨、德尼兹利向东到厄斯基色希尔、阿菲永一线，地面高层一般是500米向东逐渐升到1 000米，大部分地区坡度较缓，覆盖有第三世纪物质，地形构造复杂。以此为起点，向东到安卡拉、图兹湖、尼德一线，是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核心地带，海拔在1 000米左右，地势比较平坦，多为新第三世纪沉积物。此外，在经锡瓦斯附近为顶端的中央地块东部的三角带内，地形和构造复杂多样。安卡拉东北角到图兹湖东侧，峰峦叠嶂，山峰一般多在海拔1 700～2 000米之间。

土耳其南部地区的褶皱轮廓清晰明确，连绵不断，托罗斯山脉从爱琴海向伊斯德湾延伸，又沿阿拉伯地谷的北缘转向东北，然后向东拓展，安塔利亚湾正处在西托罗斯山的环抱之中。安塔利亚湾以西，南北走向的山脉自海湾的西岸陡然上升，在地中海沿岸菲尼克的东西侧也同样是断层陡壁。托罗斯山脉的中部从伊克山向东延伸至塞汉河上游地区。西部大体位于格克河盆地内，这里地形极为破碎，山脊极不明显，而位于博耳卡山和阿拉山地区的东部，地形起伏的变化又一次加大，同西岸形成鲜明的对照。东托罗斯山呈弧形沿阿拉伯地谷北侧延伸，在距离埃津兼、埃尔祖鲁姆、卡尔斯不到50公里处与北部褶皱带相接。它大体由两条山系组成，其间是一系列高原和矮小的山脉。地表一般比较破碎，但也有一些比较平坦的小块地面。

土耳其的阿拉伯地谷是一个稳定地块，它贯穿安塔基亚、阿德亚曼和锡尔特三个省。这里的地形和北西多山的地区相比显得比较平缓，大部分地区是宽阔的高原，高度由北向南递减，在与叙利亚接壤的边界上高度一般为400米。最高点是位于迪亚巴克尔以西的近期熔岩上的卡腊贾山，高达1 919米。在土耳其境内，低地非常有限，仅有的一些低地几乎全部位于极狭窄的沿海地带。全国只有17.5%的地面海拔在500米以下，55%以上地区的海拔都在500～1 500米之间，海拔在1 500～2 500米之间的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22%，平均高度为1 132米。

由于断层和褶皱的普遍，再加上脆弱构造线的地壳运动，使得土耳其境内的地震灾难很多，成为世界上最常发生地震而且受地震破坏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发生在1939年的那次大地震，使2万多人丧失了性命。发生在1999年8月17日的那次里氏7.8级

大地震使伊斯米特市及西部许多地区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同年 11 月 12 日，在西北部城镇迪兹杰又发生 7.2 级地震。可以说土耳其全境几乎没有不受到地震威胁的地区。

奇特的河流湖泊与交通

受复杂多变的地形与地貌的影响，土耳其境内的河流，不是直接流入地中海，便是经过黑海和马尔马拉海间接地注入地中海，而东部地区的河流大多经过伊拉克直接注入波斯湾则当是一个例外。流入黑海和地中海的河流大多短小而流急，陡降的河流与沿岸的山脉构造线横交，而注入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的河流一般都河面宽阔，水流缓慢。

在土耳其众多的河流中，最为著名的当数非腊特河。众所周知，世界上著名的幼发拉底河就源自土耳其，但它在土耳其境内并不叫幼发拉底河，而名之曰"非腊特河"。非腊特河在突厥语中意为希望之河。非腊特河的北部源头出自土耳其东部重镇埃尔祖鲁姆以北的洼地，被称之卡拉苏河；其东部的源头则穿行在凡湖和阿勒山之间的高山峻岭中，被称为木腊特河。两股源头在克班附近交汇后，穿山越岭，湾湾南下，在流经阿拉伯地谷时，则切入地面很深，堪称奇观。在非腊特河的两岸，景色奇特，变幻莫测。它时而像一把利剑劈开重峦叠峰，奔腾在高山峻岭的峡谷之中；时而又徜徉在平原、洼地之间潺潺而流，低声吟唱。就地形而言，非腊特河的北端和东端有着广阔的盆地和深水湖泊，南端则与东托罗斯山纵横交错，河水切入地表，造就了许多峡谷。

土耳其著名的大阿勒山是一个大火山堆，既是土耳其境内的最高峰，又是非腊特河的东部源头。大阿勒山的峰顶终年披银盖

雪,山腰间挂满冰川,大自然的神功让人们叹为观止。非腊特河流域是土耳其的主要高原地,空旷的山坡上长满了牧草,一直延伸到无限美丽的孔亚大平原。高原地带水草丰美,居民多以放牧马、牛、羊为生,并以此赢得了“山地土耳其人”的美称。他们有着逐水草而居的习俗,放牧时个个身穿厚毡做成的长袍,袍长过膝,双肩向上高耸,远远望去,犹如身披战袍的侠客。非腊特河滋哺的山地土耳其人,男人不仅尚武善骑,而且也同妇女一样,能歌善舞。每逢重大的节日,白天人们举行赛马或摔跤,夜晚身穿色彩绚丽民族服装的男男女女,手托点然蜡烛的木盘,伴随着萨兹琴和锁呐欢快的节拍,跳起蜡烛舞蹈。

在非腊特河北源附近的埃尔祖鲁姆东北 10 公里处的托普山上,1877 年 10 月曾发生过土耳其民众不畏强暴,英勇抵抗沙俄侵略者的动人故事,为缅怀纪念那些为国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如今在托普山上高高耸立着一座名为阿齐耶的烈士纪念碑。它由三根巨大的方形石柱组成,石柱下粗上细,犹如三柄长剑直入云端。纪念碑的底座上镶嵌着一块铜牌,底座上刻有一组浮雕,再现了当年土耳其人民抗击沙俄侵略者的英勇场面,纪念碑后,长眠着土耳其历史上抗俄女英雄哈顿。

除了著名的非腊特河之外,土耳其东部的凡湖另有一番景色。风景如画的凡湖面积为 3 760 平方公里,湖深大约为 25 米,湖面海拔 1 720 米,是土耳其境内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土耳其主要的水产养殖基地。此外,在土耳其东部还有美丽的图兹湖。受地形和气候的影响,总体而言,土耳其境内的一部分地区,尤其是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河流流量的季节变化很大,河流资源不利于航运的发展,却非常有益于水力发电。

不仅土耳其的河流湖泊受其复杂多变的地形与地貌的影响，而且交通运输也和其地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土耳其的爱琴海沿岸地区地形起伏，呈东西走向，给进入内地提供了通道，但南北向的交通却非常困难，只能靠海运发展交通运输业。在安纳托利亚的中部，虽然地形变化不多，但人口聚居的地方多在边缘地区，大多数贸易通道自古都是沿着南北边缘绕行，而极少穿过中部，使其中部交通运输受到限制。在庞延山脉的中部，耶库尔河相继穿过克泽尔河谷和杰克雷克，如同一条走廊，是迈向内地的极好通道。土耳其的东南部，地形以高原为主，自古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地中海地区之间的黄金通道。安纳托利亚东部，东西走向的交通虽然在到达伊朗边境以前要经过很高的山口，但毕竟还能有路可走，南北间的交通则相对困难得多。

作为地处欧亚两大洲交汇点的土耳其，是世界海陆交通要冲，具有欧亚大陆桥的美称。从 19 世纪末开始，欧洲一些国家开辟的亚洲通道，都横贯土耳其，然后伸向波斯湾、高加索和巴基斯坦；在海上，土耳其扼守黑海海峡，此海峡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的惟一出海口，也是独联体西部国家通达海外的重要通道。因此，土耳其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发展交通，把交通运输作为一个主要的投资部门。通过数十年来的努力，目前土耳其的交通已经形成相当完整的体系，建成了世界上最具规模地连接欧洲与中东地区之间的交通网。

土耳其在 1973 年建成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吊桥，像一条巨蟒横贯海峡，把欧亚两大洲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大桥全长 1 560 米，宽 33 米，高 64 米，桥面可同时并行 6 辆汽车，任何巨型轮船均可以从大桥底下安然通过，每天平均通过大桥的汽车为 6 万辆左

右，从1988年以来，土耳其又投巨资，相继在黑海海峡上架起了三座大桥，使欧亚两大洲相互之间的往来更加便利通畅。

土耳其铁路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1858年奥斯曼帝国政府在英、法等国的帮助下，通过贷款修建了第一条铁路。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时，一条主要的国际铁路干线已经从西北到东南穿行于土耳其全境，并建有通往梅尔辛、安卡拉、伊兹密尔和班德尔马等铁路干线。通过70多年来的努力，土耳其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但又较稀疏的铁路网。近年来，由于受到公路运输的冲击，国内铁路运输的能力已经退居到了第二位。

土耳其的海洋运输在其国内远距离大宗货物运输和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土耳其的主要港口有黑海海峡的伊斯坦布尔，爱琴海的伊兹密尔，地中海的梅尔辛，黑海的萨姆松和特拉布松等。目前，土耳其的外贸物质几乎全部都是通过海运，陆运只占2%。贸易口岸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其中伊斯坦布尔的货物吞吐量占整个货物吞吐量的1/3。

除了公路、铁路和海洋运输外，土耳其的航空运输也比较完备发达，具有相当的规模。在土耳其，国内外航线的空运业务，主要由国营土耳其航空公司经营，每年的客运量大约为650万人次，每年的货运量大约为7.6万吨。土耳其的各大城市之间，以及首都与部分边远省会之间都有定期的航班。目前，土耳其共有30多条国内航线，70多条国际航线，主要机场有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安塔利亚等。

过渡性的气候与农业

土耳其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是被人们称作地中海气候型的一

种干燥炎热的半大陆性的变型，兼有地中海型和温带大陆性气候的特征，正处在地中海气候刚开始向大陆性气候转换的过渡带上。土耳其气候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土耳其恰处在北纬36°～40°之间，南北分别与地中海、黑海为界，在这两个大海的对面分别是西亚、北非的热带沙漠和东欧大平原，再加上内陆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多变，这些因素都给土耳其气候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土耳其的夏季普遍干旱少雨，冬季大部分的气温又比真正的地中海气候还低，昼夜温差大，降雨量少且集中在初春时节。但土耳其部分地区冬季降雨多，具有地中海气候的特征。

在土耳其，1月份的内陆平均气候低于冰点以下，越向东越冷，东部大部分地区在-10℃以下，极端最低气温的西部可达-20℃，东部更降至-40℃，而沿海的边缘地区，1月份的平均气温大多在5℃以上，冬季气温最高的地方是安纳托利亚低地和阿达纳低地。土耳其的夏季，除地势较高的山区外，普遍炎热。7月份的平均气温在20℃以上，安纳托利亚西部和中部的气温在25℃以上，其东南部更高达30℃以上。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南部大陆性气候比较典型，年降雨量在300～400毫米之间。土耳其的沿海地区是最湿润的地区，其中黑海地区的年降雨量平均在2 000毫米以上，庞延山和托罗斯山的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大多维持在1 000～1 500毫米之间。

土耳其气候的鲜明特征还表现在沿海地带和内陆高原气候的差异上。沿海地带深受海洋的直接影响，内陆高原则由于山脉的阻隔，挡住了来自海洋温湿的气流。难怪内陆高原呈现出夏季炎热，冬季严寒，春雨绵绵那种典型的干燥的大陆性气候。而广大的沿海地区，包括爱琴海的西部以及黑海的沿岸地区，则深受海洋的

影响，表现为夏季无酷热，冬季较温暖，年降雨量普遍偏高的特征。但地中海沿岸的地区，则夏季炎热少雨，冬季温和多雨，年降雨量为500～700毫米，地中海气候特征表现得特别明显。

土耳其的气候造就了土耳其土壤的基本类型，并且同气候一样，表现出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土耳其比较湿润的地区，土壤主要是红色灰化土，棕色灰化土以及棕色森林土，它们所占面积超过全国的1/3，主要见于山区，以南、西、北三个方向环抱安纳托利亚内陆区。这些地方土层薄且发育不成熟，不宜从事农耕，主要植被都是森林。在安纳托利亚内陆和东南部的干燥地区，棕色土壤和红色土壤分布较广，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0%，虽然这里的农业发展潜力有限，但却是土耳其旱作谷物分布的主要生产区，就其土质而言，东西土质多为钙质土，有利于灌溉农业的发展。

土耳其最为干燥的地区，多为灰钙土，它是一种半沙漠性质的土壤，主要分布在科尼亚盆地的南部和阿塞拜疆共和国边界的阿拉斯河谷地，冲积土是土耳其的土壤中可以用作农业耕作的最佳土壤，虽然它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但却是土耳其农业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这种土壤多分布在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沿岸地区的河谷，以及塞汉河、杰汉河、克泽尔河和耶库尔河的三角洲平原上，也散布在安纳托利亚的东部和中部的盆地中。

一个国家农业的发展同它的地形、气候和土壤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土耳其复杂的地形、地貌和过渡性的气候类型，以及多样的土壤，给土耳其农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表现在沿海地区农业和内陆地区农业的差异上，沿海地区的气候和雨量比较适合发展农业，气温和光照能够满足多种农作物生长的需要，一些亚热带

作物，甚至一些热带作物，如香蕉和茶叶也能在此生长。而内地多山，冬季冰雪覆盖，银妆素裹，夏季冰雪消融，为灌溉农业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但目前这一资源的利用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

在土耳其，地中海沿岸以及爱琴海沿岸深受地中海气候的影响，黑海沿岸地区则冬季温暖，夏季炎热，雨量充沛，但由于地形的原因，只有小面积平坦或缓倾的土地可供农业耕作。土耳其内陆的西半部，是全国降雨量最少的干旱地区，这里有大片平坦或缓倾的土地，并且大多属中等肥沃的土壤，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边缘接近多雨的山地，可发展灌溉农业，但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心，河流大多深切入地表，灌溉变得极其困难。加之生长期短和冬季低温的影响，使得沿海地区的许多高产农作物不能在此生长。土耳其内陆的东部地区山地较多，水源奇缺，平坦或缓倾的土地只限于较小的山地围绕着的盆地中。土耳其的东南部，则分布着大面积的农业耕地，只是这里远离水源，夏季酷热，降雨量稀少，不便农田的灌溉。

农业在土耳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绝大部分人以农业为主，土耳其不仅是中东地区的第一农业大国，就是在世界主要农业生产国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土耳其目前是世界上第七大小麦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榛子、无核葡萄干和无花果出口国，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时，当时它的农业起点是很低的，不仅全国耕地面积仅有1 000多万公顷，而且农业的经营方式还依旧是分散的家族式经营。为了尽快发展农业，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废除了“什一税”，确定了土地的私有制，调整了农业指导机构，并组建了农业教育系统。

政府的新举措给土耳其农业带来了转机，到20世纪30年代

初，耕地面积增加了1倍多，农业总产量增长了58%。从30年代起到40年代末，土耳其在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上，把发展重心主要放在工业上，在这一时期的前10年，对农业的发展影响不大，工农业比例还比较协调。在这一时期的后10年，一是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二是由于1949年的大旱，使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停滞的局面，到了50年代，土耳其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比重不断增加，农业投资仅次于交通业的投资。与此同时，政府还调整了农业政策，表现为降低牲畜税，减免农民的交通税，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政策的导向和政府的重视，给50年代土耳其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这一时期土耳其的农业可耕地面积扩大了60%，农业总产量增长了86%。60年代后，土耳其政府在农业经营战略上实行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使农业生产向集约化转轨。集约化的经营方式，为土耳其农业持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70年代开始，土耳其的农业产品开始大量销往其他中东国家和欧洲共同体市场。1973年，土耳其公布了土地法，计划在15年内将320万公顷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并大兴水利，推广机器的使用，增施化肥，选用优良品种，对农民进行科普教育等。土地法给土耳其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1971～1978年，土耳其农业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3%，从1976年开始，土耳其由粮食进口国转变为粮食出口国，8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农业稳步增长，1980年产谷物2 406.3万吨，1987年增至2 927.5万吨(不含薯类)，增长率为21.7%，1988年仅土耳其的小麦产量就达到了2 050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0%，居世界第7位，既可满足国内消费的需要，且又有大量的出口，这在中东地区是惟一的一家。

目前土耳其的农业耕地面积大约为2 850万公顷，其中约有一半种植谷物。谷物种类主要有小麦、大麦、黑麦、玉米、大米、燕麦等。谷物生产尤以小麦为主。另外，棉花、烟草、甜菜、油料作物和水果也是土耳其的主要经济作物，也是这个国家主要出口的农产品。土耳其的棉花主要产区在伊斯梅尔和阿达那，近年来棉花每年的平均总产量大约为62万吨，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土耳其的烟草在世界上闻名遐尔，特别是黑海沿岸萨姆松的烟草质量为最佳，多被美国的卷烟厂所选用。土耳其过渡性的气候类型也非常适宜各种水果的生长。如无核葡萄、香蕉、梨、杏、苹果、柠檬、橘子、橙子、无花果、橄榄油和榛子的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土耳其水果的主要产区在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此外，土耳其的畜牧业也极为发达。安纳托利亚的大片草原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土耳其目前拥有的牲畜头数在中东国家中居第一位，在世界上也排名第八位，安卡拉羊毛驰名世界，是纺织开司米的主要原料，每年的产量大约为9 000吨。土耳其畜产品主要销往海湾等阿拉伯石油国家，每年的出口值大约为5亿美元。

丰富的矿物资源与工业

土耳其独特的地质构造和复杂的地形、地貌，使其拥有世界上丰富的矿物资源，铬、汞、锑、重晶石、天然硼酸盐、锰、铜等矿产的储存量在世界上均居前列。特别是铬矿，现已探明的储存量为1亿吨，居世界第二位。硼酸盐为6～6.5亿吨，锰大约为1亿吨，铜为3亿吨，锑为12.5万吨，汞为8 000吨。此外，土耳其的煤炭资源也极其丰富，现已探明的储存量为50亿吨，主要分布于黑海沿岸和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煤田。除了煤炭外，

土耳其的其他燃料和能源极其短缺，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石油。根据土耳其国内工业发展的需要，每年大约需要 2 000 万吨的原油，但国内仅能够生产大约 200 万吨的原油，缺口很大，所以每年依赖从国外进口大约价值 50 亿美元左右的石油，基本上占当年出口总值的 40%～50%。原油进口国主要是伊拉克和伊朗，现有好几条输油管道从伊拉克直接伸展到土耳其。

为了弥补能源的短缺，土耳其历届政府一方面呼吁要以煤代油，另一方面大力开发水力资源。土耳其的水力资源极其丰富，每年的水力发电量大约为 250 亿度，使能源不足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除了开发水力资源外，土耳其政府还积极开发地热和天然气，以弥补燃料和能源的短缺。在土耳其境内，现已被查明的天然气有 8 万亿立方米左右。

此外，土耳其也是一个森林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森林面积大约为 2 000 公顷，森林覆盖率居中东国家首位。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工业化一直是土耳其国民经济发展中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土耳其的早期工业开始于 1933 年政府推行的一项五年计划。土耳其在 1923 年建立共和国后，政治上虽然获得了独立，但经济上却极其落后。为了改变传统落后的农业在经济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土耳其政府采取了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政策，把外国人控制的公司、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并把同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经济部门纳入国营机构，优先发展民族工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家干预下，在 20 世纪 30 年代土耳其相继建立了水泥、钢铁、纺织、玻璃和陶瓷等工业部门，以求走工业内向发展的道路，用民族工业的产品来满足国内的需要。1932～1939 年，土耳其工业

品的产量增加了 2.4 倍，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中所占比重由 10%，增加到了 16%。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土耳其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为民族工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内市场条件。二战以后，土耳其的工业产量在全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增至 23%，一些新工业部门也相继建立了起来，使人均工业品占有量超过二战前的 4～5 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土耳其政府主要采取了利用外资兴办重工业的方式，同时扶持私人资本发展轻工业。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私人资本对轻工业的投资已达到国营企业投资总额的 60%，一批私人资本和外资共同经营的企业如制糖、造纸、纺织、医药等工业迅速发展，给土耳其工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机和希望。整个 60 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是循序渐进的。从 1963 年开始，土耳其实施了一个十五年的长期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又分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63～1967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1968～1972 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73～1977 年）三期来实施。在历史上，1967 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土耳其真正工业化的开端。

70 年代的前期，土耳其的工业发展基本稳定，但到了 70 年代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也未能使土耳其幸免，许多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土耳其工业化的进程布满了阴影。80 年代土耳其政府积极调整经济政策，推行稳定发展战略，把一大批长期亏损的国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同时大力发展合营经济，并购入大量廉价石油，促进电力、褐煤和焦炭的生产。政策的积极引导，对土耳其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 1981～1986 年，土耳其的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7%，1992 年工业产值达到420.16

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9%。近年来，土耳其的工业增长率年平均为5%，远远超过了农业及其他经济部门的增长速度。

在土耳其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上，加工业一直居主导地位，目前加工业产值已占工业产值的80%还多。在众多的加工业部门中，尤其以纺织、食品、烟草、建筑材料、钢铁和机械工业等部门为主。而在加工业中，纺织业一枝独秀，现已成为土耳其加工业中最大的部门，其产值占所有加工业产值的20%，从事纺织行业工作的工人占加工业工人总数的1/3。土耳其的钢铁工业是伴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钢铁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1953年土耳其的钢铁产量仅为1.35万吨，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1987年猛增到了730万吨，1999年高达1 200万吨，至此，土耳其再也不依赖外国的钢材进口，并且还可以有小批量的出口。

近年来，土耳其的机械工业异军突起，成为加工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工业部门。过去土耳其只有少数工厂能够生产数量有限的车床、织机等，大部分产品需要依赖进口。在国家鼓励国内外投资发展机械工业的政策引导下，土耳其的机械制造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汽车工业成为仅次于纺织业的第二大行业，产值大约占工业总产值的5%。目前，土耳其国内共有大型汽车制造厂20多家，其中有一部分是外国大型汽车跨国公司的子公司。除了汽车工业外，土耳其的锡瓦斯和伊兹米特已成为铁路车辆和铁路设备制造中心，开塞利成为飞机制造中心。此外，土耳其的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工业也发展迅速，许多产品已经打入国际市场。

在土耳其，食品工业是其又一个重要的工业部门，主要是中小

型企业加工农产品、畜产品和鱼类产品，农产品加工要以甜菜制糖业为主，目前，土耳其的糖产量除了能满足国内的需要外，还大量出口到国外。土耳其的其他食品工业有水果和蔬菜罐头业和橄榄榨油业，主要分布在爱琴海沿岸地区。由土耳其政府实行专卖的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酒的酿造业，主要分布在首都安卡拉、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沿岸地区。在土耳其，食品工业大多由政府直接控制，这是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特点。

在土耳其的建材工业中，水泥工业和玻璃工业位居前列。土耳其的水泥工业主要是由公私合营的工厂组成，其次是由德国提供贷款资助建造的工厂。目前土耳其共有水泥厂 30 多家，水泥年产量为 3 500 万吨左右，作为建材工业的又一大支柱的玻璃制造业，主要是依靠前苏联的帮助发展起来的。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土耳其在察依罗瓦建起了中东地区最大的玻璃厂，年产平板玻璃 750 万平方米，既满足了本国市场的需要，还有部分供出口。

在土耳其，造纸和纸板工业主要控制在政府办的塞卡公司手中。90 年代以来，塞卡公司通过得到世界银行和欧洲银行提供的贷款，修建了一座集纸、纸浆和木材于一体的联合企业，随后不久又另建立了三家分厂，总投资达 40 亿美元，从而促进了土耳其造纸和纸板工业的迅速发展。另外，土耳其的石化工业发展很快规模较大，大型企业主要是国营企业或合资企业，外国投资比例较高。土耳其的第一家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坐落在伊兹密尔。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土耳其国内对化肥的需求量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土耳其的历届政府都很重视化肥的生产。1977 年土耳其的化肥产量仅为 279 万吨，1987 年达到763.8万吨，10 年间增长了 174%。目前，土耳其的化肥产量不仅能满足国内的需要，还可以有部分出

口。总之，就土耳其工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它的前景是广阔的。

二、土耳其的社会构成

土耳其人的渊源

土耳其的名称源于国内主要居民土耳其人，土耳其一词由突厥音转变而来，在鞑靼语中，突厥有“勇敢”的意思，土耳其意即“勇敢人的国家”。土耳其人的祖先原本是居住在亚洲北方草原和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之为突厥人。大约在6～7世纪，突厥人开始向西南大迁徙，进入中亚。8世纪在中亚的突厥人开始接受了伊斯兰教。不久从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下获得独立。11世纪初，在乌古思部族的领导下，不断向西南迁徙的突厥人占领了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中心巴格达，建立了突厥塞尔柱人的王朝，从而结束了阿拉伯人在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但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这时仍然在拜占廷帝国的辖制下。正因为如此，突厥塞尔柱人的王朝建立后继续把突厥人引向小亚细亚半岛。1071年的曼齐克特之战，突厥塞尔柱人以少胜多，打败了拜占廷帝国的军队，拜占廷帝国被迫从小亚细亚半岛撤出，而大批突厥人不断迁徙到如今土耳其共和国所在的小亚细亚半岛。

突厥人在迁徙过程中，把突厥语和伊斯兰教带到了所到之处，并不断与当地人杂居通婚，使他们最终接受了突厥人的语言和宗教。同样，大多数突厥人也放弃了游牧迁徙的传统而转向定居，开始接受了阿拉伯与波斯乃至拜占廷帝国的文化，从而出现了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这种种族和文化的大融合，造就了土耳其

兼容并蓄、博取众长的特点，赋予了土耳其文化的独特性质，即其混合特色。特别是13世纪蒙古人对小亚细亚半岛的入侵，使突厥塞尔柱人建立的罗姆素丹国沦为蒙古人的藩属，又给突厥人增添了新的血液，加速了突厥人与小亚细亚半岛土著居民的融合，从此使小亚细亚半岛开始了漫长的突厥与伊斯兰化的发展过程。

14世纪初，日渐衰落的突厥塞尔柱人罗姆素丹国，分裂成为10个突厥小公国。日后建立了雄霸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人，就是这10个突厥小公国的其中之一。他们同当时那些居住在拜占廷帝国边境地区的其他突厥人一样，在其首领埃尔托格鲁尔的率领下，打着向异教徒圣战的宗教旗帜，进入到拜占廷帝国的疆域进行疯狂的掠夺。年迈多病的埃尔托格鲁尔去世以后，其子奥斯曼接管了部落，继任首领，并占领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北部，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雏形。奥斯曼去世以后，其子奥尔汉继位，通过不断的武力征服，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雄霸欧亚非三大洲、令世界战怵的封建军事帝国，前后持续了600年，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种族和文化的融合。在奥斯曼帝国前后持续的600年当中，前300年是不断扩张的强盛时期，后300年则是其日渐衰落的积弱不振时期。虽然统治者阶层试图通过一系列具有西方色彩的社会改革来改变奥斯曼帝国衰落的现状，但最终因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导致了改革的失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斯曼帝国只剩下了土耳其本土，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等土地。

1914年8月2日，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天，奥斯曼帝国和德国秘密缔结同盟条约，站在同盟国一边，承担了对协约国作战的义务。10月底，奥斯曼帝国政府默许德国人控制下

的舰队在黑海炮击俄国军舰和港口,从而彻底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年 10 月,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被迫在 30 日与协约国签订《摩德洛斯停战协定》,使奥斯曼帝国不仅丧失了在北非和西亚的属国,而且本土也未能免遭半殖民地的厄运。1920 年 8 月 10 日,协约国迫使奥斯曼帝国政府在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上签字。根据条约的规定,黑海海峡地区成了特别区,由国际共管,首都伊斯坦布尔虽然留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但却附加了许多苛刻的条件。安纳托利亚的东部以及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名为"独立"国家,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的附属国。这时留在奥斯曼帝国名下的国土,只剩下安卡拉和黑海之间一小块地方,奥斯曼帝国到了日落西山的尽头。

在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的时刻,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爱国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毅然挺身而出,发动和倡导了反对西方列强,反对奥斯曼封建王朝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建立了一支人民武装,同奥斯曼帝国素丹政府公开决裂。1922 年 9 月,在英国等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希腊军队侵占了土耳其的大片领土。在凯末尔的亲自指挥下,土耳其军队击溃了希腊军队,收复了大片的失地,最终取得了民族独立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土耳其的历史上,1923 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年 7 月,土耳其同英、法、意等国签订了《协约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因该条约签订于瑞士的洛桑,历史上又称《洛桑和约》。根据该条约的规定,除了摩苏尔外,其他被英、法、意、希腊等国占领的领土都无条件地归土耳其所有,土耳其在自己的民族疆界内保持一致统一,外国人在土耳其所拥有的各种特权也均无条件地被废除。

1923 年 10 月 29 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凯末尔出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早在共和国成立以前的 1922 年 11 月，凯末尔就废除了素丹制。新生的共和国在其成立后不久，凯末尔又积极地推行一系列具有世俗化特征的社会改革，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实行政教分离，采用资产阶级民商法制度，致力于发展土耳其的民族经济。

三权分立的政体

土耳其的现行宪法是在 1982 年颁布的，它是共和国宪政史上的第三部宪法。按照 1982 年的宪法规定，土耳其是一个民族、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反对泛伊斯兰主义，严禁宗教介入政体。

1923 年 10 月 29 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在集中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制定宪法的工作。1924 年 4 月 20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其宪法共分为总纲、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人民权利、杂项等 6 章，每章又分为若干条，共计 105 条。在此以前的土耳其人看来，自己是素丹的伊斯兰臣民，没有公民和国籍的概念，而 1924 年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土耳其人的“公民资格”，宣布所有长期居住在土耳其的居民不论宗教信仰以及种族如何，其公民资格一律为土耳其人。此外，1924 年的宪法还规定，土耳其为民主共和国，以一院制的大国民议会为国会，由选民依照选举法直接选出议员组成。国会是土耳其国家的惟一权力机构，议员任期 4 年，可以连选连任。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总理由总统从议员中遴选，政府成员由总理从议员中选择。政府应对议会负责，国民议会将随时监

督和改组政府,政府无权解散国会。

1928 年修改后的土耳其宪法删除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规定,1937 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又对宪法作了重大的修改,在宪法总则的第二条中规定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六项基本原则,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革主义。修改后的宪法并规定给予土耳其妇女以参政权,宣布年满 22 岁的男女均有选举权,年满 30 岁的男女均有被选举权。这一变化表明土耳其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已经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60 年 5 月 27 日,土耳其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现行政府。1961 年 7 月土耳其召开议会并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了新的宪法,新宪法包括前言和正文,共计 157 条,其中包含临时性条款 11 条。1961 年的宪法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国家。土耳其的国家主权无条件地属于国民,任何个人、家庭、团体或阶级一律平等,不得享有特权,国家公务人员必须按期公布财产状况。

按照 1961 年宪法的规定,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是共和国的立法机关,由大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行政权由总统与部长会议掌管,部长会议是国家的最高执行机关,它对议会负责。总统是国家元首,由大国民议会的议员们选举产生,任期 7 年,不得连任,当选后必须脱离土耳其所有的政党,其议员职责也同时终止。法院享有国家的司法权。

在 1961 年宪法的规范下,土耳其共和国走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 20 年。1980 年 9 月 12 日,以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为首的土耳其高级将领按管了土耳其国家政权。1981 年 10 月,新政权组织了专门的宪法起草小组,开始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并

在 1982 年 11 月 7 日举行全民投票，通过了新宪法。1982 年的新宪法共 7 章 117 条，外加临时法规 16 条。该宪法承袭了 1961 年宪法的基本内容，但对许多重要条款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按照新宪法的规定，土耳其是一个坚持民族团结、尊重人权、政权分离的、世俗的、社会的和民主的法制国家。1982 年的宪法还特别强调宪法的地位，指出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其他法律不得与之相抵触，同时确认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其国内机制的运作而言，土耳其共和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执掌，坚持三权分立的原则。

大国民议会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它的主要职能是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讨论和通过国家预算，决定和发行货币，宣布大赦和特赦，批准法院的死刑判决，批准同外国签订的条约，批准向国外派遣军队或允许外国军队进入土耳其，同意对外宣战。大国民议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总统，获得议员总数的 2/3 以上赞成票者当选。

土耳其政府是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拥有国家的行政权。政府总理由总统任命。从程序上讲，总理组阁后，必须向议会宣读施政纲领，议会多数票通过施政纲领后，政府才能成立。政府由国务部长、司法部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文化部长、财政部长、海关关长等组成。

土耳其的司法体系深受欧美等国家的影响，司法权完全独立，凡是法院的裁定，国家所有机构都必须执行。土耳其设立有最高司法议会，由最高法院、下级法院以及大国民议会选出的 18 名正式人员和 5 名候补人员组成，任期 4 年，每两年改选半数。最高司

法议会主要处理法官的任命、职务和法规等问题。土耳其中央一级的法院主要有宪法法院，负责审理有关法律是否违反宪法的案件，审判国家高级官员；上诉法院，主要负责审理下级法院的刑事以及民事案件；行政事务法院，主要负责审理行政纠纷案件；司法分歧法院，主要负责审理民事、行政、军事法院间的判决分歧；审计法院，主要负责监督国家预算开支执行等审计情况；财政法院，主要负责监督国家预算开支执行情况，国家安全法院，主要负责审理有关国家安全与完整的案件。此外，土耳其还设有各级军事法院，最高军事法院的法官由总统亲自任命。

作为一个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土耳其的政党繁多，可谓政党云集的国家。现有政党20个左右，目前对土耳其国内政局影响较大的有祖国党、正确道路党、社会民主人民党、繁荣党等。根据土耳其那些政党的施政纲领和政治观点来看，一般可划分为左翼政党、右翼政党、温和的中间派政党，也可以划分为世俗的政党和具有宗教色彩的政党两大类。除了繁多的政党外，土耳其还有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团体——土耳其工人工会联合会，它成立于1952年7月，是土耳其成立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全国性工会组织，现有会员200万人左右，包括遍布土耳其全国的300多个行业分工会，其中最大的是“统一的食品工业工会”，它还是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土耳其工人工会联合会自称为“民族主义团体”，宣布“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主张对各党派和政府保持“独立”。

民族与宗教习俗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根据2000年人

口普查情况，现有人口6 659.65万人左右，居中东地区各国之首。土耳其人口分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不平衡性，许多地区的人口密度低于全国平均数，人口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数的地方又很有限。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沿岸地区，黑海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是全国人口集中的地带，面积虽然仅只有全国的 29.9%，而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 26.6%，而广大的内陆地区，包括安纳托利亚的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区，面积占全国的 62.7%，人口仅占全国的 45.2%，人口密度不及全国平均数的一半，是土耳其人口最稀疏的地区。

土耳其官方在公布人口资料时，从不划分民族，并长期保持这一不变的做法，似乎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土耳其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土耳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点可以从政府公布的语言材料和宗教材料中作出判断。根据有关资料的分析，在土耳其的人口中，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大约为 10%，土耳其人是土耳其最大的民族，在全国均有分布，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0%左右。

库尔德人是仅次于土耳其人的第二大民族，大约占全国人口的 8%，他们主要分布在土耳其的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库尔德人人口虽多，但大多数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土耳其境内现有阿拉伯人 70 万左右，主要分布在土耳其的东南部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希腊人在土耳其的人口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20 世纪初，曾多达 150 万人左右，但在 1919～1922 年的那场希土战争后，两国达成协约互遣对方侨民，因此许多希腊人离开了土耳其，现在土耳其全境内仅剩留希腊人 12 万人左右，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以及查纳卡莱省，多为基督东正教信徒。在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首都安卡拉至凡湖之间，现有许多亚美尼亚

人的居民点，人口大约为 10 万左右，多信奉基督教。格鲁吉亚人早先居住在土耳其东北部的乔鲁和卡拉河的上游，后来大多移居到了中部的布尔萨、锡诺普等地，人口大约为 9 万左右，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现多已被土耳其人所同化。切尔克斯人是北高加索移民的后裔，现有人口大约 15 万左右，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分布在托尔特和马拉提亚之间的地区，多已被土耳其人所同化。鞑靼人是克里米亚移民的后裔，18 世纪末，许多鞑靼人从克里米亚迁徙而来，如今只有 1 万人左右，且大部分被土耳其人所同化，目前仅剩小部分居住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凡城和哈卡里之间的结合区。吉卜赛人在土耳其境内大约有 3 万人，多数过着半游荡的生活，主要分布在伊切尔省和阿达纳省的南部地区，少数吉卜赛人现已在大城市中过上了定居的生活。目前在土耳其境内还有大约 3.5 万保利亚人，3 万犹太人，3 万波斯尼亚人，1.5 万阿尔尼尼亚人，3 000 塞尔维亚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伊斯坦布尔和高拉基亚的一些地区。那里还居住着 1.2 万的西班牙人，6 000 法兰西人，这些民族因为共同使用法语，被土耳其人称为法兰克人。目前在土耳其境内人数最少的民族有意大利人、德国人、英国人、波斯人，他们的人数大约都在 3 000 人左右。

土耳其的国语为土耳其语，全国 98% 的居民讲土耳其语。古代土耳其语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中的一员，在其演变与发展中字形和发音上类似阿拉伯语，受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影响，且有很多词来源于阿拉伯和波斯语。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接受西方文化，1932 年凯末尔在土耳其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彻底放弃土耳其传统的文字书写方法，实行拉丁化，并大量借用法语、德语、英语等外来词汇，

使之语言词汇进一步丰富，今天的土耳其语在书写上完全拉丁化了，与西方语言无根本上的区别。

在历史上，土耳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统治者既是素丹（国王），又是哈里发（伊斯兰教的最高宗教领袖），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为一身。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已在土耳其的国民心理和文化传统中深深扎下了根。自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总统为了进一步铲除奥斯曼帝国君主制度复辟的可能性，以巩固和完善资产阶级共和国，迅速开展了一系列以废除哈里发神权制度，实行以政教分离为宗旨的世俗化改革，宣布土耳其是一个非宗教国家。

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在宗教问题上主要表现为政教分离，而不是非宗教论。其目的不是消灭伊斯兰教，而是要使它同国家政权相分离，停止宗教及阐释人在政治、社会及文化事业中所具有的那种作用，以便使伊斯兰教具有一种更加现代化和更加民族化的形式。这一方面表明在土耳其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另一方面也表明，土耳其将告别宗教对国家政治事务控制的时代，使国家进入一个非宗教、多民族共同发展的现代化时期。

作为一个具有伊斯兰文化背景和传统的国家，在当今土耳其社会中，大约有 98% 的人信仰伊斯兰教，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逊尼派穆斯林，仅有 10% 的人属于什叶派穆斯林。在什叶派穆斯林中，又以阿里伊拉希派教徒人数最多，大部分是库尔德人，居第二位的是努赛里派教徒，大约有 10 万人，主要是阿拉伯人。走遍土耳其全境，从乡村到城市，随处都可以见到带有尖塔的清真寺，几乎所有的清真寺都铺着地毯，摆放着古兰经，足见土耳其人受伊斯兰教影响之深。在土耳其境内的基督教徒分属于东正教派、亚美

尼亚格高利派、聂斯托利派和天主教派。此外,土耳其还有大约7万耶稣会教徒,3万犹太教徒。

土耳其在地理上可以说是一个亚洲国家,但自近代以来,土耳其一直推行"西方化"的方针。土耳其人坚信,欧洲与亚洲的分界不在一条山脉,一条河流或一片海洋,而在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在于社会的伦理道德,在于人们心目中的价值观念,因此,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土耳其一直把自己视为是一个欧洲国家。目前,土耳其是欧洲安全组织、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和北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也是欧洲联盟的联系成员国。1987年,土耳其正式申请加入欧洲联盟,因此,早日加入欧盟,实现与欧洲一体化,正式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是土耳其的基本国策,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支柱和重点,这关系到21世纪土耳其的发展前途和国际地位。

土耳其所具有的历史烙印和地理上的特殊性,使它在习俗文化方面,既保留了东方的传统,又具有深深的欧洲情结,成为东西合璧、南北荟萃之地,造就了土耳其人兼容并蓄、博取众长的特点。土耳其人在时装设计上不断吸取法国和意大利人的精华,他们注重着装,追逐潮流,同时又对传统服饰始终爱不能舍,那种典型的东方游牧民族传统服装的宽裆收脚灯笼裤,仍然有人穿用。此外,坐落在土耳其大小城乡的建筑物,也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标志之一。在外观上,既有那种穹顶线条流畅,窗上装饰各色玻璃,墙壁包贴图案瓷砖带有明显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物,又有吸收了西方建筑精华,处处体现出一种现代风格的高楼大厦。特别是闻名世界的土耳其菜肴,更是土耳其人的另一骄傲,它种类繁多,做法以烤、炸、煎、煮为主,以肉食品见长。土耳其的菜肴既不像西餐那样过分追求营养和热量,又不像中餐那样讲究色香味俱全,它集中西大

菜的优点，既实惠又美味，自成一派。一般在饭店或旅游就餐时，人们都使用刀叉，但某些家庭仍然保持着传统习俗，用餐时全家围圈席地而坐，用掰开的面包夹菜吃，这与传统上人们用大饼捏菜吃的习惯没有两样。

在土耳其历史上，伊斯兰教法规定男子可以娶妻妾四人，但自1926年凯末尔实行世俗化改革之后，土耳其的法律禁止一夫多妻制，由于土耳其公民结婚登记局只准许信仰伊斯兰教男子同他四个宗教妻妾中的一个进行正式的结婚登记，所以，目前在土耳其是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者并存。此外，人们对正式的、非宗教的结婚仪式不太重视，而对传统的，由伊斯兰教长主持的穆斯林仪式的婚礼举办的相当隆重。土耳其人的葬礼一般也都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规举行。人死后首先要请伊斯兰教长来诵吟古兰经，并由教长将面纱盖在死者的脸上，祈祷后默哀片刻，然后把死者殓放入棺木。搬运灵柩时，女人们要唱挽歌，埋葬死者时由教长继续唱挽歌，埋葬后在土上掘出许多沟，并把准备好的开水灌下去。

行政区域与教育

土耳其现有八大行政区，即埃尔祖鲁姆、迪亚尔巴克尔、阿达纳、开塞利、安卡拉、利尼亚、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有时为了统计之便，还以不同方式组成更大的区域，把土耳其分为欧洲部分、马尔马拉海区、爱琴海区、地中海区、安纳托利亚西部区、安纳托利亚中部区、安纳托利亚东部区和东南部区，也是八大区。

土耳其自1923年10月29日成立共和国以来，边界只作过一次重大的调整。它涉及哈塔伊省，即伊斯旨德仑和安塔基亚周围的地区。1920年，哈塔伊省是叙利亚委托统治地的一部分，受治

于法国，土耳其政府对此强烈反对。共和国成立后，遂于 1936 年宣布该地区独立，称亚历山大勒塔桑贾克，1938 年改称哈塔伊共和国。1939 年 7 月土耳其与法国签约，法国正式承认哈塔伊并入土耳其。

土耳其现有 67 个省，大多以省会命名。就面积而言，各省差异悬殊，最大的科尼亚省面积为 47 721 平方公里，最小的里津省面积仅为 3 920 平方公里。根据土耳其行政区域的划分，各省下设县或市，全国 67 个省共下辖 580 个县。县的规模亦大小不等，面积大的县可达到一个省的面积，但一般人口稀少，大多数县的面积在 500～2 000 平方公里之间，人口也大约在 5～10 万之间，村是土耳其最低的一级行政组织，目前全国共有 36 030 个左右。村与村之间的界线大多未经划定，而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往往几个村就可以构成一个市，因为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土耳其人口规模超过 1 万的居民点就是城市。此外，按照土耳其宪法的规定，各省的省长均由中央政府任命，县长由省长委派，但市长和村长则采取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每五年改选一次，由于村和市自行选举村民代表、村长，以及市民代表、市长，实行自治，自己管理自己，所以省长和县长对市和村只能起到行政监督的指导作用。

土耳其主要有三个历史文化悠久的著名城市，它们是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

伊斯坦布尔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西岸，正当欧亚交通要冲。它始建于公元前 7 世纪，称拜占廷，公元 330 年为东罗马帝国(历史上也称拜占廷帝国)的首都，改名为君士坦丁堡。1453 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占领了它，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此后一直到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它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伊斯坦布尔市区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欧化、现代的见约卢及相邻的希希利区；一是最古老的法特赫与埃米尔内尼旧城区，它位于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岬角上；一是于斯屈达尔和卡迪科伊区，它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伊斯坦布尔市区人口的4/5居住在欧洲一侧，而亚洲一侧的人口仅占市区总人口的1/5。此外，市内有举世闻名的云塔清真寺，又称为蓝色清真寺。它始建于17世纪，是全国最大的清真寺，可以容纳2 000多人同时做礼拜。市内的阿亚索非亚清真寺是由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建而成的，1935年后土耳其政府把它改为博物馆，供人们参观游玩。在伊斯坦布尔众多古老的宫殿建筑物中，首推托普卡帕宫为代表。此宫殿始建于1462年，是一座富丽堂皇、气势雄伟的皇宫。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奥斯曼帝国的素丹及其妃嫔穿戴的配有金色图案、紫地黄花及各种花色图案的中国丝绸制品。如今的伊斯坦布尔人口大约为600万，不仅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和经济、文化中心。工人人数占全国总数的50%左右，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1.5%，全国50%的进口，15%的出口都是通过该市的港口进行的，这个古老美丽的城市拥有3所大学和各种类型的博物馆。

土耳其的第二大城市是安卡拉，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成为这个国家的首都。它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坐落在安卡拉河南岸，靠近楚布克河及哈特普河与恩杰河的汇合处，是一个拥有3 000多年城市文明史的都市。它一度是喜特王国时期的重要中心，费里吉亚时代的一个城堡，更是加拉太的色尔特王国的首都，罗马帝国时代加拉提亚省的首府。在土耳其历史上颇具影响的拜占廷时代，以及突厥塞尔柱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历史

时期，它都是政治、经济、军事和商业中心。如今的安卡拉，已是一个拥有大约340万人，仅次于伊斯坦布尔的现代化大都市。安卡拉的市区由留有古城墙的老市区和沿着阿塔土耳克大道向南延伸5公里的新市区构成。老城部分以及城堡内外，房屋破旧矮小，新城区大厦林立，政府机构、大国民议会、总统府以及中、高级住宅区的新型建筑物均建于此，老城市场与店铺同新城以新月广场20层建筑街区为代表的现代化商店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今的安卡拉既是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拥有著名的安卡拉大学等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高等学府。特别是位于市区的喜特人古代考古学博物馆，更具民族风格。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首都，四通发达，纵横交错的宽阔公路，使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阿纳达等重要城市连成一片。

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是伊兹密尔，它位于爱琴海东岸，旧名士麦那，人口大约为130万，该城自古便是爱琴海沿岸农业区的中心，全国重要的出口港，这里交通发达方便，除了公路外，有铁路干线通往国内各大城市，伊兹密尔市区清洁整齐，宽阔的大街两旁高楼林立，市区还保留着众多的名胜古迹，如古钟楼，15世纪的希萨尔清真寺，以及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阿耳忒弥神庙遗址，等等。

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发展教育，教育被历届政府视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土耳其现行教育体制的总目标规定：把每一位土耳其人培养成为献身于凯末尔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改良运动的公民；具有建设精神、改革精神和生产能力的人；通过发展人们的兴趣、才智和能力，使全体土耳其公民获得为寻求幸福和对社会做贡献所必需的知识、技能、观念、协作

习惯和职业专长，从而为谋生铺平道路。

土耳其的基础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小学为免费义务教育，学制为5年，由政府管理和监督，课程必须经教育部门批准，每个学期开学和放假的日期，也均由教育部门决定。每学年在城市不能少于200天，在乡村不得少于170天，着重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并为儿童接受较高等级的教育做准备。在土耳其，初中也是免费义务教育，学制为3年。土耳其的中等教育层次一般包括高中、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三类。高中旨在培养国家的后备人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学制为3年。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被作为国家中等教育的补充，均由教育部门统一管理。

土耳其的大学均由国家兴办，没有私立大学，主要财政拨款来源于中央政府，所有希望升入大学的高中生，必须参加全国统考，然后根据学生考试的成绩和他们的自愿，将其录取到不同的大学学习。大学的学制一般为4～6年不等。土耳其现有大学50多所，著名的有伊斯坦布尔大学、安卡拉大学、爱琴海大学、中东技术大学、哈普泰普大学和博斯普鲁斯大学。

第一章　奥斯曼人的崛起

一、小亚细亚的突厥民族

突厥人的起源与大迁徙

奥斯曼人的祖先，是从中亚迁徙到小亚细亚的突厥民族中乌古思部落的一支。作为小亚细亚游牧民族的突厥人，主要是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所人种贮藏库而具有重要性，并且随着小亚细亚地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奥斯曼人在崛起过程中赖以补充的后备军，突厥游牧部落顺利地完成了由突厥人成为奥斯曼帝国社会一分子的这种转变。

突厥人的早期历史，有很大一部分相当含糊，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许多历史学家著书立传，认为突厥人是乌拉尔—阿尔泰语族的一个分支，最早出现在贝加尔湖南面，戈壁沙滩以北的今日蒙古一带。中国历史上早期的有关资料，提到过一个由这类草原游牧部落组成的军事联盟，这类游牧部落中国人在历史上称之为匈奴，其中很可能突厥部落所占的成分最大。

这一地区幅员辽阔，但由于土地贫瘠，水源匮乏，气候恶劣，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异常的缓慢，而且越来越不能保证不断增长的

游牧民对起码生活品的需求，所以自古以来，这一地区一直经受着周期性牧场危机的冲击，这种牧场危机的冲击，不仅动摇着这一地区原始的经济基础，而且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气候条件的不断变化，引发出了一系列游牧民族连续不断地向居住在大草原边缘的农耕文明地区的大迁徙。这些不断向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南部、西部迁徙的游牧民族，经过连年的混战和不断地向外迁徙，并在许多地区转为定居，所以在历史上公元6世纪出现了日后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作突厥人，被中国人称之匈奴人的许多部落政权。他们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氏族部落是其最基本的社会生产单位。广大的游牧民也把氏族部落视作维持他们自身生存的惟一依靠，而且以首领为首的少数显贵也凭借着这种血缘关系、宗法氏族制度，以及各自部落的习惯法来巩固和延续他们的统治，并享有各种特权。由于这些游牧部落的社会生产力低下，战争与抢劫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血亲复仇，同态复仇盛行。

东部的突厥部落政权以一条向北流入贝加尔湖的河流为中心，他们多从事放牧、经商和农业。这些突厥部落政权或是由于被中国人征服，或是由于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为争夺牧场、牲畜、土地和水源等诉诸以残酷的武力，而时起时落，时隐时现，如同走马灯似的交换着，使人们的社会生活一直持续在恐怖之中，很少获得片刻的安宁。

其他一些突厥部落则向南、向西推进，到公元10世纪时，这些不屈不挠的游牧民族已定居在中亚地区。他们主要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以放牧骆驼、马、牛和羊为主。有少数定居的部落则在沙漠绿洲种植谷物，在商业集市上进行实物交换，以牲畜、兽皮、林产和战俘，换取来自南方和西方穆斯林边境的商品货物。这

些昙花一现的突厥游牧部落政权，因坐落在中国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上而颇得地利之便，也曾经盛极一时。历史上的拜占廷帝国为了抵抗伊朗高原上波斯帝国对小亚细亚的入侵，曾经从首都君士坦丁堡多次派出使者，向这些突厥游牧部落政权进贡，以期得到他们的帮助，这足以表明在当时突厥游牧部落政权实力的强大。但是这些突厥游牧部落政权，也像东部的突厥游牧部落政权一样，因连年不断的战乱、灾荒、瘟疫，以及外族的入侵，不久就土崩瓦解了。然而，这一地区却一直仍然保留着突厥种族的特征。

公元 11 世纪中叶，讲突厥语的乌古思、土库曼各部族开始成批地大量涌入由拜占廷帝国统治的小亚细亚地区。位于东地中海沿岸的小亚细亚，自古以来就是东方各列强争夺的地区。公元 395 年，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小亚细亚归属东罗马的拜占廷帝国所有。公元 7 世纪阿拉伯人崛起之后，通过不断向外扩张的伊斯兰圣战，相继占领了西亚与北非的广大地区，但在拜占廷帝国顽强的抵抗下，小亚细亚这块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一直都在拜占廷帝国的控制之下。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小亚细亚成了拜占廷帝国有效抵抗伊斯兰阿拉伯帝国数次侵略进攻的坚强堡垒。从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小亚细亚的托罗斯山脉和其东部的亚美尼亚高原，形成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分界线。

居住在中亚的突厥游牧部落在大量迁徙涌入小亚细亚之前，就因与这一地区广大穆斯林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交往，而逐渐地皈依了伊斯兰教。人们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兴旺盛起，使他们最终皈依伊斯兰教，主要是通过与穆斯林的广泛接触而造成的。一是在南边边界上常有小规模冲突中遇到的偷袭者，以及双方的俘虏；二是在他们统治地区到处漫游的穆斯林圣徒；三是往

返于两地通商贸易的商人。特别是在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商业贸易的互动往来是最有影响力的。也是就是说，同穆斯林在经济上的长期广泛交往，才最终使突厥游牧部落逐渐从受佛教、摩尼教和犹太教的影响而改宗伊斯兰教。因此，大量迁徙涌入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游牧部落，是作为圣战的伊斯兰教战士而出现的。大量迁徙涌入小亚细亚以后，突厥人完全按照伊斯兰教和突厥游牧部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不断地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新的突厥民族，从而揭开了小亚细亚地区伊斯兰化与突厥化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

通过征服而迁徙到小亚细亚地区的突厥人，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有一种错综复杂而多样化的传统与文化。受拜占廷帝国影响的小亚细亚式的传统与文化，便是其中之一。它的重要性表现为：小亚细亚的当地居民很容易被突厥人慢慢地同化，并且继续拥有他们的土地。小亚细亚的当地居民不仅在宗教上改信了伊斯兰教，而且还在语言和文化上逐渐地自己变成了突厥人，成了突厥人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与突厥人并肩作战，充任骑兵和步兵，在突厥人不断对外征服和扩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伊斯兰教对突厥人的影响

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前，突厥人的宗教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原始而又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愚昧无知的物质与精神状态，使得突厥人根本无法正确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及其规律，只能凭借贫乏的生活经验进行假想和幻想，认为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充满着超人的力量。他们主要信奉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

死，精神长存。流行对大自然、动植物、日月、祖先、偶像等各种现象的崇拜。除了原始宗教外，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些突厥人，特别是早已定居的突厥部落也接受了已经传入他们社会中的佛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影响。

公元7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在征服伊朗之后，便把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宣讲的信条带到了中亚、西亚突厥人居住地的边缘。随后，一些突厥游牧部落进入了伊斯兰教统治的国土，接受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变成了穆斯林，为伊斯兰阿拉伯帝国的领土扩张，而英勇作战。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战功显赫，以及有卓越的政治才能而平步青云，担任了伊斯兰阿拉伯帝国的一些重要官职，成了举足轻重的社会新权贵，然而，此时的绝大多数突厥人，仍然居住在咸海以东的中亚、西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并同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商人，从事着一些商贸活动，一直到公元10世纪才完全接受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兴旺昌盛起来，使他们最终皈依伊斯兰教，主要是通过与穆斯林的广泛接触，而自觉自愿所造成的，这与其他许多民族是通过武力征服，而被迫皈依伊斯兰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早期突厥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他们的传布师是在他们统治地区到处漫游的托钵僧，到处流浪的苦行者和神秘主义者，以及往返于两地通商贸易的穆斯林商人。这些人传布的是和城市中的神学家和神学院所传布的极为不同的一种信仰。对于突厥人来说，阿拉伯帝国统治集团那种隐晦莫测，自负为完善无缺的正统伊斯兰教，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不带有束缚和屈从的痕迹，自然保持着早期伊斯兰教的纯朴、好战和自由的特点。他们为真主、为荣誉和为夺取战利品，而向那些不信仰伊

斯兰教的异教徒们不断地挑起圣战。而这些素质和特点，却已经在阿拉伯民族中间，从古典伊斯兰教神权政体到一个东方封建帝国的这一变化过程中，逐渐地丧失了。特别是突厥人把那种充满着早期伊斯兰教原有的火热、率直和战斗性的信仰，带到了小亚细亚并加以广泛地传播。而这种信仰是一种把信条当作战争的呐喊，把教义当作动员号令的武士宗教精神。在这种宗教精神的鼓舞下，突厥人通过武力征服了小亚细亚，他们让穆斯林的政客和文人，法学家和神学家，商人和工匠，都迁入到这块新取得的领土上，并把古典伊斯兰教旧有的高度都市文明，也一起带了进来，使得小亚细亚这块土地逐渐地打上了伊斯兰教传统生活方式的烙印，变成了穆斯林生活与文化的中心。

突厥人的伊斯兰化过程十分顺利，因为对于这个在当时存在着各种各样宗教、信仰和迷信等大杂烩的游牧民族来说，伊斯兰教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活力，使得突厥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伊斯兰教关于只有一个万能真主的观念，人类平等和兄弟情谊的教义，使突厥人过去那种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完全革命化了。尤其是伊斯兰教信仰在那些正式入教的突厥人中，起到了一种新的纽带作用，使得过去庞大乱杂的突厥游牧部落，在他们的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理念之下联合在一起了，并迅速成为世界伊斯兰文化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生力军。此外，突厥人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也把阿拉伯帝国的圣典、社会制度和统治方式一并接纳了过来，取得了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对突厥人旧有宗教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决定性胜利，彻底改变了历史上突厥人社会发展的本来道路。总之，伊斯兰教这一因素，对日后突厥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奥斯曼人崛起和称霸的历

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突厥人一旦改宗伊斯兰教以后，便在当时比较强大的突厥塞尔柱人的领导下，渡过了锡尔河不断地向南扩张。起初他们只是阿拉伯帝国亲王的雇佣军，但不久就变成为省总督，最后竟成了阿拉伯帝国境内广大地区的自主统治者。此时伊斯兰阿拉伯帝国首领哈里发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开始分化瓦解，整个伊斯兰阿拉伯世界被帝国内部统治者的你争我夺，朝代间的交替更迭，推入到了一片混沌之中。突厥塞尔柱人或者受到邀请，要求提供对哈里发政权的保护，或者是凭借武力纷纷进入今日的伊朗地区。公元1055年，在首领图格鲁尔的率领下，突厥塞尔柱人攻陷了伊斯兰阿拉伯帝国首领哈里发政权的都城巴格达，突入到正统伊斯兰教教徒定居的核心地区，并在伊斯兰教的腹地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帝国。虽然他们恢复了哈里发的尊严，表示要为哈里发服务，因为哈里发仍然是伊斯兰教世界的最高宗教领袖，但此时的实权，已经完全落入到突厥塞尔柱人首领图格鲁尔及其后嗣的手中，并被授予素丹的称号。到这时为止，突厥人不但完全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且他们自己也成了古老伊斯兰教世界主要地区的统治者。他们建立的政权以伊斯兰法和伊斯兰教的征税原则为基石，以军人这个替国家服役，并以土地分封形式获得报偿的阶层为支柱，代表军官、官僚和宗教贵族行使各种职能。从此，不管是由突厥塞尔柱人建立的帝国，还是由他们的继承者奥斯曼人建立的帝国，由奠定一直到灭亡，都始终是一个致力促进或保卫伊斯兰教权力与信仰的国家。

突厥塞尔柱人与拜占廷帝国的争夺

突厥塞尔柱人是游牧于锡尔河北岸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乌古思部落联盟中的一支。大约在公元10世纪中期,他们在其首领塞尔柱的统率下,越过吉尔吉斯草原漂泊到了河外地区。在布哈拉定居后不久,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在参与河中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突厥塞尔柱人遭受到了失败,从此臣服于阿富汗人的加兹尼王朝,被称之突厥塞尔柱人。

突厥塞尔柱人骁勇慓悍,善于骑射,为阿富汗人加兹尼王朝的对外军事扩张屡立战功,从而获得大量的封地,政治与军事势力逐渐的强大。1037年,突厥塞尔柱人在其首领图格鲁尔的率领下反叛阿富汗人的加兹尼王朝,并在1040年著名的丹丹纳干战役中,依靠强大的骑兵,打败了他们的宗主国加兹尼王朝,建立起了突厥塞尔柱人帝国。从此,他们依靠强大的军力征服了整个伊朗,不久又攻占了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迫使哈里发授予突厥塞尔柱人的首领图格鲁尔东西方之王和素丹的称号。

突厥塞尔柱人建立起帝国之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为突厥塞尔柱人以及随他们而来的大批其他的突厥游牧部落,去寻求一个良好的生存之地。这些突厥游牧部落与突厥塞尔柱人在血缘上是相同的,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也是相近的,他们是突厥塞尔柱人可靠的同盟者。他们今天可以和平地去放牧他们的畜群,或者去耕种他们的谷物,明天就可能拿起刀枪用武力去支持突厥塞尔柱人进一步征服小亚细亚。

当大批的突厥游牧部落在突厥塞尔柱人的率领下，势如破竹，横扫小亚细亚的时候，拜占廷帝国正处于王朝更迭的混乱之

中。1057年，马其顿王朝结束，开始了拜占廷帝国的都卡王朝统治时期。在都卡王朝统治的24年中，拜占廷帝国的政局异常动荡。在军人强大势力的左右下，都卡王朝像走马灯似的先后更换了五位皇帝。1068年，拜占廷帝国的军人们密谋杀害了君士坦丁·都卡皇帝，而把他们的亲信罗马纽斯推上了皇位。罗马纽斯登上皇位以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率领20万雇佣大军，在小亚细亚以东凡湖附近的小镇曼齐克特，试图与突厥塞尔柱人决战。1071年8月26日，突厥塞尔柱人素丹阿尔普仅率1.5万人的军队前往迎战。在双方激烈的交战中，突厥塞尔柱人充分利用他们的骑兵善于机动作战的优势，勇猛灵活地歼灭了大量拜占廷帝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再加上那些非常不可靠的外国雇佣军临阵倒戈，使得拜占廷帝国的军队大败，死伤无计，甚至连皇帝罗马纽斯也被俘获。

曼齐克特之战，是突厥塞尔柱人与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长期争夺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转折点，从拜占廷帝国方面来看，这次战败加剧了拜占廷帝国内部的社会矛盾和各派系之间的斗争。拜占廷帝国的官吏和将军们竞相将许多城镇和战略要塞奉献给入侵的突厥塞尔柱人，以求在突厥塞尔柱人的行政部门中，谋取一官半职。失去小亚细亚的拜占廷帝国，像一具枯瘦的躯体变得十分空虚，因为富庶的小亚细亚再也不能为拜占廷帝国提供粮食、原料、税收、人力和兵源了，从而注定了拜占廷帝国的灭亡。从突厥塞尔柱人方面来看，曼齐克特之战产生了三个结果。首先打开了征服小亚细亚的大门，从根本上震撼了拜占廷帝国的统治基础。在曼齐克特之战以前，突厥塞尔柱人对小亚细亚采取的是打了就跑的掠夺性远征。而此后，大批突厥人拥入小亚细亚，并且开始在

那里定居扎根。其次，曼齐克特之战以后，突厥塞尔柱人对当地居民或者进行屠杀，或者强迫他们集体皈依伊斯兰教，使得小亚细亚在人种、宗教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裂变。从此，这一地区开始了一个漫长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最后，曼齐克特之战以后，突厥塞尔柱人以小亚细亚的西部城镇尼西亚为其首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罗姆素丹国。在多次打败拜占廷帝国的军队之后，趁机不断扩张领土，相继占领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陈兵马尔马拉海沿岸，对拜占廷帝国在欧洲的统治直接构成了威胁。

曼齐克特之战以后，拜占廷帝国的新皇帝米查尔七世曾于1074年2月，向罗马教皇乔治七世呼吁，愿意东正教与西方天主教联合，请求教皇召集欧洲诸国国王组成基督教十字军，共同对付侵占小亚细亚，直接威胁拜占廷帝国在欧洲统治的突厥塞尔柱人。1096年，大批的西方十字军云集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首先开往小亚细亚同突厥塞尔柱人作战的十字军，是一些光有宗教信仰热情，但武器装备却非常落后的穷人。因此，他们很快就被突厥塞尔柱人围歼消灭了。不久，第二批武器装备精良的欧洲封建骑士军，大规模地到达小亚细亚，在连续攻占了许多城镇以后，他们开始围攻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都城尼西亚。当时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国王苏里曼之子开雷斯，正统帅着几十万大军在伊朗高原同波斯人作战。闻讯后，他匆忙率军赶回都城尼西亚，但是，当他还未赶到时，都城的守军弹尽粮绝，已经向十字军投降，放在都城国库里的金银财宝，以及开雷斯的家眷被押运回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满腔义愤的开雷斯联合小亚细亚境内的所有突厥人，于1097年7月与十字军展开了生死激战。在战斗中，由于突厥塞尔柱人在人数与武器装备上都远远不及十字军，终

因双方力量相差悬殊而遭到惨败。开雷斯在腿部负伤后,仅带着剩下不足千人的队伍,西渡萨卡里亚河撤往山区。

坐收渔人之利的拜占廷帝国,不费吹灰之力,乘机夺回了小亚细亚的北部、西部和南部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突厥人,或者被十字军与拜占廷帝国的军队所屠杀,或者被迫大规模地往东迁徙,人员和财产损失惨重。此时的突厥塞尔柱人仅仅占据着小亚细亚中部的科尼亚,他们的罗姆素丹国完全处于丹尼什曼艾米尔的保护之下。1155 年 2 月,开雷斯在沮丧和绝望中病故,其长子继位,为开雷斯二世。开雷斯二世继位后,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跑到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廷帝国求和。此时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对拜占廷帝国已经完全不构成什么威胁,所以曼奴尔皇帝在接受了大量的贿赂之后,同开雷斯二世签订了和平协议,承认他为全权负责管理小亚细亚突厥人日常事务的领袖。此时突厥塞尔柱人的统治地区,再次从萨卡里亚扩展到了幼发拉底河地区。

正当忙于巴尔干事务的拜占廷帝国皇帝曼奴尔逐渐地意识到,开雷斯二世在不远的将来,必定要重新威胁拜占廷帝国的安全,对此使他深感恐慌。于是,他借口突厥塞尔柱人违背了不能向小亚细亚西部扩展的协议,决定发兵攻打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起初,开雷斯二世为了避免与杀气腾腾的拜占廷帝国军队正面冲突,提议双方重新缔结和平条约,相互之间不要打仗,但被自命不凡的曼奴尔皇帝断然拒绝,于是 1176 年 9 月,决心背水一战的开雷斯二世,统帅突厥塞尔柱人的军队与拜占廷帝国的军队,在埃里迪尔湖北岸的迈里奥法克垄展开了决战。在战斗中,突厥塞尔柱人在开雷斯二世身先士卒的表率下冲向敌阵,拜占廷帝国

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纷纷弃逃或投降。开雷斯二世完全可以乘胜追击已经溃不成军的拜占廷帝国军队，并俘获曼奴尔皇帝，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马上接受了拜占廷帝国提出的和谈要求，其主要的原因是害怕引起西欧基督教十字军的武装干涉。因此，当拜占廷帝国满足了由突厥塞尔柱人提出的，完全有利于他们根本利益的重新调整双方边境的建议之后，开雷斯二世立即罢兵回营。迈里奥法克垄之战以后，突厥塞尔柱人重新又获取了小亚细亚西部的许多重要城镇。尤其是在 1182 年占领了地中海沿岸的安塔利亚，以及夺取锡诺普尔进入黑海之后，使得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再次成为一个滨海国家。

迈里奥法克垄之战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从此结束了拜占廷帝国总是把小亚细亚看成是其重要领土的传统观念，彻底打消了把突厥人赶出小亚细亚的念头，完全接受了突厥人统治小亚细亚的现实。因此，到了 12 世纪末，在西欧与拜占廷帝国往来的重要信函中，双方已经把小亚细亚称之为突厥地区。总之，突厥人与拜占廷帝国在经过 100 多年的反复较量与争夺之后，拜占廷帝国完全丧失了对小亚细亚的统治权，尤其是在突厥塞尔柱人的鼓励之下，那些流离失所的突厥游牧部落开始大量涌入小亚细亚，并在那里安家落户，成为这一地区的永久性居民，从而加快了小亚细亚突厥化的历史进程，使得统治这一地区的突厥塞尔柱人的政治势头达到了顶峰。

然而，不断涌入小亚细亚的突厥游牧部落，很快就引起了突厥人口过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特别因与拜占廷帝国讲和修好，突厥塞尔柱人停止派出劫掠队伍，是对传统加齐生活和社会经济的沉重打击。那些无教化的加齐突厥人根本无法理解塞尔柱人为什

么要同基督教的拜占廷帝国皇帝签订和平条约，更不愿意接受同基督教的权贵们友善往来的事实。加齐突厥人的不满情绪，一方面造成突厥人之间开始相互攻击和掠夺，从而破坏了小亚细亚和平与安宁的生活，使得小亚细亚出现一片混乱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突厥塞尔柱人永远丧失了小亚细亚的加齐突厥人对他们的忠诚和支持，所以当此后蒙古大军入侵小亚细亚时，突厥塞尔柱人完全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困境，被蒙古铁骑所击溃，最终成为蒙古人的藩属和傀儡。

蒙古铁骑对小亚细亚的入侵

1239年6月，因对突厥塞尔柱人罗姆素丹国朝廷所过的奢侈生活，以及软弱的对外政策不满，在小亚细亚地区爆发了以伊斯兰教什叶派苦行僧长老伊斯哈克为首的，具有宗教色彩的突厥民众起义。起义军屡败突厥塞尔柱人罗姆素丹国的军队，并相继攻占了小亚细亚的许多城镇。后因起义军内部人员的叛变出卖，伊斯哈克被捕身亡，使得起义军群龙无首，失去了凝聚力和斗争的方向，而此时的突厥塞尔柱人，在拜占廷帝国军队的帮助下，使用极其残酷的屠杀手段镇压了这次民众起义。但是，这次大规模具有宗教色彩的民众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突厥塞尔柱人的上层统治集团，严重地削弱了罗姆素丹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尤其是继之而至的蒙古大军对小亚细亚的入侵，给显著衰弱，对其他突厥人再也没有什么尊敬可言的塞尔柱人，带来了灭顶之灾，加速了他们罗姆素丹国的灭亡。

1206年，在建立蒙古族统一国家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的铁木真，被蒙古草原上各氏族部落的首领们立为大汗，尊号“成吉思

汗"。成吉思汗在顺利地完成了蒙古氏族部落的统一大业之后，亲率蒙古大军开始大规模的远征。只是由于成吉思汗于1227年不幸死亡，蒙古人的整个征服活动才暂告停止。在蒙哥大汗统治时期，蒙古人再次发动西侵。对于西南亚地区的征服，是由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大汗的弟弟旭烈兀进行的。旭烈兀于1256年1月亲率蒙古大军渡过马浒河，向波斯进军。面对蒙古大军，这一地区的诸小公国都不战而降。1257年，旭烈兀率领蒙古大军将进攻的矛头指向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并于1258年2月10日攻破该城池。除极少数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王室成员逃到埃及外，哈里发与王室要人、大臣、法官等300余人全部被蒙古人处死。曾经在历史上辉煌一时的阿拉伯帝国就此结束。

在公元13世纪蒙古大军们西征过程中，以往的掠夺和袭击总是绕过小亚细亚，可是却在1243年6月的柯塞达格战役中，蒙古大军击败了突厥塞尔柱人。不久，蒙古人在政治上肢解了突厥塞尔柱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把小亚细亚划分为两部分。把克泽尔河以东的所有地区赐给阿尔斯兰四世，而把那条河以西的地区赐给了他的兄弟卡伊考斯二世，但都必须纳贡交赋，成了听命于蒙古人的傀儡。蒙古人在政治上对小亚细亚的肢解，使得每一个突厥王公都可以自行其是了，尤其是无数个加齐领袖建立了独立的领地，而有些强有力的首领则逐渐地把许多小的领地合并成为几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加齐公国，即埃米尔国。这些埃米尔国，同以后奥斯曼人的崛起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因为奥斯曼人的崛起，就是建立在对这些埃米尔国的征服与吞并的基础之上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时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13世纪蒙古大军横扫小亚细亚，给予突厥塞尔柱人毁灭性的沉重打击，不但没有

使大批突厥人逃离小亚细亚，反而导致了小亚细亚的进一步突厥化。这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根本原因。首先，生活在中亚、西亚的突厥游牧民族，又开始大规模地向小亚细亚迁徙，出现了新的迁徙浪潮。他们或者受到蒙古大军的武力驱赶，或者是紧随着蒙古大军的西征洪流而来。其次，遭受到蒙古大军严重打击的突厥塞尔柱人，由于中央统治能力削弱，引起整个小亚细亚突厥人社会的一片混乱，造成控制力量逐渐向外溢散，小亚细亚在一种新的狂乱状态下，许多突厥小公国和加齐领袖们，不愿再受突厥塞尔柱人的约束和统治，而开始自行其是闹起独立。尤其是那些紧靠在拜占廷帝国边境上的突厥小公国和加齐领袖们，又开始像从前那样，猛烈地袭击和掠夺非伊斯兰教信徒的财产，担负起向异教徒世界进攻作战的神圣义务。

这一时期，突厥人和那些"信仰武士"们入侵拜占廷帝国又变得相当容易了，因为拜占廷帝国在1261年，从基督教十字军和西欧封建骑士手中，用武力收复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后，立即卷入了巴尔干地区的事务。当时拜占廷帝国所控制的只是小亚细亚北部的一小部分，而巴尔干地区则被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统治者们所占有，他们的支持者是基督教十字军和西欧封建骑士。为了重新获取对巴尔干地区的实际控制权，拜占廷帝国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付巴尔干地区的封建统治者，而忽略了在小亚细亚的统治地区。因此，在不多的几年中，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的整个统治地区，除西北角的一小块地方外，全部都被一些突厥小公国和"信仰武士"们靠武力掠夺而占领。其方式和速度与将近200年前的曼齐克特战役后，他们的突厥祖先占领小亚细亚东部和中部的情况差不多。

13 世纪后期和 14 世纪，突厥人强迫非伊斯兰教信徒改宗的措施和倾斜于穆斯林的税收制度，加速了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督东正教在拜占廷帝国一度最富有的小亚细亚地区的瓦解。此时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数，似乎在整个小亚细亚骤然增多，不但普通老百姓，有时甚至是基督教教士和犹太教教士，也纷纷改宗，信奉伊斯兰教。另外，基督教与穆斯林交界处的边区民族间的混杂相居，也势必促成了民族之间的联姻通婚。在 14 世纪，突厥人的许多公国后宫中收纳一些基督教妇女，乃至王子有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母亲，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此时，连拜占廷帝国的皇帝也开始招纳突厥人的王子做女婿，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这种趋势的最终结果是，伊斯兰教的势力在小亚细亚不断地发展壮大，而基督东正教的影响则在不断地减小萎缩。再加上外来突厥人的不断迁入，以及当地居民的同化，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数目也不断地增加。因此，小亚细亚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13 世纪蒙古大军对小亚细亚的入侵，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是巨大的。它毁灭了一度强盛的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彻底肢解了小亚细亚地区，特别是极度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也动摇了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的统治。这样，此时的小亚细亚正在寻求一个新的领导，而调整均势以适应新的情况，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此时有一个突厥小公国，自称是名存实亡的突厥塞尔柱人罗姆素丹国的继承者，它以地处小亚细亚西北部，今日埃斯基塞希尔城的北面为中心。它决非是当时最大或最强盛的突厥公国。然而，在历史上雄霸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就是由这样一个小小的突厥公国，在突厥塞尔柱人和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发展起来

的，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遗址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二、奥斯曼人的对外征服

奥斯曼突厥公国

奥斯曼人起源于中亚的呼罗珊地区一个突厥游牧部落，后迁至里海附近，波斯的北部和东部，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皈依了伊斯兰教。13 世纪时，为了躲避蒙古人西征大军铁蹄的蹂躏，辗转迁徙到黑海南岸的小亚细亚定居。当时奥斯曼人的数目很少，力量也很单薄，其首领埃尔托格鲁尔掌管部落时，总共只有 430 个帐(帐是突厥游牧部落以氏族组成的经济单位)。后在一次关键性战役中帮助了突厥塞尔柱人，于是突厥塞尔柱人罗姆素丹国的国王阿拉丁二世，将奥斯曼人安置在马尔马拉海峡北部，与拜占廷帝国紧邻的西北边境地区，封赐给他们一块既不富饶，也不值得令人羡慕的商业要道作为领地。此后，奥斯曼人长期在这里守卫边疆，抗击拜占廷帝国，成为突厥塞尔柱人的藩属附庸。

14 世纪初，日渐衰落的突厥塞尔柱人罗姆素丹国，分裂成 10 个突厥小公国，奥斯曼人就是这 10 个突厥小公国的其中之一。他们同当时那些居住在拜占廷帝国边境地区的其他突厥人一样，在其首领埃尔托格鲁尔的率领下，打着向异教徒圣战的宗教旗帜，进入到拜占廷帝国的疆域进行疯狂的掠夺。1288 年，年迈多病的埃尔托格鲁尔去世，其子奥斯曼接管部落，继任首领。当埃尔托格鲁尔去世时，他所传给儿子奥斯曼的领地，并不比原先突厥塞尔柱人赐给他的封地大多少。奥斯曼人对周围地区的大规模征服和兼

并，大约是从13世纪80年代，新的首领奥斯曼同伊斯兰教苏菲派长老艾德巴里的女儿结婚以后开始的。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德高望重的苏菲教派长老艾德巴里曾在奥斯曼继位时，庄严地向他的女婿赠送了一把“胜利之剑”，并授予他伊斯兰教“圣战者”的光荣桂冠，从此把奥斯曼引进了加齐集团，使他具有了伊斯兰教苏菲派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奥斯曼高举着“胜利之剑”，东征西掠，从而奠定了奥斯曼帝国600年的伟大基业。此后，举行隆重盛大的仪式颁发“胜利之剑”，也就成为了历代奥斯曼帝国素丹继位时的传统仪式之一。

奥斯曼是一位具有独创才能的组织者，他把涣散的突厥部落成员，训练成了一支组织严密，骁勇善战的武装力量。他将掠夺来的土地和大量的战利品，分封给他那些屡建奇功的将士们，鼓励他们去勇敢地战斗。他还以伊斯兰教古老的“圣战”思想武装他的那些战士，并吸收那些从小亚细亚各地纷纷赶来的圣战者、爱好冒险的勇士，以及其他突厥部落的成员，来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圣战”思想的鼓舞下，那些以半宗教性质组织起来的商人、牧民和手工业者也纷纷响应，对奥斯曼的事业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帮助他传播宗教信仰，掠地劫财。因此，奥斯曼人的突厥小公国，在奥斯曼统治时期，变成了一个“信仰武士”之国。有一块被考古发现的早期碑文称奥斯曼为“信仰武士们的素丹”。有一位15世纪左右的奥斯曼帝国的编年史学家，在撰写王朝大事记时说：“信仰武士是传播伊斯兰教的工具，是涤净人世间多神论污秽的上帝仆人，是真主手中的利剑。”古老的“圣战”思想成为奥斯曼人发展、壮大、开拓基业的一股重要精神力量。此外，奥斯曼统治下的突厥公国，也从小亚细亚的腹地汲取另外的各种力量：穆斯林艺人、商人、官吏、

神学者、法学者、财政专家、教师,甚至是一些叛教者,都为这个新的边疆"信仰武士"国家似乎无穷无尽的机会所吸引,这些人均有助于加强奥斯曼人的社会组织。

年轻气盛的奥斯曼继位以后,随即向外扩张势力,他首先攻掠的目标,一部分是与他同族的其他突厥公国。那些与之竞争的突厥公国在短期繁荣之后,便在内部长期不和,以及奥斯曼人不断攻击的巨大压力下分崩离析。另一部分攻掠的目标,是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当时的拜占廷帝国也是由于内忧外患而极度的虚弱,已经变成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帝国,丧失了昔日的强盛,于是奥斯曼人乘胜而起。

奥斯曼人首先攻打邻近的一些突厥小公国,然后攻占了位于小亚细亚的西北角,由拜占廷帝国统治的美朗诺尔城,并把该城改名为卡加布沙尔,作为其首府。1300年,奥斯曼在上下一片的交口称誉中自封为素丹,并宣布其领地为独立的公国。此时的奥斯曼突厥公国名声大振,在与拜占廷帝国长期的争夺中,从其同类的突厥诸国中脱颖而出,逐渐地取代了突厥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的历史地位。此后,许多突厥游牧部落在他们首领的率领下慕名而来,投靠效忠奥斯曼,愿意在他的麾下去同基督教世界的拜占廷帝国交战,奥斯曼的这些突厥游牧部落追随者们一律取用他的名字,通称为奥斯曼人。

在1301年的巴法翁战役中,奥斯曼率领他的"信仰武士"们击败了拜占廷帝国的军队,侵占了小亚细亚最富庶的卑斯尼亚平原。1317年,奥斯曼又率领"信仰武士"们进攻布鲁沙城。布鲁沙城是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西北部重要的战略军事重镇,因此城垣坚固,防守森严,驻扎着大量的拜占廷帝国军队。双方对此城的争

夺，前后持续了9年之久，各自都遭受到重大的伤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326年，当布鲁沙城因弹尽粮绝开城投降时，奥斯曼已经因患重病生命垂危。去世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该城的一座教堂，这座教堂以后被改建为清真寺。布鲁沙城的陷落，标志着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统治的彻底崩溃。此后定都布鲁沙城的奥斯曼人，完全控制了通往欧洲的咽喉要道达达尼尔海峡。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这个新兴突厥公国的立国基础，而且为这个突厥公国跨海向欧洲的巴尔干地区扩张，铺平了胜利前进的道路。奥斯曼去世后，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突厥公国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称为奥斯曼帝国。

奥尔汉与穆拉德一世

1326年，年仅20岁的奥尔汉继位，其英武有为，远见卓识不在其父奥斯曼之下。奥尔汉即位以后，便开始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对外征服。1313年，奥尔汉率领军队从拜占廷帝国手中夺取了尼西亚城；1337年攻占了与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近在咫尺的尼克米底亚城，在短短的10年里，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已经完全纳入到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1354年，奥斯曼人到达马尔马拉海岸之后，便立即跨越海峡进入欧洲，并在战略要地加利波利建立起牢固的据点。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人在这一年才开始向东扩张，对小亚细亚整个地区作全面的渗透，并完全控制了军事重镇安卡拉。此时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走势，就像季风那样时而向西，时而向东，但向西发展始终在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过程中占据首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优势，位于小亚细亚的西北部，紧靠通往欧洲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

海峡，以及天赐良机的时光，使其面对一个摇摇欲坠，分崩离析的拜占廷帝国。另一方面也与这个帝国靠“信仰武士”打天下的传统有关。

奥尔汉在积极开疆拓土的同时，还特别留心政事，创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机构。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实践中，奥尔汉逐渐地认识到，虽然奥斯曼人越过伊斯兰国家的边境进行征略，带回了丰富的掠夺品，使得奥斯曼人有了经济上的生存能力，但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建立在一种可靠的国家经济基础之上，尤其是每当侵征不成功时，整个社会也就衰落瓦解了。奥斯曼人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得建立起比加齐社会原有的组织更为有效的国家行政组织。奥尔汉仿效突厥塞尔柱人的军事采邑制，对那些立下赫赫战功者，一律赏赐给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分封，并把突厥塞尔柱人的圣典和统治方式一并接纳了过来，从而使得奥斯曼人的司法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即把原有部落的习惯记录下来，在伊斯兰法与突厥塞尔柱人成文法典的基础上，根据新的需要而酌加损益，编纂成为奥斯曼人自己的成文法典。奥尔汉还非常重视发展教育，注意为奥斯曼帝国培养人才。当他征服尼克米底亚城之后，立即在那里兴办了奥斯曼人的第一所设备完好的清真寺学校，并且还亲自为这所学校选择了一位德才兼备的首任校长。后来这座城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奥斯曼帝国非常重要的教育中心。

此外，作为一个对外进行武装征服的封建军事帝国，军队的组织和招募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奥尔汉即位初期，全部用突厥人组成了一支步兵部队，按十人、百人和千人编队。然而，这种办法在战争实践中证明行不通，于是奥尔汉对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编，建

立了一支常备军。奥尔汉组建的常备军有两种:一种是由得到采邑的封建主提供的军队;另一种是通过招募组建的正规新军。奥尔汉把获得的战利品的五分之一收归国库,作为新军的薪饷。奥尔汉组建的新军也称为加尼沙里军团(即童子军团),欧洲人称之近卫军团,人数大约为 5 000 左右。新军的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配备了当时最新式的大炮等火器,是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核心。奥尔汉依靠这支能攻善战的军队,不仅夺取了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所有的领土,而且还把对外征服的矛头指向东南欧。

1354 年,奥尔汉统帅 6 000 铁骑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攻占拜占廷帝国的军事重镇阿德里亚堡。此后,奥斯曼人每年总要渡海到色雷斯和黑海沿岸进行劫掠,以积聚大量掠夺来的财富。1354 年,巴尔干地区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地震,毁坏了达达尼尔海峡欧洲海岸线上的格利博卢城墙,驻扎在附近的奥斯曼军队冲进了该城,并将大量的奥斯曼人迁徙到那里定居。这样,加里波里半岛就成了奥斯曼人进军欧洲的桥头堡,整个欧洲向奥斯曼人敞开了它的大门。

长年的征战和繁忙的公务,严重地损害了奥尔汉的健康。1359 年奥尔汉不幸病逝,他的小儿子穆拉德一世即位。穆拉德一世像他的父亲一样,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驾驭局势的天分。他踏着父亲的足迹,率领着奥斯曼人,发起一个个战役,猛烈地向北方和西方进攻,直指巴尔干地区。在奥斯曼人凶猛地攻击下,拜占廷帝国境内的一些重要城池相继陷落。此时奥斯曼人对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征服,已经是作为国家有组织的军事行动,而非早期“信仰武士”的任意出击。奥斯曼人通过武力首先兼并了保加利亚,随

后进袭阿尔巴尼亚，并一直打到亚德里亚海岸。长期以来，作为拜占廷帝国核心之地的巴尔干地区，现已完全被奥斯曼人所控制，彻底切断了拜占廷帝国与巴尔干地区其余部分的联系，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几乎已是一座四面楚歌的孤城。1363 年，拜占廷帝国的皇帝被迫向奥斯曼人乞和，承认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地区的主权，且被贬为奥斯曼人的一个藩属国，按时向奥斯曼人交纳赋税。同时，一批又一批的奥斯曼人，源源不断地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定居在巴尔干地区。特别是在 1365 年至 1366 年间，穆拉德一世把奥斯曼人的首都，从亚洲的布鲁萨迁至欧洲的埃德尔纳。奥斯曼人的这一重大行动，开始了把他们的政治重心由亚洲向欧洲转移的过程。

奥斯曼人在欧洲的扩张，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也遭到了巴尔干地区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389 年 6 月 15 日，塞尔维亚的一位爱国者，贵族奥比里奇诈降奥斯曼人，乘穆拉德一世封赐他时，行刺了穆拉德一世。数日后，被刺中要害的穆拉德一世，因伤势过重而亡，穆拉德一世的儿子，外号“雷霆”的巴耶济德一世接管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权。

此时的奥斯曼人，已由一个小亚细亚边疆信仰武士们组成的突厥小公国，在 100 年的时间里，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帝国。但这一时期的奥斯曼帝国，还是一个极为松散的帝国，它仅由小亚细亚和巴尔干两部分组成，是由信仰武士们征服和封建附庸等方式拼凑起来的，其脆弱性在穆拉德一世被塞尔维亚贵族奥比里奇刺杀身亡以后的事态发展中暴露了出来。当穆拉德一世的死讯一传开，小亚细亚的一些臣服的突厥公国和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封建附庸们，便纷纷谋求摆脱奥斯曼人的统治。穆拉德

一世的继承人，外号“雷霆”的巴耶济德一世乘机发难，以这种行为实属不忠为理由，统帅奥斯曼大军，在欧亚大陆之间杀气腾腾地来回穿梭，并通过一系列摧枯拉朽的军事战役，以实现他清剿那些反叛奥斯曼人的突厥公国和巴尔干地区统治者的计划和目标，把奥斯曼人对外征服的形式，推进到了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

“雷霆”巴耶济德一世

巴耶济德一世，是穆拉德一世的大儿子，1389 年 6 月，当他的父亲遇刺身亡，奥斯曼帝国人心惶惶之际，他担当起了千钧重任，统帅奥斯曼军队，为他死去的父亲报了仇。由于他在战斗中，亲自披挂战袍，挥刀冲锋陷阵，因此威名远扬。他的朋友和敌人送他一个“雷霆”的绰号，使他成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1389 年 10 月，当巴耶济德一世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素丹的王位之后，为了铲除异己，冷酷无情的他下令绞死了他惟一的兄弟。为了使他的这一行为合法化，巴耶济德一世借用了《古兰经》中的一些话替他辩解，以致这种上台后弑兄的行为，成为奥斯曼帝国新素丹继承王位时，所采用的合法手段和传统，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流行了 200 多年。

在巴耶济德一世统治的最初年代，拜占廷帝国和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几乎同时崩溃，巴尔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贵族的统治下，巴尔干的农民受着沉重的封建剥削，经济负担甚至比西欧的农民还重。他们除了对社会经济不满外，巴尔干地区宗教上的混乱，也时常困扰着他们。例如巴尔干的农民，虽然信仰东正教，但是当他们了解到奥斯曼人对宗教信仰采取的一种非常宽容的态度，并且实行一种负担较轻的税收制度时，宁愿接受奥斯

曼人的统治，而反对巴尔干的封建贵族。而此时小亚细亚的突厥诸公国之间也是你争我夺，争执不休。这种动荡的社会局面，对巴耶济德一世率领奥斯曼人南征北战，不断进行对外扩张，是再有利于不过的事情了。

把通过武力征服的地区，转变成为奥斯曼帝国直接控制下的地区，巴尔干地区的农民并非是惟一的受益者，巴尔干地区诸国的封建贵族们也从中得利，受益匪浅。巴耶济德一世以对待穆斯林的同样原则，把"蒂玛"授予巴尔干地区诸国的封建贵族们。在奥斯曼帝国，军人社会阶层的主要成分，是由奥斯曼人的骑兵构成的。对他们服兵役的报酬，是从各省所收的农业岁入中拨给的。这种收益叫做"蒂玛"，享有这种收益的人叫做"蒂玛利奥"。在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大多数"蒂玛"的持有者，要么是穆斯林家庭出生的军人，要么就是素丹或高级军事首领的奴隶。到巴耶济德一世统治时期，"蒂玛"也授予许多基督教徒，这些基督教徒都是巴尔干地区领兵打仗的封建贵族成员。此时，他们已经与奥斯曼征服者共荣辱，同命运。

巴耶济德一世在创建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为了理顺各种社会经济关系，还废除了过去传统上，奥斯曼人必须以服兵役来履行各种封建义务，而改为易于政府机构管理的缴纳现金的新方式，有效地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各地区的统治。此外，在巴尔干许多地方的前任统治者们，与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制度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帝国中央政府还特别注意，这种制度在那些地区是否会产生滥用职权的现象。为了克服此类的问题，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给予了这些地区的农民极大的法律诉讼的权利，以防止出现农民不能忍受的各种压迫。农民有了帝国中央政府的有效保护，能够安居乐

业，从而避免了这些地区出现社会动荡。奥斯曼帝国这种使自己的统治利益同新被征服地区老百姓的利益相一致的做法，具有一种深远的社会意义，极大地促进了奥斯曼人从游牧民族向世界帝国的转变。

到了1394年，巴耶济德一世通过一系列令奥斯曼人惊喜不已的征服胜利，已经使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地区缩小到两个主要的中心：科尼亚和锡瓦斯。此时欧洲的封建统治者们，惊慌失措，大惧绝望，到处盛传巴耶济德一世就要挥兵西征，就要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神坛上喂他的战马，并将使得整个东南欧变成奥斯曼人的兵营。到14世纪末，除了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一隅之地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部分地区外，奥斯曼人实际上已经完全占领了自多瑙河到雅典之间的广大地区，几乎控制了整个巴尔干地区。

巴耶济德一世在欧洲获得的辉煌胜利，使他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赢得了加齐素丹的威名。并从一直居住在埃及开罗的伊斯兰教世界最高政治和宗教领袖哈里发那里获得了罗姆丹素的称号。作为一个具有伊斯兰教特征的国家，巴耶济德一世为了加强和巩固国家的宗教机构，从附近古老的伊斯兰教国家，尤其是埃及吸引了大批穆斯林学者、教师、神职人员和法官前来，因为巴耶济德一世想把新生的奥斯曼国家从他的父辈建立的那种单纯的突厥国家，转变成为一个传统的伊斯兰王国，而自己成为一位伟大的穆斯林君主。此时的巴耶济德一世，已经不再是一个信仰武士和突厥公国的首领了，而是一位伟大的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总之，巴耶济德一世卓有成效的治国方略，在以后的年代里，持久地影响着奥斯曼帝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深得后人的赞叹和怀念。

从 1390 年到 1397 年，巴耶济德一世率领奥斯曼帝国军队，占领和吞并了小亚细亚许多突厥公国，一些被废黜的突厥公国，由于他们不肯对巴耶济德一世阿谀奉承，所以没有在奥斯曼人的王朝中得到一官半职，以致使他们很难与奥斯曼帝国的社会融合在一起。因此，他们怀着复仇之心，逃往东方另外一个伊斯兰帝国帖木儿王朝，纷纷求助于蒙古铁骑大军西征的继承人，伟大的征服者帖木儿，竭力煽动帖木儿起兵进攻奥斯曼人，为他们达到复国的目的给予鼎力相助。

另外，巴耶济德一世经常率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去进犯底格里斯河一带的疆域，并且暴露出他试图侵入叙利亚的野心，因而严重地威胁到了帖木儿王朝的一些藩属国。帖木儿曾经多次写信奉劝咄咄逼人的巴耶济德一世改变其行径，但傲慢无理的后者一直未予理睬，从而更加坚定了帖木儿王朝发兵小亚细亚，征讨奥斯曼人的决心。然而，巴耶济德一世与帖木儿王朝的冲突，则改变了奥斯曼人的历史进程。

奥斯曼人与帖木儿王朝的冲突

正当奥斯曼人的扩张征服之势锐不可当，大有席卷东南欧，征服整个拜占廷帝国之际，位于东方的帖木儿王朝在中亚的兴起，成为了奥斯曼人在亚洲扩张和征服过程中，最大的威胁和挑战者，并在著名的安卡拉战役中，彻底打败了骄横一世的巴耶济德一世，使他本人战败而亡，使得他的帝国美梦彻底地破灭了，从而改变了奥斯曼人的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使得千年拜占廷帝国逃过一劫，又苟延残喘了大约 50 年，才最终被再次崛起的奥斯曼人所征服。

帖木儿王朝的奠基人帖木儿，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

征服者。1336年10月,此人出生于中亚撒马尔罕境内的布喀喇。他的父亲是一位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已经完全突厥化了蒙古贵族,家庭贵而不富。长大后他任性妄为,时常结伙拦路抢劫。1370年6月,帖木儿通过阴谋,率领部下靠阿富汗人的帮助,推翻了撒马尔罕的统治者,自立为王。他利用中亚突厥游牧部落组成的强大骑兵,经过数年的对外征战,把在中亚蒙古人继承的一些小国统一成了一个帝国,定都撒马尔罕。不久,他与一位成吉思汗的后裔结婚,从而把伊斯兰化的突厥传统与蒙古传统结合了起来,使它成为帖木儿王朝的精神支柱。帖木儿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人,梦想追踪成吉思汗的业绩,去征服整个世界。

1394年6月,帖木儿派兵首次侵入小亚细亚,然后于1399年10月再度派兵入侵小亚细亚,并以蒙古人后裔的资格,对小亚细亚提出了宗主权的要求,而巴耶济德一世则针锋相对与之对抗。为了遏制帖木儿染指小亚细亚,不使整个小亚细亚屈服于帖木儿的淫威之下,巴耶济德一世改变了过去父辈们姑息迁就小亚细亚诸突厥公国君主的政策,决定消灭那些暗中与帖木儿王朝勾结的突厥公国,以巩固其后方。他首先从其姻弟的手中夺取了军事重镇科尼亚,遂后吞并了塞尔柱人与土库曼人的突厥公国。其次他竭力拉拢帖木儿王朝的敌国马木留克王朝,巴耶济德一世表示将向马木留克王朝提供财政与军事援助,共同打击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帖木儿王朝。1400年春,巴耶济德一世趁帖木儿王朝平息格鲁吉亚叛乱,重建对阿塞拜疆与巴格达的统治之际,夺取早为帖木儿王朝据有,从叙利亚至小亚细亚重要商道的必经之路爱洛遵占和凯玛赫城,直接侵犯了帖木儿王朝的利益。此时,两个东方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成为完全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1402年初，帖木儿统帅80万大军再次进犯小亚细亚。为了鼓舞全军上下将士们的士气，出征前夕，帖木儿不仅举行了盛大的军事检阅，并向全体将士宣布了巴耶济德一世迎娶信奉基督教的塞尔维亚公主，庇护打劫赴麦加朝圣香客的黑羊王朝，玷辱神圣伊斯兰教的大量罪名，号召全军将士要英勇杀敌，为伟大的真主而战，给未来争霸小亚细亚的战争披上了圣战的外衣。闻讯此消息之后的巴耶济德一世也不甘示弱，放弃了对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亲率25万大军回师，前去迎战帖木儿的军队。

1402年7月28日，在安卡拉城郊的齐布卡巴德平原上，奥斯曼人与帖木儿王朝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会战。两强相遇，一方是称雄巴尔干与小亚细亚，具有“雷霆”美称的奥斯曼帝国素丹巴耶济德一世；另一方是东方的征服者，撒马尔罕的君主，具有恐怖跛子之称的帖木儿。安卡拉城的郊外，是一片高低不平的丘陵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奥斯曼人与帖木儿王朝军队的大决战是从清晨6时左右开始的。双方的军队一进入阵地，很快就完成了排兵布阵。上午10时左右，双方共40万将士挥戈上阵。奥斯曼人的步兵首先冲上前去，同帖木儿王朝的士兵展开厮杀。正当两军的将士厮杀正酣之际，奥斯曼人军中陡然发生变故。原来是巴耶济德一世右翼部队那些新近刚刚降伏过来的小亚细亚东部突厥诸国将士组成的联军，看到自己的故主正战斗在帖木儿的麾下，便纷纷临阵倒戈，投靠到原来君主的战旗下，会合帖木儿王朝的蒙古铁骑军一起冲向奥斯曼人的军队。事态的骤然变化对于巴耶济德一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虽然在巴耶济德一世身先士卒的精神鼓舞下，奥斯曼人前仆后继，英勇杀敌，并且数度攻入帖木儿王朝军队的大营中，但是在帖木儿凶猛慓悍，骁勇异常

的蒙古铁骑军面前，精锐逐渐丧失殆尽的奥斯曼人有些深感不支，即将败下阵来。

当夕阳下山的时候，奥斯曼人军队的防线完全崩溃了。在帖木儿王朝蒙古铁骑军的追杀下，奥斯曼人基本被歼，死伤无数。在溃逃中，巴耶济德一世因马蹶被生擒，昔日叱咤风云的一位英雄人物，今日成了帖木儿王朝的阶下囚。安卡拉城中的总督因得不到援军，又慑于帖木儿王朝蒙古铁骑军的威力，也被迫献城乞降。在此后清剿奥斯曼人的残部中，帖木儿王朝的军队攻陷了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布鲁萨。至此，帖木儿王朝在与奥斯曼人的冲突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不久，巴耶济德一世这位一代英杰、显赫一时的奥斯曼人的君主，在度过了八个多月忧郁和屈辱的囚徒生活之后，怀着满腔遗憾和惆怅，在卫兵们众目睽睽之下自杀身亡。随后，巴耶济德一世的遗体，被帖木儿王朝派专人护送回奥斯曼人的君主陵墓所在地布鲁萨隆重埋葬。1402 年的安卡拉战役，是一场关系到奥斯曼人历史命运的决战，正是由于奥斯曼人在安卡拉战役中的失败，巴耶济德一世曾经梦想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军事帝国的希望破灭了，从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野心勃勃的帖木儿，尽管踏平了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但是由于帖木儿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亚地区，所以帖木儿并不想直接占领小亚细亚，把它完全收归己有。帖木儿首先把小亚细亚诸突厥公国的领地，归还给了被奥斯曼人废黜的原君主，彻底地恢复了他们在小亚细亚的统治，以借此来削弱奥斯曼人的势力。其次，帖木儿把另外一些所征服的奥斯曼人在欧亚的领地，归还给了巴耶济德一世还活着的几个儿子。他的儿子

们在向帖木儿宣誓效忠以后，保存了那些被认为合法的领地，成为帖木儿王朝的藩属国。1405 年 2 月，集 40 万大军准备进攻中国的帖木儿，暴卒于撒马尔罕。消息一传开，巴耶济德一世的儿子们，相继断绝了他们对帖木儿王朝的一切依附关系，从而为此后奥斯曼人重振旗鼓，收复失地，再度崛起创造了条件。

三、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

重振旗鼓

安卡拉战役以后的 10 年，对于奥斯曼人来说，是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了决定由谁来统治奥斯曼人那残缺不全、支离破碎的半壁江山，独占掌握奥斯曼人前途命运的最高权力，巴耶济德一世的四个儿子互相争斗与厮杀了整整 10 年。要是奥斯曼人王室中这场兄弟阋墙的内讧，发生在欧洲基督教十字军讨伐战，或者帖木儿王朝大军进攻小亚细亚之前，再不，如果欧洲基督教十字军讨伐队伍，在帖木儿王朝大军击败奥斯曼人之后再浩浩荡荡地杀来，那么谁也不知道大伤元气，一败涂地的奥斯曼人是否能够幸存下来，是否以后会在世界历史上出现一个幅员辽阔，充满生机，雄霸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但是，由于帖木儿无意于直接统治小亚细亚，接下来他本人又早早地去世，再加上当时西方基督教社会自身矛盾重重，相互不和，没有能够利用奥斯曼人的内讧和厮杀趁虚而入，结果那场给奥斯曼人的社会造成极大混乱的王位之争，没有遭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涉，从而为奥斯曼人在以后又能重振旗鼓，收复失地，东山再起，称霸世界创造了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虽然巴耶济德一世于 1402 年,在安卡拉战役中受伤被俘,成为帖木儿王朝的阶下囚,但是奥斯曼王室家族仍然保有那些被认为合法的领地。巴耶济德一世的四个儿子在向帖木儿王朝宣誓效忠之后,成为帖木儿王朝的藩属国,一块瓜分了留下的奥斯曼诸省。由于帖木儿王朝这次对奥斯曼人的征服十分短暂,又无意直接去瓜分和统治奥斯曼人的土地,所以才有可能在巴耶济德一世的四个儿子之间产生了争夺奥斯曼人领地的争执。造成兄弟四人之间权力角逐的根源,一方面与巴耶济德一世杀死他的亲兄弟的行为有关,因为他这一残忍的行为,成为此后奥斯曼皇族内为争夺王权而采取的重要手段和传统。另一方面是起因于奥斯曼人政治生活中的派系斗争,而这种派系斗争也是由于巴耶济德一世企图统一国家并实行中央集权而出现的。

为了克服奥斯曼人群龙无首,相互厮杀的混乱局面,奥斯曼人的皇家集团一致认为巴耶济德一世的长子苏莱曼,可以作奥斯曼人君主的候选人。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以及在安卡拉之战溃败后残存的近卫兵团的忠心拥护下,苏莱曼对欧洲领地的统治,一直持续到 1411 年。在其统治期间,苏莱曼组织和领导的多次军事讨伐,却一直未能把其兄弟穆罕默德和穆萨驱逐出小亚细亚的军事重镇布尔萨。1410 年 6 月,穆萨得到了巴尔干地区那些心怀不满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的支持,率领大军进攻苏莱曼在欧洲的领地,并在一次轻骑突袭的战斗中,设计俘获了他的哥哥苏莱曼,并在他逃往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中途,派人骑马把他追杀。此后,见风使舵的奥斯曼人皇室集团,以及朝臣们迅速转而效忠胜利者穆萨,承认他为奥斯曼人在欧洲的领主,而他的兄弟穆罕默德则仍为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的最高统治者。然而,他的兄弟

穆罕默德却帮助拜占廷帝国的皇帝派兵攻打他。在双雄之争的紧要关头，许多过去辅佐他的重臣却离他而去，率领兵马投靠了穆罕默德。1413 年 6 月，在穆罕默德军队凌厉的攻势下，欧洲的埃迪尔内城被占领，乘着城中的一片混乱，穆萨率家眷和少数亲信弃城而逃，但被穆罕默德派去追杀的骑兵在索菲亚拦阻杀害，穆萨的尸体以尊贵隆重的皇家仪式，被送回小亚细亚的布尔萨，埋葬在他曾祖父奥尔汉的旁边。

此时的穆罕默德已经独揽了统治整个奥斯曼人的大权，所有的奥斯曼人无不臣服于他，把他视为重新统一奥斯曼人、恢复昔日辉煌的吉星。起初，穆罕默德持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为其重振雄威的基本治国方略，因为只要强大的帖木儿王朝虎视眈眈的威胁尚在他的后面隐约存在，他就不可能放手大胆地去调兵进攻小亚细亚那些复辟的突厥公国。另外，在奥斯曼人内部叛乱、王位争夺以及社会经济等问题的困扰下，也使得穆罕默德必须要处处谨慎，以免锋芒毕露，从而引起欧洲基督教世界任何激烈的反应和干涉，以至于阻碍他重振旗鼓，东山再起的企图。因此，穆罕默德谨慎短暂，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统治，成功地防止了奥斯曼人领土的分裂，为以后奥斯曼帝国的迅速崛起，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卧薪尝胆的积极作用。

1421 年 3 月，穆罕默德中风去世。为了防止奥斯曼宫廷内为了争夺王权，再次出现政治混乱和血腥厮杀，穆罕默德身边最亲近的大臣，对穆罕默德的死讯密而不宣，隐瞒达 40 天之久，直到他的儿子，法定继承人穆拉德二世从小亚细亚的阿马西亚飞骑来到埃迪尔内执掌国政，顺利地完成了王权交接之后，才隆重地为穆罕默德举行了葬礼。除了穆拉德二世，穆罕默德还有三个儿子，两个是

尚在怀抱中的婴儿，但不幸的是，这两个幼儿在若干年后死于每隔几年就来侵袭一次欧洲大陆的一种瘟疫。穆罕默德的另外一个儿子叫穆斯塔法，穆罕默德去世时年仅 13 岁。穆斯塔法害怕穆拉德二世将会仿效巴耶济德一世绞死他弟弟的方式杀害他，所以就放弃了他在小亚细亚的统治权，同他的导师一起逃到了科尼亚，寻求另外一个突厥公国的保护，后被穆拉德二世派去的人生擒绞死。

据说穆拉德二世是一位性格内向，沉默好思的人，他不喜欢战争，他对马不停蹄的作战深感厌倦。在通过同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签订和平条约，而使他的欧洲和小亚细亚边境安定下来之后，穆拉德二世决定禅位给他 15 岁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自己则退居于风景如画的马尼萨，希望从此过一种享受和平的宁静生活。然而，穆拉德二世想过一种安逸平静生活的希望，不久即成为泡影。因为他的退位，促使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封建骑士们想入非非，他们认为乘穆拉德二世退位，君主又年幼无知的大好机会，向奥斯曼人发动大举进攻，势必将打击和削弱奥斯曼人的军事力量。特别是他们认为，在这一行动的鼓舞下，奥斯曼人统治地区各种宗教信仰的居民们，也会积极地行动起来，通过发动武装叛乱支持他们的行动。面对越来越险峻的形势，此时奥斯曼帝国的一些大臣和军队指挥官们，也担忧把国家的命运交付到一个年幼小孩手中的结果，因此联名上疏，请求穆拉德二世回到宫廷来重新执政，继续指挥奥斯曼大军。

在大家的再三恳求下，穆拉德二世又重新登上了王位，并于 1444 年 11 月，率领奥斯曼大军在瓦尔纳附近击溃了以匈牙利人为主力的欧洲联军，杀死了匈牙利国王拉第斯拉夫和红衣大主教朱利安，并轻而易举地横扫了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等地区。当整

个战局稳定了以后，拙于抛头露面，喜欢宁静生活的穆拉德二世，于1445年4月再度宣布退位，仍回马尼萨去过他那种隐居的田园生活。然而不久，奥斯曼人骄横暴戾的近卫兵团发动武装叛乱，公开反对新君主穆罕默德二世，这又一次迫使穆拉德二世不得不离开他隐居的安乐地，迅速返回到埃迪尔内再次执政。在穆拉德二世残酷的镇压下，近卫兵团叛乱的祸首们，有的被处死，有的被监禁，有的被从京城流放到外地，奥斯曼帝国素丹的权威性很快就完全得到了恢复。在近卫兵团的武装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穆拉德二世就再也没有宣布退位，去过他喜欢的宁静田园生活。在此后短短的数年中，为了扭转时运，重振奥斯曼人的雄威，他倾其举国之力，率领奥斯曼大军两次进入阿尔巴尼亚，追击清剿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领导抵抗奥斯曼人入侵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

虽然穆拉德二世在征服阿尔巴尼亚的过程中，屡战屡败，严重受挫，但在对其他地区的征服过程中，则所向披靡。1445年3月，穆拉德二世在科索沃平原上击败了匈牙利国王罕雅迪率领的军队，并把他彻底地逐出了塞尔维亚。此后，穆拉德二世还在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长年的征战中，夺取了著名的商城科林斯和佩特雷。1451年初，穆拉德二世这位上了年纪的征战勇士，在布尔萨寿终正寝。此时，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已长大成人，当他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之后，便跨上他的战马，在亲信们的陪伴下，飞驰到埃迪尔内去执掌国政。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

穆罕默德二世具有一种与他父亲穆拉德二世迥然相异的性格。由于他从小受到严格的宫廷教育，他的才能得到了良好的训

练和开发，所以知识渊博，聪慧过人。他通晓文学体的突厥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希腊文，也能用一般的塞尔维亚语和意大利语与人交谈。由于受父亲穆拉德二世的影响，他从小喜欢诗歌，熟读伊朗、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诗篇。穆罕默德二世在奥斯曼王子学堂学习期间，也读过许多精典的哲学著作，他一生中最钟爱的是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派的著作。因此，他的一言一行有时候像一位富于思考的哲学家。穆罕默德二世也非常喜爱阅读历史书籍，特别是亚历山大大帝和古罗马诸帝的传纪，从小就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非常敬仰和钦佩。穆罕默德二世对于战争，以及与其他有关战争的任何事物，如战略、战术、军火、装备、后勤供应、地形地貌等问题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认为只有掌握军事知识，才能成为奥斯曼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才能实现征服世界的宏愿。

在充满朝气的穆罕默德二世的影响下，奥斯曼帝国的政府一改过去办事拖延、推诿、效率低下的官僚作风，一种务实勤奋和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政的创业精神，备受国人的拥戴，成了奥斯曼社会行为的一项准则和时尚。当然，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君主，在人们对穆罕默德二世的品行和才能非常敬仰和钦佩之余，对他奉行巴耶济德一世创始的奥斯曼传统，下令将他惟一的一位尚在襁褓之中的兄弟溺死在宫内浴缸中的做法，也颇有微词。几年后，穆罕默德二世颁布谕令，告诉他的后代们，凡夺得王位者，应将其兄弟们立即处死。穆罕默德二世这种不顾兄弟情义，斩尽杀绝的暴戾行为，以及制定的这种传统，也成为了日后奥斯曼帝国宫廷内勾心斗角，相互残杀，朝纲混乱，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

穆罕默德二世在整顿完毕朝政，巩固了自己的绝对统治权力之后，就开始积极策划攻取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他首

先积聚储备了大量的军需品，包括甲胄、弓箭、臼炮、大炮、火药、木材、粮草，以及其他各种战斗物品，并在著名的港口城市格利博卢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以便参加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整个城市呈不规则的等边三角形。拜占廷帝国为了对付穆罕默德二世的军事威胁，在君士坦丁堡易受攻击的西南陆地，修筑了两道比较坚固城墙。在金角湾入口处则以铁索封锁着港湾入口处的水城。君士坦丁堡虽然只有 8 000 多名西方雇佣兵，20 艘战舰的城防力量，但由于该城的地势险要，城墙坚固，防守森严，要想完全攻破这座城池也非易事。

奥斯曼人对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正式进攻，开始于1453 年。穆罕默德二世统帅步兵 12 万，骑兵 2 万，机动部队 1 万，大小战舰 300 余艘，从水上陆上浩浩荡荡地杀向君士坦丁堡。4 月 5 日，奥斯曼人首先开始炮击，猛烈的炮火持续了一整天，君士坦丁堡的许多重要工事被摧毁。4 月 6 日的清晨，奥斯曼人的军队首先从西线发起强大的攻势。经过数日的反复激战，在君士坦丁堡守军舍命拼杀的顽强抵抗下，奥斯曼人一直没有能够攻破城池。然而，穆罕默德二世并没有气馁，而是召集全体将士分析敌情，研究对策。经过分析与研究，穆罕默德二世同他的将士们一致认为，君士坦丁堡的守军，在金角湾的防线比较薄弱，如果能够派奇兵在那一带偷袭成功，将会使君士坦丁堡的守军措手不及，陷入被动。但是从得来的情报了解到，金角湾的入口处地势险峻，防守严密，而且又有铁索链拦河封锁，奥斯曼人的舰队根本无法通过。此时，穆罕默德二世大胆地采纳了一位老将军的建议，即借道热那亚商人控制的加拉塔据点，潜入金角湾。为此，奥斯曼人以长期保障热那亚在加拉塔的商业特权作为交换条件，用重金买通了贪婪

的热那亚商人。

4月22日，奥斯曼人仅用了一昼夜的时间，就顺利地将70多艘船只通过木板滑道，从陆地上进入到了金角湾。奥斯曼人迅速地在金角湾上架起了一座浮桥，在岸边筑起了炮台，从而控制了整个金角湾，使得君士坦丁堡腹背受敌。奥斯曼人的舰队在金角湾的突然出现，使得君士坦丁堡的守军猝不及防，匆忙从西部的防线抽调出大量的兵力，以加强金角湾的防务，决一死战。虽然整个军事形势对拜占廷帝国越来越不利，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守军们，都是些用重金收买的雇佣兵，个个凶猛慓悍，勇猛无敌，在岌岌可危之中，依然作最后的搏杀，进行顽强的抵抗，并多次击退了奥斯曼人的进攻。正当君士坦丁堡的守军拼命厮杀，进行顽强的抵抗之时，不料轰隆一声巨响，圣罗马门以北的一段坚固的城墙，被奥斯曼人用炸药给炸开了，精锐的加尼沙里军团的士兵们，像潮水般地从这个巨大的缺口涌入城内。在奥斯曼人凶猛凌厉的攻势下，君士坦丁堡的守军丧失了斗志，全线溃败，拜占廷帝国的末代皇帝在混战中被击毙。5月29日破城之后，奥斯曼军队肆意劫掠屠杀，壮丽豪华的宫殿付之一炬，历代相传的艺术珍品被洗劫一空。在屠城的第三天之后，穆罕默德二世才骑着他那匹白色的战马，威风凛凛地进了城，并下令终止了士兵们疯狂的掠劫行为，全面恢复了社会治安。为了感谢真主的帮助，穆罕默德二世到君士坦丁堡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做了礼拜，然后携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凯旋回到了奥斯曼人的首都埃迪尔内。1457年6月，穆罕默德二世从埃迪尔内迁都到君士坦丁堡，并将该城改称为伊斯坦布尔(意思即伊斯兰的城市)。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初，该城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将君士坦丁堡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

于奥斯曼人来说，象征着他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由边远草原的游牧民族到世界帝国的这一历史变迁。

当伟大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在拿下君士坦丁堡，并把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之后，便立即把注意力的重点又重新放到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征服的问题上了。他首先在黑海地区作了部分的扩张。在奥斯曼帝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这一地区的许多公国成了它的仆从国和附庸。整个黑海差不多变成了奥斯曼人的内陆湖。穆罕默德二世在完成了对黑海地区的武力扩张之后，迅速转为对巴尔干的武力扩张，并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许多村庄、城镇被洗劫一空，无数民众死于非命，社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因此，当穆罕默德二世率兵进军巴尔干时，那里的广大民众纷纷拿起武器，在抵御外敌，保卫家园的战斗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例如，匈牙利的胡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斯特凡大公，他们毫不畏惧，勇敢地站了出来，率领广大的民众，沉重地打击了奥斯曼人的嚣张气焰，树立了巴尔干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信心，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奥斯曼人的克星。1481 年的春天，穆罕默德二世在小亚细亚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对外征服。但在同年 5 月，当他的行动目标尚未由他自己或他的行军路线透露出来的时候，穆罕默德二世突然病死在军营中。穆罕默德二世这位伟大的征服者病死的消息，迅速传到欧洲时，教堂里的许多钟声响了起来。而奥斯曼帝国则在素丹王位继承人嗣位之前，一直保守着秘密。此时死去的是一位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伟人，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毋庸置疑的。

巴耶济德二世与塞利姆一世

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后留下了两个儿子。长子巴耶济德二世，33 岁，是旧加齐中心阿马西亚的省督。次子杰姆，21 岁，是从前塞尔柱人罗姆素丹国旧都科尼亚的省督。由于从阿马西亚骑马到伊斯坦布尔需要 8 天的行程，而从科尼亚到伊斯坦布尔只需要 4 天的行程，所以次子杰姆有充分的时间得到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行政控制权的便利条件。但是，近卫兵团、宫廷侍从和从宫内学堂毕业的政府官员们等帝国内部的各种政治势力，都支持巴耶济德二世，希望这位具有丰富治国经验的王子，能够继承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王位。此外，政治上早熟的巴耶济德二世，由于注意到奥斯曼帝国王室杀害兄弟的“卡农”习惯法对素丹王位继承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机智地通过政治联姻和结盟，拉拢联络了许多王室成员和帝国政府中德高权重的人物，来全力以赴地支持他做奥斯曼帝国素丹王位的继承人。当接到父亲穆罕默德二世逝世的军报之后，巴耶济德二世立即率领他的军队，马不停蹄地日夜兼程奔往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此时，杰姆也率领他的军队占领了军事重镇布尔萨，公开向兄长巴耶济德二世挑战。在得到帝国京城内全体政府官员和近卫兵团的支持后，巴耶济德二世利用其父穆罕默德二世召集准备远征欧洲的军队，一举击溃了杰姆。在混战中，杰姆率少数亲信逃往埃及，后又流亡欧洲，不久在沮丧和绝望中患上了热血症，病死于那不勒斯，了却了他苦难的一生。杰姆的遗体最后由兄长巴耶济德二世用重金赎回，隆重地葬于布尔萨。

在 1482 年至 1495 年间，巴耶济德二世由于害怕他的兄弟杰姆回来与他争夺王权，因此在对外征服的活动中一直比较克制。

但是自从杰姆病死了之后，已经完全无后顾之忧的巴耶济德二世，首先在西南采取了比以前更具有侵略扩张性的政策。1499 年 10 月，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之间爆发了战争。巴耶济德二世率领大军，首先夺取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麦托尼和科罗尼，并在纳瓦里诺的一次大海战中，一举击败了威尼斯舰队。虽然在 1503 年，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缔结了和约，但是战争还是极大地削弱了威尼斯在地中海东部的军事力量，从此奥斯曼帝国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它的海上霸权地位。在巴耶济德二世的指挥下，奥斯曼帝国庞大的海军，经常袭击地中海沿岸的每一座城市，而海军将领和船长们，则把从前的加齐海盗作为他们掠夺扩张效法的榜样。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巴耶济德二世也算是一位伟大的征服者和杰出的军事统帅，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东征西伐，开疆辟土的战争中度过的。由于长年累月在军帐中风餐露宿，使他得了严重的风湿病。1512 年 4 月，在儿子塞利姆一世的强迫下，健康状况日益不佳的巴耶济德二世宣布退位让权给塞利姆一世。一个月后，统治了奥斯曼帝国 31 年之久的巴耶济德二世，在前往他的出生地德莫提卡宫去休养的时候，不幸中途病逝。

当塞利姆一世继承了素丹王位之后，他并没有急于发动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他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巩固王位，因为此时他仅掌握着包括首都伊斯坦布尔在内的巴尔干地区，而他的哥哥艾哈迈德则统治着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对他利用非法手段继承素丹王位深表不满。于是，塞利姆一世立即率领大军渡海到小亚细亚征讨艾哈迈德。虽然艾哈迈德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还是在来年的春天，被塞利姆一世击败并捕获绞死。为了斩草除根，塞利姆一世还下令擒获了他的五个侄子和兄长考尔库德，并全部

秘密处死。

塞利姆一世在他统治的8年期间,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扩张征服战争。尤其是他东征伊朗,南伐叙利亚和埃及,使得奥斯曼帝国成为一个雄霸中东地区,统治穆斯林圣地,声势显赫的伊斯兰帝国。这种扩张征服和大片地区的获得,在使奥斯曼帝国东方化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奥斯曼人对外扩张中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

1514年4月20日,塞利姆一世以保护伊斯兰教逊尼派为名,向什叶派的波斯沙法维王朝发动了战争。在奥斯曼帝国军队大口径火炮猛烈地轰击下,波斯沙法维王朝的士兵们一排排地倒下,奥斯曼帝国凶猛慓悍的加尼沙里军团的士兵乘势发起冲锋,所向披靡,大败波斯沙法维王朝的军队。身负重伤的国王易斯马仪,仅带领少数卫兵逃离战场,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乘胜攻占了波斯沙法维王朝的首都大不里士,连国王易斯马仪的后宫嫔妃们也全部成了俘虏。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掠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以及无数波斯沙法维王朝的能工巧匠之后,胜利地返回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并将原属于波斯沙法维王朝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完全并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

随着波斯沙法维王朝的战败,在东方的三个伊斯兰国家波斯、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均势,完全被打破了,而成为了有利于后者的形势。波斯人曾经写信给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君主,告诉他关于唇亡齿寒的道理,请求派军队援助他们抵抗奥斯曼人。然而,在1516年和1517年的几次速决速战中,塞利姆一世率领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击溃了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军队,国王突曼也在战斗中被俘后处死。此后,马木留克王朝在埃及达400余年的统治结

束了，埃及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此时的塞利姆一世，已经是一位从多瑙河到尼罗河瀑布的帝国素丹了，甚至连奥斯曼帝国的宿敌，波斯沙法维王朝也急忙派遣使者前来为塞利姆一世新获得的领土而致贺，承认奥斯曼帝国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于是，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叙利亚和埃及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历经400年之久。除了原有的波斯和拜占廷帝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之外，塞利姆一世率军南下扩张，攻占叙利亚和埃及，现在与古老的阿拉伯文化又有了新的接触，接受到了新的影响。

在离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两年之后，塞利姆一世于1518年的仲夏凯旋又回到了帝国首都，但政坛时局的发展，又使他面临着一个关于哈里发职位的棘手问题。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塔瓦基勒，是一个被埃及马木留克王朝操纵着的傀儡，为了起到一种宗教上的号召力，他被埃及马木留克王朝随带出征，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交战，后在阿勒颇战败，他本人成为战俘落入塞利姆一世之手。为了获得对于伊斯兰教世界的号召力和统治权，为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们取得哈里发这个政教合一的称号，塞利姆二世把这个傀儡哈里发带回到了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过了许多年之后，即在1543年6月，穆塔瓦基勒才被获准回到开罗，后老死在那里，度过了他心酸的孤寂余生。穆塔瓦基勒在离开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之前，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将他的哈里发称号移交给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家族。在以后的年代里，奥斯曼帝国的历代素丹们就据此名正言顺地使用起哈里发的称号，成为伊斯兰教的最高宗教统治者，担负起了保卫伊斯兰世界利益的重任。

1525年秋季，连年的征战和日理万机的操劳，使得塞利姆一

世这位叱咤风云的奥斯曼帝国君主，终因急性心脏衰竭病逝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走完了他辉煌的生命历程。虽然塞利姆一世在位只有短短的8年时间，但他那金戈铁马的征服生涯，却给他的子孙后代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一支数量庞大惊人，使敌人望风披靡的军队；一套行政、司法、财政体制都已经日臻完善的封建国家机器；一顶统治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称号的桂冠，从而取得了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对奥斯曼帝国旧有宗教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决定性胜利。从此，奥斯曼帝国在对外征服过程中，伊斯兰教始终是其对外扩张的一面旗帜。

立法者苏莱曼大帝

塞利姆一世因病去世时，仅留下一个儿子，那就是世界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苏莱曼大帝，所以在奥斯曼帝国政权移交时，在统治集团内部并未产生任何紧张局势和混乱，更没有发生政治派别之间相互杀戮的事件。苏莱曼大帝一生在位46年，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趋于极盛。因此，他曾经以“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众素丹之素丹”等桂冠自诩，被欧洲人称之为“大帝”，被他的臣民们称之为“立法者”，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历代著名帝王行列中的一个最了不起的人物。

在塞利姆一世统治的8年中，由于奥斯曼帝国征服扩张的重点在东方，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有一段相对比较平静的和平时期。塞利姆一世的逝世，其子苏莱曼的继位，标志着欧洲大陆休战的结束。在苏莱曼王朝漫长的统治时期，整个欧洲大陆自始自终弥漫着东征西伐的战火硝烟。在苏莱曼大帝的率领下，奥斯曼帝国的

军队再一次转向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传统的信仰武士精神又恢复了。这时在西方基督教国家中，则为了争权夺利，疯狂地相互残杀，从而使得奥斯曼人有机可乘，去开始行动搬掉对西方领土扩张中的两道障碍，以实现解决先辈们感到棘手的两上目标：一个是贝尔格莱德，另一个是罗得岛。

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位于欧洲中部的多瑙河畔，是奥斯曼帝国与中欧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该城当时掌握在长期与奥斯曼帝国为敌的匈牙利人手中，直接威胁着帝国北部的边境，也妨碍帝国向中欧的扩张。罗得岛距小亚细亚海岸仅 6 英里，地处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到开罗的地中海的航道上，是两地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当时在罗得岛上那些桀骜不驯的欧洲骑士们，曾经不断地骚扰来往的船只，屠杀掳获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商务人员，严重地阻挠着奥斯曼帝国与阿拉伯领土的密切联系。1512 年 8 月，苏莱曼大帝统帅 10 万大军浩浩荡荡向贝尔格莱德进发。经过三个星期猛烈炮火的围攻，终于占领了贝尔格莱德这座长期抵挡奥斯曼人扩张的骄傲之城。第二年 6 月，苏莱曼大帝又在小亚细亚集中了 300 艘战舰和 10 万大兵，征讨位于地中海上的罗得岛。在对该岛的围攻持续达半年之后，迫使罗得岛上的欧洲骑士们有条件地放下武器投降。现在，苏莱曼大帝胜利地完成了他的先辈们未竟的事业，从此他们轰轰烈烈的对外征服运动已经再无后顾之忧了，因为通向多瑙河上游的道路又豁然敞开着，于是他乘机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征服战争，首先攻入匈牙利平原，继而推进到了欧洲强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地利领土上。

1529 年 9 月初，苏莱曼大帝亲率帝国的 20 万大军进犯奥地利，并于 9 月 29 日开始围攻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双方之间的战

斗异常的激烈，坚守城池的奥地利守军在西班牙援军的配合下，顽强地固守城池达三周之久。虽然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大炮严重地毁坏了维也纳城墙，慓悍骁勇的步兵们挥舞着战刀也差不多就要冲进城内，但此时双方都已伤亡惨重，丧失了斗志。尤其是在奥地利人顽强地抵抗下，苏莱曼大帝攻占维也纳城池的信心开始动摇，因此下令让疲惫不堪，士气受挫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于 1529 年 10 月 15 日全面撤退。1532 年 4 月，苏莱曼大帝再次御驾亲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闻讯起兵相迎。然而了解敌情后的苏莱曼大帝却采取了瞒天过海，声东击西的战术，率领帝国的军队，转向奥地利的另外一座重要城市斯底里亚，并在彻底摧毁了该城池之后，携带着大量的战利品班师回朝。1537 年 6 月，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为了避免引发新的冲突，双方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规定匈牙利平原和特兰西瓦尼亚仍然藩属于奥斯曼帝国，而哈布斯堡王朝要想继续领有匈牙利西北部的那份疆土，必须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纳贡。

苏莱曼大帝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战争，还产生了一些别的作用，那就是重新挑起了奥斯曼帝国与波斯沙法维王朝之间的敌对情绪，因为哈布斯堡王朝竭力敦促波斯人进攻奥斯曼帝国，以抵消法国与奥斯曼结盟的影响。同波斯沙法维王朝经过两次生死之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苏莱曼大帝率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又赢得了一系列新的胜利。虽然苏莱曼大帝也像他父亲塞利姆一世一样，并没有能够长期占领波斯沙法维王朝的首都大不里士，但他把伊拉克从波斯人手中夺了过来，并纳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这样一来，苏莱曼大帝把古老的伊斯兰世界的又一伟大都城巴格达，完全置于在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

虽说此时的巴格达破落不堪，昔日繁华的优美风姿已经荡然无存，但这一辉煌的胜利，还是令奥斯曼人激动不已。

1564年7月，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在继承了他父亲费迪南公爵的匈牙利王位之后，拒绝再向奥斯曼帝国纳贡，并且还多次发兵进攻奥斯曼帝国的领土。1566年5月1日，已经垂暮之年的苏莱曼大帝率领20万奥斯曼帝国的大军，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出发，进军匈牙利，这是苏莱曼大帝一生中的第七次远征。此时，他已经不能骑马了，只能乘坐在一辆马车里行军。当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攻陷多瑙河畔附近的锡格特，即将吞并匈牙利的前夕，苏莱曼大帝病死于军营大帐之中，享年72岁。苏莱曼大帝逝世后，大维齐索科利将死讯整整保密了三个星期不宣，在此期间，他派一个信使飞骑前往屈塔希亚，去迎接苏莱曼大帝的儿子塞利姆二世前来继位。

苏莱曼大帝一生共有八个儿子，但是只有一个寿命比他长。三个儿子在他即位的初期，尚在幼童时期就已经夭折了。穆罕默德聪颖贤达，品行端正，是苏莱曼大帝最喜爱的一个儿子，对他寄托着无限的期望。然而不幸的是，从小体弱多病的穆罕默德因出麻疹，病死于1543年，年仅21岁。长子穆斯塔法，在苏莱曼大帝的宠妃罗克塞拉娜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王位而施以奸计之后，被奉苏莱曼大帝之命的人，用绳索秘密勒死。而穆斯塔法的兄弟、驼背日汉吉尔，在听到兄长的死耗之后，在愤懑和绝望之中服毒自杀身亡。剩下的两个儿子塞利姆二世和巴耶济德都是苏莱曼大帝宠妃罗克塞拉娜的儿子。塞利姆二世是哥哥，此人阴险毒辣，喜欢搞诡计。为了争夺王位，狡黠成性的他又厚颜无耻地到处制造流言蜚语，设诡计加害弟弟，让冷酷无情的父亲苏莱曼大帝听信

了馋言之后，下令处死了巴耶济德。这样，当苏莱曼大帝逝世时，他的儿子当中仅剩下了塞利姆二世。

苏莱曼大帝的继承人塞利姆二世，长期耽于安乐，不思奋发，酗酒成性，根本不像一个伊斯兰教徒。国人都称他为“酒鬼素丹”，而西方人则干脆叫他“酒鬼塞利姆”。他从不领兵打仗，这与他的父亲苏莱曼大帝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苏莱曼大帝到了 70 多岁的高龄，还披挂上阵，而他也就是在那最后一次征战中溘然辞世，于是人们就常把 1566 年苏莱曼大帝的逝世，划定为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开端。到苏莱曼大帝去世时，奥斯曼帝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庞大帝国。然而，伟大的苏莱曼大帝之死，并未立即使奥斯曼人认识到，他们不只是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君主，因为在他的儿子塞利姆二世统治下，虽然奥斯曼人在陆地上对西方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压力，对地中海的威慑甚至还有所加强，但是到了 16 世纪末，许多外国驻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具有观察力的大使，以及一些机敏的帝国有识之士都已经看到，奥斯曼帝国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欧洲西方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它们变得相对强大了。而奥斯曼帝国却由于幅员辽阔，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人口众多，宗教、文化、民族等情况千差万别，再加上海岸线又特别长，因此，无论在外御或内治方面，都已经遇到了异乎寻常的难题。奥斯曼人崇高地位的不断下降，以及帝国内部出现的不祥之兆，人们将之一切都归罪于奥斯曼帝国传统社会制度的腐败。

四、奥斯曼帝国的社会与制度

帝国的政治体制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封建军事专制的、具有伊斯兰教性质的君主神权国家。位居奥斯曼帝国顶端和社会各阶层最高峰的是素丹(Sultan)。素丹既是帝国最高的世俗统治者，也是最高的宗教领袖，拥有"哈里发"(Khalifa)的称号，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大权于一身，自称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对臣民拥有无限的权力。作为帝国的元首、护教者和神话的执行者，帝国所有的军事力量都归素丹指挥，都要无条件的服从他的命令。素丹对所有的臣民操有生杀予夺大权，因而背叛和反抗素丹是十分危险的。

在西方，素丹的政府被称为"最高波尔特"(指奥斯曼帝国政府)。素丹之下设有国务会议，由数名大臣、大法官和国务秘书组成。国务会议类似于近代的内阁会议，但也有些同最高法院相似的地方。事实上，它兼有奥斯曼帝国政府中这两个部门的职能。大臣称为"维齐"，辅政的宰相称为"大维齐"，兼掌行政和军事，代表素丹处理帝国的日常政务。早期的素丹们亲自主持国务会议，处理和决定帝国的大事。从穆罕默德二世晚期开始，历届素丹不再过问那些繁重的日常政务和亲自主持国务会议，而由大维齐代行主持和处理日常政务，素丹只要求国务会议每周向他呈交一份内容详尽的工作报告。随着此后素丹大权逐渐地旁落，到了17世纪下半叶，大维齐的许多工作都是在他自己的官邸召开的国务会议中决定的。

奥斯曼帝国的国务会议下设有一整套精心完善的庞大官僚机构，既可以兼并新征服的领土，又能把它们相当牢固地黏合在一起；既可有效地管理治安、税收，又能维持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16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的中央官僚机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帝国国务会议下所设立的管理行政的各局和管理财务的各局，协助贯彻执行决议和保存国家档案。因为在奥斯曼帝国这个高度集中的官僚国家中，有相应的大量文牍工作。国务秘书是帝国中央行政机关的长官，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随着西方国家殖民化的历史进程，国家秘书负责的主要事务，逐渐地演变成了如何处理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的相互关系。因此，从19世纪开始，国务秘书的办公地点改为外交部。

奥斯曼帝国中央统治机构下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是省，是奥斯曼帝国军事行政的基本单位。一个省由数个桑贾克(县)组成，一个桑贾克由数个村庄组成。省设有省督，一律由素丹亲自委派。省督有着大臣的地位和帕夏(将军)的官衔，是素丹派驻各省的首席长官。他既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最高军事长官，他通过完全效仿中央行政机构的省政务会议，对省内各县加以控制，战时指挥军队打仗，平时则负责社会治安。此外，省督在司库、秘书和私人助理的协助下，处理"蒂玛"持有者的分派和提升，处理涉及帝国军人集团成员的诉讼案件，及时地把以国库名义征收的税款上缴中央政府，并坚决执行素丹所颁布的一切政令。奥斯曼帝国最基层的地方行政单位是桑贾克，由桑贾克贝伊(县长)管理。他既是一县的行政长官，又是一县的军事长官，由副官们辅佐，为了发挥更大的行政管理效率，一般他们都居住在县的重要市镇里。

奥斯曼帝国的司法制度，严格地讲，是沿袭和继承了阿拉伯帝

国的法律制度，主要由四种不同的法体或法源所组成。首先，居于其他三种之上的是伊斯兰法，伊斯兰法是有关伊斯兰宗教、政治、社会、家庭和个人生活准则的总称。内容包括信仰、道德、崇拜仪式、民事和刑事，其目的在于使伊斯兰宗教信仰、礼仪同民法、刑法等相结合，成为伊斯兰教信徒的宗教职责。与一般意义上的法有所不同，伊斯兰法是一种宗教法，它对非穆斯林不具有约束力。占第二位的是卡农，即素丹颁布的所有敕令，它们之中有些是行政性质的，有些则是对伊斯兰法的补充。最后两种是阿德特和乌尔夫。阿德特是奥斯曼人和被他们所征服的各民族所遵守的习惯法。按照阿德特的适用原则，被征服的各民族成员，不论居住在什么地方，一律适用本民族的法律，而外族人即使长期居住在此地，也不受这个地方主要民族的法律保护。乌尔夫则是在位素丹的权威和意志，它可以违反阿德特。此外，卡农可以改变阿德特和乌尔夫，并可以废止或修改过去的旧卡农，但伊斯兰法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具有伊斯兰性质、政教合一的君主神权国家，因此，在国家政权机构中，同行政机构平行的是伊斯兰教机构，它也是帝国社会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从职责上来讲，伊斯兰教机构主要负责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教育和法律三个部分。

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伊斯兰教史上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乌里玛的教权阶层。他们的首要职责，是高举伊斯兰教的法典，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秩序。乌里玛阶层的成员都是些严格受过穆斯林神学和法律的训练，学问渊博的有识之士。他们除了担任奥斯曼帝国的各种宗教官职以外，往往也担任慈善基金组织的主管人员。

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机构，一般设“学者会议”和“教律裁判委员会”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由伊斯兰教长老、法官以及从事教法和教理研究的学者们组成，负责司法和教律的裁决，负责监督和履行宗教仪式的完成，管理清真寺，管理宗教基金和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各级教育。“学者会议”除了负责为帝国各级政府官员解释伊斯兰教之外，还为中央行政机构的重要官员和地方首席行政长官选配法官和神职人员。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对外扩张活动中，伊斯兰教机构中的成员们要经常随军出征，宣扬伊斯兰教圣战，作战前动员和组织新征服地区的宗教活动。

伊斯兰教机构中的最高职务是伊斯兰教教长，一般由素丹在乌里玛阶层中亲自选拔和任命那些德高望众，出身名门显赫的人担当，以后随着社会变化的需要，又改为从著名的司法人员中挑选。伊斯兰教教长的地位与大维齐相等，素丹和大维齐在处理国家重大社会问题上，都要首先征求伊斯兰教教长的意见，并且在一般情况下，帝国的教令都是在素丹的要求下，由伊斯兰教教长发出。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伊斯兰教教长可以发布罢免素丹的教令，但这都是在帝国王室成员中的素丹王位竞争者与军政要员的要挟下发布的。

总之，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交往中，奥斯曼人吸收了伊斯兰教、拜占廷帝国和突厥民族的社会因素，创建了一种新的统治制度和管理体系。奥斯曼帝国最初是在突厥塞尔柱人的社会根基上建立的，它直接承袭了突厥塞尔柱人的军事组织和战略战术。而在其行政、宗教、法律、教育等方面则完全受益于阿拉伯人及其古老的伊斯兰文明。奥斯曼人在财政税收方面则完全是受到了拜占廷帝国的启示，尤其是在与拜占廷帝国的长期交往中，通过政治联盟或

征服战争,大量地吸收了其先进的行政管理经验和文化的熏陶。因此,奥斯曼帝国是由不同社会因素组成的混合体,是当时拥有最好统治秩序的一种社会制度。

帝国的军事建制

奥斯曼帝国在14世纪迅速崛起,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除了与它的社会制度等因素有关系外,也与它那完善的军事建制和拥有一支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军队是分不开的。在奥斯曼帝国的初期,军队组成的惯例是,传令兵到各村庄宣布:任何愿意作战的人,自带武器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集合。在奥尔汉统治时期,在与拜占廷帝国的军队交战中受到启发,奥尔汉把有作战经验和能力的奥斯曼人组成了一支步兵部队,按十人、百人和千人为单位编排,每个单位编组设置了一个负责指挥的军官,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奥斯曼统治者的直系亲属和近臣,执掌着军队的大权。此后,为组建一支职业化军队,奥尔汉把战利品的五分之一收归国库,作为军饷,成立了一支完全由基督教奴隶和战俘参加的步兵部队,称为加尼沙里军团,欧洲则称为近卫兵团。由于加尼沙里军团的士兵个个凶猛慓悍,训练有素,对素丹忠心耿耿,其战斗力威慑欧洲各国骑士,所向披靡的战斗精神经久不衰,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的主力,在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组成奥斯曼帝国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加尼沙里军团的成员,在历史上主要有两个来源,在社会上、种族上或文化上同那些自愿成为加齐和奥斯曼人的自由背叛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在伊斯兰国家有一个传统,那就是统治者作为国家的化身,通常接受所掠

劫的战利品的五分之一。由于长期以来，战俘就是打胜仗时的宝贵奖赏，又由于他们的命运永恒不变，那就是终生为奴，所以在奥斯曼帝国的早期，拥有大量战俘奴隶的素丹们，竟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排战俘奴隶们，让他们为他更好地服务。加之在周围地区的战俘奴隶市场上生意又很萧条，因此当时解决此问题的惟一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奴隶们变成士兵，去替主子打仗，掠劫财富进行扩张，或者用战俘奴隶来做保镖，也是奥斯曼帝国早期的一个重要传统。这种制度被称为“古兰制度”。“古兰”是指经过精心训练而在统治者的宫廷和国家机构中服务的奴隶。正像奥斯曼帝国和其他许多政治制度一样，“古兰制度”是奥斯曼人从阿拉伯帝国和突厥塞尔柱人那里学习和继承而来的一种惯例，经过奥斯曼人的不断发展，最终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具自己特征的社会制度。

根据“古兰制度”的惯例，在战争中被俘的基督教青少年，由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作为奴隶蓄养着，当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就被整编和训练成为帝国军队中的特种部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加尼沙里军团。另外，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有关法令，许多基督教青少年俘虏被租赁给奥斯曼的军事封建领主去做若干年的学徒。在此期间，他们学会了奥斯曼人使用的语言和生活习惯，身体锻炼得更加健壮，并精于作战技术和各种武器，与普遍的奥斯曼士兵和广大民众逐渐地融合在一起，最终被同化。

起初，当对外征服扩张能够为军队提供足够的战俘时，帝国近卫兵团的主要来源是基督教青少年战俘，尔后，当不能够为对外征服扩张的帝国军队提供足够的战俘时，就逐渐地形成了一套从基督教臣民的男孩子中募集兵丁的制度。这种做法据有关史料考证，大概可能始于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到了穆拉德二世统治年

间，从基督教臣民的男孩子中定期征兵，似乎已经趋于制度化了，是奥斯曼人对传统"古兰制度"的改革。

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那些被征募来的基督教青少年不久即改宗伊斯兰教，并接受割礼，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考试来测定他们的智商。大致经过十里挑一的筛选，那些考试合格，身体体格完全符合标准的基督教青少年，立即被送往宫廷中接受训练，这种训练既是体力的，也是智力上的。这些被选中入宫学习的基督教青少年，将要接受奥斯曼帝国最好的教育，并且一但学习训练完毕，他们将准备接受奥斯曼帝国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那些绝大多数未被选入宫廷中接受训练的基督教青少年，将被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奥斯曼农民雇佣去，以便在那里学习突厥语和熟悉伊斯兰教的信仰。当他们已经学成或帝国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被召回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加入近卫兵团，构成了奥斯曼军队的骨干。在战斗中，他们常常是被用作后备军，不到关键时刻决不轻易上阵，平时在帝国首都担负保安、警务和消防等任务。

除了近卫兵团和王室骑兵以外，地方骑兵也构成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奥斯曼帝国这个庞大战争机器对外征服扩张的强大支柱。地方骑兵称为"西帕希"，它来自帝国各地的封建领主，完全依赖于采邑制度。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有关法令规定，一切领有采邑的封建领主必须每年向素丹提供一定数额的兵源，组成地方骑兵部队。奥斯曼帝国的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都与采邑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素丹一般把新征服来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授予当地的封建领主，由他们为帝国提供一定数额的封建骑兵，这既有效地加强了对那些封建领主的统治，又解决了国家维持一支庞大军队而无须支持巨额现金的问题。

除了地方骑兵之外,“阿金日”和“阿扎布”也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中,一支骁勇善战,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阿金日”是奥斯曼帝国非正规、无军饷,并且作战时要自己带一匹战马,一个护胸和一顶帐篷的志愿骑兵。他们一般是为了荣立战功,攫取战利品而志愿应召服役的。“阿扎布”是奥斯曼帝国非正规,无军饷,自备相应武器的志愿步兵,他们与“阿金日”类似,也是为了荣立战功,攫取战利品而志愿应召服役的。在奥斯曼帝国每次的对外征服战斗中,“阿金日”和“阿扎布”总是被派遣到第一线打头阵,因而有时伤亡比较惨重。

此外,奥斯曼帝国还拥有强大的海军舰队。由于奥斯曼帝国幅员辽阔,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再加上海岸线又特别的长,因此,从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发展海军就成了奥斯曼帝国发展军事中的重点。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不断努力下,海军逐渐成为帝国各军种各兵种中的一支特别具有战斗力的队伍,海军战舰始终保持在三四百艘左右,装备精良,武器先进,并配备有来自欧洲各地经验丰富的航海人员和训练有素的水手,其实力均能同当时的海上强国西班牙、法兰西和威尼斯的海军舰队相匹敌,其威力震慑于整个欧洲和亚洲。

到了15世纪后半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式火器的出现,用兵打仗的特点此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骑兵的作用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要组织和训练掌握新式火器的步兵和炮兵,奥斯曼帝国就不能够再依靠采邑制度了,因为组建新式军队,得由帝国中央政府来领导实施,这就需要用大量的现金购买和制造新式武器以装备军队,因此用采邑提供兵员的传统办法已经解决不了此类重大问题了。于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有关社会体制,就开

始激烈地反映出这种变化。例如，有些早期采取岁入形式的采邑封地，后来就逐渐地转化成为缴纳税金的农庄，成了奥斯曼帝国提供现金税收的行政单元。匈牙利和叙利亚刚并入奥斯曼帝国的同时，采用的就是岁入制，到了1670年，两地相继改用纳税制。埃及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后，基本上一直采用以纳税农庄为基础的赋税制度，每年向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输送大量的资金，以维持奥斯曼帝国守备部队的日常开支。

帝国的米勒特制度

奥斯曼帝国随着早期不断对外扩张和征服，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封建军事联合体。帝国境内的主要宗教团体，除伊斯兰教之外，还有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格里高里教派和犹太教等。虽说信奉希腊东正教的人多属于巴尔干地区的农民，亚美尼亚格里高里教派信徒多为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农民，犹太人多为城市居民，但是这些宗教团体或者教派团体，并非完全按照地理位置划区划块分布，相反，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的宗教或教派团体都是相互混杂在一起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宗教团体或教派团体这种四方相互混杂的模式，在奥斯曼人到来之前，就已经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其二是由于奥斯曼帝国的东征西伐，宗教信仰的不断改变，以及大批移民的流入而造成的。此外，出于对边境防卫、地方治安、使游牧部落定居下来，或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考虑，奥斯曼帝国政府也有意识地采取了将各类居民团体迁徙至新征服地区定居的做法，从而进一步促成了不同宗教团体或教派团体的混杂相处。

为了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进行有

效的统治,使他们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和谐有序地相应交往,奥斯曼帝国政府采用了米勒特制度。米勒特制度是奥斯曼帝国最具自己特征的一种社会制度,从奥斯曼人早年皈依了伊斯兰教以后,奥斯曼人遵照古老的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对待被征服的非穆斯林人,一直采取一种非常宽容的宗教政策,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团体,可以充分享有信仰自由和文化自由。这种宽容的宗教政策的实施,使得许多巴尔干地区的非伊斯兰教团体,都心甘情愿地接受在奥斯曼人统治下的那种宽松的生活,而不愿意忍受拜占廷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对宗教和文化的限制和迫害。

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每个人身份的确定,完全是根据宗教信仰,甚至是根据教派来进行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之一,除了穆斯林民众不需要向帝国政府交纳人头税之外,那就是非穆斯林民众都被帝国政府安排在法律承认的宗教社区内生活。帝国政府把这些非伊斯兰教的宗教团体或宗教社区,统称为“米勒特”,意思是“奥斯曼帝国内有特殊信仰的集团或民族”。

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每个米勒特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发展自己宗教、文化和教育的机构,征收税款并上缴帝国国库,保持自己独立的法庭,以审判同族成员一切案件的各种合法权利。在奥斯曼帝国,每个米勒特都有自己的一个领袖,他主要负责向帝国政府上缴从米勒特所收到的税款,并保证其米勒特的每一个成员社会行为规范,发誓效忠素丹。此外,根据帝国政府的有关法令,在处理个人的一些事务方面,如结婚、离婚、继承遗产等,米勒特的成员都必须要通过他们的宗教社会与帝国政府发生联系。也就是说,如何对非伊斯兰教社区的司法处置,法律必须因人而异,而不是随居住地而定。这种属人主义的司法原则,虽然在当时的欧洲已经

遭到各国的摒弃，但在奥斯曼帝国这个宗教、民族广为混杂的地区仍然被人们所普遍的接受。所以，根据奥斯曼帝国某些法令的规定，米勒特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奥斯曼帝国的行政机构和伊斯兰教机构平行的。他们的利益与素丹，以及与在奥斯曼帝国对外征服的一系列战争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分教而治"的米勒特制度，是奥斯曼帝国手中对广大被征服地区异族、异教实行有效统治的重要工具。

在奥斯曼帝国，对于一位非穆斯林出身的人来说，要想跻身于上层社会，在帝国政府中担任要职，除非他首先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皈依伊斯兰教，然后想办法要求进入军队，志愿参加奥斯曼帝国发动的各种对外征服战争，屡建奇功，以充分显示自己的忠诚和勇敢，从而接受素丹给予的采邑赏赐。此外，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发展中，广大的非穆斯林在政治方面，还要受到其他某些方面的限制。例如，基督教的教堂内不得使用大钟；非穆斯林不能随身携带武器，并被排斥在帝国政府的兵役征召令之外；非穆斯林每年还要向帝国政府缴纳一笔专门的人头税，等等。尽管如此，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非穆斯林的命运和生活状况，往往要比同时代欧洲其他国家中少数派宗教团体的命运好得多。因此，那些非穆斯林似乎很乐意接受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安排。

如果不按种族和宗教因素来划分，完全按照经济和社会地位来考察进行归纳，15 世纪至 18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整个社会应该包括这样三部分传统民众：游牧民、农民和市民。山区或是沙漠地区的游牧部落的牧民数量很大，他们主要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东部和阿拉伯的广大地区。他们沿袭着游牧民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其主要财产来自掠劫的战利品和饲养的畜群。在

奥斯曼帝国,农民是社会经济的重要基础,他们一年四季在土地上辛勤劳作,交税纳粮。他们所耕作的那些土地往往并非他们所有,而是属于采邑或纳税农庄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奥斯曼帝国的农民房屋简陋,生活贫困,他们的耕作方法非常原始,落后于西欧的耕作技术。他们饲养的牲畜同西欧农民饲养的牲畜比起来又瘦又小。不过,由于奥斯曼帝国疆域庞大,可耕作的土地很多,所以在农业收获上一直尚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并且还有少量的粮食出口。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商人、工匠和手艺人,一般都集中居住在城镇里,其中好多人是非穆斯林,尤其是商人,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奥斯曼帝国,根据有关政府的法令,工匠和手艺人都必须加入行会,行会则对其成员和产品实行监督。有些地方的行会势力很大,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足以有效地控制当地的政府。这些行会不但具有经济上互助的性质,而且还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每个行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或守圣徒。这些行会有些是由穆斯林组成的,有些是由基督徒或犹太人组成的,也有些行会兼而有之,人员比较混杂。

奥斯曼人在传统上多为士兵、行政官员和农民,一般不从事商贸活动,他们把这个行业留给了阿拉伯人、基督教徒、犹太人等少数民族去干。虽然在15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政府为了军事上和安全上的需要,规定黑海地区不对西欧的基督教商人开放,但是作为帝国臣民的希腊人、犹太人则可以继续在那一带经商,从事各种转口贸易活动。

作为奥斯曼帝国社会的一部分,那些主要居住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西欧商人,都有自己的团体,他们按照帝国政府与西欧国家签订的一系列正式条约的规定生活。这些条约总的精神是,

承认西欧各国商人在奥斯曼帝国可以享有某些权利和义务，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法律生活。这些条约仿佛是奥斯曼帝国政府恩赐给西欧各国商人们，而不是经过双方平等协商制订出来的，表现出帝国政府一种对欧洲轻慢的态度。然而，在以后的年代里，随着西欧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西欧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较对前者越来越有利的时候，这些条约便发展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治外法权条约，从而使得西欧各国的商人们在奥斯曼帝国享有一种明显的政治特权，并且时常对于西欧各国政府对奥斯曼帝国极为重要的各项方针政策，施加影响，给日后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成为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帝国灿烂的社会文化

奥斯曼帝国灿烂的社会文化，是在继承了东西方各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突出的多民族、多来源的特色。当初，奥斯曼人自身的文化底子很薄，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他们所建立的幅员辽阔的帝国，把众多的民族都纳入他们的统治下。这众多的民族不仅在血缘上发生了融合，而且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也发生了相互融合。因此，奥斯曼人在陆续接触，并吸收了阿拉伯、波斯，特别是拜占廷帝国文化的基础之上，也像其他民族一样，随着政治上的稳定，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出了自己的灿烂文化，在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奥斯曼人在文化上的突出成果，就是遍布于全国各地的清真寺建筑艺术。16 世纪，是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素丹们为了炫耀其统治的威力，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城镇不惜耗费巨

大的人力、财力广为兴建清真寺和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王宫陵墓。这些建筑物不仅规模宏伟壮观，雕刻装饰绚丽多彩，而且造型独具一格。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巴耶济德二世清真寺和苏莱曼大帝清真寺。从这些清真寺可以看出，奥斯曼帝国的建筑师们详细地研究了拜占廷帝国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并且从它的庄严宏伟，科学实用的风格中吸取了灵感，总结出了怎样解决清真寺既要被修建成为一个适合于集体礼拜的、宽敞的方形或长方形结构，又能使用圆屋顶保留伊斯兰风格的问题。此外，这些清真寺在有些细微的部位上，还可以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影响。

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奥斯曼人除了在建筑方面的成就之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6世纪是奥斯曼帝国古典诗歌最为发达的历史时期。阿布杜勒是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诗坛上的佼佼者。他以突厥文创作的诗歌，语言纯朴，感情真挚。他常以春天、爱情作为题材，歌颂大自然和人们幸福美好的生活，语言优美动人，极富感染力，对奥斯曼帝国抒情诗歌的发展影响很大。苏莱曼大帝曾经高度赞赏他的诗歌成就，称誉他为“奥斯曼帝国的第一诗人”。其实英武盖世的苏莱曼大帝本人就是一位文采风流，才华横溢，卓有成就的诗人，一生的作品成果斐然。苏莱曼大帝写诗的时候所用的笔名是穆希比，他的诗歌叙述生动，充满了激情，极富有想象力，其体裁深受波斯诗歌的影响。在苏莱曼大帝的影响和慷慨的赞助下，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诗人和作家，有四分之一是属于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产生的，他们使奥斯曼帝国有了一种优越感和文雅感。此外，在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文坛上还盛行讽刺诗，其内容多是揭露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昏庸。奥斯曼帝国的著名诗人维西所写的《对伊

斯坦布尔的规劝》和《梦》等作品，就是反映当时奥斯曼帝国社会风尚堕落的不朽诗篇，可以使人们对奥斯曼帝国当时的国势凌夷、政治腐败、民众疾苦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奥斯曼帝国的另外一位著名的诗人涅菲，更是以讽刺诗见长。此人素来言语无忌，十分尖刻，行为也无所忌惮，多少有些愤世疾俗，是一位个性很强的诗人。他的诗集《命运之神》，字字掷地有声，句句振聋发聩，无情地揭露鞭挞了素丹与贵族的罪恶，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他也因此最终被统治集团迫害致死。

除了文学作品以外，奥斯曼帝国的纵横古今，褒贬百年的史学著作也极为丰富，卷帙浩繁，史学家们盛极一时。他们的著作有的是属于通史范畴，有的则为专史，只记述帝国历史上某个时期的一个发展阶段或一个重要事件，史料翔实，语言生动，剖析准确，论证精辟。史学家们试图用古代贤杰们彪炳春秋的丰功伟绩去激励后人，匡正过失。例如，奥斯曼帝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拉马赞的著作，描述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苏莱曼大帝的统帅下攻占罗得岛的经过，作者用他那由淡而浓，由简而繁的笔墨，详略不等的论证分析，向人们勾勒出了一幅奥斯曼帝国军队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全景图。另外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扎德的著作所叙述的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著名的莫哈奇战役之胜利。书中描述的战争场面壮观、激烈，阅后令人汗颜耳赤，荡气回肠。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伟大历史学家是萨阿德丁，此人曾经是苏莱曼大帝的孙子穆拉德二世的导师。他和他的儿子小萨阿德丁共同著有一部多卷本的奥斯曼帝国通史，书名为《历史的顶峰》。作者详细地介绍了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和发展。在此后几个世纪中，这部多卷本的帝国通史，一直指导着人们对奥斯曼帝国从最早的创始时期，到

作者那个时代社会发展的看法，是后人研究奥斯曼帝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哈利菲也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聪慧豁达，勤奋好学，通晓多国语言，一生撰写了好几部关于世界历史的著作，并编撰了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国历史著作的名录，为人类社会的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才华横溢，非常优秀的地理学家。他们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卓越贡献而声名鹊起。例如奥斯曼帝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卡蒂布，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共为后人留下了 20 余部关于政治、历史、地理、文学、神学等巨著，被后人誉为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世界通鉴》一书，是他在地理学方面的著名代表著作。

在奥斯曼帝国人才辈出的历史长河中，大旅行家埃弗利亚·切列比以他那对大自然充满的爱和坚忍不拔的探险精神，被后人称誉为“奥斯曼帝国的伊本·拔图塔”（伊本·拔图塔是阿拉伯帝国时期的著名大旅行家，此人曾经游历过中国及东非海岸、西非、印度等地，写下了许多漫游手记），埃弗利亚·切列比从 1631 年开始，在长达 40 年的旅游生涯中，曾经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为后人留下了十大卷的《游记》。直到今日，他的这十大卷《游记》，仍然是世界各国学者们研究这一时期世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奥斯曼人起源于游牧大草原，受大自然的影响，不但各个慓悍骁勇，而且各个能歌善舞，因而奥斯曼帝国的舞蹈行态优美，举世闻名。奥斯曼帝国的舞蹈，是在奥斯曼人早年的游牧民族舞蹈艺术的基础之上，吸收东西方舞蹈艺术特点以后而逐渐形成的。此

外，奥斯曼舞蹈的另外一个特色，是服饰异常的华丽。奥斯曼人的舞蹈从民间转入宫廷之后，歌舞者的服饰堪与君主嫔妃们华丽的服饰相媲美。

奥斯曼帝国的皮影戏，也是帝国艺苑中的一枝色彩艳丽的艺术之花，奥斯曼人把它称为“卡拉格兹”（黑眼睛剧场）。奥斯曼帝国的皮影戏与中国、印度、阿拉伯等民族的皮影戏均属于同一体系。演出时，挂上一幅白色幕布，隔一定的距离而设置蜡烛或煤油灯等灯具，然后在幕与灯火之间进行皮影表演。皮影道具多是一些用骆驼皮、驴皮剪制而成的人物、动物，以及各种形状的画片。剧中多是反映奥斯曼帝国家庭生活趣味的内容，主题多是些劝善惩恶的说教，故事剧情矛盾的解决，也都落到伊斯兰教经典规范的准则上。奥斯曼帝国的手工艺品，在世界上也同样享有盛誉，在许多领域中使得奥斯曼人颇有一种可以引为骄傲自豪的成就感。例如制图学、书法、织锦、木刻、石刻、皮革制品、饰有几何图案或花卉蔬菜图案的彩色瓷砖等，在那一历史时期，都久负盛名，誉满世界。

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文化，之所以绚丽多彩，硕果累累，一方面是与其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历史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与历史统治者对发展社会文化的重视和奖励密不可分的。当奥斯曼帝国迅速崛起以后，随着对外征服运动的顺利完成和经济的繁荣、政局的稳定，帝国政府为了巩固政权，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所以十分重视社会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帝国政府礼贤下士，搜罗人才，不分种族和宗教信仰，对广大知识分子量才录用，使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自由地在学术领域里进行探讨研究，并且享受丰厚的俸禄，过着一种安逸的生活。

正是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礼贤下士、开宗明义的政策，使它很快就把各类人才都吸引到了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使那里云集各方专家学者数千人，其万般风华，令人叹为观止，从而使得奥斯曼帝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达到了极盛。此外，奥斯曼帝国地处欧亚非三大洲要冲，位于东西方交通的重要枢纽，所以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上，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交往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正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西传，唤醒了沉睡中的欧洲大陆，打开了欧洲知识领域的大门，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早日到来。也正是奥斯曼帝国文化在东方的广泛传播，使得伊斯兰教在东方的发展尤为迅速，因此可以说，在东方，哪里有穆斯林聚居的地方，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文化就在那里广泛传播，产生巨大的影响。总之，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光彩夺目的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文化，由于遵循敞开大门与世界沟通的开放精神，因此显得开阔、明亮，一片生机，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交往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路径取向，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第二章　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

一、奥斯曼帝国的衰败

腐败与懦弱的皇权

造成奥斯曼帝国衰败的根本原因之一，首先是毛病出现在帝国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及包括军队在内的帝国政府机器的失灵。在苏莱曼大帝去世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加上地方封建割据严重，各地区纷纷闹独立，不再听从帝国中央政府的统一号令；尤其是对帝国军事封建采邑制度的极大破坏，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军事采邑向世袭个人封地转化的趋势，造成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基础的逐渐松动，以及广大农民和被征服民族的不断反抗，从而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战争屡受挫折，极大地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

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早期奥斯曼帝国王室的头 10 个素丹个个英武盖世，光彩夺目，具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深得人们的敬仰和钦佩。在他们还是王子的时候，遵照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不管年龄多小，都得照例离开帝国首都去各省机构任职，取得政治

方面统治的经验，有时还得随军出征打仗，积累有关军事方面的经验。为了使临朝执政的素丹免受因兄弟觊觎王位而闹内战的分裂，危及帝国的一统天下，弑兄戮弟就逐渐成了帝国素丹王位继承的惯例。这样做的理由是：社稷不安要比丧失几条人命更遭殃。虽说某个王子最终能够登上素丹王位，也得归功于朝廷命官和近卫兵团的协助配合，但这个登上素丹王位的王子往往是诸兄弟中最机敏、最能干的一位，具有文治武功的才能。因此，直到苏莱曼大帝为止，素丹一般都是要亲自领兵挂帅，主持朝政。这前10位素丹平均在位27年，经济繁荣，社稷稳定，统治的年代较长，而这一支系其余的统治者却都是个个养尊处优，平庸较弱，任性妄为，腐化堕落，其中有些人甚至可以说相当无能，智力上还存有一定的缺陷。造成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荒淫无道，才能衰退的主要原因，必须要从奥斯曼帝国素丹王位继承原则的更改这一做法中去寻找。

1595年7月，上台执政的新素丹穆罕默德三世，根据奥斯曼帝国的“卡农”习惯法，下令派人一下子杀死了他的19个兄弟，在这以后，奥斯曼帝国的继承原则就出现了意外的变化。1603年4月，当素丹穆罕默德三世因病去世时，奥斯曼帝国王室家族中的直系男性亲属，只剩下他的两个少不更事的儿子。如果杀死其中一个，而另外一个将来如果出现不幸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影响帝国王室的传宗接代。所以继承了素丹王位的艾赫默德一世，根据辅佐大臣们的意见，饶恕了他弟弟穆斯塔法的性命，而穆斯塔法按照帝国的有关规定，则被严密地关在后宫女眷居住的特殊住所里，不许与外部世界有丝毫接触。从此，奥斯曼帝国在王位继承原则方面，对同胞手足的处置，改用软禁替代了杀害。

1617年2月，被长期软禁的穆斯塔法接替了病故哥哥的素丹

王位，自此以后，当素丹逝世或因其他原因宣布退位后，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王位就不一定再是父子相传，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有时也改由帝国王室中最年长的男子来继承素丹王位，但是那些长年累月被软禁在宫廷中的王子们，因住在高墙大院里面，与外部世界隔绝，所以孤陋寡闻，很少也很难了解到外面所生发的一切事情，并且每日还要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害怕根据帝国的“卡农”习惯被自己执政的兄长杀害，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长期生活在一种恐怖的状态之下。奥斯曼帝国实行的这种王位抚育和选择制度，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产生出任何有作为的统治者来的。

摆脱了所谓囚笼式禁闭生活的新素丹，因过去完全被禁锢在深宫后院之中，过的是一种无聊闲极的日子，所以体格和精神往往都很虚弱，尤其是心理发育极不正常。由于长年累月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所以新即位的素丹们谁也没有机会学习和实践治理国家，或者长年征战，养成一种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品质。因此，他们即位后全无料理朝政，治理国家的经验，更缺乏应付帝国社会事态骤然变化的能力。他们不思奋发，不务正业，逸乐无度，醉生梦死。有些人甚至把整日酗酒作为一种慰藉自我，逃避现实的一剂良药。另外，虽然生活在深宫后院的他们被允许娶妻纳妾，但是这些妻妾不是动了绝育手术，就是当所生的小孩一呱呱坠地，就被人残忍地弄死，所以没有哪一位素丹在登基之前膝下有子。也就是说，即位后素丹所生的儿子，在他去世时还未成年。

由于这些素丹长年累月过着一种囚笼式的禁闭生活，他们既不会领兵打仗，也完全没有料理朝政、治理国家的经验，于是他们即位后也不再把帝国朝政大权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他们除了参加一些庆典之外，很少出席帝国的国务会议，料理国家政务的主

要责任就逐渐地旁落到了大维齐的肩上，大维齐的官邸完全成了大臣们召开国务会议的重要场所。

虽然这些素丹已经放弃了对帝国日常政务的控制，但是最终谁来当大维齐，还得由素丹来指派。在大维齐和大臣们的人选方面，皇宫仍然能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然而，反过来，这种影响和作用，又为宫内各派系勾心斗角，在帝国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安插亲信开了方便之门。正是在素丹腐败无能、充满邪恶之道这样一种气氛中，宫廷内外阴谋诡计到处盛行，恶毒的流言蜚语成了帝国政府中置政敌于死地公认的伎俩。人们忠于素丹，为奥斯曼帝国效劳的信仰，完全被惟利是图的动机所支配，从而导致厚颜无耻，贪赃枉法，随波逐流，见利忘义等现象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使得奥斯曼帝国政府号令不通，纲纪废驰，整个社会迅速呈现出一种穷途末路的景象。

素丹们奢靡无度的宫廷生活，不但使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日趋腐败，而且还耗去了巨额的财力，导致国库日益枯竭。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满足他们挥金如土的生活，帝国的素丹们一方面不断下令以各种名目开辟税源，提高税额，敲骨吸髓地压榨广大的百姓，另一方面强迫他们的官员们在提拔晋升到较高职位上去的时候，要向素丹进献重要的礼物，这种做法不幸打开了帝国贪污腐化之门，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卖官鬻爵、争权夺利盛行，严重地损伤了奥斯曼帝国社会的机体。16 世纪末以后，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和民族独立斗争风起云涌，不断爆发，给予了奥斯曼帝国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冲击着帝国日益腐朽、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和反动统治，使得奥斯曼帝国从此陷入了社会危机的历史深渊。

社会制度的崩溃

奥斯曼帝国皇权的腐败与懦弱，以及宫廷内部勾心斗角，不但滋长了任人惟亲的腐败社会风气，而且还助长了行贿受贿、卖官鬻爵的做法。出钱买官位，意味着当了官之后，总得设法把花的钱捞回来，并还得为将来的前途积攒点资本。于是，从行贿受贿谋官位，到假借收税榨取额外钱财的这一恶性循环就不断地加剧了。再加上官位频频更迭易手，所以发生的一切情况就越发糟糕，甚至连伊斯兰教高级阶层的乌里玛也受到了这股腐败社会之风的严重影响。一些训练不当、不学无术的乌里玛之辈，他们出钱买下官位，然后另雇替身代他们去催粮纳款，搜刮民膏。在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司法的腐败更为严重，法官个个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有钱就能打赢官司，没钱请别进来，整个社会根本就无公平、正义可言。

奥斯曼帝国这种江河日下的社会衰败趋势，所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灾难性的，尤其是使得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征兵制，以及由帝国皇宫学校培养训练出来的基督教青少年新兵们，也受到了这种世风日下的社会影响。因为在金钱和恩宠面前，骁勇善战的基督教青少年新兵所获得的战功与荣誉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而且他们还时时受到社会上各种不正当竞争势力的排挤，这种竞争主要来自帝国政府内部臃肿庞大的官僚队伍。到了17世纪末期，这些官僚们似乎已经成功地打破了奥斯曼帝国政府要职，皆由基督教青少年新兵出身的行政官员所把持的传统局面。到了18世纪，甚至有更多的笔吏和乌里玛成员当上了帝国的帕夏，统治着过去由基督教青少年新兵军事集团管理的一些省。此后，虽然帝国皇宫

学校仍然继续存在,但传统的征兵制度却被彻底地废除了。培养基督教青少年新兵这一征兵制度的废除,是与奥斯曼帝国近卫兵团的日趋腐败涣散,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例如近卫兵团的士兵,必须终生独身不娶的这条规定,早已失去其约束作用,后来则干脆废除掉了。在素丹塞利姆二世统治时期,帝国政府就已经允许近卫兵团的子弟们应征入伍,这要是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它严重地破坏了奥斯曼帝国的征兵制度,因为这些应征入伍的子弟,根本就不是基督教青少年,而是穆斯林自由民。这些穆斯林自由民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千方百计地进入帝国近卫兵团,依靠特权攫权利益和好处,搜刮民财,欺压百姓。尽管帝国近卫兵团力图让自己的子弟独占这块地盘,极力地排挤其他人员加入近卫兵团,但在金钱的交易中和权势的威迫淫威下,帝国的近卫兵团也无可奈何。所以到了 17 世纪中期,近卫兵团的人数已高达 20 余万,成为帝国财政的负担和累赘。虽然帝国政府迫于财政的窘困和压力,也一度作过大量裁减近卫兵团人员的尝试,但在帝国近卫兵团不满的对抗情绪中,被迫放弃了这一尝试,所以近卫兵团的人数不但没有裁减下来,而且又增加了更多的人员。

虽然帝国近卫兵团的人数在不断地增加,但他们的战斗力却在不断地下降减弱,完全丧失了往日骁勇善战,不怕牺牲的雄风。有些近卫兵团的士兵根本不执勤,不出征打仗,尤其是不太愿意前往遥远的地方去经受长期作战的严峻考验,而只想在商业和贸易方面搞经营赚取大笔的钱,因此,要派他们去打仗,他们就开小差,到时候只是凭着手中的军人证件去领军饷。并且这些近卫兵团的士兵们领取军饷的证件,不久在他们的手中也变成了可供买卖的一般商品。外人完全可以通过出钱把它买下来,然后按每个季度

凭证到有关政府部门去领军饷，就像凭息票去领取钱一样方便。

近卫兵团的腐败涣散，不仅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也严重的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了支付大量集中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近卫兵团的薪金和经常性的生活开支，国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奥斯曼帝国的某些偏僻地区，以近卫兵团为首的卫戍部队成为了当地的实际统治者。当他们不能再从对外征服的战争中夺取到战利品时，就在国内肆意掠夺，靠糟蹋国家，鱼肉百姓过日子。另外，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帝国军队也越来越多地扮演起了左右君王废立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的一些年代里，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实际地上完全控制在横行不法的军人手里。

要全面地勾勒出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发展过程，也不得不了解一下封建采邑制度的命运。因为采邑制度，是奥斯曼帝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奥斯曼帝国早期以及其后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和健全内部行政的最可靠的制度之一。所以，封建采邑制度的破坏，是造成奥斯曼帝国萎靡不振，社会衰败的主要原因。16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加紧把无领主的采邑变为国家土地，为供养常备军提供财源，但这些努力却往往是徒劳无益的，以前的采邑封地有些以纳税农场的形式租了出去，但获得采邑的封建领主缴纳的税金却常常要比预期的少。有些封建采邑领主似乎毫不费力地就获得了产业的继承权，通过非法手段，使采邑变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根本就不允许的。特别是奥斯曼帝国长期的通货膨胀，对采邑封建领主的经济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和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采邑的收入是固定不变的，而帝国政府根本就无法增加这些收入的价值，以减少通货膨胀对采邑封建领主的经济地位所造成

的影响和伤害。由于在固定的津贴收入和飞涨的物价之间受到压迫，所以许多维持原状的采邑封建领主当征召令下达时，他们往往置若罔闻，根本就不去应征报到，于是采邑就被帝国政府强行收回。那些受到帝国政府制裁的采邑封建领主心怀不满，纷纷逃往城市，或者参加日益壮大的土匪队伍，在乡间荒野进行抢劫掠夺，强行向城乡居民征收所谓的保护费，蹂躏百姓，破坏治安，造成社会大乱。然而，对收回和被遗弃的采邑，帝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加以管理和利用，而逐渐地落入到帝国近卫兵团的军官及政府中有权有势的官吏和宫廷宠儿的手中。甚至有些平民也通过贿赂的手段，非法取得采邑。奥斯曼帝国早期的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家们认为，打乱帝国的传统秩序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衰败和没落。他们希望通过恢复那种曾经造就奥斯曼帝国辉煌时代的传统秩序，如彻底恢复采邑制度的纯洁性，从而兴利除弊，制止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势头，但实践证明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采邑制度的混乱和被破坏，实际上是 16 世纪末叶以来遍及整个奥斯曼帝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变革的一种反映。

奥斯曼帝国衰败的原因，除了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崩溃之外，它的社会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崩溃的演变过程。那一时期，许多形形色色的西方观察家在他们的著书撰文中，对奥斯曼人抱有一种极端的蔑视态度。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奥斯曼人邪恶的一面，而不是他们的美德，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奥斯曼人的品德和堕落。尤其是奥斯曼人的酗酒、鸡奸、卖淫，以及流氓恶棍和伊斯兰教异端的歹徒们在咖啡室等社交场所的聚会，为他们的看法和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虽然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有识之士的自我批评，也与上述的某些观点

和看法一致，但他们的批评矛头是更急切地指向上层社会的腐败、贿赂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他们认为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是传统制度和传统价值观念崩溃的一种反映，也是耽于"世俗利欲享乐"的一种反映。但面对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问题，他们又感到束手无策，拿不出改变这种现状的好办法。以上罗列的奥斯曼帝国社会制度衰败的种种原因，勾画出了一幅几乎根本无法缓解的暗淡画面。

科普鲁卢家族执政时期的复兴

虽说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及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但毕竟社会秩序还未彻底涣散瓦解。在社会统治集团的大部分成员耽于骄奢淫逸的现象下面，却仍然持续存在着一些对奥斯曼帝国非常忠诚的人，以及相当一部分训练有素、耿直能干的政府官员，他们希望通过励精图治，扭转时运，重振奥斯曼帝国往日雄风，再现昔日风采。其中最杰出、最有才干、最有作为的要算 17 世纪末叶，出身于科普鲁卢家族的几位大维齐。通过他们专心致志，呕心沥血的努力，奥斯曼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一定的元气，暂时度过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1656 年 9 月 15 日，奥斯曼帝国原任大维齐被宣布免职，素丹亲自把大维齐的官印交给了穆罕默德·科普鲁卢。16 世纪 70 年代，此人出生于阿尔巴尼亚一个微贱无名的穆斯林家庭。在他被提升为大维齐之前，虽然他已经有了很长的政治生涯和治国经验，但是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名望。因此，帝国没有一个人敢打赌说他这位 60 多岁的老翁会健康地活下来，更不用说他能够成功地作出努力，使奥斯曼帝国恢复元气，并在这个王朝以后，成为奥斯曼帝

国历史上最辉煌家族的奠基人。不过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事实上，穆罕默德·科普鲁卢有许多有利条件能够胜任其职，很好地治理国家。首先，他多年担任帝国重臣的随从，其中包括好几位大维齐，从而使他在行政管理方面得到了锻炼，获得了才能，并且直接了解到了帝国为什么会产生祸患，导致衰落的根本原因。其次，多年的流放生活和数次下野退出政治权力舞台，使他有更多的时间静下心来，洞察了解社会，并去思考怎样才能找到一副医治帝国社会弊端的良药，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穆罕默德·科普鲁卢复兴奥斯曼帝国计划的核心非常简单，即在帝国中首先制止腐败和贪污。对帝国社会腐败现象嫉恶如仇的他巧妙地兼施策略和威力，无情地罢免和惩治了一大批腐败渎职的政府官员，包括伊斯兰教教长、海军总司令和近卫兵团司令等，不管他们的地位有多高，权势有多大，只要犯有腐败罪行，一律都在罢免和惩治的行列之中。此外，秉性刚正，不肯阿谀奉承的他甚至把消除腐败，整顿吏治的范围扩大到帝国宫廷内部，痛加鞭挞贪赃枉法的太后图罕的政治顾问和居心叵测、臭名昭著的帝政干预者、黑衣太监头子切莱也，并把他流放到了埃及，远离帝国首都。在穆罕默德·科普鲁卢任大维齐的 5 年中，大约有 3 万多名军官、官吏、法官和神职人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因目无法纪，贪污腐败，出卖国家利益而被处死。

穆罕默德·科普鲁卢一旦整顿完了帝国的吏治，牢牢地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之后，便全力以赴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对外战争方面。首先，他派遣帝国大军进攻塞尔维亚，然后再派军队征服匈牙利等中欧国家。完全仿照苏莱曼大帝的战略方针，来推行他的对外征服计划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塞尔维亚是通向匈牙利和波

兰的桥梁，是奥斯曼帝国在中欧实行征服扩张政策的关键所在。1661 年 10 月，具有文治武功才能的穆罕默德·科普鲁卢在他的威望和权势达到顶峰时，不幸因病去世，终年 72 岁。在他任期大维齐的短短数年中，通过他的辛勤操劳，不懈地努力，初步地完成了恢复奥斯曼帝国国运和权威的任务，使帝国再次重振雄风。由穆罕默德·科普鲁卢本人举荐，死后奥斯曼帝国大维齐的职务传给了他的儿子艾哈迈德·科普鲁卢，一位年方 26 岁，充满朝气，性格刚毅的年轻人。

艾哈迈德·科普鲁卢从小就跟随着父亲在帝国境内四处奔波，对帝国世道的混乱，政府官员们的贪赃枉法，社会经济千疮百孔，以及广大民众的疾苦早有深刻的认识。在父亲言传身教的精心培养下，艾哈迈德·科普鲁卢从一个不懂世故的小孩，长大成了一位颇具才华的一代英才。他接替父亲出任帝国大维齐的职务，不仅仅是一个举贤不避亲的范例，更主要的是保证了穆罕默德·科普鲁卢开创的复兴奥斯曼帝国计划顺利完成的连续性，况且，艾哈迈德·科普鲁卢本人也确实是一位有政治经验、有治国才能和充满智慧的行政官员和军事指挥官。与其父的铁腕政治统治相比，艾哈迈德·科普鲁卢则更温厚，更富有同情心，是那种思路宽纵，刚柔并济，绵里藏针的人。

在获得素丹穆罕默德四世坚定的支持后，艾哈迈德·科普鲁卢于是统率了一支庞大的帝国军队，向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发动了一系列猛烈的进攻，迫使其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华斯瓦条约》。特别是当 1669 年 7 月，艾哈迈德·科普鲁卢率军最后完成对克里特岛的征服之后，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影响日大。然而，常年征战奔波的艾哈迈德·科普鲁卢终因积劳成疾，因突发性脑溢血病逝

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享年 38 岁，属于英年早逝。

艾哈迈德·科普鲁卢去世以后，他的姐夫卡拉·穆斯塔法帕夏被任命为大维齐，开始执掌帝国的大权。卡拉·穆斯塔法从小接受过宫廷学校良好的教育，在宫外服务部门几度担任重要职位后，成为安纳托利亚一个县的一名县长，最后靠自己的政绩荣升为安纳托利亚的总督，成为权势显赫的帝国封疆大臣。此外，卡拉·穆斯塔法也是穆罕默德·科普鲁卢和艾哈迈德·科普鲁卢父子两人的崇拜者，并且坚定不移地贯彻追随他们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即维护帝国内部的稳定统一，清除社会腐败和健全吏治的管理，实行强有力的对外征服政策。他认为，对外征服是奥斯曼帝国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是社会古老的传统，是帝国复兴的前提。为了实现科普鲁卢家族重振奥斯曼帝国雄风和国威的宏图，从 1682 年开始，卡拉·穆斯塔法发动了一场与历史上的老竞争对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进行的战争。但是此时，他那些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政敌们，通过对他的诬蔑和诽谤，成功地破坏了他的威望。1683 年 12 月 25 日，听信了小人馋言的素丹穆罕默德四世下令处死了卡拉·穆斯塔法，而他的死，不但使奥斯曼帝国失去了一位精明强干的栋梁之才，也使得许多帝国政府官员从此不再愿意秉公办事，害怕以自己的性命作为失败的代价。

在苏莱曼二世登上素丹王位之后，认识到奥斯曼帝国情况的危殆，于是亲自任命已故的艾哈迈德·科普鲁卢的兄弟穆斯塔法·科普鲁卢为大维齐。科普鲁卢家族的信念、理想和才智再一次在新任大维齐的身上强烈地体现了出来。穆斯塔法·科普鲁卢一方面对帝国财政的改善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整编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帝国军队，一举

收复了被奥地利人、威尼斯人、波兰人所夺取占领的许多土地。为了把帝国的敌人赶得更远一些，在残酷激烈的战斗中，他不幸被射来的子弹打断了脊柱而丧失了生命。此后，在奥斯曼帝国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另一位科普鲁卢家族颇具才干的成员临危受命，出任大维齐，他就是穆罕默德·科普鲁卢的侄孙子，名叫侯塞因·科普鲁卢。侯塞因·科普鲁卢认识到，由于帝国军队不断遭受严重的挫折，为了帝国的和平和社会的安定，必须与那些赞成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领土纠纷的欧洲国家密切合作，并在1700年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波兰人、威尼斯人，以及俄国人在克罗地亚的卡洛维茨通过难苦的谈判，最终签订了《卡洛维茨停战协定》。

《卡洛维茨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在帝国与欧洲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具有深远的影响。根据此协定，使长期属于穆斯林的领土第一次永久性地转归欧洲基督教徒控制了，从而成了奥斯曼帝国疆域开始不断收缩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自14世纪初开始的使巴尔干地区突厥化的历史演变，已经慢慢地，然而却是显而易见地降下了帷幕，这是奥斯曼人不得不吞下的一个苦果。

对外战争的失败及其影响

在17世纪的时候，同奥斯曼帝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对手，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威尼斯，但在18世纪中，威尼斯的角色由迅速崛起的俄罗斯人来充任了。虽然根据《卡洛维茨停战协定》，奥斯曼帝国把亚速及其内陆80英里的地方割让给了俄罗斯人，但是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并不满意。奥斯曼帝国的黑海作为通向地中海重要出口的海峡区域，以及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都在同

西方的更自由更开放的贸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深深地刺激和招唤着俄罗斯人注定要进攻征服奥斯曼。因为只要沙皇一天不能控制那些海峡水道和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斯坦布尔，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就决不能被完全纳入欧洲这个政治组合之内。

在18世纪，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范围，则远远超过以前黑海北面鞑靼国或高加索地区的边境冲突。在这个世纪内，奥斯曼帝国同俄罗斯共进行了三次战争，双方互有胜负，但最终还是以俄罗斯人的胜利而告终。第一次战争爆发于1711年，当俄罗斯为了夺取克里米亚地区时，双方的军队在普鲁特河两岸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激战中，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他们生性刚猛，骁勇善战，在作战中使用传统的武器弓和剑，砍去了许多俄罗斯士兵的头颅，使得帝国素丹在战争开始许诺的把每个俄罗斯士兵的头颅送到他们营帐时发给大量的赏金，竟在一天之内不得不把赏金削减到了原定赏金额的半数还不到。

在这次历史性的战役之后，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接受了著名的《普鲁特降约》，把亚速及其毗邻的所有地区，都统统归还给了奥斯曼帝国，并且拆毁了附近的所有军事要塞，取消了让俄罗斯船只停留在黑海的特权。同时，这次所取得的胜利，也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一次喘息的机会，乘机收复了由于《卡洛维茨停战协定》而丧失给威尼斯人的属地。

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进一步的侵略，因此次失败基本上停顿了10年以上，直到它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结成军事联盟共同行动时为止。1723年，俄罗斯军队再一次窜犯克里米亚，重新占领

了亚速，并且向奥斯曼帝国索取从多瑙河到高加索一带的领土。在帝国政府断然拒绝了俄罗斯的无理要求之后，俄罗斯派出大量的军队向奥斯曼帝国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俄罗斯的军队虽然打了几个大胜仗，可是在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巧妙地策划了令人惊异的《贝尔格莱德条约》之后，俄罗斯所得无几，仅获得了一个不设防的亚速和在黑海地区通商的权利，但是货物必须由奥斯曼帝国的船只载运，在《贝尔格莱德条约》签订以后的 35 年中，奥斯曼帝国西部的边境进入了一个相对长期和平的历史发展时期。实际上，正是由于《贝尔格莱德条约》的签订，使得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自得其乐，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不能居安思危。特别是长时期的和平，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战争的锻炼，军事装备和作战技术落后老化，从而导致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过程不断加快。

引起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第三次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关于波兰的局势。1763 年 4 月，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去世时，欧洲的几个强国为了选立新国王进行了疯狂的外交策划。俄罗斯和普鲁士希望新国王不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控制，所以波兰议会在俄罗斯和普鲁士的联合压力下，选出了亲俄罗斯和普鲁士的贵族为波兰新国王。法国因自己企图控制波兰的计划受挫，便怂恿奥斯曼帝国干预波兰事务。1768 年 10 月，当奥斯曼帝国对有关波兰问题的要求不能如愿以偿时，便鲁莽地投入了对俄罗斯的战争。战争期间，俄罗斯的方针之一，就是支持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基督东正教，试图鼓动希腊人起来造反。在战斗中，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斗，屡战屡败，一溃千里。而俄罗斯的军队则一路攻城夺隘，勇猛无敌，迅速占领了雅西和布

加勒斯特等重要城市,并且在两年之中完全掌握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全境。此外,俄罗斯的一支波罗的海舰队开进了地中海,虽然它没有拿下军事重镇莫里厄,但却在爱琴海消灭了一支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舰队,直接威胁着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沿海各地区。为了免遭更惨重的失败,1774 年 6 月,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通过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此条约为日后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双方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了 19 世纪俄罗斯在巴尔干和海峡区域实现其领土野心的有用的楔子。

根据《卡伊纳雅条约》的规定,俄罗斯有权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设立“奉行希腊宗教仪典的公共教堂”,有权代表希腊东正教向奥斯曼帝国提出抗议,而奥斯曼帝国政府则必须保证“持久地保护基督教徒及其教堂”,把对自己帝国境内基督东正教徒属民的保护权,实际上让给了俄罗斯人。于是,日后每当俄罗斯干涉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事务时,就可以据此大肆张扬地宣称自己是以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东正教大教区合法保护者的身份行事。在领土方面,俄罗斯虽然根据《卡伊纳雅条约》从占领的奥斯曼帝国大部分的领土上撤走了,但却把黑海北岸的某些战略要地留在了自己的手里,并且让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克里米亚鞑靼可汗国宣布独立,强迫奥斯曼帝国给予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特殊的自治待遇。在商业方面,俄罗斯获得了在黑海地区,在海峡沿岸以至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各地经商并建立领事馆的权利。在外交方面,俄罗斯被允许在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派设一名全权常驻公使。

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卡伊纳雅条约》所带来的耻辱和后果,

进一步削弱了已经开始衰退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对于各省的控制权。在17世纪的时候,素丹和帝国中央政府就已经面临着许多具有独立倾向的、不驯服的地方总督。到了18世纪中叶的时候,尤其是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得奥斯曼帝国境内独立和分裂的政治倾向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任何具有魄力和野心的地方总督都可以建立他自己不受约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来公开违抗或不理睬素丹和帝国中央政府的命令。具有重大讽刺意义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首先闹分裂和独立的地方,正是亚洲和非洲那些传统的伊斯兰地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这类独立运动,说不上是任何具有群众性和民族意义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社会表现。除了像黎巴嫩、库尔德斯坦、阿拉伯半岛等少数遥远沙漠地带和山区外,所有其他地方闹独立的首脑人物和他们的追随者,全部都不是当地人,而是来自奥斯曼或者马木留克的军人阶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一些野心勃勃,居心叵测的地方总督和政府官员。他们利用素丹权力鞭长莫及和帝国中央政府软弱无能的缺点,窃取了本省的大部分税收,组成了庞大的私人军队,同西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并且创造了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机构,把本省变成了实际上的独立王国。例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叙利亚的扎查尔,巴格达的马木留克酋长等,他们全部都属于这一类典型的人物。他们并不比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更加关心自己属民的言论和情感,当然更谈不上对属民福利的关怀了。他们的主要目的和所关注的事情,就是如何与帝国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此时对于奥斯曼人来说,沉痛的教训使他们逐渐地认识到,为了使帝国不被沦落为西方列强相互瓜分争夺的目标,为了恢复他们昔日的地位和风采,他们必须要实施社会改革,至少要实施军事

方面的改革，既然西方，后来也包括俄罗斯在内，在武器技术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那么为了对付西方，奥斯曼人就得借鉴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战争经验。在18世纪初叶，奥斯曼帝国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改革历史进程，已经在小范围内悄悄地展开了。到了18世纪末期，帝国的社会改革更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了。

二、社会改革的兴起

帝国早期的社会改革

18世纪时，每当重大的军事失利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总是产生许多反思，总是用毫不留情的坦率态度来评论帝国的腐朽和军队无能的种种表现。特别是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的签订，与随后克里米亚地区被俄罗斯所吞并，都曾经使得帝国的许多仁人志士痛定思痛，议论纷纷，使得帝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伊斯兰教文明，很难再为奥斯曼帝国重振雄风提供动力，从而发起了以效法西方文明为基础的早期社会改革运动。

奥斯曼帝国早期改革家们所考虑的，主要是随着辉煌时代体制机构的日趋腐朽而暴露出来的帝国内部的弱点，因而他们的改革实践，也只是着眼于过去，竭力想使那些体制机构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也就是着眼于恢复过去旧有的统治秩序，重振奥斯曼帝国一度失去的雄风。他们社会改革的宗旨，是根除腐败之风，而他们的武器，就是行刑官手里的大刀和没收非法所得财产。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同奥地利与俄罗斯军队相形见绌的交战中一败涂地，

尤其是1699年签订《卡洛维兹条约》和1718年签订《巴沙洛威茨》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奥斯曼人从失败和教训中看到了西方军事优势，逐渐地认识到了使军队近代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开始把他们社会改革的目光转向西方。例如1718年6月，具有改革思想的易卜拉欣当上大维齐之后，呈递给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一份指出有必要进行军事改革，迎头赶上西方军事技术发展的奏本，并于1719年下令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设立了帝国大使馆，于1721年任命热衷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事业的著名政治家埃劳迪为帝国驻法国大使，要求他详细地研究西方有关文明与教育的各项措施，并及时汇报其中能够使其应用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西方的印刷术。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进一步推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改革热情的帝国印刷局局长米特费里卡，在漫游考察了西方一些国家之后，向大维齐易卜拉欣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长达49页的备忘录中，作者就当前各国的不同政体作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之外，还就不同基督教国家军队的训练、组织、纪律、作战方式和军事法律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西方军队的优势在于他们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并且掌握了先进的武器，所以奥斯曼帝国军队应该向他们学习，这是摆脱困境的惟一办法和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所获得的一项非军事性重大的改革成果，要算是印刷术的采纳。18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而奥斯曼帝国的一切文件和书籍还要全靠人工来抄写，这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极不相宜。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决定采用广泛流行于西方的印刷术，但鉴于帝国境内宗教保守分子和抄手们的强烈反对，被迫对印刷术的应用范围作

了许多严格的限定，只准人们印刷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各种科目的突厥文书籍。虽然此时印刷术的采用在奥斯曼帝国是有条件的，但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在社会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对促进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向西方的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西方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也有着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奥斯曼帝国上流社会的人士热衷于种植荷兰的郁金香，热衷于请西方一些享有相当名望的画家们替他们画肖像，尤其对法国生活方式和风格的表层事物十分感兴趣。修建法国风格的公园，使用法国样式的家具，模仿法国的室内装饰等，一时成了帝国宫廷圈子内的一种时尚。连素丹本人也在他的宫廷门外盖了一座一望就可知是法国卢浮宫式的喷水池。为了了解和学习西方，这一时期帝国的许多重要官员都被作为使臣派往巴黎，受命对法国的技术进行考察，看看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可供奥斯曼人借鉴之用。他们回国后，都用近乎赞许好奇而惊讶的口吻，汇报了法国的科学研究、工业生产，甚至歌剧院里的情况。

奥斯曼帝国的 18 世纪初叶，属于相对的和平时期，那些具有现代性的军事和社会改革的尝试，在西方的影响和那些被聘请的西方人的帮助下，对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生气，但不久因东部边疆爆发的同波斯人的战争而被打断了。1730 年 6 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被在波斯初得天下的纳迪尔汗指挥的军队打败了，从而引发了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广大民众对于朝廷的荒淫无度和宫廷圈子的“法兰克生活方式”日益感到愤慨情绪的爆发，广大民众在帝国政坛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近卫兵团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武装叛乱，公开反对被他们视为标新立异的各种社会

改革。支持改革的素丹穆罕默德三世丢掉了王位,而倡导改革的大维齐易卜拉欣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则断送了性命。

这次武装叛乱固然与开展向西方异教徒学习的改革有关,因为帝国保守的社会势力害怕社会改革会严重损及奥斯曼帝国同伊斯兰教的社会结构,但是某种程度上,这次叛乱也是对帝国社会上流人士所盛行的"法兰克生活方式"的一种抗议。18 世纪 40 年代,由于社会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帝国所有的印刷所都被迫关门歇业,军事改革也完全失去了发展的势头。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保守势力竭力抵制的结果,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 1739 年至 1768 年间,奥斯曼帝国没有遇到对外战争,长期的太平,使得帝国发展军事缺乏动力,整个计划成了泡影,就像早先海上长期休战期间,奥斯曼帝国根本就想不到要发展海军的情况一样。

然而,顽固守旧,不求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状态,使得奥斯曼帝国在 1774 年的对外战争中再一次出乖露丑,败给了强劲的对手俄罗斯。这一惨败的事实,又一次在奥斯曼人面前确凿无疑地证实了西方武器装备的优势,尤其是 1783 年俄罗斯用武力吞并克里米亚的现实,极大地刺激了奥斯曼帝国的上下朝野,变成了帝国对于一项新的改革方案实施的推动力量,而害怕俄罗斯人可能威胁到他们在勒旺岛利益的法国人,也在实施社会改革方面给予了奥斯曼帝国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此时,在 18 世纪初叶在奥斯曼帝国着手进行的那套兴邦强兵的改革,又一次在帝国境内兴起。就在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帝国政府又聘用了一名出生在匈牙利的法国顾问托特男爵,来训练帝国的炮兵和工兵部队。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这次帝国政府倒没有要求他像以前聘请的军事顾问那样皈依伊斯兰教。

这一时期，在社会改革的推动下，奥斯曼帝国境内许多新的军事学校相继建立起来。这些军事学校拥有的教学设备和使用的教材都来自欧洲，明亮整洁的图书馆都收藏有欧洲书籍，其中有些书籍是突厥文译本。这些军事学校共有400余名学生，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帝国军队和社会上层人物的子弟。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些军事学校都得到了扩充和发展，它给由素丹塞利姆三世及其继承人所开办的其他各类学校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此外，以前的印刷厂现在又恢复了生产，并承印了许多有关西方军事或科学技术方面的译著。更多的西方人才，尤其是法国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有的属于官方交往，有的出于民间的经济交流，特别是掌权的大维齐哈米德对西方人士和西方化的社会改革，均持一种友好的态度。但是，面对源源不断来自异邦的人士和观念，再加上又有迹象表明西方国家正在企图控制东地中海，威胁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安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保守势力又引起恐慌。于是在一片阴谋诡计之中，他们联合起来把支持社会改革的大维齐哈米德赶下了台，并派人秘密结果了他的生命。这些还不够解心头之恨，那些极端的保守派分子还在他的尸体上插上一个标明他身份的牌子："教规和国家的死敌"。

然而，这些得势的保守派分子根本就拿不出更好的振兴帝国的方案。1787年4月，奥斯曼帝国在同老对手奥地利与俄罗斯的重新开战中，又一次遭受到了惨败。所以当年轻有为，充满朝气，具有强烈改革精神的素丹塞利姆三世于1789年即位时，所面临的还是帝国以前的两个老问题：西方的优势和国内的保守势力。

年轻有为的塞利姆三世

素丹塞利姆三世登基时年仅27岁，他秉性刚直，多少有些愤世嫉俗，是一位个性较强的人。同长期以来其他的许多走出奥斯曼帝国皇宫王子阁笼的人相比，他的能力更强，知识更广，阅历也更丰富。尤其是他不讨厌西方社会的异端思想和生活方式，对于欧洲各国的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通过私人使臣，同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有过书信来往，希望法国人能够帮助奥斯曼帝国抵御俄罗斯人。塞利姆三世即位最初，奥斯曼帝国对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战争束缚住了他的双手，但是此后的法国大革命分散了欧洲列强的注意力，使得奥斯曼帝国从欧洲列强的巨大压力下获得了几年宝贵的喘息时间，从而使得新素丹塞利姆三世乘机可以计划、并部分地执行一项规模巨大的改革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方案，其目的是要把落伍的帝国军队在技术装备、军事训练和战略战术等方面，迅速提高到西方国家军队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所以这个意想不到的大好时机，为年轻有为的塞利姆三世提供了一个充分显示他治国才能的机会。

塞利姆三世即位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手下的大臣们呈递一些有关奥斯曼帝国亟需改革的奏章。虽然有些改革的奏章也触及到了帝国的税收、铸币以及采邑制度等社会问题，但大部分奏章所主要关心的，还是如何能够尽快地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全面加强帝国军队的战斗实力。有些大臣除了建议按原有形式改组已经毫无战斗力的帝国近卫兵团外，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有些大臣则认为必须另起炉灶，解散近卫兵团，建立全新

的军事组织。尽管对于这些大臣来说，西方模式可以学习接受，然而就他们的改革主张来看，没有一个能够超越外观西化或技术西化的范畴，谁也没有考虑到教育、工业、农业这类最基本方面的社会改革。因而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主要还是局限于军事领域，也只是该世纪初叶奥斯曼帝国温和改革开端的延续，而没有什么新的实质上的突破。然而，就是这样的改革建议，从一开始便引起了帝国保守分子最强烈的反对，在宫廷中遭受到了一些人的唾弃和辱骂。因为近卫兵团首先意识到，一支装备精良、具有战斗力的新式兵团的崛起，必将影响和威胁到他们在奥斯曼帝国传统的政治地位。保守的伊斯兰宗教人士认为，效法异教徒的一切改革，都有损于穆斯林的传统信仰和神圣的伊斯兰法典的尊严，容易把人们引入歧途的异端。但是，塞利姆三世已经完全意识到，帝国的社会体制已经过时了，尤其是近卫兵团，它已经成为了帝国的一种政治负担，极大地妨碍着帝国社会进步的每一个步骤，所以决心要不遗余力地进行社会改革。他下令成立了一个以改革派人士组成的小型委员会襄理其事，并且在 1792 年和 1793 年相继颁布了一整套的新训令和新条例，后来被总称为新秩序。它们包括各省总督官制、地方税收、谷物交易的管制，以及其他有关行政和财政事务的新条例，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按照欧洲方式训练与装备一支新式正规化步兵团所规定的各项条例。为了筹措作为进行这项军事改革所需要的经费，塞利姆三世还特下令成立了一个财政局，对已经被收回的和被没收的采邑封地，以及烟、酒、咖啡和其他商品等实行征税。

塞利姆三世在振兴帝国军事力量方面的主要尝试，是缔造一支西方式的步兵军团。因为帝国的近卫兵团在对外战争中表现极

差，如果让他们去使用西方的新式武器，采用新的战术，等同缘木求鱼，所以训练一支新式军队来替代他们，是帝国振兴军事力量的上策。为此，塞利姆三世首先建立了几所为训练有关的炮术、防御工事、航海，以及其他辅助科学等方面人员的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塞利姆三世非常倚重法国人的帮助。许多法国军官被聘为教师和顾问，法文成为所有学生必修的语言。每座学校都有一所藏有 4 000 多册欧洲书籍的图书馆，其中大多数都是法文书籍。为了组建新式军团，塞利姆三世物色到了一位名叫奥马尔的奥斯曼人，此人曾经在俄国沙皇军队中任中尉，塞利姆三世委任他为将军，让他成立了一支 600 人的军团，这些人全部穿着当时的欧洲军服，使用由法国政府提供的新式武器，并用欧洲的战术和操练的方法来进行训练和演习。此后，为了战事的需要，塞利姆三世下令扩充新式军团，在帝国实行普遍征兵，以代替直到那时还沿用的义务募兵制。新的征兵制度，既适用于一般的民众，也适用于近卫兵团。到了 1801 年，大维齐尤苏夫遵照塞利姆三世的旨意，已经组建了一支 9 000 人的新式兵团，其兵源全部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新式兵团的士兵全部采用西方最新式的来福枪，并在法国军事教官和已经完全欧化的奥斯曼军事教官的指导下，完全按照欧洲的战术和科目进行严格的训练，根据塞利姆三世的有关命令，新式军团的全体官兵一律实行薪给制，一律穿欧式的军服。在塞利姆三世的眼里，这支新式军团颇有长进。他给新式军团配置了一些炮兵，又在第二个步兵团里增加了一些骑兵。此外，根据塞利姆三世的有关命令，帝国境内的各省都组建了国民军，同样采用新式军团的训练方法，并一律实行征兵制。这样，到 1806 年的时候，经过西方式严格训练的新式军团和各省国民军的总人

数已达 202 万名。新式军团和各省国民军的经费,主要靠没收或挪用采邑岁入的办法来提供。

素丹塞利姆三世对于改革一直谨慎行事,他首先苦口婆心,用大量帝国如果不改革,就将被欧洲强国打败瓜分的事实,设法争取到了包括帝国伊斯兰教教长在内的一些乌里玛头面人物的同意和支持,并让组建的新式军团在远离帝国京城的郊外进行操练,以免与拒不采用基督教徒所设计的军械的近卫兵团发生摩擦,也避免触犯民众的守旧情绪。然而,塞利姆三世还是同对改革一直怀恨在心的近卫兵团和某些顽固派政府官员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上书请愿要求停止改革。塞利姆三世迫于顽固派分子的压力,最终作了妥协,免去了支持他的改革派大臣们的职务,并把新式军团调回安纳托利亚。

这次塞利姆三世的妥协让步,只是延缓而并未能挽回帝国改革局势的崩溃。1807 年 5 月,由于拒不接受穿欧式军服的命令,反对"法兰克式"的改革,再加上军饷长期被拖欠,从而又一次引发了驻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近卫兵团的兵变。他们掀翻了汤锅,这是传统的叛乱信号。面对反对改革的顽固派分子们的武装叛乱,塞利姆三世非但没有动用新式军团镇压,反而把新式军团给解散了。此时,气焰嚣张的兵变分子在一群对改革不满暴民的帮助下,单凭一份帝国改革派主要参与者的名单,便随意把这些人抓了起来并杀害了。然而,素丹塞利姆三世的妥协和屈服,也并未能够使他保全住自己的王位,在一片阴谋诡计中,他最终还是被保守派分子废黜了,他的堂兄弟穆斯塔法四世被立为新的帝国素丹,此人胆小软弱,是那些废黜塞利姆三世的保守派分子的傀儡。

1807 年夏,改革运动在奥斯曼帝国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实

行改革的素丹塞利姆三世被废黜,新式军团被解散,改革派的大臣们死的死,逃的逃,反对社会与军事改革的顽固派势力接替他们掌管了帝国的大权。1808 年 6 月,新上任不久的大维齐塔尔亚,同帝国另一位臭名昭著的顽固派分子、帝国的总法典官产生矛盾因而被免了职。心怀不满的塔尔亚摒弃前嫌,投靠了奥斯曼帝国多瑙河前方司令巴拉克达尔帕夏,此人是当时仍然活着的惟一尚未就范而拥有军事实力的重要改革分子。1808 年夏,巴拉克达尔联合帝国残存的改革派和反对帝国京城顽固派政权的其他政治派别人士,向顽固派分子发动进攻,率军占领控制了帝国京城。素丹穆斯塔法四世得知这些人想使塞利姆三世复位的企图之后,便先发制人,派人将塞利姆三世秘密处死,并下令要将自己的胞弟马赫默德也绞死。听到此消息之后,惶恐不安的马赫默德还算机敏,立即躲藏了起来。勤王之师遂把素丹穆斯塔法四世禁闭了起来,后把他也秘密处死,而把隐匿在宫廷中一只空炉子里面的马赫默德二世拥上了王位。

新即位的素丹马赫默德二世授予巴拉克达尔为大维齐,他在马赫德德二世的全力支持下,开始拟定一项无比雄心的社会改革计划。他首先改用新番号,对新式军团进行整编。其次全面恢复塞利姆三世时期的各项改革法令,并召集了一次大型的帝国会议,帝国各地的高级政府官员、省总督和地方显贵均被邀请参加。在一篇使人情绪激动的演讲中,他向与会的代表们提出了一项包括彻底改组帝国近卫兵团的改革方案。这一方面可以消除一系列沿袭已久的弊端,同时又能使得新兴地方上层社会集团的利益和特权得到肯定。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很快便和帝国中央政府之间达成了一项改革协议,并得到素丹马赫默德二世的批准。但是,等到当

真要将此项涉及社会改革的协议付诸实施的时候，除了大维齐巴拉克达尔的几个少数挚友以外，所有的人又都同他疏远了。尤其是巴拉克达尔允许他从前部队里的波斯尼亚士兵和阿尔巴尼亚士兵返回家园之后，被他的改革方案惹恼了的帝国近卫兵团，再一次掀翻汤锅发动了武装叛乱。内战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带来了严重的纵火、爆炸和混乱。在骚乱中巴拉克达尔被暴民们烧死在他的官邸里。素丹马赫默德二世本人也不免沾上了改革墨渍的污点，仅仅由于他是奥斯曼帝国王室硕果仅存的一位男性，这才保全了他的王位，甚至是他的生命。此时，以近卫兵团为首的帝国顽固派再度得势，控制了中央政府，从此改革全部的心血毁于一旦。不过，胸怀大志的素丹马赫默德二世并没有被险恶的形势所吓倒，他静心地洞若观火，伺机而动，准备先打垮帝国的保守势力，然后再重新启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

马赫默德二世的改革

随着帝国改革的停顿和新式军团被彻底的解散，以及许多改革家死于非命，奥斯曼帝国的改革热情大为减退，西化的改革成果所剩无几。不过有心人可以从塞利姆三世改革失败的经验中吸取到这样的教训：只有把奥斯曼帝国顽固派势力的后盾近卫兵团剪除掉，帝国的改革，特别是效法西方的社会改革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聪明过人的马赫默德二世很快便领悟到了这一点，可是他不敢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贸然下手，因为顽固派分子和近卫兵团还在控制着帝国京城。就算在帝国京城以外，马赫默德二世一开始也行使不了多少权力。所以，马赫默德二世的第一个奋斗目标，是想尽办法，制订措施，维护帝国中央政府对地方各省的控制。不

久，他削平了一些省具有独立倾向的总督权力，任命了一大批比较顺从听令的总督。

素丹马赫默德二世 1784 年 7 月出生于萨拉伊。他的父亲阿布杜尔一世在位时，曾经创办了一批西方式的世俗学校，当时在帝国影响甚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马赫默德二世似乎受到他的堂兄塞利姆三世的影响极大，特别是在从塞利姆三世被废黜直到被害去世的最后一年里，他们两人一直被幽居在一起。他从塞利姆三世那里学习到了许多宝贵的治国经验，为他以后试图通过社会改革，转变奥斯曼帝国积弱贫瘠的现状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从马赫默德二世以后实行的改革实践来看，他的改革指导思想和治国方针，同塞利姆三世是一脉相承的，但他吸取了塞利姆三世改革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把改革与强化素丹的统治权力结合了起来。在改革内容上，他将军事改革放在首位，试图建立一支效忠于素丹的强大新式军队。同时，马赫默德二世也特别关注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改革。在实行改革的策略和措施上，他吸取了塞利姆三世失败的经验教训，做了相应的调整和必要的部署，尽量避免伤害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引导和利用乌里玛的影响为帝国的改革计划服务，在打着恢复帝国传统的旗号下，行改革之实。

1826 年 5 月 28 日，在经过 18 年卧薪尝胆的准备之后，马赫默德二世颁布了一项关于成立新式军团的御诏。在御诏中，虽然帝国近卫兵团仍予以保留，但是要求近卫兵团驻守帝国京城的每一个营都必须要抽调 150 人参加新式军团，并竭力设法把新式军团说成是已故苏莱曼大帝军事体系的复活，特别规定新式军团的

军事训练不得由基督教徒或外国人来负责，而只能由熟悉现代军事技术知识的穆斯林军官来负责指挥。这一举措在“对异教徒的圣战需要高于一切”的大旗下，得到了具有保守倾向的帝国总法典官、乌里玛，以及近卫兵团将领的认可，他们每个人都在改革的文件上签了名，盖了章。然而，桀骜不驯的近卫兵团根本就不听素丹马赫默德二世指令的那一套，当他们穿上合身的西式新制服开始训练的时候，驻扎在帝国首都的近卫兵团又发动了兵变。近卫兵团中的五个营首先打翻了汤锅作为传统性举行叛乱的信号，跟着便在赛马场集合，并很快又纠合了一伙愤怒的民众，企图重演1807年的大屠杀。不过，这一回他们却遭到了大多数民众的坚决反对，同时，足智多谋的马赫默德二世也早已料到了这一点，略胜一筹早有防范。此时，忠君的高级军官一接到马赫默德二世的命令，便迅速率领新式军团和携带着大炮来到了皇宫。在新式兵团的大炮对准人群密集的广场和近卫兵团的兵营连续开炮轰击30分钟之后，近卫兵团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四处溃散。结果，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斗中，有数千名近卫兵团的成员遭到屠戮。6月17日，在马赫默德二世发布的一项通告中正式宣布废除近卫兵团，而代之以一支号称“穆罕默德常胜军”的新式军团，其任务是“捍卫宗教和帝国”。另外，马赫默德二世还趁这次机会消灭了最后一批采邑封建骑兵部队，一些残存的采邑不久也全部予以废除，而必须保留的骑兵部队改发饷银，全部由国家来供养。

一个月以后，素丹马赫默德二世又借口贝克塔希斯派托钵僧曾经煽动反对废除近卫兵团的叛乱，宣布它为非法宗教团体，没收了它的财产，毁掉了它的寺院，并将它的三名主要首领公开处死，而把其余的成员全部流放到外地，将这个数世纪以来一直与近卫

兵团保持密切政治关系的宗教团体予以解散。此后，马赫默德二世又通过将乌里玛划编政府管理，享受国家俸禄，使他们增加了对政府的依赖性，减弱了他们与穆斯林民众的联系和影响，以及对素丹权力的制约作用。另外，马赫默德二世还宣布结束各省的自治权，削弱和限制来自世袭传统习惯或是由群众或地方所同意授予的各种权力。这些举措极大地强化了素丹的权力，为马赫默德二世多年期待实行的社会改革彻底扫清了道路。总之，马赫默德二世王朝以后，以素丹为首的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力极大地加强了，这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从此完成了由封建军事联合体制向中央集权体制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只有这种转变，才能使得奥斯曼帝国以后的政治体制便于向世俗化、民族化、现代化的政治体制过渡。

由 1826 年消灭帝国近卫兵团直至 1839 年马赫默德二世去世，在这段时期内，马赫默德二世进行了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计划。他为这项社会改革计划所规定的主要路线和方向，成为此后的 19 世纪，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20 世纪奥斯曼帝国改革家们所一直遵循的政治路线。马赫默德二世首先设置了“塞拉斯克”，以代替帝国近卫兵团的统领“阿加”。按照马赫默德二世所规定的这一官职来看，它相当于总司令兼陆军部长，专门负责新式军团的一切事务。另外，还由塞拉斯克接管过去由近卫兵团的统领阿加在帝国京城所负有的保安、警务、消防以及诸如此类的职责，在不断加强帝国中央集权和强制推行社会改革的历史时期，保安与警务工作变得日益重要，因此，管理和指挥如帝国的警务系统，已经成为塞拉斯克的主要职责之一。1845 年，帝国中央政府下令成立单独的警务部门，向西方国家学习，把警务与军队区分开来，从此，

帝国的警务部门不再属于塞拉斯克管辖了。为了使帝国的新式军团更加正规化和制度化,1826 年,马赫默德二世下令制定了一项有关帝国新式军团的组织管理条例。其中规定全军共为 1.2 万人,分为 8 个大队,全部驻扎在帝国首都。此外,他还发布了有关帝国各省招募新式军团的命令,规定新式军团的服役期限为 12 年。

废除近卫兵团,组建新式军团,这是马赫默德二世改革计划的初步胜利。然而,要想按照既定的改革计划,真正成立一支完全欧式的、强大无比、所向披靡的新式军团并非易事。这不仅有财政上的原因,还有人力资源上的困难,特别是缺乏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穆斯林军官。为了设法弥补在新式军团中缺乏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穆斯林军官,同时也为了在帝国各级政府部门中充实具有专业知识的称职官员,马赫默德二世对于帝国的教育事业也日益重视起来。因为他逐渐地认识到,如果没有适当数量的政府官员,首先得到西方现代式的学习和训练,然后再由他们去负责教育和训练别人,从而提高帝国各级政府官员的现代综合素质,那么,他所倡导和推行的整个社会改革体系,不但缺乏勃勃生机,而且终将要注定垮台。1827 年,马赫默德二世不顾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毅然采取果断的步骤,向欧洲各国派出了大批的留学生,其中主要是帝国陆军和海军青年军官。他们分别被派往欧洲不同国家的首都,学习军事,学习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这些人在回国后,都成了奥斯曼帝国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在改变他们国家的社会面貌方面,扮演了无比重要的先驱角色。另外,在马赫默德二世统治时期,人们除了进专门培养军官、军医或文职人员的各类军事学校以外,还可以通过其他两个

渠道学习到外语和西方的科学知识，其中之一便是帝国的外交机构。塞利姆三世在欧洲设立的常驻大使机构，在他死后纷纷被取消了。马赫默德二世实行社会改革后，又重新在欧洲各国建立了这些使馆机构，这样，有机会一边在国外供职，一边学习进修的奥斯曼青年数量也就不断增多了。另一条渠道是帝国中央政府新设立的翻译局，该局的设立，是为了处理日益增长的外交信函，培养奥斯曼帝国的外语人才。随着翻译局的建立，有越来越多的奥斯曼人学会了外语，外交机构和翻译局日后成了造就奥斯曼帝国人才的苗圃。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许多著名政治改革家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代表了帝国官僚集团内部新形成的一批英才荟萃的西方通。他们往往都是支持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的改革派，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发展，起着难以估价的重要作用。

在早期，马赫默德二世的教育改革，主要十分关注与军事有关的问题。从1838年以后，他也开始逐渐注意到非军事性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问题，并且创办了许多传授西方近代知识课程和其他世俗学科的学校，为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发展，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在非军事性教育领域内实施改革，一般来说特别困难，因为这里是乌里玛传授伊斯兰宗教课程的传统世袭领地，所以改革的阻力特别大。在由乌里玛控制的宗教学校中，普通小学用死记硬背的办法教授阿拉伯文古兰经，另外也涉猎一些念书写写之类的文化学习，根本不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在高一级的宗教学校，如经学院，给学生教授的几乎全部都是伊斯兰宗教方面的课程，这类宗教学校根本就培养不出来帝国社会改革亟需的新式政府官员和专业人才。所以要想办那种西方式的世俗普通学校，就会在帝国宗教界

人士中引起无休止的争论。为了避免与帝国宗教界人士的全面冲突，马赫默德二世在非军事性教育领域内实施改革的时候，也相应地作了一些妥协。如把此类学校的校址选在一些清真寺内，也选择一些具有博学知识，懂得一些西方现代科学的乌里玛在学校任教。在主要讲授外语和西方现代课程的同时，学校也为学生讲授一些传统的宗教课程。这些学校的学生，也和其他各类军事学校的学生一样，一律领取帝国政府的公费补助或奖学金。在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中，有几个人成了奥斯曼帝国未来社会改革的领导人物。

除了建立一支西方式的新型现代军队，关注帝国的教育改革之外，马赫默德二世在 19 世纪 30 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中，还致力于开创一套新的官僚管理体制。其目的就是要将奥斯曼帝国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自己的手里，使素丹的权力，成为帝国境内一切权力的惟一源泉。建立一套新的官僚管理体制，马赫默德二世首先从整顿宫廷开始。因为奥斯曼帝国原来的宫廷职务，此时有好多已经成为光拿薪水的挂名差事，办事效率极低，所以现在一概加以废除。此外，帝国政府机构经过整顿改革之后，大小政府官员一律都有了新的职衔，他们的职权都由素丹来授予，而再不靠过去传统的惯例所获得。另外，马赫默德二世开始将原有的帝国行政机构改换成了西方模式的政府各部，并除了塞拉斯克以外，还设置了外交大臣、内务大臣、财政大臣等官职。大臣国务会议有意仿效欧洲国家内阁的格局，大维齐也不再是旧式素丹绝对意志的代理人，而是内阁首席大臣，称为首相。马赫默德二世还规定了统一的官服，让帝国政府官员们穿起欧洲式的马裤、黑皮靴、礼服大衣，为他们预备好办公室、写字台和若干新换上西式服装的工作人

员。特别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杜绝贪污腐败行为，克服政府官员工作能力不断下降和精神面貌不振的状况，马赫默德二世在政府官员领取薪俸方面，也进行了改革，由帝国中央政府统一付给所有政府官员以适当的固定薪俸，并彻底地废除了无理没收政府官员私产的传统做法，给予政府各级官员经济上更大的保障。此外，马赫默德二世还下令创办了一份官方报纸，起先用法文发行，后来改用突厥文出版。他要求每位政府官员都必须订阅，因为政府官员的任命和帝国中央政府制定的规章和法令，都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这份名叫《大事概览》的报纸，也代表了奥斯曼帝国新闻事业的开端。

另外，在马赫默德二世积极的倡导下，欧式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也开始在奥斯曼帝国民众的家庭中出现。在帝国宫廷和上层社会中，欧洲那套彬彬有礼的社交方式也被广泛采用。尤其是马赫默德二世此时在公开场合已经开始不按照奥斯曼帝国传统的那套仪式，而是完全按照欧洲仪式来接见客人，同他们促膝交谈，甚至对妇女也表示出极大的尊敬。此时，在马赫默德二世的影响下，帝国出现了一股学习西方生活方式的时尚，帝国政府规定星期四为不分宗教的休息日的做法，就是从法国那里学习来而行之于政府各机关的，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在帝国政府机关办公室里的墙壁上，还出现了素丹的肖像和西方的艺术品。当然，奥斯曼帝国的这些社会变化，也不过是一些事物的表层现象，因为对于伊斯兰教的神圣法典，特别是涉及于帝国社会和家庭的问题，仍然是丝毫不可动摇的。所以有关结婚与离婚，财产与继承以及妇女和奴隶的社会地位等一类极为敏感的问题，实际上都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尽管马赫默德二世的许多改革措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尽

管这种改革多在表面上做文章，而没有把奥斯曼帝国的所有力量集中在民众教育和发展社会经济这些根本性的领域，但他所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就其结果而言，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在马赫默德二世倡导的社会变革之后，奥斯曼帝国要想再走恢复旧制度的回头老路，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不仅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且也成了一个人心所向的社会进步过程，并为“坦齐马特”时期的社会改革，起到了一个启锚开航的巨大作用。

坦齐马特时代

1839 年 7 月 1 日，踌躇满志的马赫默德二世不幸因病去世，他的继承人是才满 16 岁的儿子阿布杜尔·麦吉德。新登基的素丹决定继承他父亲的遗志，重振帝国雄风，在这方面他得到了母亲阿莱姆太后的支持。阿莱姆太后是一位善解人意，品质坚强，非常了不起的妇女，她曾经积极地支持丈夫马赫默德二世从事帝国的改革事业，并为其出谋划策。由于她对儿子帮助和影响很大，所以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于奥斯曼帝国未来政局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正处于紧急关头，难以驾驭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重新又向帝国挑起战争，并在尼济普战役中，把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望风披靡，从而再一次威胁到帝国的一统江山。奥斯曼人急需要欧洲列强的支持，所以一份改革公告说不定能够帮助获得这种支持，因为它可以表明奥斯曼帝国是进步的，素丹政府组成的开明而现代的政体也是值得挽救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新受命的奥斯曼帝国的大臣们才制定了那个历史上著名的《花厅御诏》，并于 1839 年 11 月 3 日正式予

以公布。

《花厅御诏》的内容新旧参半，它把奥斯曼帝国的衰微归咎于没有遵守古兰经戒律和帝国的法令，但是它又指出补求的办法在于制定“新法令”，彻底改变原有的习俗。御诏中的基本原则是：保障臣民的生命、名誉及财产；废除租税仓收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弊端；实行正规的、按照规章执行的征兵制度；对刑事被告人给予公正的和公开的审判，一切人不拘任何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中最后一项更能说明是同古老的伊斯兰传统作了最根本的决裂，所以按照穆斯林的原则和价值观来看，有悖于《古兰经》的精神。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对于异教者的偏见，无论从传统上或是道义上来说，都是根深蒂固的。但在当时，新登基的素丹和他的那些具有改革精神的大臣们已经认识到，如果不尽快满足奥斯曼帝国各族人民的平等要求，就将会为欧洲列强寻找保护帝国境内基督教徒，干涉帝国内政找到借口。即使没有外部列强的干涉，在兴起的民族主义影响下，也将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新素丹和他的大臣们想通过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来增进帝国境内所有臣民们的友好关系，加强穆斯林以及基督教徒臣民对帝国的忠诚，削弱分离主义，巩固奥斯曼帝国的统一。《花厅御诏》还进一步指出，这些具有浓厚西方色彩的改革措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所有臣民，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一律适用。虽说《花厅御诏》提出的各项原则和承诺，在马赫默德二世改革时期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但是这份形式极其庄严的公告，标志着为时 40 年的，在奥斯曼帝国历史进程中被称为“坦齐马特”改革运动的开始和“坦齐马特”时代（1839～1876 年）的到来。“坦齐马特（Tanzimat）在突厥语中为改革整顿之意，因为该时期具有按照奥

斯曼帝国新的法令和条例，在行政、财政、司法、教育等主要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特点，体现了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一些法理精神，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故称为“坦齐马特”时代。

在“坦齐马特”时期，左右奥斯曼帝国政局的是一大批精通外语，熟悉欧洲政治，立志于社会改革的官僚们。在1871年以前，他们的权势如日中天，比帝国素丹的权力还大，政敌甚至称他们为独裁者。不过他们中的杰出之士，倒也不失具有真才实学的政治家。例如雷什德帕夏，此人可以称得起是19世纪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改革运动的真正创始人。1834年，雷什德帕夏被派往巴黎当大使，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在留住巴黎期间，他一直与年高德劭的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德萨西友好交往。德萨西一方面帮助他学习法语，一方面介绍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启蒙家，对他以后政治志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1839年，雷什德帕夏作为特使前往伦敦，在那里他接到消息，得知马赫默德二世因病逝世。新素丹继位之后，任命由伦敦兼程返回国内的雷什德帕夏为外交大臣。此后，正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奥斯曼帝国政府才拟定和公布了《花厅御诏》这份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通称为“坦齐马特”的那些伟大文告中的第一条法令。

“坦齐马特”时期的社会改革，首先从法律开始。1840年5月，奥斯曼帝国颁布了一部新刑法，它的各项条款，尽管受到法国法律的影响，但主要方向仍然没有超出伊斯兰宗教法中刑法本身的范畴。但是，这里面却有着一两点重要的改变，其中之一是确定了奥斯曼帝国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另一个是责成一个负有专责的法人团体起草并颁布了一项包含前言和十四项条款的法规。这项法规尽管意思模糊，措辞不清，实行后又不见效果，然

而它却标志着一项立法原则和一个立法机构在奥斯曼帝国首次出现了，为随后实行的更加激进的法律改革开辟了道路。

此外，为了改变帝国政府机构运转不灵，效率不高的现状，在帝国的财政管理方面也相应地作了一些改革。例如，在《花厅御诏》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应即采取步骤开设银行以及相似的机构，以实现货币和财政制度的改革，并应设立基金，用以增强我帝国的各种物质富源。"其目的就是希望在帝国建立一个正式的国库和一种健全的货币制度，以实现帝国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1840 年 4 月，帝国发布了一道敕令，允许成立一个欧洲式的银行。次年帝国政府首次发行纸币，纸币的利息高达 12%，每年分两次发给。1844 年，帝国政府会同新银行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币制的新措施，其中包括收回旧纸币，发行欧洲式的新货币。

在奥斯曼帝国各项社会改革中比较行之有效的，是 1845 年帝国诏书发表后实行的教育改革措施。同年 3 月，帝国政府发出通令，任命了一个由精通司法、宗教、军事等各类学科的人士组成的七人委员会，就帝国现有的各类学校进行了调查，并为设立新学校作好准备。委员会于 1846 年 8 月起草了有关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全面发展的规划，建议设立国立奥斯曼大学，建立初等及中等学校教育制度，以及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公共教育会议。公共教育会议在 1847 年被改建为教育部，试图把帝国的教育从乌里玛的独占权中分离出来，从而为以后帝国全面建立世俗教育体制开辟了道路。到 1867 年，奥斯曼帝国建立的初等学校已达 1.1 万多所，世俗初小达 1 000 多所，在校男生为 24 万人，女生为 10 万人。1869 年，帝国政府又颁布新的教育法，规定每 500 人以上的村、镇都必须建立一所初等学校。超过 1 000 人以上的市镇必须

建立一所中等学校。每个省都必须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并且整个教育经费都纳入到国家财政预算，由教育部统筹管理。教育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奥斯曼帝国各地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到1875年，帝国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达135万人，其中军事院校的学生为2.7万，职业学校的学生为8.2万。“坦齐马特”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教育改革方面的主要成果，不仅是建立了许多学校，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批受到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一代。尤其是开创了世俗教育的体制，使帝国教育中的世俗化倾向日渐明显。尽管这一时期神学院依然存在，但由帝国政府所创办的世俗学校，已经正式脱离了乌里玛的控制，完全由帝国的教育部门管辖。

1852年，“坦齐马特”改革运动遭受到了一次最为严重的挫折。因雷什德帕夏不断采取更加激进的改革步骤，希望赢得西方国家的友好和支持，但遭到帝国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在巨大的压力下，素丹被迫免去了雷什德帕夏大维齐的职务，以致由他制定的新地方行政制度遭到废除，甚至使整个“坦齐马特”改革运动都陷于停顿。不过当时的一些西方观察家已经看到，自从18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一直在为社会改革铺平道路的那一长串的事态发展中，改革包含的原则与信念，经过长久岁月的磨难，已经制定了出来，成为人们更高的热忱。

1854年，“坦齐马特”改革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帝国军队同俄国人作战不利，这恰好暴露了帝国政府的腐朽和无能。于是，素丹又一次向欧洲列强提出，在他们的帮助下，接受社会的进步和改良，全面推行一项更加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运动。这样，帝国的改革派又重新上了台。1855年5月，帝国政府宣布，

愿意废除有关歧视非穆斯林的两项重要措施,一项是人头税,这是自有伊斯兰教政权以来,便要求在穆斯林国家内,所有受保护的非穆斯林属民都要缴纳的一种税,如今庄严地以法律的形式被废除了。另一项是携带武器的特权,也就是服兵役的权利,过去几乎同样长时期地仅限于穆斯林才能享有,如今也对所有的人开放了。在"坦齐马特"时期,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帝国政府在 1856 年 2 月 18 日又颁布了另一份庄严改革法令——《哈蒂·胡马云诏书》。这份改革法令不同于 1839 年的御诏,它只字未提《古兰经》,而是较多地谈到了人间的平等,强调世俗物质的进步和繁荣。帝国政府表示要建立银行,改善公共建筑和交通设施,改进商业和农业,将充分发挥西方的知识、技术和欧洲都城的作用。

关于改革的新法令——《哈蒂·胡马云诏书》的制定与颁布,作为长期改革派领袖的雷什德帕夏却并未参与。此时他已年迈多病,这次改革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其信徒、阿利和富阿德两人的手里,这两人领导了此后"坦齐马特"15 年的改革工作。阿利和富阿德也都像雷什德帕夏一样,是靠外交知识才开始飞黄腾达的,属于"坦齐马特"时期改革运动的第二代人物,许多在他们前辈时期还是陌生和新奇的东西,此时都已成了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不论从他们所抱有的改革信念或是他们的个人地位来说,两个人都比雷什德更加立足稳固。因此,即使他们在帝国的社会改革实践中做得更加谨慎和更加现实一些,都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关系。

1861 年 6 月 25 日,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去世,他的兄弟阿布杜尔·阿齐兹继任素丹。新素丹继任后不久,便同以阿利与富阿德为首的改革派发生了芥蒂,以致帝国的整个改革工作,由于他的

粗暴干涉而受到阻挠，甚至往往被取消，但是阿利和富阿德还是能够利用在奥斯曼帝国已经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新的西方式的对王权监督制约的机制，来推行各个方面的社会改革。

奥斯曼帝国在1839年至1871年间的“坦齐马特”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是很不平衡的，其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虽然帝国的农业生产有所增长，但那也是微乎其微的。虽然帝国政府两次宣布废除纳税农庄制，但事实上却是废而不除，因为直接征税制既没有增加岁入，也没有减少横征暴敛的弊端。此外，公路、铁路、桥梁以及公共建筑等现代设施的发展程度，各省之间的差异也很大。由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工业发展，所以，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只是建立了一些小型的制造加工业工厂。特别是因为欧洲列强签署的通商条约，把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关税限制在了8%之内，使得欧洲货物的进口量不断增加，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奥斯曼帝国民族资本的发展。

1869年，“坦齐马特”时期改革运动的两个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富阿德逝世。1871年9月，另一位重要的领导人阿利也在卧病三个月之后死去。奥斯曼帝国重要改革派人士的相继去世，尤其是他们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模仿学习者的法兰西，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败北，造成法国在奥斯曼帝国朝野中的威信下降，帝国改革派的威望也随之降低。因此，在一片对奥斯曼帝国的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坦齐马特”的改革家们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纵观奥斯曼帝国的全部历史，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历史时期比“坦齐马特”更招人评论的了。对于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社会改革，或被认为是浅薄而过于仓促的西化，或被认为还不够雷厉风行。也有的政治家则把“坦齐马特”时期誉为“播种时节”，是新的观念和制度得

以萌动发芽的季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坦齐马特”这一历史时期，此后的奥斯曼帝国宪政时期，以及共和国时期的改革家们，都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社会进步的成绩。因为基本的事实是：奥斯曼帝国如果要想继续立足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除了实行具有西方色彩的社会改革，别无其他的抉择。

三、从专制君主帝国到现代民主共和

青年奥斯曼党人与宪政运动

关于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反抗极权统治的历史，按一般的习惯，都是以1859年的被称作为库勒利的事件开始。在那一年，一小撮同谋者策划推翻、或者在必要时刻刺杀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但是不幸的是预谋被发现，主谋人被作为要犯流放到了叙利亚。欧洲的一些政治观察家，把这次未获成功的预谋事件，说成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企图实行立宪及议会政府的尝试。实际上，自由主义和立宪思想，在若干年以前便已经为奥斯曼帝国的人们所知道，尽管这类思想是很不明显的，但还是曾经对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和雷什德帕夏倡导的改革有过一些影响。1845年，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曾经试行召开过一次全国地方乡绅大会，希望批准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但会议开得并不成功。

在奥斯曼帝国，完全是按照自由主义方式对政府的行为提出批评，以及提出一些宪政改革方案，那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情。1865年6月，一些反对帝国专制统治的自由主义者，试图组织一个确定的秘密团体。关于它的最初方案很少有人知道，只是据说

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阿耶图拉，带着两本重要的书籍参加了第一次的会议。一本书是关于意大利烧炭党的，一本书是关于波兰的一个秘密团体的。后来他们决定采取的行动方案，似乎便是根据意大利烧炭党而来的。这个团体很快得到发展，不久便号称拥有245名成员了。尽管帝国政府通过谍报人员的报告，也了解这一团体成立的有关情况，不过一直都没有对它采取任何措施。1867年，这个团体大量印发致素丹的公开信，在信中提及关系到奥斯曼帝国情况的一些冷酷的实情，并且建议立即实行宪法及其他方面的改革。这封信引起了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的极大振奋，但也引起帝国政府的恐慌，帝国政府迅速而又不声不响地采取了行动。这个团体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被流放到了安纳托利亚，但正是这个时候，这个秘密政治团体得到了正式命名。1867年2月初，比利时报纸《北方报》登载了一则关于费萨尔亲王在奥斯曼帝国开办一家银行的消息。费萨尔亲王在为更正这项错误报道而写的信中，提到在奥斯曼帝国支持他的人，并称他们为“青年奥斯曼人”，这一名称无疑是从几十年前已经在欧洲出现过的青年意大利、青年英格兰、青年法兰西、青年德意志等得到启发而采用的。这个名称被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看中了，他们最后决定用青年奥斯曼人作为他们的政治组织和出版物的名称。1871年奥斯曼帝国宣布大赦，随后，许多青年奥斯曼党人由流亡中返回国内，通过新闻活动，继续从事他们反对专制统治，要求自由和宪政改革的活动。

19世纪70年代中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情况急剧地恶化。庞大的军费开支，素丹的荒淫无度，再加上大臣们漫无止境地借款，使得帝国的财政陷入一片混乱，尤其是农作物的连年歉收所带来的苦难，使得广大民众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变得普遍而强烈。

1875年10月,大维齐尼迪姆宣布奥斯曼帝国所负的债务一律拒绝支付利息,这使得奥斯曼帝国政府在欧洲的地位和信贷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全国各地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875年7月,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了不满帝国专制统治的群众起义。不久,这一事态迅速蔓延到了保加利亚,在那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采取了血腥的镇压,以致引起了全欧洲各地一致发出的忿怒抗议。特别是1876年5月6日,在萨洛尼卡发生了杀害法、德等国领事的事件,使得奥斯曼帝国政府同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水火不相容。1876年5月10日,奥斯曼帝国内部不满情绪终于达到了顶点。帝国京城里几所著名神学院的学生们,在帝国中央政府的外面举行抗议示威,要求撤换一些腐败无能的政府官员。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在神学院学生们的巨大压力下被迫让步,两天后,他免去了腐化和保守的大维齐尼迪姆和总法典官埃芬迪等人的职务,任命了以米德哈特为首的一批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政府高级官员。然而,由于立场和观点相左,所以在素丹和他的新大臣之间,彼此完全无任何信任可言,一切政治摊牌已经是迫在眉睫。1876年5月30日,以具有改革精神而著称的米德哈特为首的大臣们,凭着帝国总法典官署名同意废黜素丹的判决书作为武器,并以适当的政治和军事准备为后盾,正式宣布年迈保守的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已不再执掌朝政,而另外立他的侄子、思想比较开明的穆拉德五世为素丹。老素丹泪流满面地写了一封让位给他的继承人的信后,一声不响地离去了。新即位的素丹立即下诏,要所有的大臣一律留任,并准备进行奥斯曼帝国新的社会改革。

穆拉德五世的登基,似乎像是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的一次胜利。穆拉德五世在过去的一些年代里,一直与青年奥斯曼党人

保持着联系，并且一直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表示同情。然而，自由主义者为他们的新素丹所感到的高兴，只是昙花一现。穆拉德五世曾经是一位极有人智的王子，他博览群书，特别是对于欧洲的文学、科学技术以及欧洲政治事务颇感兴趣，也颇为了解。由于他思想开放，并一直和青年奥斯曼党人保持着联系，素丹因而对他越来越不放心，从此，他在监视之下过着一种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这种生活给予他的心理压力，以及经常借酒浇愁的不良习惯，对于他那已经变得神经不正常的性格来说，都是致命的。所以在等到他登基的时候，穆拉德五世已经朝着神经错乱的方向在发展了。特别是在穆拉德五世登基之后，由于受到两次不幸事件的打击，弄得他果真神经错乱了。第一件是老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的暴卒事件。他在继位几天之后，老素丹被发现两腕割破惨死在奇拉安宫里。第二件事是他的一些亲信大臣在内阁会议上惨遭杀害，凶手是曾经任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之子伊泽丁亲王的副官哈桑。新素丹因这些事件受到过度打击，竟变得无法在公共场合露面，更完全不能料理国家大事。经过帝国医生和外国医生的仔细会诊，人们似乎已经弄明白，那就是新素丹的病症已经无可救药了。

在对外战争和帝国内部危机两面夹击的情况下，这样一种形势不久便使人感到无法容忍下去了。具有改革精神的大臣们，不管他们心里怎样不愿意，但又不得不开始考虑着素丹退位的可能性。下一个素丹继承人是穆拉德五世的弟弟阿布杜尔·哈米德。1876 年 8 月 27 日，具有耿直贤官美名的米德哈特前往阿布杜尔·哈米德母亲所住的王宫去会见他，以便事先得到他对于帝国自由主义事业表示同情的诺言。这位未来的素丹，在看了由大臣们准

备提出的一份帝国宪法草案之后，表示同意，并且答应予以支持。初步工作完成以后，米德哈特又从帝国的总法典官那里得到了一份根据神经失常不堪任事为理由，而准许素丹穆拉德五世退位的判决书。8 月 31 日，苦命的穆拉德五世被废黜，阿布杜尔·哈米德正式宣告继任素丹。退位后的素丹被带到奇拉安宫，在被囚禁了 28 年之后，于 1904 年病逝。在短短的四个月内，素丹根据自己手下大臣的决定，两次被废，两次易人。

1876 年秋季，面对泛斯拉夫主义和欧洲列强的干预，奥斯曼帝国上下群情激昂，出现了一股爱国主义热潮和伊斯兰教的狂热情绪，这种气氛进一步催化了有关帝国宪法的讨论。11 月末，在米德哈特主持下的一个由乌里玛成员和文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部宪法草案。可是等草案的最后文本呈递给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之后，他又压着迟迟不表态，最后虽然总算批准了，但突然又加上了这么一句："凡属危及国家安全的人物，素丹皆有权将其放逐"。1876 年 12 月 9 日，米德哈特被任命为帝国大维齐，四天后，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成文的宪法公之于众，庆典是在刚被大雨冲刷过的帝国广场上举行的。

这部 1876 年的帝国宪法，从头至尾显露出西方的影响。它对内阁，对由素丹任命的帝国上议院，对由选举产生的帝国众议院，对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人权法案等，都作了明文规定。但帝国的内阁并非像米德哈特最初提议的那样对议会负责，而完全对素丹负责，所以帝国的立宪主义者都把希望寄托于由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另外，帝国宪法还规定素丹拥有批准立法，任命各部大臣，召集和解散议会等各项大权。这种状况的政府，一些西方评论家把它称之"有限制的独裁政府"，并认为开明的比利时宪法，以及更带

君主主义色彩的普鲁士宪法，为它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启示作用。

奥斯曼帝国的新宪法还宣布素丹为哈里发，宣布他本人为神圣不可侵犯。虽说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一直都在使用哈里发的衔称，甚至还正式载入了 18 世纪以来所签订的一些条约中，但是没有谁像阿布杜尔·哈米德在他当朝的最后几年里那样大量地使用这个头衔，并试图给它增添新的光泽。这与当时奥斯曼帝国特别强调伊斯兰性和在伊斯兰教旗帜下团结的泛伊斯兰主义理论有关。

1876 年的帝国宪法再次强调了奥斯曼帝国全体臣民的平等地位。在公民的自由方面，在所有的法律权利方面，在担任政府的公职方面以及在当选议员方面，均一视同仁。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帝国的国教，但除了这一点，以及素丹的哈里发称号之外，宪法没有再提关于区分教区的事情。这一时期帝国的政治家们正全力以赴，免得帝国在危机时期出现分裂局面，而这部宪法显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这在宪法的第一项条款中明确地反映了出来。这项条款规定：奥斯曼帝国，包括像罗马尼亚这样的特许区在内，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分割的整体。其实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政治家们也像“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家们那样，有意要向欧洲列强表明，帝国完全有能力自行改革，有能力处理自身的问题，希望用这部宪法作为对付欧洲列强的有力武器。

在此期间，宪法的事宜并未被置诸脑后。根据一项临时选举法，并利用省政府议会作为选举机构，由此推选出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批众议院议员。众议院在帝国首都先后共召开了两次会议，一次是从 1877 年 3 月至 6 月，另一次是同年的 12 月至 1878 年 2 月。由于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和大臣们在法案提出或批准时，一

味地拖延扯皮，所以众议院没有取得什么立法结果。但是众议院本身总的来说，表现不错，许多议员对奥斯曼帝国的事务不仅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而且发言切中时弊，显示出独立的见解和远大的目光。此外，穆斯林议员和基督教徒议员们之间虽然有分歧，但都能够以大局为重，在谋求奥斯曼帝国的福祉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见。众议院的第二次会议适逢俄国军队突破了帝国军队的防线，正向埃德尔纳和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步步紧逼。议员们在会上慷慨陈词，直言不讳地指责帝国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以及指挥战事的不当，这一下可惊醒了素丹。

尽管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为了登上素丹王位，当时答应制定一部帝国宪法，但从许多史料来看，他对立宪一事从来都没有给予过任何积极的支持，也许他真正中意的是宪法草案的最后文本，因为它赋予了素丹各种大权。1877 年 2 月，阿布杜尔·哈米德意识到议会不愿受任何约束，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将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许多麻烦，而且议会还有可能成为公众不满情绪的聚焦点，因此他赶在议会召开之前，抢先放逐了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大维齐米德哈特，而后者一直希望利用立宪政体，来实现他关于政权机构的原始设想，即帝国的内阁对议院而不是对素丹负责。

1883 年，米德哈特和他的几位自由主义者同胞，被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下密令绞死在阿拉伯半岛麦加附近的塔伊夫地牢中。1878 年 2 月 14 日，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以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战争结束时的危急形势为借口，宣布帝国议会休会，然而这一休会，奥斯曼帝国的议会就休了整整 30 年。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强行解散议会，恰恰充分说明帝国议会具有反对专制统治的潜在战斗力。奥斯曼帝国的宪法虽然被搁置了起来，但它始终是日后帝国

政治家们回顾瞩目的一盏明灯。

专制君主阿布杜尔·哈米德

自从阿布杜尔·哈米德流放了大维齐米德哈特，并以国家局势危急为借口解散了帝国议会之后，早在"坦齐马特"时期就已经能够看出的朝着毫不受约束的君主专制主义发展的各种趋势，这时得到了实现并达到了顶点。从1878年到1908年的30年中，阿布杜尔·哈米德根本就没有召集过一次帝国议会而统治全国，尽管他从来都没有公开废除帝国宪法，而且还继续把它刊列在帝国的年鉴上，但是这30年的专制统治仍然是非法的。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宪法特别规定，倘若素丹解散帝国议会，新的议会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开会；帝国宪法条款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终止，而阿布杜尔·哈米德本人也是接受并亲手颁布这个宪法的。帝国宪法出现的是，它并没有颁布强制素丹行为的条文，相反，它宣布素丹是非责任者。此外，就帝国穆斯林臣民总体而言，阿布杜尔·哈米德的这些行为不一定不得人心。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影响下，议会政府对广大穆斯林根本没有意义，他们所尊敬和拥护的，还是奥斯曼帝国王室的天子后裔。他们大多数人普遍认为专制君主用心善良，会慈父般地关心和帮助他的臣民。

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的头10年，也正像奥斯曼帝国从18世纪开始以来同任何其他时期一样，是一个积极从事于变革的历史时期，并且完成了许多在过去年代还只是刚刚开始或是初步预以拟定的计划。所以在掌权的早期年代，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位积极上进的君主，以个人专制和独裁来拯救和改善帝国的统治者。阿布杜尔·哈米德很注意博得大众的好感，这特别表现在

他强调自己作为哈里发的地位，以及重视增进在伊斯兰教旗帜下面的团结。过去帝国政府以往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强调奥斯曼主义，而现在他则逐步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即素丹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并且也是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同时又是各代哈里发的继承者。随着阿布杜尔·哈米德专制统治的加强，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也日益壮大。阿布杜尔·哈米德泛伊斯兰主义的大部分目标，是专门为了确保阿拉伯臣民对他的忠诚。他选拔了一大批具有才干的阿拉伯人充当他的近侍，在阿拉伯地区新建或重建了几所著名的大清真寺，并鼓励广大穆斯林到麦加去朝圣。阿布杜尔·哈米德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最令人难忘的物质成果，是奥斯曼帝国从1901年到1908年修筑的一条从大马士革到麦地那全长800英里的铁路，而且是不要欧洲资本参加，完全由帝国资本投入修筑的惟一铁路。此外，为了拉拢和监视阿拉伯民族的宗教领袖，故强令后任麦加沙里夫的侯赛因，住在远离圣城的帝国首都。阿布杜尔·哈米德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在当时确实在某些方面起到了把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部门紧密联系起来的积极作用。

除了以宫廷为中心的君主专制和宣传泛伊斯兰主义之外，阿布杜尔·哈米德的专制统治还包括使用新闻检查、警察、告密者和流放等手段。19世纪80年代以后，奥斯曼帝国内外局势的不断恶化，使得阿布杜尔·哈米德更是杯弓蛇影，似乎对谁都不信任，听不进半点来自民众不满的呼声。为此，他颁布了严厉的新闻检查法。这一时期帝国检查新闻的机构主要有两个，一个设在政府，一个设在宫廷，二者互相监督，共同对付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因此，报纸被禁止出版或暂停发行乃家常便饭，尤其是来自国外的报纸和书刊，更是特别受到重点怀疑和检查。当然，在奥斯曼帝国境内

不让传播新思想是办不到的，即就是阿布杜尔·哈米德专制统治的时代，那些被阉割了和不起作用的报纸，也对于促进奥斯曼帝国的社会进步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至少是报纸读者的数目在不断地增加，因而使得更多的奥斯曼人养成了像欧洲人那样每天阅读报纸，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西方的知识，尤其是科学与文学方面的现代思想正在广泛地传播，因为一旦向西方打开了门户，要想重新关上就不那么容易了。即就是那些被迫回避政治问题的书刊，继续按照它们在“坦齐马特”时代的方针办事，翻译外国文学，刊登小说、诗歌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传播有用的科学的新思想和新观念。

另外，在帝国的宪政改革方面，阿布杜尔·哈米德是一位专制的独裁者，但是在教育领域，他却是一位继承了“坦齐马特”传统的改革家，在他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在他看来，教育改革是推进帝国各方面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所以他对教育改革，作出了最先和最大的努力。这一时期帝国改革最显著的成就，在于高等教育的极大发展，无论是高等学校或是高等学院的学生，在数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增加。在建立学校方面，阿布杜尔·哈米德雄心最大的是创办了奥斯曼帝国大学。这项计划实际上早在1845年就经人提出，但由于经费短缺以及筹办人员工作不认真，以致计划半途而废。最后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长期的筹备，后来被称为伊斯坦布尔大学，并于1900年8月正式开学。

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时期，另外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是法律方面的改革，这实际上又是自“坦齐马特”时代便已经开始的那一过程中的最后终结。1870年5月6日，奥斯曼帝国颁布的四项

法律改革，其中的两项关系到司法及法庭组织，另外两项关系到法律的程序。阿布杜尔·哈米德过去曾经下诏设立司法部，同时授权该部接管各商业法庭，如今又就司法部的职能进行了改组，将所有非宗教性法庭统统拨归它管理。另外一项法律就世俗法庭的条例作了规定，这是几年以前为审理穆斯林及非穆斯林之间的诉讼案件而设立的一种混合法庭。

在其他物质生活方面，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也是朝着西方化的方向不断发展。奥斯曼帝国在欧洲资本的资助下，修建铁路，兴办矿山和公用事业。虽然绝大部分的利润以货币的形式从帝国流向海外，但奥斯曼帝国所得到的好处却是物质生活日益方便，以及随着西方资本的渗透而带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方面的社会进步。在克里米亚战争年代开始修建的帝国电报网，到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时期，已经四通八达，并有着重要的双重意义。新建的电报线路，以及简化了的电码和受过专业训练的接线员，可以使得素丹对各个行省进行严密的监视。另一方面，电报局里受过现代教育的技术人员，后来都在许多场合同反对帝国政府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凯末尔主义分子合作。此外，电报也成了奥斯曼帝国持不同政见者从事反专制政治活动的一种工具，他们可以通过电报在远隔千里之外向奥斯曼帝国政府发出威胁，并提出社会改革的强烈要求。

与电报相比，奥斯曼帝国铁路的发展自然在长度上要短得多，但它的兴起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是帝国朝着西方化的方向不断前进的佐证。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的那个年代里，虽然租给欧洲人修建的铁路都比较短，但它已经打通了富饶的内地与附近港口城市之间的联系，它极大地促进了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的统治下，虽然帝国在教育、法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还是有所进步的，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奥斯曼帝国危机的年代里，反抗和不满的浪潮还是从两个不同的风源兴起。一个反对派起源于非奥斯曼民族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思想。尤其是在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阿拉伯人中间，通过阿拉伯文化复兴培植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因此，在许多地区都产生了要求自治的政治主张。反对派的另一起源，是那些受过西方式现代教育的奥斯曼青年人对阿布杜尔·哈米德血腥专制统治的不满。黑暗的君主专制统治，并不能阻挡民主与自由等反对专制的破坏性观点在帝国军校学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传播。这些作为未来奥斯曼帝国的军人和行政官员的青年们，虽然接受的是帝国所能给予他们的最先进和最现代化的教育，但是他们以及他们的教师，在关于怎样对于他们所服务的那个国家进行管理的问题上，迟早会得出一些较为激进的结论来，那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第一个有组织反抗阿布杜尔·哈米德专制统治的团体成立于1889年，正如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也就是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发起人是四名医科学校的学生。同年5月，他们在坐落于旧皇宫和火车站之间的军医学院的花园中开会，开始密谋反对阿布杜尔·哈米德的专制统治，实行帝国的社会改革。新革命组织很快成长起来，并从其他高等院校赢得了信徒。这些新谋反者也像他们的前辈，1865年的青年奥斯曼党人那样，效仿意大利烧炭党的办法，把人员分别编排为若干编号的小组，同时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号码。这时，流亡国外的人士在巴黎也成立了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团体。当阿布杜尔·哈米德解散议会以后，

一小群奥斯曼自由主义者便一直居住在那里。其中一名是前奥斯曼帝国议会的议员加尼姆，他在巴黎主持出版了一种叫做《青年土耳其人报》的报纸，公开批评素丹以及专制政权。采用这个名称，无疑是要有意识地唤起人们对19世纪60年代青年奥斯曼流亡者的回忆。国内的谋反者通过加拉塔地方的法国邮政局，一直和巴黎的革命团体保持联系。大概是由于受到西方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秩序和进步的影响，当时在帝国首都的革命组织，把原来奥斯曼同盟的名称，改为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欧洲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不久，它的领导人之一穆拉德向阿布杜尔·哈米德呈递了一份奏折，其中列举必须予以推行的各项社会改革，并公开批评素丹及其政权的专制统治，然后便逃往在英国统治下的埃及。阿布杜尔·哈米德马上采取了报复性措施，逮捕了穆拉德在帝国京城的许多朋友，并流放了各反对党派的知名领导人。但是奥斯曼帝国的革命者远不是能轻易被消灭掉的。相反，他们开始由理论转入实践，准备在1898年8月举行旨在废黜素丹的武力政变。但是由于事情不慎泄漏，阿布杜尔·哈米德立即采取了行动，将所有的谋反者几乎一网打尽。

1899年12月，正当青年土耳其党人无论是在帝国境内，还是在欧洲似乎都处在前途最暗淡的时刻，有一小批来自意想不到方面的主力军，戏剧性地由帝国首都逃往了法国，从而使得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突然之间又变得活跃起来。杰拉莱丁是一位大臣的儿子，素丹马赫默德二世的外孙，他的妻子是阿布杜尔·哈米德的妹妹，因此，他和阿布杜尔·哈米德有着双重的亲戚关系。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萨巴赫与卢特富拉出走法国，是对阿布杜尔·哈米德的沉重打击。这些皇室成员叛逃的到来，自然给青年土耳其

党人增强了很大的实力和声誉。

1907年,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又有了新的迅速发展。帝国军校的学员们如今都已经当上了尉官和校官,掌握着军队和武器。由于帝国军队的装备现代化处境比较困难,加上地方割据和外敌入侵的危险与日俱增,以致使任何一位具有爱国之心和胸怀大志的青年军官无疑都会认为,当前国家最迫切的任务便是要设法改换政体。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比较简单而原始的,那就是:自由与祖国,宪法与民族。

1907年2月,青年土耳其党人采取了行动,试图促成反对阿布杜尔·哈米德专制统治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团结。他们在巴黎举行了大会,并就当前行动的一项计划达成了广泛的协议。然而,此时革命形势发展的真正中心,已不再是这些国外的流亡者,而是那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军官们,他们在马其顿和安纳托利亚又新成立了许多革命组织。1907年9月,以青年军官为首的萨洛尼卡革命组织,同在巴黎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实行合并,从而给后者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声望。

1908年的6月9日至10日,英国与俄国的两国君主在雷维尔的会晤,似乎预示着奥斯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的丧礼,所以帝国急需要采取立宪的治疗方法,来结束腐败无能的专制统治。尤其是在帝国境内,军队领不到薪饷,吃不饱,穿不暖,他们不顾死活地起来要求满足一些最起码的人类需求,因此,从安纳托利亚到鲁米利亚,兵变的浪潮便此起彼伏地不断出现。这类兵变在1908年的头几个月里,似乎也传播到了驻扎在马其顿的第三军团。这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军官们,深感帝国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把这个没有能力去巩固其国防的政权推翻。此时的

阿布杜尔·哈米德也采取了严厉的镇压行动，下令相继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和惩戒委员会。有一位青年军官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按照惯例，他被邀请前往帝国京城"述职并接受晋升"，这位青年军官也很机警，他料到这项邀请来意不善，于是便潜逃到了列斯尼山区，这个便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恩维尔。1908 年 7 月 4 日，当时青年土耳其党人中另外一位更加重要的青年军官尼亚齐少校，也继恩维尔之后逃往山区。不过尼亚齐不是独自秘密前往的，他还带走了相当一部分士兵、武器军火以及从连队贮藏室窃取的现款。他同时向帝国宫廷秘书处发出通电，谴责素丹的专制统治，此人后来也成为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这时的兵变，不仅很快地蔓延到了马其顿第三军团的各个单位，而且不久也开始影响到了埃迪尔的第二军团，甚至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阿布杜尔·哈米德派来镇压兵变及反叛者的军队统帅。此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组织，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开始公开露面收容了大量的变兵和反叛者，并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恢复帝国宪法。阿布杜尔·哈米德最初还企图拒绝这项要求，并又拿出已经不起作用的监视、收买和镇压兼而施之的老办法，来对付革命运动领导人，但是这次所有的办法都失败了。特别是他派往马其顿负责监视该地军官们是否忠诚的谍报人员被人发觉，这就更加深了军队对于加诸他们的这种无礼和侮辱的愤怒。此时，黔驴技穷的阿布杜尔·哈米德又采取了一系列颁发勋章、晋级和保证补发欠饷的紧急措施，试图拉拢帝国军队的军官们，但还是打动不了反对他专制统治的军官们的决心。这时萨洛尼卡和马纳斯特尔的驻军，受到青年土耳其党人组织和宣传的影响，已经公开站出来反

对素丹，并且还得到了驻埃迪尔内第二军团给予坚决支持的保证。甚至连由伊兹密尔派往萨洛尼卡去的、阿布杜尔·哈米德认为忠诚可靠的安纳托利亚军队，也倒向了革命的一边。1908 年 7 月 20 日，马纳斯特尔的穆斯林居民举行了起义，并占领了军械库。接着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革命暴动，特别是科索沃省的愤怒群众向素丹发出了最后的通牒，立誓要恢复宪法，如果素丹拒绝的话，便在鲁米利亚另立皇太子为素丹，同时有一支 10 万人的武装队伍将向帝国京城进发。经过两天的踌躇和讨论，阿布杜尔·哈米德屈服了，决定恢复帝国的立宪政府，以确保他的素位王位。7 月 23 日，他宣布帝国宪法再度生效。7 月 24 日，帝国首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将举行议会选举的官方通知，全文总共三行，没有标题。

因对报纸刊物一律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帝国首都的市民们大都对于马其顿的兵变事件一无所知，所以当人们看到了这项通知以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第二天报纸刊登发表欢庆帝国宪法恢复的文章之后，人们才明白了帝国发生了什么事。洪水于是冲决了大堤，造反变成了革命，欣喜若狂的民众拥上街头互相拥抱，欢庆胜利，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标语口号：自由、正义、平等、博爱。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血腥专制统治的漫长黑夜已经过去了，自由的黎明已经到来，这一时期帝国作品所反映的，几乎是一种如狂的欢乐，甚至连抱有怀疑态度的欧洲报纸，也在报道中作出了这样的反映。

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下的社会改革

从奥斯曼帝国第二个立宪政体一开始，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便像过去作为反对党和在国外流亡时期已经出现的那种发展

趋势，分裂成为不同的两派，一派是自由派，他们主张某种程度的地方分权，并且给予按宗教或种族划分的少数民族一些自治的权利。另一派是民族派，他们变得越来越公开地主张中央集权和由奥斯曼人来控制一切。后者的工具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组织"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最初，在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间，自由温和的政治主张确实占据了优势。宪政时期最初的两位大维齐塞伊德和卡米尔都是国家元老，他们得到青年土耳其党人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和其他多数人的尊敬。但是不久，不管青年土耳其党人民族派的意图如何，塞伊德和卡米尔这两位国家元老几乎立刻遭到来自帝国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攻击，致使他们深感忿怒、痛心和沮丧。

1909 年 2 月 13 日，"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由于种种理由而对比较自由开明的卡米尔大维齐政府产生了不满，并设法把他赶下了台，由得到青年土耳其党人民族派支持的希尔米出任大维齐，完全操纵了帝国政府的各项任命。他们还对于其政敌进行威吓和谋杀，他们的所作所为日益引起了各方的忿怒，许多自由主义者都变成了他们的反对派。因此，在距离卡米尔大维齐倒台后仅仅一个月，帝国京城便发生了武装叛乱。叛乱虽然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帜，但实际上采取了兵变的形式，参加者多数是驻防在帝国首都的第一军团里面的阿尔巴尼亚士兵。他们的叛乱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并且同来自其他单位的叛兵以及一些神学院的学生会师在一起。叛乱者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伊斯兰教法典在危险中，我们要伊斯兰教法典。"青年土耳其党民族派的帝国政府在危机中变得手足无措，素丹不得不采取过去对付不满社会情绪所一再使用的老办法，撤换大维齐和大臣，并赦免所有参加这次保卫神圣法典的叛乱士兵。4 月 15 日，帝国政府通令各省总督，着令他们保卫伊

斯兰教法典。在帝国议会中，自从革命以来一直担任议会议长职位的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艾哈尔德·里扎被免了职，另选宗教人士伊斯梅尔接替他的位置。但是不久，便发生了青年土耳其党民族派对叛乱分子的还击。萨洛尼卡的驻军接到了关于反对派武装叛乱的电报之后，一支由青年土耳其党人谢夫凯将军率领的“救国军”立即乘火车开往帝国京城，他们的参谋长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其他随同一路前往的还有尼亚齐和恩维尔，后者在接到消息后，兼程由驻柏林大使馆赶回国。救国军于4月23日抵达帝国首都，在同叛乱者略交锋后，次日占领了该城。他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废黜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这位逃过1908年革命的素丹，如今却落得了一个不体面的流亡下场。新素丹穆罕默德·雷夏德平庸软弱，完全听命于青年土耳其党人，后者并把宫廷原有官吏全部撤换，把他们指派的人员都安插在那里的重要位置上。从此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便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真正主人。

在奥斯曼帝国第二个宪政历史时期，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实行的专制和中央集权政策，决非仅限于帝国的基督教属民。无论是巴尔干或亚洲诸省，以及统治的其他地区，他们都执行着一种使一切奥斯曼化的政策，并企图把突厥语强加于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他非奥斯曼的穆斯林。甚至在帝国京城，他们对待反对派的严厉和无情，也是前所未有的。在紧接平息了1909年9月的反对派暴乱之后，经过军事审判，许多暴乱者和反对派的领导人都被当众绞死。

1911年初，奥斯曼帝国各个社会阶层对于时局的日益不满，也在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间有了反映，从而造成了第一次重大分裂。一部分人在萨迪克上校和梅吉迪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叫“新党”

的政治组织，对青年土耳其党人遵循的各项方针与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个新成立的政治组织，很快便赢得了青年土耳其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青年土耳其党内的分歧和矛盾，严重地削弱了这个一度具有无限政治力量的权威，降低了它的声誉。1911 年 11 月 2 日，在国际形势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所有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团体、组织和人士，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党，即所谓的自由同盟。自由同盟的发起人，多数原来就已经是国会议员，因而他们能够在议会中立刻形成反对派。他们和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发生在自由同盟成立还只有 20 天的时候。外交大臣里法特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他的位置因而空缺，在为此举行的补缺选举中，参加竞选的有两位候选人，一位是代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内务大臣梅姆杜，另一位是代表自由同盟一方的新闻记者海雷丁，最后自由派候选人以一票的多数而当选。此时，帝国京城的舆论已经变得非常突出地站在自由同盟党的一边，许多持自由派观点的著名帝国政治元老纷纷写信给素丹，把帝国遭受的不幸都归罪于青年土耳其党人。同时，还建议和英国结成国际联盟，认为这是奥斯曼帝国防止发生进一步民族主义灾难的最好办法。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面临自由派和素丹联合起来反对它的危险情况下，迅速对二者采取了果断的行动。首先利用报纸猛烈地抨击自由派；其次在 1912 年 1 月设法强行解散了议会，并且在 4 月间另外举行了一次完全由他们进行筹备和一手包办的大选。结果，在全部 275 名议会席位中，仅有 6 名态度比较温和的反对派议员当选。最后，他们把在萨洛尼卡的总部迁到帝国京城，以便更好地操纵一个肯听话的议会和一个顺从的素丹，从而完全地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是，青年土耳其党人这种以非法手段搞掉合法反对

派的做法，终于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一个既不民主、又非议会的，而是军事性和阴谋性的新反对派的产生。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专制统治下，一些具有自由主义信仰的青年军官，再度逃往鲁米利亚地区，掀起了新的武装叛乱。1912 年 6 月，鲁米利亚青年军官们的武装叛乱引起了人们极大震惊，同时对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的指责，也很快地增多了起来。这时，在帝国京城成立的一个叫做"救亡军官"的秘密政治组织开始积极地行动了起来。他们首先在报刊上公布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同时通过陆军会议递交了一份致素丹的声明。特别是他们还作了一些暗示性的军事活动和准备，并且很快地收到了效果。7 月 17 日，以青年土耳其党人组成的内阁集体辞职，7 月 21 日新内阁组成，大维齐是学者兼军人的著名政治家穆哈塔尔。担任陆军大臣和国务会议主席的，分别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帝国政治元老纳泽姆和卡米尔。由于新内阁的组成，满足了反对派把青年土耳其党人赶下台的基本要求，所以其他的步骤也接踵而来。长达数年的戒严令于 7 月 23 日被解除，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下的议会于 8 月 5 日解除。同时，所有现役军官一律宣誓并作出书面保证：不参加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政治团体，也决不干预国家的内外事务。然而 1912 年 10 月爆发的巴尔干战争，对于奥斯曼帝国和上台不久的自由派政府，都是一场极大的灾难。到年底，帝国军队的又一次战败，使得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似乎已经丧尽。尤其是在 1913 年 1 月 23 日，当自由派内阁看来被人们误认为正在就一项把埃迪尔内割让给保加利亚人的建议进行审议的时候，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了对自由派内阁的突然袭击。一小伙青年军官在恩维尔的率领下，突然闯入内阁会议室，开枪打死了陆军大臣纳译姆，年迈的政治元老卡米尔在枪口对准的情况

下，写了一封辞职书。随后恩维尔拿着这封辞职书，到皇宫去见素丹，并当面把辞职书交给了他。青年土耳其党人通过发动政变，这时他们又重新稳固地掌握了帝国的政权，并且设法使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铁腕人物谢夫凯将军出任大维齐。1913 年 6 月 11 日，谢夫凯将军在家中被人谋杀，此事被青年土耳其党人用来作为借口，逮捕并流放了一大批反对派的人士，从而把帝国的最后一点自由和民主也一概清除干净了。从那时起直到 1918 年，整个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处于国防大臣恩维尔、内政大臣塔拉特和海军大臣杰马尔三人控制的军事独裁政府之下。奥斯曼帝国在这三大军事寡头政治控制下，国家权力机器被拧得越来越紧。反对派政党已被完全解散，他们的领导人不是被流放，便是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这一时期实行的无情镇压，一时之间竟达到了近似于恐惧的统治程度。他们的统治只是由于 1918 年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才告结束，最终导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组织“团结与进步委员会”自动解散，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逃往国外，而帝国自由派的代言人又从流亡、隐匿和默默无闻中开始出头露面，彼此为争取得到主持奥斯曼帝国解体的特权而争吵不休。

在由 1908 年直到 1918 年奥斯曼帝国最后失败的这段时期内，除了短暂的空隙时间外，国家的大权始终掌握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手中。乍一看来，由 1908 年至 1918 年的 10 年政绩，确实是非常糟糕的，应该在许多问题上受到责备。他们通过暴力、镇压及恐怖的手段，把国家公共生活变成了一种野蛮行为，他们多次使军队干预政治，导致了政府军事化和将领政客化的双重恶果；尤其是他们使资产阶级立宪政府循序渐进的社会发展，完全变成了阴谋与反阴谋、镇压与暴乱、专制、丧权辱国以及战败等等的恶性社会

循环，最终使帝国的广大民众对革命寄予的崇高希望，很快地变成为失望。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另外一个主题，应该永远不被忽略，这就是对于所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他们最终关心的事情，便是这一时期已经明白无疑处于危险中的奥斯曼帝国的存亡问题。像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改革派的前辈那样，他们相信，要使帝国从内部腐朽和外部侵略中得到拯救，便必须对奥斯曼帝国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某种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在为巩固执政地位而激烈斗争的那些年代里，青年土耳其党人都曾抽出大量时间来处理一部分此类的问题，并设法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使其得到解决。尽管他们的工作往往是计划不周全的，并且也时常因碍于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以致受到挫折，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在许多方面兢兢业业地努力。尤其是从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长远意义而言，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这种努力，不仅为奥斯曼帝国的将来传下了前几百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和成就，并且在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为现代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时期的社会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现代行政管理机构。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执政以后，第一件迫切需要予以关注的事情，便是外省和地方上僵化教条、效率极低的行政机构。所以不久，便参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拟定了一个新的省市政府行政制度，并且付诸实施后提高了地方官员的办事效率，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所以这些行政制度，在仅仅略加修改之后，便又成为了土耳其共和国地方及省市政府执行司法和行政的体制。此外，在帝国的京城，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和长远性的变革。如通过在帝国京

城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新市政组织，从而不遗余力地推行了多项公用事业计划，使城市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逐步地使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这个古老的城市演变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城市。有了现代下水道，有了现代的警察和消防队，城市交通和公用事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帝国京城街头游荡的有名的伊斯坦布尔狗群，经过市政会议决定，予以一网打尽，运往一个无水的孤岛，令其自生自灭。从此在帝国京城的街头上，便换成了一班接一班的垃圾工人和清道夫。

2. 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的政府，虽然也和他们同时代的多数其他政府一样，对于经济问题不像对于政治和行政问题那般关注，然而他们还是试图解决一些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解决了帝国长期遗留的土地问题。关于土地改革，帝国时期的其他改革家们一直没有什么重大的举措。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执政后，1910 年 2 月通过了一组“临时性”法律，给土地，特别是其中有关集体所有权、抵押和继承权等问题，带来了重要的改革。1911 年 3 月和 1913 年 2 月，还分别另行通过立法，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尤其是 1913 年的修改，为不动产的划定和登记，以及地价和租税的估定，规定了一套正规的制度，对于自从“坦齐马特”改革以来所遗留下来的那种复杂而不规则的状况，确实起到了简化的作用。此外，他们还采取了鼓励地方企业发展的许多措施，并为废除经济治外法权条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13 年 7 月，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成立了一个“国民消费社”，并且发动了一次鼓励民众进行国货消费以替代舶来品的运动。同年，通过了一项积极鼓励发展工业的法律。1915 年，完成了帝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工业普查。1916 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政府成立

了一所国家信贷银行，该银行于1917年1月正式开业，资本为400万奥斯曼镑，其中半数已预先交付，并发行了每股价值10镑的股票40万份，并明确规定只限于奥斯曼帝国的属民方能拥有。在国家银行的扶植下，其他金融企业也都开始兴办起来，特别是还开办了两家保险公司。关于私人企业利用地方资本开设公司一类的事情，在报纸上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工厂的开业也都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3. 法律方面的改革的成就。1908年的革命和帝国宪法的恢复，再度引起了关于引用涉及地方分权和地方政府职能分立的宪法第108条的问题，议会中关于这项法律的审议是旷日持久而又艰难的。1913年3月26日，该法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努力下终于获得通过，这是立法者抛开伊斯兰法律原则，而走向西方世俗法律原则方面迈出重要步伐的具体表现。从此，帝国便把西方关于法人团体的概念带进了该国的法律及行政机构，并一直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基础。此外，1917年在青年土耳其党的倡导下通过的新婚姻法，标志着妇女权益上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作为理处家庭婚姻，以及个人事务的宗教法庭，也已拨归司法部管辖，也就是说，把一个现代的、世俗的权力机关置于诸教权阶级之上了。

4. 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成就。由前一个世纪开始的西方化运动，到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时期，已经形成了一股社会势力。老的计时方法让位给了24小时为一天的欧式计时法。服装和生活方式的西方化发展程度，到了以致引起宗教当局的关注并不得不加以申斥的地步。奥斯曼帝国社会日益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在教育方面取得了他们最大

的成就，他们在前辈改革者做出事业的基础之上，又建立了一个包括由世俗初等及中等学校，到师范和专科学校，并以经过改组的伊斯坦布尔大学为顶峰的新型现代教育体系。这种新型的现代教育体系，扩大了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为女子进入专门行业和参加公共生活打开了道路。在帝国京城等大中城市，许多大胆的女性居然剪短了头发，戴上了帽子，摘掉了面纱，出现在公共社交场合。特别是在战争年代，由于许多男子被军队吸收入伍参战，因而迫切需要妇女出来为社会服务。在过去的年代里，女性惟一可能从事的职业，只能是护士、助产士和教师，这时她们已是医生、公务人员、律师和企业家了，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在1919年奥斯曼帝国战败后，为土耳其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 思想及文化方面的成就。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的时代最有趣和最主要的一面，是思想和文化生活。1908年革命胜利后，帝国宪法的恢复，使得长期以来被封闭在素丹专制统治下的各种思想和自由意识，如一股洪流一泻千里。一系列新文艺、新政治以及其他性质的刊物不断涌现出来。长期保持缄默或是遭到压抑的声音，现在又都大声地清晰地回响了起来。多年积郁在民众心中的想法，纷纷上了书报。尽管1909年4月兵变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又重新恢复了镇压和新闻控制，但也始终没有能够真正制止住源源而来的各种新思想、新表现和新议论。随着现实生活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得既迅猛广泛，又意义深长。

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西方的思想再度为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批评提供了理论基础。另外，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成为青年土耳其党人自由派个人立场和地方分权学说的基础。最后，正是在

西方的社会学中，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民族派为创立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详尽理论体系，找到了概念上的结构。所有这些政治学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趋向于把社会学看成是一种哲学，甚至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把它看成是在有关道德、社会、政治甚至宗教等问题上的准神权权威的一个来源。

总之，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的年代里，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加速了。如果青年土耳其党人能够按照这一发展趋势努力下去，奥斯曼人在东方的伟大历史新命运就将会充满了极大的希望。但因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决策上的失误，使得奥斯曼帝国不久卷入 1914 年到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现代战争的冲击下归于覆灭，终于耗尽了奥斯曼人的士气和忠诚。

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

1918 年初，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即将结束，奥斯曼帝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庞大帝国，因军事失利、经济崩溃和政治腐败无能，看来终于变得奄奄一息了。长期以来在帝国民众中间产生的对于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专制独裁的忿恨，正在不断地加深。尤其是随着以英、法等国为首的协约国军队的节节前进，使得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终于不可收拾。1918 年 7 月，继任素丹王位的穆罕默德六世登上了帝国的宝座。10 月，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大臣们宣告辞职，新素丹任命帝国自由派人士伊泽特为新的大维齐，并交给他一项谋求休战的艰巨任务。在经过三天初步的协商之后，10 月 29 日，一个由海军大臣劳夫率领的帝国政府代表团，登上了停泊在利姆诺斯岛的英国军舰，并于次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三

位党魁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尔，此时同乘一艘德国炮艇越过黑海逃跑了。一支拥有60艘军舰的协约国海军部队，于11月13日在奥斯曼帝国首都的港口停泊了下来。12月8日，协约国在帝国首都成立了军事管理委员会，对港口、防御工事、宪兵、警察，以及电车等交通工具实行了严格的管制。1919年2月8日，法国军队的统帅德斯佩雷将军，像几个世纪以前的奥斯曼帝国素丹穆罕默德二世一样，骑着一匹由希腊人赠献的白马，进入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1919年，英国和法国军队相继占领了靠近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的安纳托利亚中南部的几个地方，意大利军队则在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登陆，希腊人也相继占领了伊兹密尔等城市。与此同时，协约国正在巴黎，以及此后从1919年至1920年春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制定奥斯曼帝国必须严格履行的和平条款。此外，协约国之间达成的秘密协议还规定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它的安纳托利亚。

1920年5月，奥斯曼帝国政府收到了巴黎和约条款。根据此项条款，奥斯曼帝国的所有欧洲领土，除首都伊斯坦布尔周围的一小块外，都得被割让掉。帝国的海峡一律实行非军事化，向一切船只开放，并置于一个国际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帝国的重要城镇伊兹密尔交付希腊管理。独立的亚美尼亚和获得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出现在安纳托利亚的东部，仅留给奥斯曼帝国的安纳托利亚的其余部分，也要根据另外一份协议被指定作为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势力范围。巴黎和约条款还规定全面恢复治外法权，并且奥斯曼帝国的一切财政均由协约国来控制。1920年8月10日，奥斯曼帝国的代表不得不在塞夫勒签署了这份判处奥斯曼帝国死刑的条约。因此，以后成立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把签订条约的这一天，规

定为国耻日。

在摩德洛司停战协定和塞夫勒条约签订的阴沉和沮丧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个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许多满腔热血，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在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发起反抗，成立了“护权协会”。他们成功地开展了反对西方列强瓜分和控制奥斯曼帝国的斗争，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由此开始了。到了 1919 年至 1920 年，这个运动的组织更为严密，协调更加有方，以后还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领导，他就是被世人称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

促使奥斯曼帝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是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强行登陆的事件。根据停战条款，伊兹密尔应由协约国共同占领，但这只是表面文章。1919 年 5 月 15 日，一支希腊军队在协约国军舰的掩护下，在伊兹密尔登陆。希腊军队在按照计划占领该城以及周围地带之后，继续向东推进，进入了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区。希腊从一开始就让人明白，他们此次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临时占领，而是为了永久性地吞并，是为了把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并入一个拥有爱琴海两岸的大希腊，重新恢复君士坦丁堡希腊东正教帝国过去的辉煌。希腊人的这种伟大理想对于奥斯曼帝国具有最终威胁，是所有的有识之士都能看到的。

把其他各民族居住的遥远省份割让出去，倒还可以忍受，甚至帝国的京城被人占领也还可以容忍，因为占领者是作为胜利者一方的不可战胜的西方大国，同时这些军队迟早总会退回到他们的国家去。但是一个帝国的邻邦，一个过去的附庸民族，突然地冲进了帝国的心脏地带，这实在是一种忍无可忍的危险和耻辱。这样，压在奥斯曼帝国民众心灵上的忿怒，终于燃烧了起来，变成了无法

扑灭的烈火。在帝国首都，他们不顾占领军机枪大炮的威胁，举行大型的抗议集会，并且第一次着手进行秘密的抵抗运动。在安纳托利亚的厄代米什地区，少数的帝国军队甚至与希腊军队发生了遭遇战，虽然未能阻止希腊军队的前进，但在希腊军队行进的沿线，广大民众到处都展开了游击战。

为了组织民族抵抗武装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凯末尔与志同道合的富阿德将军、劳夫及雷费特上校等人多次举行秘密军事会议，商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办法。不久，凯末尔又向国内的一些军政当局发出一封用密码拍发的通电，借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通电的开头语是："1. 国家完整，民族独立，正处于危险之中。2. 中央政府已无力履行所承担的责任。因此，应该认为国家已不复存在。3. 惟有民族的意志及决心，有能力挽救民族的独立。"这些慷慨陈词，为此后数年间的奥斯曼帝国国民政治纲领定下了基调。

凯末尔等人进行活动的消息传到帝国首都之后，爱国人士感到欢欣，深受鼓舞，而卖国求荣的素丹政府却感到万分惊恐。陆军大臣要求凯末尔立即返回首都，并得到他拒不遵命后，便以素丹的名义发出一道终止凯末尔军职任命的敕令。为了竭力避免过早地发生任何公开背叛合法素丹政府的行为，凯末尔毅然辞去了所有的军职，换上了便装，转而参加了 1919 年 3 月 3 日成立于埃尔祖鲁姆的东安纳托利亚保卫权利协会。这个政治组织，后来在埃尔祖鲁姆地区按照合法手续正式登记，从而为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合法性，成为以后同素丹政府以及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进行斗争的重要政治工具。

1919 年 7 月 23 日，由东安纳托利亚保卫权利协会发起召开

的东部各省代表大会，在埃尔祖鲁姆开幕，凯末尔在第一天就被定为大会主席，会议开了 20 多天。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就，是起草了一项后来被称为国民公约宣言的初稿。会议并且宣布，在必要时它有成为奥斯曼帝国临时政府的权利。9 月 4 日，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参加的更为重要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瑟瓦斯正式开幕，凯末尔再度当选为大会主席，并亲自指导大会的讨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要把埃尔祖鲁姆会议的政治成果扩大到全国范围，并通过决议，成立了奥斯曼帝国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安纳托利亚和隆美利亚保卫权利协会"，下面设立一个以凯末尔为首的常任代表委员会，直接领导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爱国革命者的游说和压力下，奥斯曼帝国举行了成立新帝国议会的选举。1920 年 1 月 20 日，新议会正式在帝国首都开幕，民族主义分子及其同情者取得了新议会中的大多数。凯末尔由于感到去首都有危险，所以便留在了安卡拉。两周以后，新议会表决通过了以埃尔祖鲁姆和瑟瓦斯宣言为基础的国民公约，从而确立了关于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基本政治要求。随着奥斯曼帝国民族革命形势的高涨，在首都的爱国者们这时变得更加活跃起来，他们不仅在舆论上广泛支持凯末尔和全国保护权利协会，而且还袭击了协约国军队的军械库，把夺获的战利品送往安纳托利亚全国保护权利协会所在地。这一切都震惊了协约国占领军，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应付措施。首先迫使大维齐里扎将军辞职，由敌视民族解放运动的海军大臣萨利赫接任他的职位，并派协约国军队开入首都奥斯曼人居住区，逮捕全国保护权利协会成员及其同情分子。当时被捕的知名人士共计有 150 人左右，其中还有不少议会议员，都一律被关押在马耳他岛，他们这些人，直到 1921 年下

半年同在安纳托利亚被民族革命派捉住，并作为人质扣留下来的英国军官实行交换时，才获得释放。

1920 年 3 月 18 日，在首都奥斯曼帝国新议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一项抗议逮捕国会议员的决议后，宣布无限期的休会。同年的 4 月 11 日，经素丹同意予以解散。此时的形势急转直下，因此，在议会宣布休会的第二天，忧心如焚的凯末尔立即发表声明，要求举行选举，以便成立一个新的紧急大会。在凯末尔的亲自主持下，紧急大会自 1920 年 4 月 18 日，在已经成为“代表委员会”所在地的安卡拉举行。一时间，这个风景如画的安纳托利亚小山城，变成了奥斯曼帝国民族抵抗运动的大本营，变成了奥斯曼帝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实际首都。

协约国军队的这次镇压行动与上次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一样，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一次新的推动和促进，使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转化成了一个有效的独立政府。1920 年 4 月 23 日，一批被称为大国民会议的代表，在安卡拉举行了正式会议，选举了大国民议会政府，这一天从此就成了以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庆日，也叫做儿童和国家主权日。大国民议会政府并没有宣布废黜素丹，只是声明由于素丹是协约国的俘虏，所以只有大国民议会政府才代表国家。第二天凯末尔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并主持了部长会议。1921 年 1 月大国民议会颁布的法律把这一组织具体化了，法律宣布主权无条件属于国家，这个国家现在第一次被正式称为“土耳其”。

1920 年 4 月 28 日，素丹再度召回反动透顶的外国侵略者的走狗费里德为大维齐，并且成立了讨伐民族革命派的讨逆军，任命长期以来一直同民族革命派为敌的安扎费尔为总司令，开始向民

族革命派发动新的猛烈攻击。此外，伊斯兰教教长埃芬迪也发布了一道通令，宣称遵照哈里发的命令和宗教义务，要杀死所有的叛逆者。5月11日，经帝国首都军事法庭的缺席审判，郑重其事地宣布凯末尔等其他民族革命派领导人死刑。此时的素丹和他的政府，正在准备利用宗教、政治、军事等一切手段，向在安纳托利亚的民族抵抗运动大本营，发动他们最为猛烈的进攻。这些行动使得安卡拉政府与素丹政府之间几乎不可能再有任何和解。此时，形势的发展对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越来越十分不利，陷入了被反动武装四面包围的困境，他们既要抵抗装备精良、来势汹汹的素丹军队，又要时刻提防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军队的武装干涉。从民族革命派本身来说，关键性的问题，主要是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统一指挥的正规军。虽然在镇压反叛和粹碎素丹军队进攻的战斗中，游击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战斗中，游击队也表现得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但是，分散不统一的游击队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和组织指挥系统完备的西方列强侵略军面前，却处处表现出了劣势和被动。不过，到了1920年下半年，整个形势的发展开始变得对民族革命派越来越有利。在西方，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终于为处理奥斯曼帝国、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病夫留在人世间的财产作出了最后的安排。经过在伦敦和圣雷莫一系列幕后的肮脏交易与喋喋不休的争吵之后，他们起草了一份条约。1920年8月10日，在色佛尔由协约国与帝国素丹政府双方的代表在上面签了字。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色佛尔条约》是一个内容非常苛刻、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奥斯曼帝国将支离破碎，陷入绝境，变成了一个有形无实的国家，仅能依靠吞并了它最富庶地区的那些西方列强的怜悯和宽容来生存，这

比强加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的条约还要更加严厉得多。因此,《色佛尔条约》的签订,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引起了广大民众对于接受这项条约的素丹政府的极大反感,并把签订条约的那一天定为国耻日。凯末尔代表安卡拉革命大本营发表声明,坚决拒绝接受该项条约。

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共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凯末尔率领游击队在阿达纳、腊代加和济安普特等地,曾经有效地阻止过法国侵略军,使他们没有能够越过雷池半步。然而,在著名的安特鲁战斗中,由于游击队在人数与武器装备上都远远不及敌方,虽然经过了十个多月的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遭到惨败,几乎丧失了全部人马和武器装备。军事上的失败并没有使凯末尔沮丧、绝望,他以一个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很快地找出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就是政治纲领确定之后,亟需建立一支纪律严明,指挥统一,英勇善战,能够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主力军的正规部队。凯末尔为了建立这支正规部队,与他的助手们到处招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他过去的许多老部下、老战友也纷纷脱离素丹政府率领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数万人参加了新组建的国民军。

1921 年,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战争的初期,同样还是外国侵略军占据了上风。新组建的国民军仓促应战,处处被动挨打,形势十分严峻。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和人员所遭受的重大伤亡,时常使凯末尔彻夜难眠,甚至心存退意。有些重要的领导人也建议凯末尔与素丹政府妥协,接受协约国的条约。经过数日痛苦的反思,他觉得妥协与退让,只能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被瓜分,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只

能殊死一战，决不能仅顾虑个人的荣辱安危。”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凯末尔慷慨激昂地对他的部下说道。

凯末尔决定重振旗鼓，发动民众。一方面利用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同部分国家签订友好条约，让他们停止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干涉，承认安卡拉民族革命派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争取苏俄政府在经济上、军事上的支持，使奥斯曼帝国有一个安定可靠的后方。此外，由农民为主体组建的国民军，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青年人纷纷参军入伍，老人和妇女们帮助士兵们挖战壕、修工事、护伤员、运枪弹，把水和粮食运到了前沿阵地。广大民众这种忘我的精神和全力以赴的支援，使凯末尔深受感动，更坚定了他与外国侵略者血战到底的信念。

1921 年夏天，希腊侵略军在英国军事顾问的指军和英国军队大炮、坦克的火力支援下，由国王君士坦丁统帅，气势汹汹地向国民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8 月，希腊侵略军兵临安卡拉城下。在希腊侵略军得意忘形之际，凯末尔对希腊侵略军速战速决，急于攻占奥斯曼帝国民族革命派大本营安卡拉的战略计划，决定采取稳定后方，迂回作战和突破重点的作战方针，抓住有利战机，志在必得，同希腊侵略军展开了一场事关奥斯曼帝国民族前途命运的大决战。为了给大决战作好充分准备，凯末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平定了素丹军队的武装围剿，消除了肘腋之患，并重新调兵遣将，迅速分割包围了希腊侵略军。1921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3 日，在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援下，在凯末尔卓越的指挥下，国民军发动了为时 20 天的“萨卡里亚战役”。在战斗中，国民军前仆后继，英勇杀敌，数度攻占敌军阵地，而希腊侵略军凶悍善战，又几次反攻击退了国民军的进攻，战场被一片冲天的火海所吞噬，双方都付

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一次夜间作战中，亲临前线阵地指挥的凯末尔不幸被流弹打断了一条肋骨，用绷带包扎好以后，他又继续指挥战斗。在凯末尔大无畏精神的鼓舞下，国民军士气大振，越战越勇，而此时的敌军已成惊弓之鸟，在国民军的追杀下，希腊侵略军大部分被歼灭，少数溃逃到萨卡里亚河西畔。这是一场关系到奥斯曼帝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决战的结果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奠定了凯末尔以后的辉煌业绩，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胜利，表彰凯末尔的功勋，奥斯曼帝国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以“加兹”称号，意思是“圣战的胜利者”，并晋升他为国民军元帅。

“萨卡里亚战役”的胜利，不但改变了战场上国民军长期处于劣势的状态，而且还促使协约国集团内部出现了分化。在这次战役结束后的一个多月，法国首先同奥斯曼帝国民族革命派政府签订了和约，并撤出了自己的军队。意大利也停止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干涉，同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此时的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武装干涉完全陷入了一种孤立的状态，只有它的小伙伴希腊侵略军在奥斯曼帝国维持着被动的军事局面。此时国民军的人数和武器装备，与希腊侵略军几乎相等。虽然在飞机、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方面的数量，希腊侵略军略占优势，但国民军却有强大的骑兵，并且通过苏俄的大力援助，获得了许多重型的远射程大炮，从而为大部队的全面反攻和轰攻拔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国民军斗志昂扬，充满必胜的信心，而希腊侵略军却由于内部意见不和，加上国内政权和决策的不断变化，导致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雄韬武略的凯末尔决定集中主力部队，首先攻击希腊侵略军一翼，击溃并消灭其主力，然后分路包抄歼灭其他侵略军。1922 年 8 月 25 日，凯末尔在前

沿总指挥部下达了立即出击的紧急命令。发起总攻的国民军，如同离弦之箭冲入希腊侵略军的阵地，所向披靡。在国民军猛烈地攻击下，敌军无法抵挡，纷纷弃城而逃或投降。因此，第二天傍晚，国民军便占领了不堪一击的希腊侵略军的大量阵地，俘虏敌军数万人，缴获武器弹药不计其数。在佩纳忠地区进行的最后战役中，希腊侵略军新任总司令特里席皮斯将军被俘，人们风趣地把这次战役戏称为“总司令战役”。

1922年9月9日，威武雄壮的国民军，迈着矫健的步伐，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进入了长期被协约国军队占领的军事战略重镇伊兹密尔。同时，协约国要求与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政府谈判。然而，当凯末尔到达谈判地点时，并无诚意的协约国无一名代表在场。凯末尔随即发表了《军队从地中海向全国致敬》的宣言，并发出命令：“全军将士们，你们的目标是爱琴海，前进！”此时的外国侵略军，在国民军的乘胜追击下，不堪一击。不久，安纳托利亚境内的侵略军全部被歼灭，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所有失地，至此全部得到了恢复。在以后的时间里，英国政府为了避免与奥斯曼帝国民族革命派政权的武装冲突，于1922年10月11日，同安卡拉民族革命政府签订了新的停战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各协约国政府同意把伊斯坦布尔、海峡地区以及东色雷斯的主权交还给奥斯曼人，并同意召开一次和会，废除《色佛尔条约》，缔结一项新的和约。至此，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奥斯曼帝国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西方列强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从1920年国难当头时起，铺放在奥斯曼帝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桌子上作为哀悼标志的黑色桌布，这时被取了下来，而象征着胜利与和平的绿色桌布，被平整地铺设在了主

席团的桌面上。

和平会议于 1922 年 11 月 20 日在瑞士的洛桑召开。经过随后许多个月的艰苦谈判和外交争执,终于在 1923 年 7 月 24 日双方签订了正式和约。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这项条约最主要的意义,是重新确定了奥斯曼人对于几乎包含今天整个土耳其共和国在内的全部领土所拥有的完全和不可分割的主权。在这同时,还废除了长期以来象征着卑劣和屈从,因而引起人们深恶痛绝的治外法权条约。正因为如此,在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个战败国中,奥斯曼帝国是后来惟一不愿意修正和约的国家。

第三章　土耳其共和国的内政外交

一、凯末尔领导下的社会变革

共和国之父凯末尔

在历史上，每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总会涌现出许许多多治世奇才和英雄豪杰。凯末尔就是这样一位在奥斯曼帝国近现代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不但在最后的历史关头把奥斯曼帝国从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命运中拯救出来，而且通过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实行一系列以政教分离为宗旨的世俗化社会改革，最终把一个多民族军事联合体的帝国，演变成为一个民族性的现代国家，把一个具有伊斯兰性质的君主神权国家，演变成为一个立宪民主共和国，把一种官僚封建主义，演变成为一种现代资本主义，被人们称誉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父。

1881 年的春天，凯末尔诞生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美丽的爱琴海城市萨洛尼卡的一个中等木材商家庭，凯末尔的祖父是萨洛尼卡地方的一名小学教员，父亲阿里·李査曾经是一名帝国政府海关的低级官员。在凯末尔童年时代，奥斯曼帝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国家。以素丹为首的专制统治集团的无能和卖国，奥斯曼民族的屈辱，外国人的跋扈，这时期在整个奥斯曼帝国表露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动乱冲垮了他的家庭赖以为生的木材生意，父亲经受不住这个打击，在凯末尔7岁那年，不幸身染重病，虽多方求医，耗尽了家中的大量钱财，但终因病情太重，不久离开了人世。社会的动荡，家庭环境的险恶，都在凯末尔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凯末尔从小酷爱军事，似乎对军事有着一种天生的悟性。12岁那年，他违背母亲的意愿，偷偷考入了萨洛尼卡的一所军事中等学校。在军校学习期间，除军事课程以外，他对数学、化学、历史、文学也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立下宏愿，要读尽天下的好书，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自己学习的楷模，长大后成为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才。以后，随着眼界的开阔，阅历的增长，新思想的冲击，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干练，从而为日后的政治军事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895年，凯末尔在萨洛尼卡军事中等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后，升入玛纳斯提尔军事预备学校。他在这所学校不仅表现出数学课程成绩优异，而且外语与化学等课程都获得优良的成绩。凯末尔的远大抱负与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得到了校长与教师们的一致好评。从玛纳斯提尔军事预备学校毕业后，1899年，凯末尔进入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学习步兵。不久，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崭露头角，深得有关部门的赏识，所以又让他改学军事参谋专业。1905年1月毕业，被授予陆军上尉军衔。

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学习期间，正巧也是奥斯曼帝国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黑暗专制统治最严厉的年代，而陆军大学又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境内秘密反抗素丹专制统治的主要中心之

一。学员们不顾学校当局采取的一切纪律性措施,依然偷偷地在宿舍里阅读青年土耳其党流亡分子的著作,并且就国家的弊病及其挽救之术相互交换着意见。起初,凯末尔对社会政治问题不予过问,在学校里是埋头读书,很少关心与军事无关的一些事情,担心因违纪而被开除,失去当军官报效国家的机会。但是不久,奥斯曼帝国的软弱,社会的不公正以及西方列强外交官的飞扬跋扈、傲慢无礼的现状,都在凯末尔的脑海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凯末尔一面刻苦学习,一面思虑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社会的黑暗与人民的痛苦,时常使他冥思苦想通宵达旦,不能合眼。他逐渐地抛弃了政治的天真,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了青年军官中的政治活动,最终加入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组织,成为了一名反对素丹血腥专制统治的坚定革命者。1905年,当凯末尔即将得到毕业证书时,由于他积极参与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政治活动,终于不可避免地被人告发,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被捕,关在皇宫里面拘押犯人的地方。经过长时间的审讯,毫无结果,帝国政府就把凯末尔和他的几位密友一起放逐到大马士革的第五军团去服兵役。大马士革是当时奥斯曼帝国国内外各种社会矛盾的集合点之一,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这里表露得最为激烈。帝国政府在那里派驻重兵,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凯末尔到达第五军团以后,曾经在叙利亚各地到处游览,亲眼目睹到素丹专制统治下无能腐败的社会现状,以及人民大众受苦受难的悲惨情景,为了把帝国从素丹专制残暴的统治下拯救出来,在这里,凯末尔又把在军校学习期间开展的革命活动恢复了起来。他和四位最可靠的战友,在大马士革成立起“祖国与自由协会”的

秘密政治组织，并通过这一革命组织同许多朋友们建立起了联系，团结更多的人们参加革命活动。1907 年，凯末尔被晋升为少校，调往马其顿的第三军团任职，开始了他战功卓著，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随后，他同青年土耳其党的秘密政治组织同盟进步委员会取得了联系，并积极参加他们的革命活动。然而，这一时期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恩维尔等，刚愎自用，爱好虚荣，嫉贤妒能，排斥异己。他们并没有重用像凯末尔这样一些革命品质坚强，非常有才干的青年军官。因此，在奥斯曼帝国著名的 1908 年革命中，没有使凯末尔显露头角。

1908 年的奥斯曼帝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因青年土耳其人的政治纲领，只能满足于帝国宪法的恢复和暴君的下台，国家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进步，革命的发展趋势与凯末尔的想法和政治信仰相冲突，为此，凯末尔十分不满，他很快脱离了青年土耳其党，一度放弃政治而专心致力于军事。他曾经先后翻译并发表了德国著名将军李兹曼的步兵排战斗操典和步兵连战斗操典，使受训的官兵颇有收益，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崭露头角。1910 年，凯末尔第一次访问欧洲，参加了当年在皮卡尔迪举行的法军军事大演习，亲眼看到了欧洲经济上的繁荣和军事上的强大，接触和学习到了许多欧洲的新思想，以及先进的军事科学。并通过对比，对奥斯曼帝国国势衰微、政治腐败、民众疾苦有了进一步较深刻的认识，这段经历对凯末尔日后树立治国平天下的雄心有着很大的影响。此后，在奥斯曼帝国对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的战争，凯末尔亲率他指挥的部队奔赴前线，总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屡建奇功。他的所作所为与军事才能，深得上级的赏识。不久，他就被上级任命担任大大超越他军衔的军事指挥职务。他当时仅只是一名少校军衔

的副官,可是上级却命令他统率一个团的军队。由于凯末尔任人唯贤,不拘一格,为人宽厚,善待士兵,使得上下左右齐声交口称赞,深受广大官兵的衷心爱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国际形势洞察敏锐的凯末尔预见到，不管奥斯曼帝国的同盟者德国是否获胜，等待奥斯曼帝国的都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凯末尔曾经多次给最高军事当局建议，竭力反对把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同德国拴在一起，反对听任德国摆布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但是，对德国人言听计从，希望依靠德国的武力，建立以奥斯曼王室为首的突厥民族大帝国的最高政府当局，充耳不闻，听之任之，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凯末尔的劝告和批评。1911 年，急公好义，疾恶如仇的凯末尔被调离帝国的首都。在此后令人惴惴不安的和平年代里，他任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武官。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成为以德国为首的同盟集团成员之一。1915 年初，由于凯末尔本人的恳切请求和大声疾呼，不久，被帝国政府召回国内参加战争，奉命统率当时在马尔马拉海欧洲沿岸泰基尔达地区正着手建立的几乎属于空想的第 19 师。随后，踌躇满志的凯末尔率领他的军队由泰基尔达奔赴加利波利半岛前线。一时间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奥斯曼帝国境内社会动荡，人心彷徨不安，到处笼罩着悲观的情绪。凯末尔感到救国家与民族于水火之中，是一名军人责无旁贷的崇高天职。他到达前线后，亲临阵地视察，关心士兵的疾苦，人们对他充满了尊敬。

凯末尔经过周密、细致的研究部署之后,率领军队顽强地抵挡住了英国军队强大的攻势,成功地保住了达达尼尔海峡,为扭转整

个不利战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达达尼尔海峡保卫战的辉煌胜利，虽然一方面给凯末尔带来了晋升和荣誉，使他赢得了“伊斯坦布尔大救星”的美称，但另一方面也遭到了帝国政府最高军事长官恩维尔的嫉妒和猜疑。不久，凯末尔被调往距离帝国首都数百公里以外遥远的东部前线执行一项任务，因为恩维尔认为，如果把凯末尔这样一位家喻户晓、光彩夺目的民族英雄留在帝国京城，总不免会过于引人注目，使他相形见绌。

1916年2月27日，凯末尔受命正式接任在迪亚尔巴克尔地方的一项军职，并被授予将军军衔。在同俄国人进行了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之后，他为奥斯曼帝国夺回了比特利斯和穆什等许多地方，同时也为他自己赢得了新的荣誉。1917年7月，凯末尔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帝国第七军军长。他曾经竭力地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军政府的轻率进攻战略，相反，他多次强调守卫国土和奥斯曼帝国人力与物力的必要性。他同时反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主义，认为那是幻想。他相信西方化，私下认为伊斯兰教在许多方面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他的思想比他的同事们更加世俗化。因此，可以这样公正地说，如果他早先还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现实主义和独立意识也足以使他成为这样的历史人物。

1918年初，体弱多病，长年卧床不起的奥斯曼帝国素丹病故，由皇太子瓦希代丁继位。因瓦希代丁对具有超人精神和具有独创军事才能的凯末尔颇有好感，所以委任他为驻战略重地叙利亚的第七军团总司令。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整个战局不断恶化。装备精良的英国与法国军队已马不停蹄地向奥斯曼帝国军队与德国军队发动强大的进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帝国与德国联军赶出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广大地区，到处传来奥斯曼

帝国军队败如山倒的噩耗，奥斯曼帝国的许多重要城镇纷纷陷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军队的铁蹄之下。

尽管凯末尔指挥自己的军团，在撤退下来的其他各军团的协助下，经过周密筹划，组织了多次卓有成效的反攻，并在哈来卜北部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打垮了法国军队，后又腾出手来有效地阻止住了英国军队的进攻，获得了局部战役的胜利。特别是凯末尔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果断地命令手下虎将伊斯梅特上校率其部强渡沙姆特斯河，将英军退路切断，准备在勒阿颇以北地区同英国进行最后一场殊死之战，发誓要雪洗民族之耻。然而，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巨人气数已尽，在军事上彻底被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击垮，再也完全无力进行抵抗了。

1918 年 10 月 3 日，奥斯曼帝国正式在摩德洛斯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停战协定规定，德国元帅应从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离开，而任命凯末尔担任奥斯曼帝国最精锐的部队、闪电集团军总司令。但是，在两个星期之后，精锐的闪电集团军被帝国政府勒令解散，凯末尔本人也被召返回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1918 年 11 月 30 日，当凯末尔抵达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天，也正是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庞大舰队开到伊斯坦布尔的同一天。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惨败，使得凯末尔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暗中发誓一定要雪洗民族之耻。

返回帝国首都后的凯末尔很少抛头露面，曾经引起许多人的猜疑。凯末尔时常一个人默默无语，感觉到这眼前的世界变得很茫然。在等候、期盼和焦虑之中，阴郁地度过了一段归隐生活。但是，就在凯末尔归隐期间，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贪得无厌的疯狂瓜分，以及素丹王朝的摇摇欲坠，为凯末尔日后在政治上、军事上

的东山再起，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早在摩德洛斯停战协定签字之前，凯末尔就给帝国政府发去电报，陈述奥斯曼帝国对敌人无条件限制的投降，是极其危险的。然而，软弱无能的帝国政府仍然在丧权辱国的摩德洛斯协定上签了字，宣布奥斯曼帝国无条件的投降。面对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虎视眈眈，迫不及待，试图在众目睽睽之下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狼子野心，凯末尔又含泪给帝国大维齐伊泽特将军发去一份电报，再次指出，如果帝国政府未对停战协定条款其错误之处加以争辩修改之前，就将解散本国军队，敌人必然要随意长驱直入侵占许多地方，奥斯曼民族必将陷入灭顶之灾。但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摇摇欲坠，满朝的皇戚贵族都吓得魂飞魄散，一心只想妥协求存，如何苟延残喘，根本就听不进去凯末尔的建议和忠告。因此，凯末尔私下将其部属的军队尽可能地悄悄转移到托罗斯山脉以北的广大地区，并把余存的武器和阵地设施，采取发给奥斯曼帝国南部各省民众收藏等必要措施。凯末尔的这些必要措施，在后来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为取得安太普、乌尔法、马拉斯等保卫战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条件。

尽管凯末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硕果仅存的胜利将军而声誉昭著，但他要想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组织领导民族抵抗运动，挽救危难的国家民族，却很难有所作为。素丹及其帮凶拼命地反对所有一切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奥斯曼帝国的不幸遭遇，都是民族主义所带来的。他们对外国侵略者提出的任何无理要求都惟命是从，根本就没有一点骨气和反抗精神，陷于一种极端恐惧的状态之中。素丹政府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阻止任何群众性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运动，害怕这类运动不仅将会威胁外国侵略者的利

益，而且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他们一方面继续遣散奥斯曼帝国军队，但另一方面却听任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军队一再违犯休战条款。素丹政府命令在伊兹密尔的帝国军队不得对希腊侵略军进行抵抗，并对京城内任何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抗议活动一律采取严厉的镇压。此时的凯末尔已经敏锐地体察到卖国求荣的奥斯曼帝国素丹政府已经完全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成了声名狼藉的外国侵略者代理人和人民公敌。面对越来越险峻的形势，凯末尔决心离开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依然到奥斯曼帝国当时民族主义运动非常活跃的安纳托利亚去。那里成立了全国第一批民族主义抵抗运动团体，即“保卫权利协会”，这个团体后来又相继出现于奥斯曼帝国的全国各地，并且为各个受到外国侵略者威胁或被外国侵略者占领地区的民族主义抵抗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凯末尔虽然早就有离开外国侵略者所占领的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想法，但最终到达安纳托利亚参加组织领导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却完全是处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1919 年初，行将崩溃的多民族军事联合体的奥斯曼帝国，到处都是各族人民的反抗，尤其是在黑海地区由希腊人组织的武装游击队的活动非常活跃，对素丹政府在那一地区的统治威胁极大。素丹政府为了彻底消灭这些由希腊人操纵指挥的游击队，想起了起用声誉昭著，骁勇善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凯末尔，任命他为驻防在安纳托利亚黑海沿岸的萨姆松地区的奥斯曼帝国第九军团军民联合检阅使，全权负责这一地区的军政大事，成为了一名掌握如此重要职权的领导人。虽然当时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政府领导人，对具有爱国热情与军事才能的凯末尔的这一任命持怀疑态度，但素丹政府为了

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也只能起用像凯末尔这样的人才，所以仍然坚持这项任命。最后，1919 年 5 月 16 日，凯末尔登上了邦德玛号轮船，离开了使人窒息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前往奥斯曼帝国当时的民族抵抗运动中心安纳托利亚，并在那里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最终成为奥斯曼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政治体制改革

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摆在凯末尔及其拥护者面前有几种选择。他们可以乘胜长驱直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占领奥斯曼帝国失去的亚洲领土，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凯末尔还可以登上素丹和哈里发的宝座，维持封建神权专制的国家形式。但是，凯末尔是一位头脑清醒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政治家，他认为这种扩张主义违背了民族意愿，增加了敌人的力量，不如回到自然合理的限度中去，坚持和平共处的睦邻友好关系。战事一停，为了使奥斯曼帝国和希腊摆脱令人头痛的少数民族问题，凯末尔首先同希腊达成了交换人口的协定，不惜采用残忍但十分有效的交换人口的办法，解决了奥斯曼帝国与希腊之间从古到今的民族纠纷，在以后的几年中确实使两国易于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此外，凯末尔宣布放弃一切对外野心和一切形式的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意地把自己的行动和意愿限制在洛桑和平条约所规定的奥斯曼民族领土的范围之内，并把他的后半生贡献给了艰苦、费力而不引人注目的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1923 年，凯末尔在一次精彩的演说中提醒奥斯曼人民："至今我们的军队已经取得的胜利，不能被认为已经能够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得救了。这些胜利，仅仅只是为我们将来的胜利奠定了

基础。我们不应该为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而感到自豪，我们还应该更多地为取得科学与经济方面的新胜利而作好准备。”

一旦挣脱了奥斯曼帝国桎梏和卸下额外领土这副重担，去实施凯末尔他那世俗主义的理想，使奥斯曼帝国完全接受西方文明，从而推动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改革便不难进行。改革之所以比较容易进行，还因为奥斯曼帝国经过几代改革家们承前启后的不断努力，此时已经培植出一种改革的传统和社会发展方向，这种方向便是全面学习西方的制度、思想和习俗。虽然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和伊斯兰教古老的信仰、仪式和习惯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有的已经被改造，更多的则是面临能否存在下去的挑战。这种新老体制的共存，时常造成人们的精神痛苦。

凯末尔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军事家，而且也是一位胸怀大志向，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社会改革家。从奥斯曼帝国几百年来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凯末尔判断，要想巩固他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掌握奥斯曼帝国未来的发展命运，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迫在眉睫的政治体制问题，即奥斯曼帝国的形式与结构问题。

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从一开始便坚持他们是忠于素丹的，君主之所以反对他们的正义事业，那是由于听信了馋言和受到外国人控制的缘故。但是这些原则，从奥斯曼帝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长远的目标来看，又是同保留素丹君主制相矛盾的。早在1920年7月，凯末尔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向安卡拉民族革命派大国民议会宣布：“我想，使我们今天能够存在的这个基本现实，已经显示出我们民族总的发展趋势，那就是民族主义和人民政府。这意味着政府正在转向人民的手里。”此后，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凯

末尔一直宣扬这种观点。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奥斯曼帝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是封建神权的专制制度，即王权（素丹）和教权（哈里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素丹既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又是宗教的最高领袖。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于 1517 年征服阿拉伯的哈里发末代王朝统治的埃及以后，又给自己加上了哈里发的尊号，因而素丹又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最高领袖。这两个融为一体，形成了奥斯曼帝国封建神权君主专制制度，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促使凯末尔下决心从此一劳永逸地结束奥斯曼帝国君主的政治权力，把它同哈里发制分离开来的原因，是因为在召开瑞士的洛桑和会之前，协约国同时向安卡拉的民族主义政府和伊斯坦布尔的素丹政府发出正式邀请。而这种双重邀请，对在这紧要关头由于这一邀请而展示出来的国家权力行将分裂的前景，不得不使凯末尔下决心要彻底废除素丹制。凯末尔在进行重大政府改革时，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魄力和灵活的策略。他分两步来进行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先废除素丹制，后废除哈里发制，以解决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老大难问题。然而，当时凯末尔将要进行的这项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不仅封建神权专制的维护者们坚决反对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遭受到凯末尔的许多忠于传统制度思想极深的亲密同事和一些大国民议会议员们的反对。

当凯末尔决心一劳永逸地结束奥斯曼帝国封建君主政治权力的时候，他曾经向一些最亲近的同僚征求意见，结果却发现他们仍然对素丹表示忠诚。例如，凯末尔在问起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他的最亲密战友劳夫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时，后者回答说："在良心上

和感情上，我是离不开素丹和哈里发的，我有责任继续对君主保持忠诚，我对哈里发的爱戴，是我所受教育的结果"。劳夫用严肃的口吻继续说道："废除素丹和哈里发，而另设其他性质的官职来代表，将会造成失败和灾难，这是千万做不得的。"当时坐在凯末尔身边的许多亲密战友也都表示同意，并且还说："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除素丹制和哈里发制以外还有其他形式的政府。"

然而，凯末尔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得出了与他的那些亲密战友不同的结论。在他看来，素丹和哈里发由于在奥斯曼帝国民族解放战争中同外国势力相勾结，所以已经被弄得声名狼藉，威信扫地，成为过去的东西了。而民族革命派在战争中建立了崇高的威望，并且手中有强大的军队作后盾，所以逐步废除素丹和哈里发的时机已经成熟。特别是当协约国一方面同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政府签订和约，另一方面又顽固地继续坚持承认素丹政府，这种别有用心的双重承认，企图使国家政权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促使凯末尔更加坚定了废除素丹和哈里发。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凯末尔决定把素丹和哈里发这两个职位分开，并先废除前者，从此将不再有素丹，而只有一位奥斯曼王子来担任哈里发的职位，他仅拥有宗教权力，而没有政治权力。凯末尔希望通过这项折衷办法来瓦解宗教分子对于政治变革的反对，来保持一个超越国家政治之上的合法宗教权威所具有的优点，同时又结束了素丹的个人专制。1922 年 11 月 1 日，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包含两项条款的决议。第一项条款宣布："奥斯曼帝国的人民认为，在伊斯坦布尔的那种依靠个人统治形式的政府，已不复存在，至此，已经永远成为历史。"第二项条款承认哈里发职位应属于奥斯曼王室，但规定哈里发只能依靠国家而存在，

并应由大国民议会遴选奥斯曼王室中最属品学兼优的分子充任。同年11月16日，大国民议会又决定，以勾结英国的叛国罪，将把素丹及主要大臣交付国家最高法庭审判。素丹穆罕默德四世11月17日得到消息之后，见大势不妙，还没有等候大国民议会来评定他是否品学兼优，便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带着他那不满10岁的幼子，仓皇从王宫侧门逃出，登上英国军舰逃离了奥斯曼帝国。留传了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素丹制，随着这位最后一代素丹的逃亡而一去不复存在。不久，素丹穆罕默德四世的堂弟麦吉德被选为新的哈里发。然而，此时的哈里发制，也随着素丹制的灭亡而形影相吊，摇摇欲坠了。

凯末尔在终于办完了奥斯曼帝国素丹制的丧礼之后，又开始为下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好了准备。他首先需要一个政治工具。虽然保卫权利协会曾经在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作了许多工作，但它却满足不了一个享有和平与独立国家的需要。凯末尔这时着手把它改变成为一个在现代政治体制运作中的真正政党。凯末尔经过走访全国各地，同国内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交换了意见，并在他的领导下，1923年8月9日，一个叫做人民共和党的新政党宣布成立，凯末尔担任该党主席，它是这一时期国家中的惟一政党。与此同时，凯末尔另外又准备进行着一项甚至更加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在1923年10月29日，正式宣布定都安卡拉，其次是宣布共和。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经过许多小时的激烈辩论之后，当天晚上8时30分，成立共和国的决议案以158票获得了通过。投票时，虽然有许多人投了弃权票，但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15分钟之后，也就是在8时45分，大国民议会一致选出凯末尔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命他的

亲密战友伊斯梅特·伊诺努将军为他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同一天晚上，在全国各地发布了这项消息，午夜后，全国各地都鸣炮一百零一响以示庆祝。定都安卡拉和宣布共和，凯末尔的每个行动都象征着进一步割断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联系，以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并不是所有过去奥斯曼帝国的臣民都能以同样的历史现实主义眼光看待时事的发展。在许多地方，宣布共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认为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在一些地方，它给人们带来了震惊和悲伤，以及对于未来的无限忧虑。对于国内的保守派分子来说，他们之所以反对共和，主要是认为它危及民众同自己的伊斯兰过去，以及与自己帝国过去的联系，同时也危及他们同长期以来一直以他们为首的那个更大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联系。因此，传统的保守势力也就不可避免地全部都聚集到作为两重感情的活生生象征者哈里发本人的周围来了。哈里发麦吉德虽然也并不失为一个温和的具有学者风度的人，然而他却不惜使自己出来承担了一个很可能是反对土耳其共和国政治体制变革和凯末尔本人的精神领袖，并且他本人也试图把他在宗教上所起的作用扩大到国家政治上，不甘心充当徒有虚名的哈里发，因为他一度谈到"哈里发宝藏"。哈里发麦吉德在社会活动中模仿素丹的威严和奢华，并置大国民议会指令于不顾，除"穆斯林哈里发"的头衔外，还添加了"先知的哈里发"、"两圣地的侍从"、"阿布杜尔·阿齐兹之子"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他频繁接见以各种借口前来拜谒的人，并每周五到不同的清真寺参加聚礼，以扩大其影响。他还多次要求议会为他增加预算，维持他庞大的日常开支。哈里发麦吉德的所作所为遭到凯末尔在1924年1月的一次大国民议会上对他发出的

尖锐申斥:“哈里发在他的府内,特别是在他公开露面的时候,似乎还是按照他的先辈素丹们的那套办法在行事,我们不能为了保持礼貌和表明道理而牺牲土耳其共和国。哈里发必须确实弄清他是什么人,他的职务是什么,并且应该要知足。”

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凯末尔,从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判断出,政治体制改革仅废除素丹制是完全不够的,还必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最终解决哈里发的问题。他认为,废除素丹制而单单保留哈里发制,使得国家元首问题不明确,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论是在大国民议会里,以及其他的地方,许多人都认为哈里发便是合法的君主和国家元首,即一种立宪君主,特别是那些狂热的宗教维护者。

通过一段时间对局势的耐心观察,以及深思熟虑之后,凯末尔决心彻底解决作为封建神权精神支柱的哈里发制问题,从根本上消除国家政治制度中所存在着的各种模糊观念和混乱局面,不过,废除哈里发制要比废除素丹制困难得多,甚至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压力是来自各方面的,首先是宗教界的代表在大国民议会中公开声称:“议会应属于宗教,伊斯兰教就是一切”。1923 年 11 月 11 日,国内著名的一家报纸《塔宁报》的一篇社论反映了一般人的心理状态,它写道:“如果我们没有哈里发,奥斯曼连同它的 500 万或 1 000 万人口,将失去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并且在欧洲政界人士的心目中,我们将会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小国之列。

此外,哈里发制问题所引起的关注,远远超出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界,并且从各方面,特别是从印度接到了对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意图不安的询问。1923 年 11 月,印度什叶派穆斯林领袖阿加汗和阿米尔·阿里致函土耳其共和国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要求将哈

里发置于“能够获得各穆斯林国家的信任与尊敬，同时能够给予土耳其国家以特殊力量与尊严”的地位。这封信在送达伊斯梅特·伊诺努总理之前，伊斯坦布尔的报界已抢先全文发表。国内外反动宗教势力相勾结的这个信号，恰恰给废除哈里发制提供了最方便的口实。凯末尔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排除一切干扰，彻底废除哈里发制，对国内的伊斯兰教教权组织进行一次毁灭性打击，不再让他们妨碍他的以政教分离为宗旨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便完成一项惊天动地的历史伟业。他首先同人民共和党和中央政府内几位职位显赫的主要支持者达成协议，然后说服国内几家具有影响的大报编辑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哈里发制的舆论宣传运动，把它说成是影响奥斯曼民族社会进行的最大障碍，呼吁把伊斯兰教信仰从数世纪以来惯于充任政治工具的地位中拯救出来，使其得到纯洁与提高。

1924 年 3 月 3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开会讨论关于废除哈里发制的议案。在会上，司法部长赛伊德首先作了长篇发言，论述哈里发制的起源及其发展，说明这纯粹是民族的事，应服从时代的发展要求。此后，议员们投票通过了废除哈里发制的法案，并决定将所有奥斯曼王室成员驱逐出土耳其共和国国境。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神色慌张沮丧的麦吉德被装进一辆小汽车，前往火车站赶乘东方列车。至此，最后一位哈里发也随着最后一任素丹走上了流亡的道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的王朝帝国，在现代社会不断进步的冲击下终于归于灭亡。

世俗化的社会改革

为了使土耳其共和国与人民更加世俗化、民族化、现代化，在

国家日常社会生活中减少宗教色彩和伊斯兰教性质，凯末尔不断遵循以世俗化为核心的改革原则，在土耳其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凯末尔十分清楚，一个国家仅仅具有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外表是毫无价值的，如果土耳其要想立足于民族之林，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来彻底改变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凯末尔曾经对他的亲朋好友多次推心置腹地谈道："土耳其人民是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取得伟大成就的人民，只不过是由于他们中间的某些分子和力量的坏影响，以致走错了路，他们必须被重新引回到进步的道路上来，重新找到他们在文明国家大家庭中的地位。"凯末尔一生中两个最主要的信念便是："土耳其民族和进步"。这两者的未来又都有赖于文明，而对于他来说，文明又只能是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文明，此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

过去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一向鄙视劳动和商业，一向把发明才能视为异教者的幻术，一向惟武功是崇的社会。凯末尔变成一位文职总统后，他脱去了军服，戴上大礼帽，穿着晚礼服，出现在国人中间。作为社会象征大师的凯末尔，便是通过自己的这一新的形象，清楚地告诫他的国人，圣战中崇尚英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在促进国家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艰苦、平常而紧迫的任务中，发扬勤劳、技能和节俭等实实在在的文明时代已经到来了。有一次凯末尔在土耳其境内的一些地方视察，看到有些地方的老百姓仍戴着土耳其传统的费兹帽，穿着旧式的长袍，感到很不好看，很不文明。他在一系列的演讲中讥讽这样的服装是一种浪费，穿起来不舒服，是一种野蛮的表现，不配文明人使用。他气愤地说道："我看到在我面前有一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费兹帽，帽子上又盖了一块绿头巾，身上穿着一件长罩衫，外头又穿了一件像我这

样的上衣，我看不见他的下半截”。凯末尔喝了一口水，以质问的口气大声地讲道：“请问，这是什么一种装束？难道一个文明人会穿上这种荒唐的服装，跑到外面去使自己成为天下的笑料吗？”凯末尔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不久，土耳其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遵照凯末尔的指令，颁布了有关服饰改革的法律，结束了土耳其穆斯林以传统头饰为象征，表明自己忠于伊斯兰社会，拒不承认任何其他社会的可以看得见的外部标志。这种在服装方面的关门主义，凯末尔认为它影响了土耳其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得土耳其人民在实质上和形式上完全不能采取像当代文明社会所要求的那种生活方式，所以应该彻底地改变土耳其人民原始的东方式外观。

在改变传统服饰的同时，凯末尔还果断地改变了一些其他旧世界的传统象征物。在历史上，土耳其的财政日历，是结合了希腊式的月份与伊斯兰教教历的年份来制定的。虽然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改用了西方历法中的月份，但其年份仍然依照经过修订的伊斯兰教教历。1925 年 12 月 26 日，土耳其政府根据凯末尔的建议，废除了旧历，正式采用西方的历法和纪元。同时，还确定了以全世界通行的 24 小时国际时钟，作为土耳其国家惟一合法有效的计时方法。

在像土耳其这样一个文化传统负担过于沉重的国家里，社会改革的大师凯末尔也时常会遇到一些非常棘手、难以处理的问题，例如妇女的服饰。虽然凯末尔多次发表精彩演说，以他特有的俏皮语言对土耳其传统男人服饰给予抨击时，还一并对妇女戴面纱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言简意赅地说道：“在有些地方，我看到妇女用一块布或一块毛巾，或类似的东西盖在头上来遮住她们的

面部，还看到她们在遇到过路男人的时候，便转过身去或者伏在地上缩成一团。这种做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何道理?”一些群众大声喊到“愚昧！落后！”“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凯末尔继续演讲道：“各位先生，难道一个文明国家的母亲和女儿能够采取这种奇怪野蛮的姿势吗？这样丢丑的事情，把我们国家变成了大家的笑料，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得到纠正”。虽然在对待妇女戴面纱的问题上，凯末尔大声疾呼，严肃批评，但在世俗化的社会改革实践中，凯末尔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勇气，通过立法来禁止妇女戴面纱。因为不让妇女戴面纱，这在土耳其大城市里，有文化的各个社会阶层是能够完全接受的，而在大城市以外的广大农村地区，将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凯末尔在进行世俗化的社会改革中，所采取的另外一个步骤，是文字改革。文字改革主要是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因为阿拉伯字母不适应土耳其语元音丰富而辅音相对不够发达的特点，给人民学习和书写本民族的语言带来了巨大困难。土耳其著名的讽刺诗人杰马丁·纳迪尔说道：“向毛拉学习的学生问哥哥、父亲、祖父某个字的读法，结果都不一样；问经师，读法又不相同。一位阿拉伯语教师说，不认识的字很难读出，要靠狡猾来区分 ha 和 hi”。文字改革在土耳其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从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时代以来，便曾有人多次建议对传统使用的阿拉伯字体进行改进，然而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少有所成就而已。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以后，又有一些专家学者向凯末尔提出关于在土耳其完全抛弃阿拉伯字体而代之以拉丁字母的主张。但经过酝酿讨论之后，这个主张被一些比较保守的权威人士断然拒绝了。随着凯末尔世俗化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此时的凯末尔政权已

经稳如泰山，以宗教界为首的保守势力经过一系列的猛烈打击后，变得俯首帖耳，毫无生气。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政府决定以拉丁字母代替苏联国内突厥语中的阿拉伯文字，为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树立了光辉榜样，起到了积极的鼓励作用。

1928 年 1 月，凯末尔正式任命曾经在废除伊斯兰教神圣法典时担任主要角色的激进改革家、司法部长埃萨德为土耳其国家文字改革特别委员会主席，着手研究关于采用拉丁字母的可能性及方式。特别委员会许多重要会议都是由凯末尔亲自主持召开，并指导讨论，因此这个文字改革特别委员会能够迅速高效地开展工作，无疑是和凯末尔的大力支持作用分不开的。

六周以后，新字母完成了。1928 年 11 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议案，决定从新的一年起采用拉丁字母，禁用阿拉伯字母印刷书籍，中学停止教学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一个月后，商店的招牌、广告以及报刊开始广泛使用拉丁字母。在以后全国的新字母普及过程中，身为共和国总统的凯末尔，又以学校教师这个新身份动身前往全国各地，出现在乡村的广场、学校的教室、市镇的大厅和咖啡馆里，教给人民群众识字，并对他们进行测验。凯末尔每到一处，都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动员号召民众积极投身到新文字的学习热潮中去。“诸位朋友，我们丰富而和谐的语言，如今能够借用新的土耳其字母得到表达了。我们必须让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我们民族将以她的文字和她的思想，表明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凯末尔激动人心的号召，通过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介传遍了祖国大地。

在凯末尔的带动影响下，土耳其政府的其他高级人员也都群

起而效之，不久，整个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大教室，国内的知识分子都带着黑板和板架，教人们阅读和书写新文字，将学习、推广新字母看作是一种爱国行为和国民义务。采用拉丁字母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毁灭了土耳其的民族文化遗产。首先，所谓的奥斯曼语不是地道的民族语言，而是突厥语同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混合物，只是在知识分子中间通行。文字改革前，土耳其的民众平均识字率不足10%，文字改革后，两年内有大约150多万民众进入国民学校学习新字母，其中有一半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在此后的短短10年间，土耳其民众的识字率提高了一倍多。其次，奥斯曼帝国迟至1727年才采用印刷术，两百年间总共才出版了大约3万种书籍，历史上留下的手稿有限。文字改革大大方便了广大民众学习掌握本民族语言，为保存和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创造了条件。在此后的几年里，土耳其出版发行了用新字母撰写的各类书籍1.5万余种，并开始有计划地用新字母出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优秀著作，暂时无力或没有必要用新文字出版的古籍在各类图书馆中得到了妥善地保存。

为了表彰凯末尔在文字改革中的巨大贡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决议，赠送给凯末尔一块刻有新字母的金匾，并授予他"国民学校总教师"的光荣称号。凯末尔倡导的一系列关于世俗化的社会改革，体现了破除迷信与陋俗，提倡科学的现代文明精神，是土耳其从神权政治国家走向现代民主政体转变中的重大步骤。在凯末尔的晚年，他主要关注的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但仍然还是非常关心更加深入的社会改革问题。一是要求所有的土耳其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姓；二是所有的政府部门和公共机关均一律实行由星期六下午一时起到星期一早晨为止的每周休假制。

这两项改革措施，尽管不如其他已经完成的世俗化社会改革那样重要，但都是根本不合乎伊斯兰教传统习惯的。例如周末休息的方式，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生活习惯，而不是穆斯林的习惯。穆斯林的星期五，是一个公共祈祷日，而不是一个安息日，并且在传统上又是清真寺周围的市场最活跃的一天。凯末尔倡导由原穆斯林的星期五到以基督教的星期日作为每周休息日这一转变的社会改革，主要是考虑到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与行政上的管理，而且这也是土耳其采用了西方时钟和西方历法之后的必然结果。

此外，土耳其人多年来，也像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一样，一向没有采用家姓的习惯，每个人都只有他个人在出生时取的名字，另外加上一个幼时取的第二个名字，或者加上他父亲的名字。但随着土耳其现代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家姓制度变成了一种经济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土耳其采用新的民法之后，家姓制度便立刻成为社会交往中必不可缺的内容。根据凯末尔的要求，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 1934 年 6 月 28 日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自 1935 年 1 月 1 日起，每一位土耳其公民都必须有自己的姓。并同时规定废除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一切非军事的官衔和爵位，而代之以先生和夫人等新名词。凯末尔首先带头放弃了过去奥斯曼帝国授予他的贵族头衔，并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他阿塔图克作为姓，意思是土耳其共和国之父。

宗教与法律制度的改革

为确保土耳其共和国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并纯洁伊斯兰教信仰，把宗教信仰作为个人的行为，凯末尔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使宗教同国家政权相分离。1924 年 3 月 3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接

连通过数个法令，把宗教改革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宗教同国家事务相分离的思想，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叶。当时的青年奥斯曼党人的支持者穆斯塔法·法泽尔帕夏在给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的信中指出："如果统治者混淆宗教和国家，既会破坏国家，也会毁灭宗教。"另外，在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第二次立宪时期，在广大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间，那种"如果国家和宗教事务不分离，我们的解放、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的思想也极为普遍。例如，青年土耳其党人著名的诗人格卡尔普在其作品《国家》一诗中，明确反对宗教法，捍卫世俗法，认为宗教的梅希哈特职位同法律不相适应，要求消除在立法与司法中的宗教和世俗的双重性。在广大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看来，制定法律、管理国家的权力不应该属于宗教，而应该完全属于国家。然而，宗教改革势必触动伊斯兰教的世袭领地，动摇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因而会遇到无穷的社会阻力，遭受到宗教势力的顽强反抗。在"坦齐马特"时代，伊斯兰民法典《麦加拉》的汇编整理并出版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大维齐阿里帕夏极力主张翻译法国的民法典，把它作为奥斯曼帝国民法典的蓝本，但高级伊玛目以杰夫代特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和比较保守的政府官员认为不可翻译法国的民法典，只能从本国法律中制定出必要的法典。结果奥斯曼帝国政府被迫放弃采用法国民法典的要求，由杰夫代特主持汇编出版了16卷本的《麦加拉》。《麦加拉》尽管采用了西方编辑律例的方法，并承认时代变了法律条款亦应随之变化的原则，但它只是选编了哈乃斐教法学派对各种案例的见解，因而维护了伊斯兰教法在民法领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

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宗教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根据土耳其国民议会的有关法令，宣布撤销伊斯兰教法和教产基金部，成立隶属总理府的宗教事务局。并规定伊玛目、布道师、穆安津（宣礼人）等教职人员的任免一律由宗教事务局局长负责，宗教事务局也是穆夫提的主管机关。宗教事务局局长作为伊斯兰教界的最高首脑，可以解释伊斯兰教法，发表具有最高宗教权威的法特瓦，但作为国家政府部门的一名官员，他在采取重大决定之前，必须与自己的世俗上司磋商。由于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教逊尼派缺乏严格完善的宗教组织体制，所以凯末尔设立宗教事务局不失为独创性的尝试，既消除了伊斯兰教凌驾于国家世俗政体之上的组织机制，又使伊斯兰教完全处于政府地直接监控之下。此外，按照有关宗教改革的规定，伊斯兰教的教产基金也一律移交总理府，由新成立的国家教产基金处管理使用，统一纳入国家的财政预算。二是根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有关法令，规定全国的教育机构统一隶属国家教育部，关闭所有教法和教产基金或私人基金会管理下的所有学校。为了培养高级宗教学者，国家教育部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开设了神学院。此外，为培养称职的伊玛目、布道师等普通神职人员，土耳其政府专门开办了一些特殊的学校。这项宗教改革措施的理由既简单又有说服力，即一个国家只能实行一种教育体制，双重体制只能培养出两种人，从而破坏民众对国家思想情感的统一。

1928年，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感觉到伊斯兰教的礼拜仪式等，也需要进行一些改革，使其更现代化和民族化，这个任务交给了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神学院，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以史学家富阿德·柯普吕教授为首的伊斯兰改革委员会。委员会建议为了使宗教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跟上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必须用突厥语

进行祈祷和讲道，并着手用新文字翻译《古兰经》。1932 年 1 月，在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清真寺的尖塔上，人们第一次用突厥语发出了“真主伟大”的宣礼声，2 月初，苏莱曼大清寺也改用突厥语讲道，1933 年，土耳其政府明令全国所有的清真寺一律用突厥语代替阿拉伯语宣礼。

虽然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的宗教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国家的宗教教权性质仍然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出来。例如，根据 1924 年 4 月大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宪法，伊斯兰教仍为“国家宗教”，议会负有监督实施宗教法规的职责，教法仍然是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特别是家庭、婚姻和财产继承的主要依据。特别是许多教团，以其庞大的组织和对世俗政权的独特态度，成为干预国家政权事务的重要因素。

1925 年 5 月，土耳其政府借口组织库尔德人起义，取缔了在东部地区活动的纳克什班迪教团。8 月，凯末尔正式提出教团问题，认为只有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文明道路才是真正的“道路”（此教团的突厥语名称“塔里卡特”的含义为“道路”）。他说道：“土耳其共和国不能是教长、教团教士、门徒和俗人教友这样一些人的国家。”凯末尔并从怎样教育启蒙民众，如何建立现代文明社会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要求。不久，土耳其政府和议会相继作出决定，取缔所有的教团，关闭道堂并没收其财产。新颁布的法律还禁止使用教长、教团教士、圣门后裔、教团首领等宗教头衔或称号及其服饰。此外，念咒、占卜、魔法、书写符咒、问卦等活动均被视为犯罪作为。

在 1926 年颁布的新刑法中，第 163 条还规定不得组织以宗教或宗教情感为政治基础的社团，凡“滥用宗教、宗教情绪或在宗教

上被视为神圣之物，借此在人民中间进行不拘任何形式的煽动，以致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者，或为此目的而集会结社者"，都应按刑法加以惩处。在新刑法的第241、242、529条中，还规定禁止神职人员阻挠政府、国家法律的实施，禁止在礼拜场所外举行宗教庆典和仪式。此外，在1938年通过的结社法中，还禁止政党参加宗教活动，进行宗教宣传，在宗教、教派、教团基础上组建社团。

1928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对宪法进行第一次重大修改，删去了"伊斯兰教是国家宗教"和"教法规则由大国民议会贯彻实施"的提法，总统、总理、议员的就职宣誓改为以个人荣誉进行。据此，土耳其共和国在法律上已成为一个地道的世俗国家。1937年，土耳其再次修改宪法，将包括世俗主义在内的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原则纳入宪法。针对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直到今日仍然为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

此外，在彻底改变土耳其人民的家庭生活方式，这样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中，凯末尔认为有必要对国家的整个法律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随着撤销伊斯兰教法法庭，土耳其共和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定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新民法、新刑法等法律，培养出具有新气质、新观念的法官和律师，为此，共和国政府在首都安卡拉开设法学院。凯末尔在开学典礼上提出"建立一套全新的法律，从而彻底毁掉旧的法律制度的基础"的任务，凯末尔主张制定全新的民法，认为"家庭生活是文明的基础，是进步和权力的基石，不良的家庭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经济及政治生活的软弱"。1924年9月11日，根据凯末尔的提名，一个以26位著名法律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根据瑞士公民法典草拟了一份适合于土耳其需要的民法。草成的法典在1926年2月17日由大国民

议会通过，并于 10 月 4 日起正式生效。

土耳其共和国的新民法废除了多妻制和休妻制，承认并保证妇女在家庭、社会、经济生活中同男子的平等地位，为妇女解放奠定了法律基础。新民法中有两条规定同世俗原则关系最为密切，例如，第 110 条规定结婚要登记，领取结婚证，在出示结婚证书之前不能举行宗教婚礼。第 266 条对宗教教育作出规定："子女的宗教教育由父母决定……成年人自由选择宗教。"此外，妇女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就业领域的扩大和获得政治权利上。新民法保障妇女可从事除军事以外的各项社会职业，于是在土耳其出现了女医生、女法官、女律师、女飞行员等。1925 年妇女获得了在国家机关任职的权利，1931 年妇女获准可参与地方市政选举。1933 年大国民议会修改了农村法，使妇女有可能进入农村长老委员会。1934 年妇女获得全国大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新一届大国民议会中共有 18 名女议员，占该届议员总数的 4.5%，这在土耳其和伊斯兰国家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甚至走在了某些西方国家的前面。

总之，土耳其共和国法律制度的变革，对于其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难以形容的。传统的伊斯兰教教法被宣布无效；多妻制、休妻行为等一切妨碍妇女自由与尊严的古老禁例，都一律被废除了，建立了男女平等的结婚与离婚制度。另外，最令人感动震惊的是，从此，一个穆斯林女子和一个非穆斯林男子结婚，在法律上已是完全可能的了。同时，所有男子也都取得了自由改变他们宗教信仰的合法权利。

二、共和国的政治生活

共和国宪政

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第一届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举行，凯末尔当选为大会主席，大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宣誓忠于《国民公约》，大国民议会宣布自己为土耳其惟一的合法政府。5月4日，凯末尔以大国民议会议长的身份组成以他为首的11人部长委员会，第一届大国民议会政府遂告成立。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首都为安卡拉，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统。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前，曾于1921年1月20日，由大国民议会通过"基本组织法"。建国后，1924年4月2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4月30日将其公布，新宪法废除了1876年的宪法和1921年的"基本组织法"，用以巩固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1924年的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共分6章，105条，分为总纲、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人民权利、杂项等。在以前的土耳其人看来，自己是奥斯曼帝国素丹的伊斯兰教臣民，没有国籍观念，1924年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土耳其人的"公民资格"，规定土耳其居民不论宗教及种族如何，其公民资格为土耳其人。此外，根据新宪法的规定，土耳其为民主共和国，以一院制的大国民议会为国会，由选民依照选举法直接选出的议员组成。国会是土耳其国家惟一的权力机构，任期4年，可以连选连任。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总理由总统从议员中遴选，政府内阁成员由总理从议员中选择。政府

内阁应对议会负责，大国民议会得随时监督和改组政府，政府无权解散国会。另外，在选举方面共和国的新宪法也有严格的规定。过去奥斯曼帝国的旧宪法规定，每5万男子中选出议员1人，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战争使土耳其的人口锐减，所以新宪法改为每2万男子中即可选出一名议员。旧帝国宪法规定男子必须年满21岁方有选举权，现新宪法改为年满18岁即可，但被选举者须年满30岁者才方可。共和国的新宪法还规定，现任官吏必须先辞去现任官职后，才方能当选为议员；军官不退役不得当选议员；不识土耳其新文字者没有被选为议员的资格。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反映出了土耳其政体的变化，体现出民族独立后的土耳其政府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政府。

为了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以便使伊斯兰教具有一个更加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形式，不让伊斯兰教的僧侣们参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事务，1928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宪法删除了“伊斯兰教为国教”和“教法规则由大国民议会贯彻实施”的内容，认为像其他的社会制度一样，宗教必须迎合社会生活的需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像道德生活和经济生活一样，按照科学的路线进行改革，使其同别的各项社会制度保持和谐，使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社会发展中，显示它所具有的那种活力和进步性。据此，土耳其共和国在法律上，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世俗国家。

1931年4月，凯末尔提出了六项被称为有根本意义的原则。1937年，由凯末尔领导的共和人民党在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这六项原则，共和人民党的党徽把这些原则标为“六个箭头”，并把它写入新修改的宪法总则的第二条中，这六项原则即共和主

义、民族主义、人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革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含义在凯末尔的革命生涯和他的一系列讲演中已经很清楚了。可称为革命的改革主义也同样非常清楚,那就是迅速、持续而非暴力的社会变革,人民主义则以人民主权以及不分阶级只有一个人民这样的概念而著称。新增加的一项原则为国家主义,意指土耳其政府积极指导和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被写进新修改宪法中的六项原则,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国家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特别是世俗主义成为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指路明灯,为社会的不断进步提供了改革的哲学思想和具体政策。

1934年12月5日,根据土耳其共和国社会政治生活发展的需要,大国民议会对宪法又进行了修改,给予土耳其妇女以参政权。过去的宪法规定,年满18岁的男子有选举权,年满30岁的男子有被选举权。修改后的新宪法规定,年满22岁的男女均有选举权,年满30岁的男子有被选举权。宪法的这一修改,表明土耳其共和国妇女的政治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进一步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扩大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确保世俗共和国制度的巩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宪法在1937年和1945年虽然几度修改,但它的主要内容一直延续到战后的60年代,土耳其军人发动政变推翻曼德列斯政权之后。

共和国政党

在建立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凯末尔首先需要一个政治工具。虽然在1919年锡瓦斯大会上成立的“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亚护权协会”,曾经在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做了许多的事情,

已具备了现代政党的雏形，但它却满足不了一个享有和平与独立的民族主权国家的需要，因为它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明确斗争目标和政治纲领的政党。为了把它着手改变成为一个现代政治体制运作中的真正政党，1922 年 12 月 6 日，凯末尔首先通过在安卡拉出版的《民族主权报》、《新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向全国发布将成立一个名为“人民党”的消息，并亲自走访全国各地，同国内外各个社会阶层的代表交换意见。1923 年 4 月 8 日，凯末尔发表了九条原则，作为人民党的政治纲领。这九条原则是：①全部政权集中于国家手中；②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国内行使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③保卫国家安全是国家最重要的任务；④改进诉讼程序；⑤大力发展本国经济；⑥缩短服兵役的期限；⑦对战争中牺牲的人员及其家庭给以物质保证；⑧改造并健全政府机关的工作程序；⑨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向经济方面投资。1923 年 8 月 9 日，人民党举行成立大会，凯末尔当选为主席。1924 年 11 月，人民党易名为“共和人民党”。共和人民党在土耳其拥有很大的权力，国家的大政方针均由党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等组成的核心小组制定。凯末尔领导下的共和人民党实施对国家所有要害部门的领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所有重要官员均为共和人民党党员。

1931 年 5 月，在凯末尔的亲自主持下，共和人民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在共和人民党的党章中，规定了党和国家的机构是一致的，党的现任主席就是共和国总统，他的副手也就是总理，而在各地新设立的“人民之家”也就成了共和人民党的地方机构，此后，一党专制的倾向不断地加强。1935 年 5 月，在凯末尔的亲自主持下，共和人民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政党和政府合二为一的决议。

共和人民党的总书记赖皮普·佩卡尔明确宣布，党的总书记兼任政府中的内政部长，各省的党主席兼任省长，实施一种党政合一的政体结构。

1938 年 11 月 10 日，凯末尔因病逝世。1938 年 11 月 11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一致投票选举凯末尔的亲密战友，他的内阁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为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同时担任共和人民党主席，继承了凯末尔的大权，继续实行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国家政体。伊诺努当选为土耳其总统与共和人民党主席后不久，在国内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下，凯末尔执政时期所实施的党政合一的政体结构开始松散，一党专制受到猛烈的冲击。1939 年 5 月，在伊诺努亲自主持下，共和人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党和政府分开，其任命不再相互结合，并决定在议会内成立一个与党团平行，由共和人民党议员组成的“独立集团”，起着反对党的作用，受委托批评议会和政府，以显示国家制度的民主性，但一党专制的现象并没有彻底的改变。

实际上，在集中精力进行各项社会改革的同时，凯末尔也曾经作过组织反对党，实行民主改革的实验，试图允许有一个可容忍的反对党存在，从而打破共和人民党对国家政权的垄断。1924 年 11 月 17 日，一伙对政府的建树不满意，并公开指斥说各项社会改革不分阶段进行的知识分子，组建了一个名为“进步共和党”的政党。据所宣布的政治纲领来看，主张国家实行民主制度，提倡尊重宗教信仰。该党曾于同年的 11 月 30 日，支持著名的政治家费提·欧克亚尔为政府总理，迫使共和人民党的重要领导人、内阁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下台。然而，在该党仅存半年之后，因在军队平定赛义德酋长策划库尔德人的叛乱中，发现进步共和党为了自己的政治

目的，具有公开煽动挑拨与支持叛乱分子作乱的行为，所以该党被勒令取缔。

1930年8月9日，在土耳其第三届大国民议会议员举行大选时，又出现了一个名叫“自由共和党”的政党，其创建人是著名的政治家费西。费西是凯末尔早年的支持者之一，与凯末尔的私人关系甚密，曾经担任过驻法大使。据说费西组织反对党的这一行动，是在同凯末尔本人商量后采取的。但凯末尔的最终意图是真要在土耳其建立西方式的两党制，还是把反对党仅仅当作早已弥漫全国的牢骚和不满的出气筒，并不明确。当时土耳其社会普遍不满的怨气主要指经济方面的，如对政府的经济限制政策，沉重的税收负担和私人企业不能自由发展等意见。特别是连续数年的农业歉收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更使得这些满腹牢骚的人振振有词，政治方面的抱怨主要是指反对独裁和一党专制。

自由共和党的政治纲领与共和人民党的政治纲领基本类似，主张共和制，提倡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和改革主义，只是在经济领域里，自由共和党主张实行一种更加对外开放的自由发展政策。1930年9月，当费西开始从事竞选活动时，他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热情支持。支持者不仅有自由派分子，也有许多狂热的宗教分子和其他一些对政府不满的人，他们或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或以政党为掩护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特别是在竞选活动中，全国各地发生了数起对共和人民党机关采取暴力的事件。面对社会的动荡，凯末尔深感这场民主试验过于危险，此外，费西本人也不愿意领导一场会演变成为攻击凯末尔的政治活动，所以在凯末尔本人的授意下，1930年11月17日，费西向共和国政府的内政部写了一份报告，并宣布自由共和党自行解散。从此，土耳其共和国由共

和人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共和国的民族政策

历史上的土耳其，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国家，近代以来，在政治上长期被民族问题所困扰。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通过交换居民的方式，遣送出大量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等民族成员，所以土耳其共和国历届政府在公布人口资料时，从不划分民族。这种长期不变的做法，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土耳其共和国仍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当时的境内还有 2 百多万的少数民族成员，他们主要是库尔德人、保加利亚人、格鲁吉亚人、希腊人等。这一点，可以从土耳其共和国历届政府公布的语言材料和宗教材料中作出判断。

对待境内存在的民族问题，从凯末尔统治时期开始，共和国历届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是一种土耳其化的政策。1924 年通过的土耳其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的第 88 条规定："凡土耳其公民，不分种族、宗教，皆称为土耳其人，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凡土耳其人，必须进土耳其学校，习土耳其语，不悖于土耳其的礼俗文化。"也就是说，土耳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必须接受同化，一律称为土耳其人。特别是对境内的第一大少数民族库尔德人，认为可以通过文化教育使他们的民族特点消失、融化于土耳其族人之中。所以，土耳其政府强行关闭了库尔德人的学校，禁止使用库尔德语言，在所有的书籍以及科学研究中，消除一切"库尔德"和"库尔德斯坦"词句，把库尔德人称之为"山里的土耳其人"，并将库尔德人每十人为一组迁往土耳其各地区，使其处于 95% 的土耳其族人的包围之中。土

耳其政府的“土耳其化政策”，以及对库尔德人所采用的极其野蛮的手段，使库尔德人的经济文化生活长期陷入一种落后的状态，遭到他们的强烈反抗。

1925 年 2 月 21 日，库尔德族部落的沙赫·赛义德酋长打着宗教的旗号，率领库尔德人发动了叛乱，反抗土耳其共和国高压的土耳其化民族政策。他们相继攻陷了埃拉泽、埃尔甘尼、甘赤等地，包围了迪亚巴克尔省会，声势浩大，震动了土耳其的整个东南部，给成立不久的共和国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共和国政府用了几个军，数万人的兵力前去进行镇压，直到 1925 年 4 月间，库尔德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次起义才被镇压下去。1925 年库尔德人事件之后，土耳其政府的土耳其化民族政策并无改变。在东部各省的地方政府，对库尔德人强制同化政策的推行，更是变本加厉。在库尔德人聚居区发号施令是政府派去的官兵，库尔德族的青少年入学后，不许再讲库尔德语，至于库尔德文字的书刊，更是不能出版。

在共和国政府的土耳其化政策和高压手段之下，1930 年 6 月，在土耳其东部的几个省，又爆发了库尔德人的武装起义。特别是在 1925 年的库尔德人事件中逃往伊朗的库尔德族酋长赛义德，此时率领着从伊朗带来的几百名骁勇善战的骑兵也参加了战斗，从而使库尔德人与土耳其政府军之间发生的战斗更加激烈。后来，屡战屡败的土耳其政府军在调整了战略后，派出大批兵力通过伊朗边境上的领土，从库尔德人背后进行夹击，武装起义才最终被镇压下去。此次库尔德人的事件被平定以后，土耳其政府更加紧了它的土耳其化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1932 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将东部地区的一部分库尔德人迁往他乡，使之与

土耳其族的百姓杂居,并严厉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库尔德人语言,严厉禁止库尔德人的工匠们组织行会社团。1936 年,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又在东部的埃尔遵占以南的省份实行全面的军事管制。并将大约 3 000 户库尔德人强行迁徙到小亚细亚的西部定居。这些库尔德人在小亚细亚的西部居住了 10 年之后,于 1946 年 12 月在土耳其政府宣布取消了军事管制之后,才获准返回故乡。土耳其政府对境内库尔德人民族权利的漠视和无理压迫,以及土耳其化民族政策上的不适当性,在 1937 年又引起了库尔德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参加这次武装起义的共有六个库尔德人部落,人数超过 5 000 多人。土耳其政府这次派去清剿库尔德人起义的军队,拥有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人数达 25 000 多人,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才最终镇压了这次库尔德人的起义。

在土耳其境内反抗共和国政府土耳其化民族政策的少数民族,不仅是库尔德人,还有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在宗教信仰上与土耳其人一致,都是穆斯林,但在语言和文化上彼此不相同。自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根据政府的有关法令,外国人建立的和私人建立的学校一律停办,所有民族的百姓都必须进共和国政府开办的学校学习,而各类学校一律用土耳其语教学,阿拉伯族的学生也不能例外,因此,他们对强迫学习土耳其族的语言和文字,而不允许讲阿拉伯语和学习阿拉伯文字深表不满。同时,土耳其境内的各宗教学校也一律关闭,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也一律被取消,甚至在伊斯兰教中作为神圣经典的《古兰经》,也由过去传统的阿拉伯文被译为土耳其文。特别是共和国政府根据有关法令的规定,要求人们在清真寺内作礼拜的时候,不得再用阿拉伯文诵读祈祷词,更加深了阿拉伯人的反感和不满。1938 年,土耳其与法国为哈泰省

的归属问题相互发生了争议。当时叙利亚境内的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曾发生冲突，于是居住在土耳其边境上的阿拉伯人起来声援叙利亚，反抗土耳其政府的统治，但遭到土耳其政府残酷的镇压，部分阿拉伯人被强行驱逐出境。

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因不堪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纷纷逃往前苏联境内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邻国叙利亚。那些流亡在国外的亚美尼亚人，先后在奥地利、瑞士、巴黎等欧洲各地采用暗杀和绑架土耳其外交官员的恐怖手段，用以发泄民族仇恨，反抗土耳其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到 50 年代，还留居在土耳其境内东部省份及大城中的亚美尼亚族人，数目不过 5 万人。

土耳其共和国的土耳其化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在其境内的犹太族中间一直没有遭到什么激烈的反抗。历史上，犹太人主要居住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安卡拉等大城市，虽然他们仅享受一般的公民权，但可以不服兵役，不纳额外的捐税，其子女也可以进入土耳其的各类学校学习，毕业后可参加社会的各项工作。因一些历史上的特殊原因，犹太人掌握着土耳其的商业和金融业，对其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犹太人主要使用土耳其的语言和文字，其有些上层人士还在共和国的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因此，长期以来犹太族人同土耳其族人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

文化教育的发展

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时，即积极发展文化和教育。早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就注意到了国民教育

问题，认为土耳其国民受教育程度的偏低，使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足够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是造成土耳其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和最大障碍。从此，土耳其政府对学校教育和教育行政事务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多次在首都安卡拉召开国民教育会议。1922年3月1日，凯末尔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讲话，为发展国民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原则奠定了基础。他指出：1. 政府最大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国民教育工作。为了取得这方面的成绩，需要依据本国的情况，社会上的与生活上的需要及各方面的条件和适应长期的需要，制定出长期规划来。2. 国民教育政策的基础和初步目标是使全国公民能读会写，进一步要求公民具备世界水平的知识。若能达到此项目标，将标志着在我国国民教育史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3. 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须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并为高等教育提供候选人，要办好中等教育。4. 在对儿童和青年进行教育中，不论受教育者程度如何，首先应施以土耳其独立自主的思想教育和用全力与来犯的敌人奋战的精神的教育。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文盲的比率占全国人口的89%，为此，政府筹措大量资金，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乡村学校，学校内除了有小学班外，还办有针对成人的扫盲班。扫盲班的学习期限为4～6个月，半文盲学习的时间为4个月，全文盲者学习的时间为6个月，课程以学会土耳其新字母为主，辅以语文、算术及农业常识等，学习者多利用晚间上课，以免影响白天的生产。两年后，有一半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乡村学校的小学班则招收学龄儿童。因贫困落后等社会原因，当时土耳其的农村儿童失学者甚多，所以小学班的学生们一般都年龄偏大，他们毕业后马上充任乡村小学教师，这既有利于补充乡村小学师资的不足，也便于农村小学教育的

推广。

土耳其的教育体制受美国教育体制的影响，小学的学制为5年，初中为3年，高中为3年，中等、高等专科皆为3年，大学本科为4年。并规定各族男女儿童均可以入校学习，一律实行男女同校，平等免费。按照土耳其教育体制的规定，在初、高中的教学大纲中，除必修的基础课程外，外语设英、法、德文三种，学习时学生可任选一种，技术课程有农业、商业知识，男生必须学会细木工和钳工，女生则必须学会家务和缝纫等。体育课之外，还安排有短时间的军训。

除重视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外，土耳其政府非常关注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培养更多的高级管理人才，将原来培养高级文职人员的政治学校，升格为政治学院，并在首都安卡拉创办了安卡拉法学院，培养现代法律人才，充实各级法院，以保障实施相继颁布的民、刑、商等法律。此外，为了解决师资匮乏的问题，土耳其政府在全国建立了七所师范学校，并在首都安卡拉建立了一所女子艺术学院，以培养中等学校的师资。特别是土耳其政府于1933年彻底改造了历史悠久的伊斯坦布尔大学，以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为未来创办安卡拉大学奠定了基础。

1924年3月，土耳其政府统一教育法，使土耳其的教育发展又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统一教育法的理由既简单又有说服力，即一个现代国家只能实行一种教育体制，双重体制只能培养出两种人，从而破坏思想情感的统一。根据统一教育法的原则，政府取消了原公立和私立学校中设立的宗教课程，在课程设置方面，加强了对本国语言和本国历史的教学，并取消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课程，注意给学生提供各门学科的基本知识。于是，遍布全国的宗教

小学(麦克泰卜)和宗教中学(麦德来赛)悉数停办。此后,国家的宗教教育完全由政府接管了下来,宗教不能再过问教育。新的伊玛目和讲道员的训练学校一律由政府教育部设立,实行统一管理。过去的素莱曼宗教学校被改组为伊斯坦布尔大学下的一个经学院,其培养目标是为世俗的共和国提供一个科学的、新型的宗教教学中心。特别是根据统一教育法的规定,外国人办的学校在教学计划上必须遵守土耳其教育部的统一要求,由土耳其教师来讲授语文、地理和历史课,一律使用土耳其语教学,并拆除这些学校的宗教标识。

在凯末尔一系列世俗化改革的推动下,土耳其的社会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抛弃宗教精神,树立起土耳其的民族精神,繁荣了共和国的文学艺术。在抛弃宗教精神,树立民族精神,发展现代社会文化的过程中,土耳其政府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号召人们学习和了解本国历史,目的在于促进土耳其民族意识的发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31 年,由凯末尔提议,土耳其政府创立了土耳其历史学会,并召开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讨论会,对历史文献上的记载和观点进行了校勘与纠正。在此基础上,编写出了四卷本的《土耳其历史大纲》,同时,土耳其历史学会还相继发表了一些重要的和有益的文章,这就为国内各级学校的历史课程,提供了土耳其历史的基本内容。

由于摆脱了宗教对社会文化的束缚,使长期被压抑的精神生活获得了解放,使得文学、音乐、歌曲、舞蹈、戏剧、雕塑、绘画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土耳其的许多城市中,都建立了民族文化宫、艺术院校、文艺团体、体育团体,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不断地活跃了起来。特别是在 1923 年共和国成立以后,土耳其的文学如春花

怒放，过去在文学上的一些禁区，如妇女问题现在得到了广泛地描述。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们注意分析妇女的心理、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把妇女问题视为社会问题来看待，并有较深刻的刻画。随着建国初期世俗化改革运动地深入发展，许多文学作品对封建神权主义思想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揭露它的实质和谴责它对社会的不良影响。此外，在土耳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大量描写中产阶级命运的著作，主要反映土耳其的社会改造问题。在这些作品中，理想的土耳其社会是以所有的阶级和民族的和谐为基础的。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部分作家深受西方存在主义流派的影响，作品内容抽象，语言晦涩，主要表现个人在社会和宇宙中的孤独、绝望和痛苦，忧伤地去欣赏大自然，狭隘、主观地去感受爱情和孤独。不过，在那些坚持“纯艺术”立场的作家中，后来有些人又相继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总之，共和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与当时凯末尔所倡导的世俗化和改革运动是很合拍的，在开拓文学题材的新领域里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为土耳其共和国艺术的不断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共和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和国初期的经济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的领导下，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羁绊，政治上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但由于土耳其在独立之前，即奥斯曼帝国时代，曾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后又经过战争的多次破坏，因此，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宣告

成立时，还是一个社会生产力遭受到巨大战争破坏的落后农业国家，到处呈现出一派国敝民穷，哀鸿遍野的社会景象。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土耳其的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而经过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9～1922年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两次规模较大的战争破坏之后，土耳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1914年的水平又向后倒退了若干年，甚至直到1927年，在全国175万户的农业家庭中，仅只有139万具犁，而且其中85%为木犁。这也就是说，直到共和国成立后的第5个年头，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土耳其，竟然还有30多万户以上的农民家庭中连一件最原始的木犁生产工具都没有，由此可见当时的土耳其社会生产力是多么的落后。面对奥斯曼帝国和战争破坏所遗留下来的半殖民地落后经济，独立后的土耳其国家领导人凯末尔大声疾呼，要努力发展土耳其的民族经济，将土耳其建设成为一个以西方为榜样的工业现代化国家。为此，土耳其曾在伊兹密尔多次召开有关的经济会议，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投身参加本国的经济建设。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土耳其经济发展缓慢，其主要原因，一是奥斯曼帝国为共和国留下了一个落后的，不发达的工业和一个十分危险的贸易逆差。为了早日消除殖民地的残余痕迹，土耳其政府不得不将大部分资金用于赎买外国资本家手中的铁路、电厂、自来水厂、矿山等企业，并不得不偿还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沉重外债。因此，在经济上土耳其政府只能是先努力恢复农业生产，使人民有饭吃，国家尚无余力发展工业。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战争，使土耳其的运输和通讯设施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客观上也为土耳其早日恢复经济造成了许多困难。三是土耳其的经济被一些不平等的条约所严重制约，在《洛桑条

约》有关经济的条款中，就明确规定了土耳其政府不得征收某些种类的关税。

在共和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民族经济的发展，土耳其政府制定了两项有力的措施。一是大胆吸收外资，以解决资金与技术的短缺问题。土耳其政府大胆吸收外资的初步尝试是签订《柴斯特让与权协定》。1923 年 4 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批准美国人柴斯特和肯尼迪组织“土美开发公司”，享有土耳其境内修筑铁路、港口，开采多种矿产的让与权，为期 99 年。这是土耳其与外商缔结的第一个投资协定，后由于英、法等国的激烈反对，此协定没有实施。《柴斯特让与权协定》的中途夭折，并没有影响其后土耳其大胆吸收外资政策的推行。1924 年初，土耳其政府通过法律，承认外商在土耳其境内可以拥有、保持私人财产。同年 3 月颁布《农村法》，规定如果外商在土耳其开办合资企业，可以购买土地，并经土耳其政府批准后，还可以享有长期的居住权。20 年代中期以后，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发展，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1927 年 6 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在伊斯坦布尔设立自由贸易区的议案。自由贸易区实行一种特殊的经济政策，政府不仅不征收关税，不执行限制性的法律，而且还提供各种现代化设施以及仓储设备。

在土耳其政府优惠投资政策的鼓励下，外商在土耳其的投资呈明显增加的趋势。新流入土耳其的外资，1926 年为 650 万里拉，1927 年为 530 万里拉，1928 年为 800 万里拉，1929 年为 1 200 万里拉。它们主要采取合资的形式，大部分投入生产领域。另外，这一时期外国银行的外商还为土耳其提供了巨额的生产信贷和进出口信贷。1927 年，土耳其全国的生产信贷为 3.5 亿里拉，其中 2/3 为外国银行所提供，仅奥斯曼银行就提供了 1.77 亿里拉。

1926～1928年，土耳其利用的进出口信贷为6 580万里拉。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国际投资市场不景气，造成流入土耳其的外资锐减，甚至出现了外商回抽资金的现象。

土耳其政府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第二项措施，是积极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1927年，土耳其政府颁布了《奖励工业法》，给予私人企业免征免税，降低商品运输价格等一系列优惠条件，希望以此来振兴本国的民族工业。在这段时期内，土耳其的私人企业确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土耳其在1927年只有私人企业470家，1930年发展到了1 255家，1932年发展到了1 473家。土耳其的私人企业在5年内增长了3倍，但是这些私人企业对土耳其的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并不太大，其中主要原因是这些私人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并且主要集中在食品加工和棉纺织业，私人资本无力投资于规模较大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又缺乏同国外产品竞争的能力。另外，轻视工业而乐于经商是土耳其的经济传统之一，在加上商业比工业获利快，所担当的风险又小，更使得土耳其的许多富人不愿意投资于工业。在国内社会经济严重不景气的同时，1929年全球又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得土耳其主要出口小麦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度地下跌，造成土耳其的外贸收入也随之急剧地减少。另一方面，为恢复国际信誉以争取国外的投资，土耳其政府从1928年开始偿还奥斯曼帝国时期所欠的总额高达8 600万里拉的外债。沉重的债务负担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终于将土耳其的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

面对国内经济的种种困难，土耳其人民的眼睛也就不可避免地转移到了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那里正在试行着一种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当时，虽然苏联本身的经济也是困难重重，但却很少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波及，似乎对于经济恐慌有着极强的免疫作用。尤其是苏联从1928年开始的五年计划建设所取得的令世人瞠目结舌的巨大成就，使当时苏联的声势如日中天，而这时甚至连资本主义的西方也明显地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依靠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涉来解救他们的危机。正是在这如此强烈反差对比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苏联的近邻，并在民族解放战争与共和国创建初期，曾经得到苏俄巨大物质援助的土耳其共和国，以及它的最高决策者凯末尔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改弦更张以俄为师，在社会经济领域内推行国家主义，用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方式来渡过难关，以经济上获得的胜利，来巩固政治上的独立。这标志着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方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经济恢复时期推行的发展私人经济，转移到了由国家干涉社会经济生活和有计划地发展民族经济的历史阶段。在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开始对私人企业的发展加以限制，私人经济的存在只是对国有经济的补充。

关于土耳其实行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是1930年由凯末尔的亲密战友伊斯梅特·伊诺努在瑟瓦斯一次发表的演讲中首先提出来的。当时他强调指出："国家有必要参与经济活动"。随后，在1931年4月20日凯末尔发表了他的著名政治宣言，第一次规定了六项基本不可改变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中，只有一项是新的，那

就国家主义。根据凯末尔本人所下的定义,国家主义就是"经济由国家来控制"。1931 年,土耳其共和人民党的大会宣言对国家主义作了如下说明:"尽管考虑到私人企业和活动仍然是我们的基本主张,但我们的主要政策之一是使国家积极关心涉及民族普遍性问题和重大利益问题,特别是有关经济问题,以使尽可能在短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引向繁荣。"实际上,由凯末尔 1923 年在土耳其伊兹密尔亲自主持召开的经济大会上,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经济公约》和《九项原则宣言》中,就已经有了国家主义的思想萌芽。这些文件提出了复兴民族经济,重建金融机构和由国家控制经济的指导思想,只是这些指导思想到了 30 年代才开始正式实施。土耳其政府为推行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而采取的一系列主要措施有:

1. 以俄为师,制定五年发展计划。苏联工业化的经验,是凯末尔国家主义借鉴的主要蓝本。1932 年 5 月,土耳其共和国总理伊诺努专程访问了苏联,以学习工业化建设的经验。双方并达成了由苏联提供给土耳其 800 万美元作为建设基金,援助土耳其实施五年发展计划的协定。随后,大批苏联专家作为顾问来到了土耳其,他们肩负重任,既要筹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细节,又要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具体项目,目标是要在土耳其建设一个初步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2. 强化国家计划管理,严格经济总体控制。为了贯彻实施"经济由国家来控制"的发展原则,土耳其政府先后创办了苏美尔银行和埃蒂银行,以此来控制工矿、商业、电力等生产部门,并及时地向企业提供资金。1934 年 4 月,这两家银行划归经济部直接管辖,以便更好地执行各自的职能。据统计,"到 30 年代末期,土耳

其全国铁制品生产的100%，钢制品生产的80%，人造丝制品生产的35%，水泥制品生产的55%，均被苏美尔银行所控制。而埃蒂银行则控制了土耳其全部的煤炭和铜矿生产以及一半以上的铬矿与硫磺矿的生产。在共和国初期的经济恢复阶段，土耳其的农业银行就担负着向农民提供贷款和调控全国农业生产的职能。为了加强这种调控机能，1932年土耳其政府从农业银行中有意地又分立出一个特别机构，专门负责收购、贮存和销售土耳其最重要的农产品小麦的业务。1938年这个专门机构被政府命名为“农产品局”，它的职权与经营范围也迅速地扩展到了整个农业领域。农产品局与农业部共同核算农产品的成本，然后制订出收购价格，经政府内阁批准后即在全国统一执行。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在30～40年代，国家对土耳其社会经济领域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控制都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政府对工业生产的全面控制主要是通过苏美尔和埃蒂这两个国家银行来实施，而对农业生产的控制则主要是通过以农产品局为核心的价格干预体系完成的。这种典型的统购经销式的经济运作程序，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计划经济属性。

3. 实行外资企业国有化，优先发展国营企业。1923年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国有经济领域中的外国资本一直占有绝对的优势。全国94家外国公司投资达5亿里拉，51%投资于铁路。23家外国银行的资本，为土耳其同类银行资本的5倍多。由英、法控制的奥斯曼银行，享有发行纸币的特权。外国资本控制了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外国公司垄断了土耳其农产品出口贸易的50%～90%。凯末尔国家主义在对待外国资本的态度上，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外国资本活动范围的措施。尤其是对国计民生有

着重大影响的外国企业，土耳其政府不惜付出重大的经济代价，用赎买的方式将它收归国有。1930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了中央银行，彻底剥夺了由英、法控制的奥斯曼银行发行纸币的权力。到1939年，通过循序渐进的赎买方式，几乎所有的铁路、码头、船坞、矿山和城市公用事业都已经完全转入到了土耳其政府的手中。另外，随着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深入推行，土耳其政府改变了原先鼓励发展私人企业的政策，转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土耳其政府通过推行外资企业国有化，以及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一系列措施，大大增强了由国家控制整个社会经济领域的实力。

4．高筑关税壁垒，履行进口替代战略。1922年土耳其与欧洲列强签订的《洛桑条约》，极大地限制了土耳其的关税自主权，严重影响了土耳其经济的正常发展。1928年随着这些规定限制的到期失效，从30年代开始，土耳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关税法案，严格规定对本国已能生产的工业产品禁止或限制进口。对本国尚不能生产而又需要进口的工业产品征收50%的高额关税，从而限制外国货物的输入和限制对外国人员的雇佣。这些法案的颁布，为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实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实行保护主义关税政策的同时，土耳其政府积极鼓励用本国生产的工业品来替代需要进口的工业产品，全面贯彻执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这些措施的实施，客观上对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的土耳其民族工业具有积极的保护作用。

从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践来看，国家主义显然属于计划经济的范畴，具有土耳其民族的特色。若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土耳其是除苏俄之外，第一个采用中央指令性计划概念，并像苏俄那样将发展重心放在工业化上的国家。土耳其虽

然在发展民族经济中以苏联的经济体制为楷模,实行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原则,但从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它同社会主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具有基本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性质,是由土耳其政府直接投资经营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

第一个五年计划

1933年,在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共和国政府聘请苏联专家作顾问,制定了为发展土耳其民族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于1934年1月9日获得大国民议会的批准,1939年完成。土耳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1)增产消费品;(2)开发地方原料;(3)创办纺织业;(4)把工业分散到全国,改变工业主要集中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大城市的状况,注意合理布局。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土耳其政府并没有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而是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轻工业方面,如造纸、玻璃、交通运输等方面,也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目标是在土耳其建成一个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土耳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不足之处在于很少关注对农业的投入,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使这个国家最大的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另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过程中,尽管仍然坚持过去维护私人企业的说法,但对于后者的发展甚至存在,在实践中都很少表示兴趣或关怀了。

土耳其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的基金,除苏联提供了8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外,英国也于1938年向土耳其政府提供了

总数为 1 600 万英镑的工业贷款。但从整体上看，土耳其的建设基金主要来自于国内。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府仿照苏联的做法，通过冻结甚至降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以及用高税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来为工业化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在 30 年代，土耳其政府为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总共投入了 9 亿里拉的资金。土耳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1937 年提前完成，共建成了 20 个新工厂，其中最大型的企业是由苏联帮助设计的、拥有 33 000 纱锭的开塞利纺织联合企业和英国人建造的卡拉比克钢铁公司。而在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期间建成的这些大中型国有骨干企业，则为土耳其工业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负责土耳其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的机构，原为工矿银行，其后经过改组，分别设立管工业的苏美尔银行和管矿业的埃蒂银行。特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土耳其的外国工矿企业收归国有运动也有极大的进展。经过赎买，外国工矿企业基本上都被收归国有。例如 1933 年 5 月 20 日，土耳其政府以 130 万法郎赎回由法国人在伊斯坦布尔经营的自来水公司，交市政府经营管理。1933 年 6 月 12 日，土耳其政府以 780 万法郎赎回法国人在伊兹密尔经营的莱赫特姆电车公司，交市政府经营管理。1934 年 5 月 31 日，土耳其政府以 1.62 亿法郎赎回由法国人经营的从伊兹密尔到阿菲尔和从马尼萨到班德尔马的两条铁路，由国家经营管理。1932 年 12 月 23 日，土耳其政府以 3 300 万法郎收购了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安特里波电器公司。1935 年 5 月 30 日，土耳其政府以 180 万英镑收购了由英国人经营的艾登铁路公司。1936 年 6 月 13 日，土耳其政府用 80 万英镑买入由英国人经营的伊斯坦布尔电话公司。1937 年 3 月 3 日，土耳其政府以 350 万里拉收购了由

外国人经营的埃雷利公司。位于土耳其埃雷利市的这家外国公司拥有该市的港口、码头设备，以及位于宋古达克市的查塔拉兹铁路线和煤矿。1937 年 4 月 26 日，土耳其政府以 2 070 万瑞士法郎收买了由外国人经营的东方铁路线。此外，土耳其政府还相继在 1936 年、1939 年、1940 年将由外国人经营的埃尔喀尼铅矿公司、库瓦尔逊铅矿公司和一家啤酒公司全部收归国有。

在土耳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当中，外资企业国有化的运动也波及到土耳其的民族工商业，当时不少由土耳其人经营的私营企业也被收归国有。据统计，从 1932 年到 1941 年，土耳其本国的私人企业从 1 472 个锐减到了 1 050 个。特别是随着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深入推行，早年奖励私人办企业的《鼓励工业发展法》，最终于 1942 年被正式废除。总之，与 20 年代相比较，在土耳其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期间，是土耳其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低谷。但土耳其政府通过推进外资企业国有化，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等措施，从而极大地增强了由国家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的能力。

正当土耳其成功地实现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筹划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虽然保持中立，未参加战争，但仍然不得不动员百万军队陈兵边境，以防法西斯的入侵。五年的世界大战，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原材料的严重短缺，使土耳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不但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而且还造成国内各项生产大幅度的下降，以致土耳其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出现了 - 3%。在农业产生方面也因为实行局部动员，土耳其的劳动力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造成土耳其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与战争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体制长期以来所存在的那种漠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巨大作用的弊端,随着土耳其经济发展条件的不断变化,而逐渐显露了出来。人们可以普遍听到许多关于政府官僚主义指挥无力,工厂浪费严重,生产缺乏效率,产品质次价高等诸如此类的事情。1940年1月18日,土耳其通过"国防法",给予政府以更加广泛,办法也更加严厉的经济权力,从而使得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排斥和限制市场机制,长期忽视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那种在工业化建设中不计代价,不讲效益的发展方式,都严重地窒息了土耳其社会经济的活力和生机,明显地滞后于土耳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完全暴露出它的历史局限性,最终导致了战后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体制的衰亡。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成就

土耳其的社会经济在经历了恢复时期和国家主义时期之后,有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土耳其先后建立了几百个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重工业、化工业、矿产业、机械加工以及交通、通讯等部门,促进了土耳其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壮大,使土耳其比较顺利地渡过了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为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民族工业奠定了基础。如在开塞利、埃雷利、纳齐利、马拉提亚和布尔萨等地的纺织业;伊兹密尔的造纸和人造纤维业;格姆利克的人造丝;帕沙巴赫切的玻璃及玻璃瓶;库塔赫亚的瓷器;凯奇博

尔卢的硫磺与瑟瓦斯的水泥；重工业包括宋古尔达克的无煤烟大煤矿和卡拉比克的钢铁企业，使土耳其煤的产量增加了100%，铬的产量增加了将近600%，铁的产量，仅卡拉比克公司就从零上升到了1940年的130万吨，特别是土耳其的交通运输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完全由土耳其人自己掌握的阶段。1933年，土耳其全国公路长度为37 400公里，至1933年增加到40 900公里，每年大约增加500公里。1935年，土耳其全国铁路线长度为6 639公里，至1940年已达7 381公里，年平均修筑160公里。在整个铁路修建工程中，不再依赖外国技术人员，已完全由土耳其工程人员来承担。公路和铁路的迅速发展，使土耳其的客运业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增长了5倍。

在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土耳其的金融外贸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30年6月11日，土耳其建立了中央银行，取代了由英国人和法国人开设的奥斯曼银行，全权处理和控制货币流通，负责执行政府的货币政策，管理纸币的印刷和发行，确定利率等，从而确保了土耳其通货的稳定。另外，从1929年起，根据大国民议会通过的"关税法"，提高税率，对税率作了调整，土耳其开始关税自主，实行新的关税税率。1930年，大国民议会又颁发了1547号法令，对土耳其货币与外汇的比值加以支持。1932年，大国民议会又通过票据交易新法案，对外贸加以控制。不久，土耳其又建立了外贸的新清算制度。经过这一系列的法令，调整了整个对外贸易，所以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惊涛骇浪中确保了对外贸易的顺差局面。

此外，最为重要的是，土耳其的注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6倍，从1929年的5 800万里拉，达到了1939年的33 100万里拉，

特别是在土耳其的总产值中，工农业的比重有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期间，土耳其的农业由43.2%下降到了37.3%，工业由11.8%上升到了18%。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1%，农业为5.1%。据统计，从1927～1939年间，土耳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2%，国民生产总值的年人均增长率为4%。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4%，上升到了19%。国民收入中，工业由1929年的2.41亿里拉，增为1939年的3.14亿里拉。据统计，在30年代，土耳其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由1927年在世界总产值中仅占0.14%的比例，逐渐上升到了1939年的0.23%，这使得土耳其得以与同时期的苏联、日本和德国相并列，成为当时世界上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连国际建设开发银行在经济评估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在凯末尔国家主义的制度下，土耳其取得了可观的社会经济发展。如果仍然处在本国的私人企业之下，加上奥斯曼帝国传统的障碍，在这段时期之内是否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很有疑问的。

土耳其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显然是土耳其政府实施凯末尔国家主义经济原则，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就。如为了迅速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摆脱来自西方列强的工业上不平等的侵略，土耳其政府不惜牺牲本国农业的发展和冻结国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将资金全部集中于工业化建设，实现了工业的快速增长。除此之外，经过民族解放战争和凯末尔世俗化的改革运动，土耳其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有所提高，劳动者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仍然以充沛的爱国主义热情投入紧张、繁重的劳动，创造出大量的社会财富，这也是30～40年代土耳其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

四、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土苏关系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它的对外政策就是凯末尔所说的“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原则，其追求的根本目标是本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权利，主张各国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特别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土耳其一方面与支持民族解放事业的苏俄结成友好关系，争取苏俄人民的道义和物质援助，安定其后方；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协约国内部的种种矛盾，离间和争取法、意等国，集中力量打击英国及其指使下的希腊侵略军，就是此原则的成功运用，也成为土耳其赢得民族解放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因素。因此，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就是 1920 年 4 月 26 日致列宁的信件。凯末尔在信中建议土苏建立外交关系，并请求在土耳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援助。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 6 月 3 日的复函中，表明苏俄政府同意苏土之间立即建立外交领事关系，并强调说：“苏维埃政府十分高兴地注视着土耳其人民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在土耳其目前艰难的日子里，苏维埃政府为使土俄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友谊奠定牢固的基础而感到荣幸。”不久，两国互派了大使，并通过互派代表团进行了多次的磋商，于 1921 年 3 月 16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土友好条约》。其重点是：(1)双方承认东方各族人民享有自由、独立和选择政体的权利；(2)废除沙俄帝国同土耳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债务，苏俄并放弃领事裁判权；(3)双方不得承认一方因迫于暴

力而接受的任何和约和有关土耳其的国际文件，特别是《色佛尔条约》，如未经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承认，苏俄政府将不予承认；(4)把统划入苏俄的格鲁吉亚，而在1878年划归俄国的卡尔斯、阿尔达汗和阿尔特温划归土耳其；(5)关于海峡的开放和通商问题，双方在坚持不损害土耳其主权和安全的条件下，同意由沿岸各国代表举行特别会议，最后拟定黑海海峡的国际条例。

当协约国企图在政治上奴役、军事上征服、外交上孤立土耳其的时候，《俄土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于巩固土耳其民族政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打破了帝国主义各国对土耳其在外交上的孤立，在道义上支持了土耳其。对此，凯末尔在致列宁的亲笔信中写道："同俄国的友谊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奉行的政策的基础。"苏联不仅在道义上援助了土耳其，而且在物质上也大量地援助了土耳其。1919年5月底6月初，苏俄布琼尼上校在萨姆松附近的哈夫扎同凯末尔的会谈中，就明确地表示："俄国将在武器军火方面给予援助。"从1920年起，土耳其国民政府就源源不断地从苏俄获得了各种军火和大量的财政援助。例如，1920年苏俄支援的步枪为6 000支，子弹为500万发，而在1921年，步枪就增加到了3.3275万支，子弹增加到57.9306万发。此外，还向土耳其提供了760万卢布。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坚持同苏联的结盟政策，努力发展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双方结下的友好关系。1925年，土耳其同苏联签订了《土苏友好中立条约》，从此，两国政府领导人之间，以及学者、作家、医生、演员、运动员之间的相互访问，颇为频繁。1932年，土耳其总理伊诺努访苏，参加了"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在土耳其客人访问期间，双方就苏联给土耳其贷款一事达成了原则协

议。1933年,伏罗希洛夫率领苏联代表团访土,参加共和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934年1月,土苏两国代表团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签署贷款协定。据此,苏联给土耳其提供了8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土耳其在20年内用本国商品偿还,条件十分优惠。土耳其利用苏联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在开塞利和纳齐里兴建了两个现代化的大型纺织厂。土耳其还决定学习苏联计划经济建设的经验,聘请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第一个工业五年计划。以奥尔洛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对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4年1月,土耳其曾向苏联表示愿意签订互助协定,以确保一旦第三方威胁海峡时两国间的合作。1935年11月,两国政府在安卡拉签订议定书,决定把1925年的《土苏友好中立条约》延长10年,从而使两国间的信任和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36年4月11日,土耳其政府照会1923年洛桑和会的参加国,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修改海峡制度。苏联第一个同意了土耳其的建议,但恰恰就在蒙特勒海峡会议上,两国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其主要原因是苏联对土耳其接近英、法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土耳其在蒙特勒会议上的立场没有充分理解,作了不适当的过激批评,而土耳其的民族利己主义立场,又进一步加深了两国间的不信任和猜疑。在蒙特勒会议之前,土耳其政府派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柏林、巴黎、伦敦等地,详细地了解各国政府对海峡问题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拟定了一个海峡制度草案,提交蒙特勒会议作为谈判的基础。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土耳其提出的草案不仅限制了非黑海国家军舰出入海峡,而且对黑海国家包括苏联在内的军舰出入海峡也作了某些限制,如只能通过15 000吨以下的军舰,而且要事前获得土耳其政府的许可。这些规定没有充分考虑黑海

国家的特殊利益，距苏联关于黑海国家军舰通过海峡不受任何限制的观点甚远，因而受到苏联代表团的批评。而土耳其代表团从民族利己主义立场出发，一方面表示放弃自己的方案，一方面却又支持更加漠视黑海国家利益的英国方案。土耳其代表团所持的这种立场更加深了苏联的疑虑和忿恨，受到苏联政府的严厉指责。

另外，使土苏关系蒙上阴影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与土耳其政府长期坚持反共政策有关。凯末尔作为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对土耳其共产党的活动一直视为洪水猛兽，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工人运动的发展，直到取缔共产党，迫使其转入地下。但凯末尔懂得苏联是当时国际上惟一支持民族运动的国家，是土耳其维护民族独立事业的国际力量，所以，他尽量不让国内的反共政策损害与苏联的国家关系。但随着土耳其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农民对社会不满的加强，土耳其资产阶级对国内工农运动的发展越来越恐怖，镇压措施也愈加严厉，对苏联的疑虑和不满也随之增加，1938 年的海军事件和大逮捕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土耳其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共立场，以及对苏联的疑虑和不信任，无疑起到了自己恶化与苏联关系的消极作用，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国关系陷入难以修补弥合的境地。

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

土耳其共和国对西方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斗争演变过程，主要表现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采取一种灵活的对外政策，把军事战线和外交战线的斗争结合起来，把打仗和谈判结合起来，尽量利用协约国之间的矛盾，选择适当的时机，朝着民族独立的目标前进。作为协约国主要成员的英、法两国，在土耳其

问题上长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法国的大多数政府要员和政治家们认为,英国人所拟定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和英国人对土耳其的军事占领,给法国在土耳其的利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因为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法国在土耳其的投资最多。据统计,法国在土耳其工业、铁路、公用事业、商业和银行业中的投资大约为5亿法郎,在奥斯曼帝国债务中所占的份额超过20亿法郎。因此,英国在安纳托利亚发动的战争,使法国的债务和投资受到巨大的损失。同时,实行瓜分土耳其的政策,也将使法国失去土耳其广大地区的殖民利益。一个法国记者在文章中写道:"把伊兹密尔交给希腊人,这就意味着对法国进行偷窃"。另外,由于英国反对法国在欧洲的对德政策,不支持法国对鲁尔的占领,也严重影响到两国在土耳其问题上的合作。许多法国政府要员和政治家们公开发表意见,认为法国没有理由在土耳其问题上支持英国。因此,瓜分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墨迹未干,法国政府就已经表示出修改它的愿望。此时,法国军队虽然仍然占领着西里西亚和伊斯坦布尔等地,但许多非正式的政府官员相继访问了土耳其国民政府所在地安卡拉,并对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斗争表示同情。1921年6月9日,以前部长富兰克林·布翁为首的法国代表团到达安卡拉,就与土耳其达成一项长期协定进行谈判。1921年10月20日,土耳其政府同富兰克林·布翁为首的法国代表团签订了《安卡拉协定》。《安卡拉协定》的要点是:(1)明确了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的新国界线,西里西亚归还土耳其,亚历山大勒塔州归叙利亚,但土耳其在该州仍保留类似自治的"特别行政制度"。(2)土耳其同意把巴格达铁路由巧班站至奴息本的一段以及法国企业家在阿达纳省修建的其他一些铁路支线的租让权让给法国,而法国也同意土耳其人有权沿着转往

叙利亚境内的铁路支线进行自己的军事运输。这一点给土耳其带来了重要的战略优势。(3)法国承诺立即从西里西亚和叙利亚边界以北的安纳托利亚地区撤兵,并公开声明自己在《色佛尔条约》上的签字无效,承认土耳其国民政府。此外,根据秘密协定,法国把它那时剩余的大量武器和军需品卖给了土耳其。

《安卡拉协定》的签订,不仅使土耳其获取了大约1.8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而且也是土耳其在外交战线上所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在军事上,法国的撤军,使土耳其能够将南部战线上的兵力转移到西线进行斗争,法国卖军火给土耳其,加强了土耳其国民军的装备,提高了其战斗力,从而加快了对希腊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政治上,《安卡拉协定》的签订,意味着法国这样一个协约国集团中的大国,承认了土耳其国民政府,极大地提高了土耳其的国际地位,特别是此协定进一步激化了英、法两国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土耳其与法国之间的关系继续向前发展。1926年,土耳其同法国签订了友好条约。1933年,土耳其与法国签订了关于解决原奥斯曼帝国债务问题的协定,土耳其同法国的关系完全正常化了。

作为协约国集团中的主要成员意大利,也不满意一战后英国对土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俄等国为了换取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同盟国作战,于1917年4月19日与意大利签订了《圣·让·德·莫廉秘密协定》,同意把土耳其自西里西亚到伊兹密尔一带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划给意大利。后来,在希腊首相维尼泽洛斯的活动下,英国把伊兹密尔让给了希腊,并纵容希腊于1919年5月占领了伊兹密尔。对此,意大利感到特别的愤怒,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因而在土耳其问题上处处于英国作梗。土耳

其国民政府抓住时机，同意大利取得联系，努力改善两国的对立关系，促使意大利一方面把大批武器卖给土耳其用来对付希腊侵略军，一方面于1921年6月撤出土耳其安塔利亚等地区的军队。土意关系的改善，特别是意大利的撤军，极大地孤立了英国和希腊，使土耳其可以集中更多的兵力来对付希腊侵略军。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两国马上签订了友好条约，对土耳其发展民族经济，进行社会改革，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土耳其对英国的关系并不忽视。英土两国之间的关系长期陷入僵局的原因，主要是《色佛尔条约》。1922年8月底9月初，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英国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不得不请求与土耳其国民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停战协定。缔结和约的会议于1922年11月21日在瑞士的洛桑举行。出席会议的一方是土耳其，另一方是英、法、日本、希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美国派遣了自己的观察员，苏俄和保加利亚被邀请参加海峡的讨论。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洛桑条约》。《洛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土耳其民族解放斗争在外交战线上的最后胜利。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土英两国为解决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摩苏尔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1926年6月5日，双方在安卡拉达成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土耳其和伊拉克划定边界线，摩苏尔划归伊拉克，而伊拉克政府每年从油田税收的本国份额中提取1/10拨交给土耳其。摩苏尔问题的和平解决，使长期冷淡的土英关系开始好转。1929年10月，英国舰队在第一次大战结束后首次访问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进入30年代以后，土英

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32 年 7 月,土耳其正式加入国际联盟,以此表达其在国际问题上与英国合作的意向,并在 1935 年与英国达成了地中海君子协定。1936 年,在蒙特勒海峡问题会议上,土耳其积极与英国合作,从而又向西方国家靠近了一步。1937 年、1938 年土耳其两次接受英国提供的大笔贷款。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出于对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主动与英国发表了互助合作宣言。从此,英国在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势力才正式进入土耳其。洛桑和会期间,美国只派了自己的观察员出席会议,而没有在洛桑和约上签字。但洛桑和会闭幕的翌日,土美两国代表就在当地开始了缔约谈判,并于 1923 年 8 月 8 日草签了土美友好条约和土美两国引渡罪犯条约。1927 年 2 月,根据土美双方交换的照会,两国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经济上,双方发展很快,1923 年美国已成为土耳其出口产品的第二大主顾,美货在土耳其进口商品中亦占第二位。不过,土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

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在历史上基本都是土耳其的属国,因此,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对土耳其国家和平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凯末尔就多次批判了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泛奥斯曼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有害倾向,宣布放弃对外的一切野心,坚决拒绝了民族解放运动内部要求收复西色雷斯和马斯顿的建议,而主张为了土耳

其未来的国际信誉,决不应该越出国民公约一步,而应该坚持其对内和平、对外和平的政策,有意地把自己的行动和愿望限制在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土耳其民族领土的范围之内,甚至不惜采用残忍但十分有效的交换人口的办法,解决了土耳其与其邻邦之间从古到今的纠纷。从而彻底地打消了人们对土耳其民族是否仍存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泛奥斯曼主义的疑虑,在国际事务中逐渐赢得了信任,顺利地与邻邦消除了历史上的一些隔阂,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1923年,凯末尔在大国民会议上谈到同希腊等巴尔干国家关系时说道:"我们同欧洲大陆上的邻国没有矛盾。我们真诚希望同对我们友好、与之有长期联系的巴尔干国家尽早恢复正式关系。"本着这种精神,土耳其在20年代先后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极大地改善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1923年1月30日,土耳其与其邻邦希腊签订了交换侨民的条约。条约规定:除居住在色雷斯及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外,其余一切居住在土耳其境内大约150万的希腊人,一律遣返希腊。而所有居住在希腊境内大约50万人的土耳其侨民亦一概返回土耳其。这种大规模交换侨民的做法,在历史上被视为创举。此外,还有大约50万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在此规定下,也被迁往苏联境内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土耳其之所采取如此残忍的手段以交换侨民,主要是鉴于过去西方列强往往以保护土耳其境内基督教徒为名而进行讹诈和侵略,而希腊境内的土耳其侨民一旦在受到希腊人虐待或杀害时,又将引起土耳其人的怨忿而兴兵讨伐。为了釜底抽薪,乃采取彻底交换的办法以杜绝今后两国纠纷之根源,谋求从根本上解决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3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土耳其又近一步加速了同巴尔干国家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在土耳其积极努力地推动下，1930年10月，第一次巴尔干联盟会议在雅典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在会议参加者的赞同下，巴尔干联盟设立了常设理事会、大会秘书处等组织。此后，巴尔干联盟1931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1932年10月在布加勒斯特，1933年11月在萨洛尼卡多次召开过会议。巴尔干联盟后因其内部矛盾存在不久就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有土耳其、罗马尼亚、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国参加的巴尔干公约。1931年凯末尔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由于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土耳其特别关心在巴尔干维护和加强和平。"本着这种精神和原则，1937年土耳其分别与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签订友好、互不侵犯、仲裁和调解条约。这些以土耳其为核心的合作条约，成为1934年2月签订的巴尔干公约的基础。巴尔干公约第一条明确宣布，缔约四国"集体保证它们巴尔干边界的安全"。此条约不仅针对试图修正巴尔干边界，要求通过西色雷斯重返爱琴海的保加利亚，也指向觊觎巴尔干地区的德意法西斯国家。因此，在巴尔干公约秘密附加的条款中特别规定，在非巴尔干国家进攻巴尔干国家的情况下，相互将进行经济、军事援助，总之，土耳其积极参与组织巴尔干协约国，是其睦邻友好合作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对于加强本国和巴尔干地区的安全，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土耳其与东方邻国的关系

土耳其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不仅同西方

国家建立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且也非常注意改善同东方邻国的关系，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1921 年 3 月 1 日，土耳其和阿富汗两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友好条约。1928 年，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在访问土耳其期间，续订了《土阿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关系，1931 年，土耳其与伊拉克也建立了友好关系，使两国长期冷淡的关系开始好转。在所有的东方邻国中，同伊朗的关系对土耳其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 16 世纪穆斯林什叶派在伊朗确立统治地位以来，两国一直处于一种敌对的战争状态，这不仅造成了两国巨大的经济、物质和人员损失，而且也为西方列强干预其内政敞开了大门，找到了口实。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虽然土伊两国在 1926 年订立了友好条约，关系比以前有所改善，但不断发生的边境冲突仍然时常危及两国间的关系。直到 1932 年 1 月，土伊双方缔结了边界条约，接着又签署了友好、安全中立条约和经济合作条约之后，两国关系才真正好转，并为近东协约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34 年，伊朗国内的报刊在评价近东国家结盟的思想时指出："东方各国人民只有借助结盟和巩固友好关系才能增强自己的实力。只有通过团结，东方各国才能结束外国人对他们权利的干预。"伊朗国王礼萨·沙萨也表示："通过消除宗教分歧，土伊两国才能真诚相待，携手并进，共同走向繁荣、幸福的未来。"1934 年，借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来土耳其访问之际，两国政府将友好合作关系向前更推进了一步。土伊两国邀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于 1937 年 7 月 9 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萨阿达巴德皇宫，签订了一项标志四国友好合作的《萨阿达巴德公约》。公约规定了缔约各方互相合作、互相协商和互不侵犯的原则。并且在首次理事会上决定一致支持土耳其竞选国际联盟的常

务理事。1937 年,凯末尔在一次大国民议会上评价萨阿达巴德公约时说道:“同东方国家的友好和接近,是共和国政府一贯追求的目标。”萨阿达巴德公约的签订,不仅保障了土耳其东部边界的安全,而且也使土耳其成为影响中近东国家政治背向的一个重要因素,表明土耳其与东方邻国的关系正朝着相互信任、加强合作,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方向不断发展。

第四章 战后土耳其现代化的发展

一、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

一党专制的解体

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因病逝世，终年57岁。他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亲密战友伊斯梅特·伊诺努，经大国民议会投票选举后，于1938年11月11日出任土耳其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同时担任共和人民党领袖，继承了凯末尔的大权，继续实行“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国家政体。凯末尔执政时期所实施的党政合一的政体结构开始松散。1939年5月，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党和政府分开，其任命不再相互结合，并决定在议会内成立一个与党团平行，由共和人民党议员组成的“独立集团”，起着反对党的作用，受委托批评议会和政府，以显示国家制度的民主性。为了进一步体现土耳其是一个民主国家，伊诺努总统于1945年8月批准伊斯坦布尔的大资本家努里·德米拉组建了“民族复兴党”。民族复兴党的领导和纲领都相当混杂，因此引不起人们的关注和支持，然而它的真正意义是树立了组建新政党和反对派的先例。同年11月1日，伊诺努总统在大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宣布允

许持有不同政见的同僚们组建政党，以公开表示他们的信念和发表其政治纲领。1946 年 1 月 7 日，凯末尔执政时期的最后一位总理杰拉尔·拜亚尔与共和人民党阿伊登省议员阿德南·曼德列斯等人脱离共和人民党，另外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民主党。同年 5 月，共和人民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决定解散在议会中由该党自己议员们组成的“独立集团”，放弃自己是国内惟一合法政党的垄断地位，并决定废除共和人民党党主席的常任制，改为党主席由代表大会每 4 年选举一次，以及实行党主席报告的工作原则，并主张把议会的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接着共和人民党政府又修改了 1938 年制订的“协会法”，进一步宣布允许以阶级和经济利益为基础，建立政党和政治协会。从此，土耳其开放党禁，实行民主的潘多拉盒子彻底打开了，从一党制向多党制政体的演变，在土耳其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社会洪流。据不完全统计，仅 1945～1950 年间，就有 27 个形形色色的大小党派相继成立，工会组织多达 88 个，其中势力较大的政党是 1946 年 1 月成立的民主党和 1948 年 7 月成立的民族党。

1946 年 7 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提前举行了 4 年一次的选举。选举结果，共和人民党取得了议会 461 席中的 390 席，民主党得 65 席，无党派人士得 5 席。随着民主党进入议会，由共和人民党过去一党垄断议会的局面遂告结束。共和人民党政府起先打算镇压这个反对党，但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伊诺努总统采取了超党派的立场。他在 1947 年的夏天发表讲话，称多党制民主国家要求各党派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应对各自行为负责，在朝党应尊重在野党的权利，从此，共和人民党政府强硬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1946 年 7 月，民主党进入议会后，同执政的共和人民党的角逐便

随之开始。民主党利用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因战争带来的经济失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和物质匮乏之机，集中对国家的经济形势进行抨击。同时利用一些资本家对共和人民党国有化政策的不满情绪，提出“私人主动精神”是土耳其经济生活的基础，并宣称如果民主党执政，将把国家建立的企业转让给私人经营。同时重申坚决拥护凯末尔主义，尊重自由选举和权利平等，保护工人、农民、商人等劳动者的利益。民主党还利用一些宗教人士和部分保守农民对某些世俗化改革政策的不满，在宗教界和农村进行广泛地活动，把所有不满意共和人民党的人统统拉进民主党。1950年3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受到各党派赞同的新选举法。它规定由司法机关监督选举，秘密投票和公开计票，使公民在行使投票权时避免了干涉。各党派随即在竞选活动中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争取选民。而这方面民主党取得的成绩最大，因为他们拉拢的选民对象，自然是那些不论出于何种动机，但都强烈要求改变现实统治的人。在1950年5月14日的全国大选中，近90%有选举权的人进行了投票。选举进行得很有秩序，计票也很公正。一位土耳其公民在谈起他家乡的选举情况时说：“1946年的选举，计票人奉命不让人看到计牌，并得保证让共和人民党获胜。而1950年的选举则不同，计票牌挂在公众面前，并当众计票，于是这一堆票属于艾哈迈德，那一堆票属于穆罕默德，分得清清楚楚。”民主党虽然在选举之前就早为许多人预见会获胜，但胜利之巨大尚在人们的预料之外。它取得绝对多数票，约占总投票数的53%。在大国民议会总共487个席位中，共获得408个席位，而共和人民党仅获得69个席位，民族党获得1个席位，无党派人士获得9个席位。1950年5月22日，大国民议会选举民主党党魁杰拉尔·拜亚尔为

土耳其共和国第三任总统，民主党主要领导人阿南德·曼德列斯出任总理，并组成了一个有 14 名部长的民主党内阁。在共和人民党将政权和平地转交给民主党之后，这场从一党专制向多党制政体演变的政治革命就圆满地完成了。没有发生暴力和流血，没有发生军人干政，这一切在土耳其历史上是空前的，是广大群众对民主政治的信念所致。从此，土耳其开始了民主党 10 年的执政时期。

民主党的垮台与新宪法

民主党执政的 10 年，前后政治气氛有着巨大的变化。1950 年政权的和平移交，使全国出现了一个政治“蜜月”时期。尤其是在繁荣的 50 年代初，民主党成为土耳其最受民众拥护的政党，人们均称道这短短几年政治上的自由。1954 年的选举做到了完全的自由和公正计票，使民主党的总得票率增加到了 58%，取得了 503 个议席，而共和人民党的得票率仅为 35%，占 31 个议席。但不久即有迹象表明，议会中席位的增加，以及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使民主党对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批评非常敏感，增强了对舆论的监督和控制，朝着日益独裁和压制反对派的倾向发展下去。至 1954 年底，共有 3 名公开批评政府的新闻记者被判刑，另外有 4 名被解雇。1955 年，共和人民党总书记卡泽姆·吉列克因在一次政治发言中攻击民主党政府而遭监禁。同时，有 5 种报纸因违反政府的新闻检查规定而被迫停刊，其中包括共和人民党的喉舌——民族报。

民主党在执政期间实行镇压民众的一系列措施，不仅遭到反对党的严厉批评，同时也引起党内部分成员的不满和反对。1955 年 10 月，许多民主党成员由于拒绝服从民主党的纪律而被开除，

另一些则由于与党的领导人意见不合而宣布退党另组建新的"自由党"。该党宣布支持一个合理的纲领:包括从1950年以来土耳其所发生的一切为基础的经济计划、民主政权和宪法保障的法律秩序。民主党政府鉴于反对党日益增多,还有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它的可能,于是通过一项新的选举法。该法不仅禁止党派联合,用来防止各党结成反执政党的联盟,而且使民主党即使不能获得多数票时也可以在各个选区取得相对多数的议席。

此时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形势比较错综复杂。虽然民主党在知识分子中和大城市中遭到了反对,但在农村民众中却赢得了支持。因为民主党政府在农村修建了道路、灌溉设施、供电设备和设立了许多小学,使广大农民得到了许多实惠。另外民主党政府积极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使其每年分配给农民一些国有土地,使得商人和小手工业主的利润和收入比过去大有提高,这部分民众手中掌握着较大比重的选票。因此,尽管民主党在政治上镇压民众,摧残反对党,公开抛弃了民主和法律,在经济上导致通货膨胀,物质短缺,但在1957年的大选中,仍然以多数票获胜,赢得议会席位中的424席,但此时作为主要反对党的共和人民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已由1954年大选中的31席,此次上升到了178席。共和人民党由于在议会中的席位增多而斗争信心大增,所以在选举后的第三天于加济安特普市举行"共和纪念日"活动,此后该活动演变成为反政府的示威游行。

1957年的大选之后,民主党政府对反对党的批评指责不但不虚心改进,而且报之以更加严厉的镇压,甚至不惜动用军队。民主党的领导人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要军队履行此种政治上的职责,以及用一种铁腕手段便可以维护他们的统治。实际上他们破坏了

民主政治机制的正常运行，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为日后军人干政找到了口实。待到1959年，因经济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的专制，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军队担心宗教活动的日益增加，将使凯末尔世俗化改革所获得的社会进步付诸东流，使得民众对民主党政府的不满情绪更加激化达到了顶点，纷纷在报纸上指责民主党政府总理曼德列斯是土耳其的李承晚。1960年2月，曼德列斯更换了他的司法部长，由他的亲信杰拉尔·亚尔德姆支继位，以便进一步镇压反对者。4月18日，民主党控制的议会经过一场激烈的以全武行告终的党派辩论之后，设立了一个调查共和人民党活动的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被授予超越议会和法院的特权，可以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并没收各种文件，查禁报纸以及逮捕违反上述和其他规定的人。共和人民党反对特别调查委员会滥用职权，于是民主党政府宣布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两城市实行戒严。5月20日，被激怒的安卡拉大学和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学生们上街举行示威游行。5月21日，又发生了大批安卡拉军校的学生们上街举行反政府的示威游行。1960年5月27日拂晓，军队出动坦克控制了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逮捕了拜亚尔总统和曼德列斯总理，以及内阁全体成员和议会中大部分的民主党议员。四个小时之内，一场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完成了。陆军总司令古尔塞勒将军就任临时政府首脑。军队还成立了一个“民族团结委员会”，管理国家日常事务，其成员大都是这次政变的领导者。

与此同时，一切政党活动都被停止了。政变的军人们决定制定一部新宪法来修正旧宪法中的缺点，尤其是要防止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多数党专制统治的重演。新宪法由政变爆发后几小时从伊斯坦布尔大学请来的法律专家们组成起草委员会。1961年1月

至 6 月，在由军人组成的民族团结委员会主持下召开的制宪会议，彻底改写了新宪法草案，最后定稿的新宪法内容非常详细具体。1961 年 7 月 9 日，新宪法提交全国公民投票表决，投票赞成者为 62%，反对者为 38%。该宪法从而成为了土耳其从 1876 年的宪法以来实行的第五个成文宪法。1961 年的宪法与 1924 年共和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相比，其主要的原则区别在于它加强了行政机构，把大国民议会由一院制改为两院制，并增设了宪法法院。另外，按照 1961 年宪法的规定，总统是国家之首，由大国民议会的议员通过秘密投票以 2/3 多数选举产生，任期 7 年，年龄不得低于 40 岁，必须接受过高等教育。如一旦当选为总统，必须脱离与其所属政党的联系，议员资格也须终止，如果是军人还须脱离军籍，同时不得连选连任。在必要时，他可以主持内阁会议，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发布命令。只有当大国民议会两院以2/3的多数票通过时，才能以重大判国罪弹劾总统。新宪法还规定，政府总理由总统在大选中获得多数票的政党领袖中任命。各部部长则由议会提名，再由总统任命，政府内阁成员一律对议会负责。1961 年的新宪法具有反映时代新精神的一些规定，增添了一些富有民主色彩的内容，这无疑在团结土耳其各种政治力量，维护国内安定团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保证了土耳其的多党政治沿着民主大道继续前进。

60 年代的土耳其政治

在国内外强烈要求还政于民的呼声中，军人干政后的第 17 个月，土耳其参众两院的议会选举终于举行了。然而，1961 年 10 月 15 日的选举结果，在参加竞选的 14 个政党中，没有哪一个政党获得多数派，从而表明新组建的文官政府只能是一个联合政府。与

此同时，土耳其参众两院选举古尔塞勒将军为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在当时，他似乎是民族政治团结的必需品。他卸下戎装，辞去军职就任总统职位，但政府内阁地组成却很困难。虽然为了使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在11月，组成以资深政治家、共和人民党领袖伊诺努为首的联合内阁，军方做了许多工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把前民主党的许多党员拉入自己队伍的正义党，坚持要大赦被判有罪的民主党政治家，因此根本无法与军方的立场一致，使得联合政府终于在1962年破裂。继后的两届联合政府内阁，都是由共和人民党和一些小党或独立人士组成，均由伊诺努出任总理，但都缺乏内聚力。1965年初，伊诺努领导的第三届联合政府在议会投票表决预算时被推翻下去。在这次倒阁行动中，由新领袖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起了主要作用。随后，正义党与其他3个小党组成了以非党派人士领袖于尔居普吕为首的联合政府，德米雷尔出任副总理。伊诺努与共和人民党以反对派的身份准备参加新的竞选。竞选活动主要由6个政党参加，共和人民党的选民对象一如既往，主要是老的官僚阶层、军官、城市知识分子、地方显贵和大地主。正义党则对土耳其社会新兴分子有号召力，他们是自耕农、成长中的商业和工业中产阶级、城市工人，以及新迁入城市的乡下人。

在竞选活动中，各党派就以下这些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土地改革、经济发展、对外政策，甚至还讨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除代表宗教和社会保守主义的民族党，以及赞成专制政府去加速社会发展和改革的极右派共和农民国家党外，还出现了土耳其劳工党。它由城市知识分子领导，但希望获得劳工乃至农民的支持。这个公开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组织政党的存在，以及提出的政治纲领，长期影响着其他政党的行为。共和人民党的政治路线则稍稍

偏左，即伊诺努所谓的“中间偏左”原则。正义党则一心一意维护企业和外国在土耳其的投资，在政治上向右倾斜。1965 年 10 月的大选，是土耳其国内重要的政治事件。在这次大选中，人们原预测正义党不可能获得多数选票，因为当时有 6 个政党并存，认为土耳其将会出现一个以正义党为首的多元化政治格局。但选举的结果却是正义党获得了 53% 的绝对多数选票，堪与 1950 年民主党的巨大胜利媲美。共和人民党则不尽如意，仅得到 29% 的选票。劳工党也仅获 3% 的选票，成绩之差也使预测者们大惑不解。正义党通过它所获得的胜利证明，它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它不仅继承了被取缔的民主党外表，还有它的实质。根据新的议会比例代表制，正义党在议会中占 240 个席位，共和人民党占 134 个席位，劳工党位居第五位，占 15 个席位，但这是在土耳其的议会中，第一次可以听到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

新总理德米雷尔组成正义党内阁后，联合政府随即消失。德米雷尔是一位深受西方影响的新型政治家，与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家们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时期的革命家们相同，都出身寒门，接受过西方式的现代教育，然后都从政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员。不仅如此，德米雷尔还是一位专业管理工程师，具有丰富的经营私人现代企业的经验，并在美国学习过。他年轻、务实、富有朝气，是党内温和的政治家。德米雷尔上台执政后的首要任务，是向土耳其民众证明，正义党能够对国家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他首先通过获取军队的支持做到了这一点。1966 年 3 月，第四任总统古尔塞勒因病去世，议会新选的前土耳其军队总司令杰夫德特·苏奈出任共和国第五届总统，使得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政府与军队紧张的关系有所缓和。德米雷尔表示政府继续支持军队现代化，改善军

官和士兵的待遇，避免干涉军队事务，而军人出身的总统苏奈也下令，军队不得卷入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双方并就长期影响关系的大赦民主党成员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不久，根据土耳其大赦法的规定，前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拜亚尔及500名成员相继被释放出狱。其次，德米雷尔抑制了党内的右翼势力，继续执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并谋求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缓和。此外，德米雷尔还制定了一系列稳定社会，改善国家经济的措施。在1969年的大选中，正义党获得众议院450席位中的260席，共和人民党得144席，信任党14席，统一党7席，民族党6席，新土耳其党3席，土耳其工人党2席，民族主义运动党1席，无党派人士13席。1969年的大选确定了正义党在土耳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影响土耳其政局前后达10年之久。即便如此，正义党的执政仍然暴露出了影响国家今后稳定发展的一些社会问题。第一个是社会主义的作用问题。一些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比实施迄今往往效率不高的混合经济更能使国家有希望。认为与凯末尔年代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党初期的自由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意识形态。另外一个问题涉及正义党在获得巨大胜利后，会不会像民主党政权后期那样，情不自禁地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和个人自由。一些右翼知识分子则担心正义党将迎合全国中小城镇和农村多数人的物质、有时是蒙昧主义的要求，来牺牲实实在在的西方化和社会进步。另外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则担心伊斯兰宗教作用将东山再起，尤其是当它形成政治力量后，将危及共和国的世俗化改革成果。他们甚至谈论过其他国家发生过的可能性，即被他们称作为“黑色力量”的宗教作用，与在政治上和具有激进主义色彩的“红色力量”结合起来，从而葬送土耳其共和国。因

此，在60年代后期，土耳其社会与中东其他国家相比，它虽然取得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和进步，但也还存在着许多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1971年3月12日，由于土耳其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纸币大量贬值，物价持续上涨，民众怨声载道，引起社会的动荡。特别是执政的正义党内部发生分裂，政府难以继续施政。鉴于局势严重，军队总参谋长和陆、海、空三军司令联合致函总统和参众两院议长，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受人们信任的超党派政府，以消除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并要求在凯末尔主义的原则下进行社会改革，否则，军队将按照保卫共和国的法律规定，接管文官政府。慑于军队的压力，以德米雷尔总理为首的正义党政府在召开内阁会议后即宣布辞职。总统遂受命无党派人士埃里姆组织了一个超党派政府，并发起了一场打击左右翼势力的运动。这次军人干政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两大对立政党的再次联合，打击了无政府主义，使得整个社会趋向稳定，保障了土耳其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继续有效地得到了贯彻执行。

政局动荡的70年代

自1971年2月，正义党德米雷尔政府在军方迫使之下辞职，以迄于1980年9月12日的军人接管政府时止，9年之间政府更换达11次之多，其中超党派人士组织政府5次，而主要由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两大对立政党为首组织的联合政府有6次，每届任期最长的不超过两年。他们相互倾轧，互相折合，使得土耳其政局日益动荡，加之70年代中期欧美国家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对土耳其的冲击，使得其经济更加严重恶化，几乎陷入崩溃的边缘。

70年代最初的年代里，土耳其政府由所谓的超党派人物组

阁,总理频繁地更迭。此时,共和人民党内部正在进行领导人的更替,年迈保守的伊诺努退位,年轻更具有魅力和才华的比伦特·埃杰维特接替共和人民党的主席。下野的德米雷尔也在正义党内部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使其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大党,具有选择一些小党与之合伙组成联合政府的能力。在1973年的大选中,以埃杰维特领导的共和人民党获得议会中的多数票,而正义党的议席从过去的256席下降为149席。不过,共和人民党在议会中所获得的席位未超过法定组阁的半数,正义党又拒绝与其组成联合政府,所以到1974年底,埃杰维特终于将政权移交给由正义党领导的,有救国党、民族行动党和民主党参加的祖国阵线,组成联合政府。德米雷尔联合救国党、民族行动党等右翼小党组成反对左翼的联合政府,是他政治生活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因为极右的民族行动党人效仿法西斯主义者,组织右翼青年走向街头,狂喊极右口号,攻击工人、左翼学生以及共和人民党成员,造成恐怖枪杀事件日益增多,使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大国民议会宣布在1977年6月提前大选。在这次大选中,共有正义党、共和人民党、民主党、救国党、民族行动党、共和信任党、土耳其工人党和土耳其统一党等8个政党参加。结果,共和人民党获得议会中的213席,正义党排名第二,获得议会中的189席。可是,在大选中排名第一的共和人民党所获得的议会席位没有达到议会中450席的半数,从而未能获得议会批准组阁的信任票。而此时列居第二位的正义党却又一次联合救国党、民族行动党等右翼小党,组成祖国阵线的第二届联合政府,仍由德米雷尔出任总理。上台的第二届联合政府,仍然未能很好地解决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

1977 年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制止，而且仍继续发展，造成食品和日用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 30%，出口贸易萎缩，国际收支逆差居高不下，失业者的人数达到 300 万，政府的财政负担压力越来越大。不久，在第二届联合政府里，三个政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正义党内部的纠纷也在不断地发生。1977 年 12 月，有一些议员相继退出了正义党，遂使德米雷尔政府在议会中失去了绝对多数的地位，因而被迫辞职。此时，在 1973 年 4 月 6 日当选为共和国第六任总统的前退休海军上将法赫里·科鲁蒂尔克授权共和人民党主席埃杰维特组织新政府。虽然共和人民党在议会中的席位较多，但仍须拉上民主党、共和信任党和从正义党退出的 10 名“无党派”议员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共和人民党在处于微弱多数的情况下组织政府，使得它在政府和议会中想作出任何决定和通过任何法律，都要考虑到这些小党派人士的意见，这就形成了在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大党受制于小党的奇特现象。

在埃杰维特领导的共和人民党政府的执政时期，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各种不同的法律 100 多个，其中有许多法律是为了使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正常化的。1978 年 1 月，埃杰维特政府为了克服现存的经济危机，专门成立了一个经济问题委员会，试图制定出一些稳定社会经济的有效政策。1978 年 2 月，经济问题委员会首次提出了一项稳定社会经济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将土耳其的货币里拉贬值 30%，从而提高土耳其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压缩进口，积极吸纳国外土耳其劳务人员的侨汇。同年 3 月，埃杰维特政府批准了将所有私营的煤矿、矿场及矿山开采项目收归国有的法律草案。埃杰维特政府一系列稳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相继出台，使土耳其的经济有了一些好转。1979 年 2 月，在美国商

业部长的报告中，特别指出了这个变化。报告中写道："土耳其1978年的外贸逆差只有1977年度的半数，主要由于将进口额下降了近1/3，并在1978年1～7月间将出口额增加了11亿美元，与1977年度相比较，出口额增长了15%。"

1978年，经过埃杰维特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经济危机有所缓和，但国内的政治危机却日益严重，特别是在极右的民族行动党的鼓动下，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更加猖獗，社会上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社会秩序的混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此外，1978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国王巴列维出逃，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上台执政，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的鼓舞下，中东各国伊斯兰复兴运动蓬勃兴起。1978年12月初，土耳其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拥护者们在安纳托利亚东部马腊什省挑起流血冲突，造成10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2月16日，埃杰维特政府宣布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13个省戒严，以防止事态扩大。然而，宗教极端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不但没有被制止，而且仍在不断增加。其后，戒严的省份扩大到了19个。此时，土耳其的政局更加动荡，经济更加恶化，货币里拉不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外贸出口未能继续上升，而外债却增加超过了100亿美元。

1979年10月，土耳其举行了大国民议会参众两院部分议员的改选，共和人民党和它所联合的无党派议员失去了在众议院里的多数席位，正义党取得了胜利，埃杰维特不得不辞职下台，总统法赫里·科鲁蒂尔克依据国家宪法的要求，决定由正义党领袖德米雷尔再次组织政府。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在这次大选中得以击败脆弱的埃杰维特联合政府而上台，主要是依靠了一些右翼小党的支持。因此，他上台执政后，自然也要将政策向右转，从而制

定和采取了一些压制民主和工会自由的法令和措施，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德米雷尔未能有效地克服中央银行由于外汇储备缺乏而停止支付的财政困难，对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无所作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军队鉴于国家形势危急，乃于 1980 年 1 月向总统法赫里·科鲁蒂尔克递交了一份声明，要求所有合乎宪法的组织结束党派之争，建立合作关系，以消除国内的无政府主义，并把经济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声明在国内各大报刊上发表之后，总统与各主要政党的领袖及大国民议会参众两院的议长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法令，向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门授予了处理紧急突发事件的广泛权力。所有在大国民议会中有代表席位的政党都表示坚决拥护这项法令，但由于各政党之间并无意于真诚的合作，相互指责，相互倾轧不止，使得新法令根本就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1980 年 4 月，总统法赫里·科鲁蒂尔克的 7 年任期已满，按宪法规定，须由大国民议会两院联席会议选举新总统。可是经过数十次的投票，竟然未获结果。所以，从 1980 年 4 月 7 日起，土耳其总统职务便由参议院议长暂代，整个社会陷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最终导致了以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将军为首的军人，在 1980 年 9 月 12 日发动了军事政变，全面接管了国家政权。土耳其军政府在扼制住社会动乱的同时，开始探索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试图从改革和开放中寻求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1982 年土耳其通过了新的宪法，1983 年军政府还政于民，由被称之为土耳其“经济设计师”的厄扎尔出任总理，从此，土耳其的政治与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二、社会经济体制的演变

50年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国内百废待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早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推动民族经济蓬勃向前发展，这是摆在土耳其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战后国内政治民主化变革浪潮的推动下，土耳其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几个不同特点的发展阶段，一步步从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原则，走向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全方位开放的发展道路。这种经济的运行，从国家主义强制的行政干预，向含有调节机能的市场经济方向不断过渡，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构性转变，都充分体现了土耳其经济变革的客观发展趋势，强烈地反映了土耳其人民努力发展民族经济的意向。这种意向顺应了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独立，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经过1950年5月的大选，土耳其民主党获得了胜利，组成了新的政府。新政府一上台，就对国家经济领域内的一些方针政策做出了巨大的修改与调整，改变了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实行的国家主义经济发展原则，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政策，试图使土耳其的经济从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逐步减少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民主党政府特别反对制订任何经济发展计划，认为经济计划就是对私人经济发展的束缚。民主党政府总理曼德列斯本人就公开声称“预算就是计划”。他的工业部长则说：“让我们先干吧，计划嘛，以后再说。”当建筑工程部部长法赫里拟定了一份交

通、水利建设的五年计划时,曼德列斯竟破口大骂这个计划是以一个"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这种对经济计划的偏见和敌视,既反映了当时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上的巨大转变,也为以后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出现埋下了祸根。

积极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努力发展农业,是民主党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但同时政府也继续发展国有企业,这是因为私人经济刚刚起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民主党政府在信贷投资,以及利税等方面都重点向私人经济倾斜,从而有效地保障了私人经济的迅速发展。战后,土耳其的私人经济比重从 1950 年的 52%,上升到了 1954 年的 65%,私人企业从 1951 年的 660 家,发展到了 1953 年的 1 159 家,而到 1960 年已经发展到了 5 284 家,并且在规模和人数方面也都有了较大的增长。战后土耳其私人经济的迅速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精力旺盛,具有创新观念,并具备优秀管理能力的企业家,他们的才干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家们相媲美。同时,土耳其的大批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以及物美价廉的各类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和吸引力。当然,战后土耳其私人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尤其是表现在地理布局方面。例如在某些地区私人企业发展比较快,规模也比较大,而在另外一些地区,虽然私人企业也很多,但规模比较小,发展缓慢,甚至在有些地区私人经济还是一个空白。此外,不断加快土耳其工业化的步伐也是战后民主党政府发展经济的基本方针之一。因此,政府积极鼓励每个企业家到工业领域内大量投资,许多私人企业家也都渴望到工业领域内投资,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严重制约着他们的行动。例如在实际行动和心

理上，大多数人都还没有作好在工业领域内大胆投资的准备，虽然政府在立法上通过了许多关于信贷投资以及利润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但在落实过程中，却常常被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打折扣而受到影响。另外，国内一些基础设施的缺乏，如交通、水电、通讯等方面的落后和不完善，也是严重制约私人企业家大量在工业领域投资的一大障碍。这种状况直到50年代后期才有所缓和，这也说明土耳其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需要有一个过程。在就是土耳其私人企业家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互不信任，使得许多公司各自为政，单独经营，从而形成不了大规模的经济力量，造成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一定的竞争能力，这也是制约土耳其私人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长期以来，严重影响土耳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缺乏资金。战前，少有外国私人资本在土耳其投资，一方面是共和人民党执政的政府对国外私人投资不感兴趣，缺乏热情；另一方面是因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处于大萧条之中，各国资金都严重的不足。战后，土耳其民主党政府为了迅速恢复经济，早日实现工业化，急需大量资金。1950年和1951年，民主党政府先后颁布两项鼓励外资的法令，即5583号和5821号法令。两项法令实施后效果并不佳，其主要原因在于对投资限制过多。1954年1月，民主党政府聘请了一些美国经济专家为顾问，制订并颁布了一项新的外资法——第6224号法令。此法令是在前述两项法令的基础上做了重大修改后而拟定的。由于条款内容优厚，被一些经济专家称为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吸引外资的法令。第6224号法令规定：外国资本在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得垄断及享有特权的前提下，可以在土耳其私人资本投资的领域进行投资，并且外国的资本与土耳其国内资本享有同等的权利。该法令还明确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将所

得利润的全部或部分在土耳其再投资，外国公司并且还可以把净挣得的利润，拍卖收入中外资所拥有股份的全部或部分，清理财产的全部或部分，外国贷款到期后的本利，按当时土耳其官方的汇率以外资国家的货币汇往国外。

由于土耳其政府的法令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相当优惠的投资条件，因此广泛地引起了外国投资者的极大兴趣，大批的外国投资者接踵而来。从 1951～1961 年，外国的投资平均每年达到 2 200 万里拉，占土耳其总投资年平均数的 21%。这段时间，国外对土耳其的投资主要来自美国、西德、瑞士、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另外，国外对土耳其投资的重点也是比较合理的，主要集中在石油的勘探开采，以及化学药品、纺织、电器用具、食品加工等行业。据有关资料统计，外国投资的资金 85%～90%是在工业领域，11%～15%的资金是在服务性的第三产业，1%是在农业，并且为 17.5 万多名土耳其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这段时期外国投资的形成主要是提供设备，完成工程设计施工，以及技术援助和转让专利权等。例如 1951～1960 年，土耳其批准外国投资额为 5.47 亿里拉，其中 80%是向土耳其的企业提供设备和技术转让。更为重要的是，外国对土耳其的投资，不仅为土耳其带来了市场和利润，而且还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从而有利地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驾齐驱。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于土耳其来说过去一直都是非常缺乏的。战后外国的大量投资，一方面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土耳其的社会带来了许多潜在的问题。首先是过分依赖于外国的投资，使历届土耳其政府在制订国内各项方针政策时，不得不听命于提供投资的那些国家，不得不接受那些国家所附带的许多苛刻条

件，从而丧失了一定的主权和独立性。其次是大量的外国投资，使土耳其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包袱，对土耳其以后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土耳其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在土耳其共和国初期，政府对农业的发展还是比较重视的。具体表现在重视农业教育，大量优先向农业发放贷款，从国外引进新的农作物，不断改善优良品种，努力发展和完善各种农业服务设施，并制订了一系列关于土地使用和占有的立法，结果在 1923 年至 1932 年的 10 年间，土耳其的农业产量增加了 50%。30 年代以后，国家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了发展工业方面，而忽视了对农业的发展。在国家制订的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和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中，就根本没有提出如何发展农业，仅只提到要重视和鼓励农业产品的出口。在整个 30 年代，土耳其的农业产量仅增加了 20%，并且不是依靠改善农业耕作技术所取得的，而是依靠扩大耕作土地面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时动员和紧急状态，以及恶劣的天气，使土耳其的农业产量急剧下降。1950 年民主党政府上台后马上改变了过去长期对农业发展不重视的做法，其目的是，一方面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笼络广大农民获得更多的选票；另一方面是因为土耳其的农业太落后了，严重制约了土耳其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民主党政府一上台就制订了一系列全面推动和促进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在广大农村大规模地实行机械化，以及加速国有土地的合理分配和使用。这一政策的实行使许多农民家家都重新有了土地，从而使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业产量逐年地增长。小麦的产量增长了两倍，水果、蔬菜以及别的农产品增长的速度更快。另外，国家也加强了对农

业的投资，并且减免农业税收和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一时期促进土耳其农业发展的还有一些间接性的因素，如世界粮食价格的不断增长，朝鲜战争对粮食的极大需求，在加上 50 年代最初的几年中风调雨顺的好天气，以及农村水利灌溉设施的不断改善，等等。

战后，尽管民主党政府积极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但是土耳其的国有企业一直控制着炼钢、炼铁、化工、化肥以及棉纺织品等国民经济中的主要行业。并且在技术和设备方面也比私人企业先进，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也比私人企业的好，国有企业长期制约和影响着土耳其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上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是战后民主党政府为了克服在发展民族经济道路上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迫切需要国家动员与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在 50 年代初期中东地区国有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土耳其政府制订的经济发展政策多少也有着一定的影响。最后是因为在战后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土耳其的私人资本也无力兴办和经营大中型企业。

50 年代后期，由于以曼德列斯为首的民主党政府，在政治上大搞独裁，排除异己；在经济上过分推崇自由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长远的计划，而是追求增长的高速度，盲目引进，盲目生产，放任自流，造成整个国民经济失控。其结果是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严重，产品过剩积压，没有市场，卖不出去，而内债外债又居高不下。1952 年土耳其的外债仅是 7.75 亿里拉，到了 1960 年已达到 50 亿里拉，而内债高达 100 亿里拉。此外，土耳其的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也持续下降。1951～1953 年，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1.9%，而 1954～1960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只

有4.2%。土耳其的整个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从而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造成土耳其社会的长期动荡。

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的军人发动政变，一举推翻了土耳其民主党执政的政府。1961年7月9日，全国公民投票通过了土耳其军政府制订的新宪法。同年10月15日，经过普选产生了大国民议会参众两院的议员。10月26日，大国民议会举行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选举军人政变首脑、陆军总司令杰马尔·古尔塞勒为土耳其第四共和国总统。11月初，总统指定土耳其最大的政党共和人民党主席、前总统伊诺努组阁。11月20日，以伊诺努为总理，由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正式成立。至此，持续一年半之久的军政府还政于民，土耳其的经济从此开始进入了战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和舆论准备之后，从1963年开始，土耳其政府实施了长达15年的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又分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63～1967），第二个五年计划（1968～1972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73～1977年）三期来实施。计划组织的指导工作及计划初稿，是由首席顾问美国人廷巴根拟制和指导的。从此，土耳其进入了一个新的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将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向前推进。这个时期的经济特点是，一方面政府继续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将经济计划原则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61年的土耳其新宪法，从法律上为土耳其制订了一个混合型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一种混合型的经济体制。它的

特点是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同时，为了弥补市场的不足，纠正市场的失效，国家对社会经济干预的方式和力度随着国有经济的消长而不断变化。土耳其这种混合型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土耳其统治阶级急于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与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之间矛盾的产物。至此，历届土耳其政府都坚定地接受了这个重要的经济发展原则，但土耳其政府对国有经济与私人经济在投资和扶植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主要是在基本设施和重工业方面，如能源、交通、通讯、机械加工、钢铁、化工、化肥等。而对私人企业的投资主要是在日常的消费品方面。如食品的加工、纺织、皮革、纸张等。但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指导方针这时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把私人企业中的风险机制引入到了国有企业之中，从而使得一些国有企业内部产生了巨大的活力和显著地提高了经济效益。当然，根据国家的某些投资条例规定，基础设施和重工业领域也对私人企业开放。实事上，在战后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私人企业在金属制造业，机器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及金融保险等过去均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中，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 1970 年，土耳其的私人企业已经发展到了 17.5 万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 1968 年是 210 家，1973 年是 470 家，1977 年已达到 1 584 家。在工业中，尤其是在制造业中，私人企业的产量，销售额以及雇员的比重在许多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几乎垄断了羽绒皮革业、橡胶业、玻璃与玻璃器皿业以及科学仪器设备业的全部生产。另外，从雇员和产品销售额的关系来看，私人企业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讲求经济效益。例如，在 300 个最大的土耳其企业中，经营的食品、饮料及烟草等企业的雇员仅占这类企业总雇

员的25.3%，但其产品的销售额却占总额的43%。在金属制造品以及机械制造行业中，私人企业的雇员占总人数的23.8%，但销售额却占总额的60.5%。换言之，私人企业用了不到一半的人数，却创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产值。

60年代的土耳其，虽然是混合经济，但金融活动主要控制在国家手里。货币政策和货币发行皆由国家中央银行执行，其资产是私人银行的2倍。五年经济计划建设开始之后，建设资金也完全划归中央银行管理，中央银行将全国各银行资金的70%集中在自己手中，以供政府支配使用，只余30%留给各银行作为流动资金。所以，经济计划建设资金的半数以上主要是由国库拨付，其余部分则由私人企业自己筹措。至1962年，土耳其共有商业银行55家，其中有36家属于私营，5家属于外国银行，14家属于国有银行。在36家私营银行中，首推企业银行，其次是建设与贷款银行，这两家的资产占全部私营银行资产的半数。在"一·五"计划期间，各银行不断增设分支行，多方吸收存款，特别是在1964年，由于政局稳定，流动资金比较充裕，使得存款倍增。此时，各银行的贷款放松，而储户提款则较少，形成各银行经营的繁荣局面。1963～1967年，土耳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是10.9%，而各银行系统的资本年均增长率达到14.9%，在促进土耳其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外，在此期间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劳务输出创汇，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可靠资金。土耳其的劳务输出很发达，劳务输出在土耳其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西欧各国的劳动力价格昂贵，在加上地理位置又比较近，所以西欧各国一直成为土耳其劳务输出的最大市场，人们到国外去打工是很普遍的事情。

战后,随着西欧经济的不断恢复,土耳其的劳务输出人数也再逐年增长。到70年代,平均每年对外劳务输出大约在100万人左右,平均每年在国外工作的劳务人员向国内寄回来的外汇达9.87亿美元,1974年达到最高峰,从国外寄回来的外汇总数超过14亿美元,似乎与这一年国家出口创汇的数字一样高。土耳其发达的劳务输出,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好处,首先是为土耳其减少了大量的失业人数,减轻了就业负担。其次是在国外的劳务人员在西欧等发达国家学习到了许多先进的工作技能,为土耳其免费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人才。最后是在国外工作的劳动人员通过把挣来的钱寄回国内,使土耳其每年可以获得大量的外汇,解决了土耳其的贸易逆差,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金。当然,靠劳务输出创汇容易受到外来因素变化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以及西欧各国为了保障提高自己国家的就业率,对外来劳工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从而使土耳其许多工人难以在西欧各国继续找到工作,不得不返回国内,这种情况导致了土耳其在1976年和1977年间,每年创汇下降到了大约10亿美元左右。当然,土耳其政府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也相应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如改变过去只注重西欧劳务市场的传统方式,把劳务输出的重点也逐渐转移到中东地区的一些产油国家。

截止70年代能源危机之前,土耳其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当不错,三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分别为6.7%、7.1%和6.5%,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值的增长率为3.6%。在农业方面,政府大力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化肥和良种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应用,灌溉面积大幅度的增加。谷物耕作面积从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仅增加了4.9%,但产量却增加了57.9%,

这使得土耳其在70年代又重新成为粮食出口国。这些成就在整个中东地区是非常突出的。在工业方面，各种产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了，许多产品，如煤炭、电力、水泥等基础工业和纺织、仪器等消费品工业不但达到了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大量向外出口，特别是纺织业，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出口国。另外，国有企业的钢铁产量，在数年内，也从126.6万吨增加到了325.8万吨；糖产业由52.5万吨增加到了111.7万吨；纸和纸浆的产量由9.8万吨增加到了36.5万吨；水泥由324.4万吨增加到了1 504.3万吨；棉毛纺织品增长了50%以上。特别是土耳其的汽车制造、化工和内燃机制造等工业也部分地实现了进口替代。进口替代是帝国主义形成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殖民地经济内在矛盾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进口替代又是政治上取得独立以后，一些急于发展民族经济，并以经济上的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采取这种发展战略的国家，必须正确处理好工农业关系和技术引进问题，研究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发展规划，并且要为制成品出口积极创造条件，从而提高本国的工业化水平。否则，容易造成国际收支长期处于逆差的状态，影响到外汇紧张，建设资金匮乏，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十年中经济的发展变化

70年代的前期(1970～1976年)是土耳其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半期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4年，经济还在持续地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7%，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较快，年均增长率为9%，是中东地区工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为3.2%，成效显著。在此期间，工业方面加

快了钢铁生产的发展，开始大量生产化肥和人造纤维，并从国外引进了许多条汽车、收音机、电视机等先进的流水装配线。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作物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76年，土耳其从粮食进口国变成为出口国，同塞浦路斯一起成为西亚地区仅有的两个粮食出口国。侨民外汇收入也逐年增长，为土耳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此外，随着土耳其经济的不断发展，1970年后，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了较为自由的政策，对从国外进口商品的控制放宽，对出口商品予以退还出口税，并对进口货实行优惠的政策，这对促进外贸增长，吸引大量外资皆有利，使得土耳其的出口量每年都在稳步增长。据世界银行组织1980年统计，土耳其的年出口平均增长率1960～1970年是1.6%，1970～1979年是0.8%。在70年代中期，土耳其的出口创汇，基本上一直保持在每年2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上。在土耳其的对外贸易出口中，传统的农业产品占有很高的比重，并且在农业产品出口中的85%是水果、蔬菜、烟草、棉花以及一些工业原料。但随着土耳其工业的迅速发展，农业产品在对外贸易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减少。如在1961年占总出口量的大约81%，1970年占75%，1977年下降到了60%，而纺织品、玻璃制品、陶器和一些有色金属产品一直成为土耳其贸易出口中的畅销货。另外，为了扩大外贸出口，土耳其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企业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争能力；另外一方面改变过去传统的只重视开发欧美国家的市场，忽视非欧美国家市场的做法，不断开发中东和拉美等国家的市场，努力扩大出口贸易和吸引大量外资。

随着土耳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土耳其的副食品产量也在不断

提高，如奶制品、肉类和鸡的产量，从1948～1975年的几十年当中翻了一番，鸡蛋的产量翻了两番，除供应国内食用外，尚有余力出口，特别是向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肉类和乳制品，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据统计，土耳其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为3.76%，从1961年人均仅有的200美元的国民收入，到1973年已经突破了1 000美元的大关。

在1973～1980年期间，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土耳其经济受到了两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1973年开始的世界性范围内的石油价格暴涨所带来的能源危机，它使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土耳其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土耳其是一个贫油国家，本国年产原油仅为300万吨，每年需要进口原油300多万吨。这些原油1973年进口时只需付2.27亿美元，到1974年，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度地提高了石油价格，则猛增至7.63亿美元，随后逐年增加。1975年石油的进口支出为8.11亿美元，1976年为11.26亿美元，到1977年，仅进口石油的费用就占年出口总值的84%左右，使其进口额增加了1/4以上。对外贸易赤字立即从1973年的7.69亿美元，剧增至1974年的22.45亿美元，到1975年又增至33.338亿美元，极大地影响了土耳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次冲击是在1978～1980年期间，这次主要因为土耳其的内债外债负担太重。自1963年土耳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至1977年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国家财政收入一是依靠税收，另外一个来源是借债。在经济计划建设开展以后，由于财政赤字骤增，完全依靠税收应付已无济于事，为支付大量建设资金的投入，土耳其政府曾多次举借内债外债。特别是为了解决外贸逆差问

题，举借国外短期贷款逐年增加，已经严重超过了一个国家正常的偿还能力。如1973年土耳其的外债已经达到了135亿美元，光每年偿还的利息就达6.6亿美元，大约占土耳其每年创汇的32%。也就是说，土耳其每年通过出口挣来的钱，大约1/3都要用来偿还债务，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此外，伴随着这两次冲击而来的是土耳其经济的急剧恶化，到1980年，这种危机达到了顶点，国民经济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其主表现为：(1)物价暴涨，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1975年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仅为10.1%，1979年上升到63.9%，1980年更高，达到了107.3%，人们的工资虽然提高了6倍，但物价同时上涨了12倍。由于物价昂贵，土耳其人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了一半。(2)国民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土耳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由1975年的8%，降至到1976年的7.7%，1977年的3.9%，1978年的2.9%，1979年的-0.4%，1980年的-1.1%。(3)工厂开工不足，失业人员不断增加。由于严重缺乏能源和原材料，造成土耳其的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工人大量失业。1979年土耳其的开工率只达到30%，失业率高达15.4%，失业人数为265万人。

由于土耳其经济急剧地衰退，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从而加剧了土耳其整个社会的动荡，使得城市暴力恐怖活动日益猖獗，社会秩序逐渐失去控制，最终导致了以参谋总长凯南·埃夫伦将军为首的军人在1980年9月12日发动军事政变，全面接管了国家政权。土耳其军政府在扼制住社会动乱的同时，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战略积极改造国民经济，试图从改革和开放中寻求摆

脱经济危机的出路。1982 年土耳其通过了新的宪法，1983 年军政府还政于民，由被称之为土耳其“经济设计师”的厄扎尔出任总理。至此，土耳其的经济开始进入了战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新旧战略的更替

战后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新旧战略的相互更替。土耳其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一直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加强国家的经济职能，以国有经济成分的发展，为私人资本主义开创条件；以高关税保护民族工业免受国际垄断资本竞争；鼓励投资建立现代化企业，刺激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以求实现工业现代化。1963 年土耳其提出 15 年长期发展规划之后，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实施规模更加扩大，并且在 70 年代初期以前，促进了土耳其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然而，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土耳其企业经常着眼于国内，而长期忽视国际市场，工业产品不谋求外销，使得土耳其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一直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1973～1980 年间土耳其出现的两次冲击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说明，长期以来，土耳其所采取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已经过时了。这种发展战略多方面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过程。实施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仅限于以高关税来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而很难达到工业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因此，这就需要土耳其政府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实施新的发展战略，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

土耳其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首先反映在原土耳其正义党（1980 年 9 月被取缔）主席，曾多次担任土耳其总理职务的

德米雷尔政府在 1980 年 1 月 4 日通过的“经济稳定计划”之中。该计划规定:(1)鼓励大型企业,首先是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私人企业发展。(2)吸引外国资本,建立有国家和私有资本参加的合股公司和外国独资公司。(3)逐步采取市场经济原则,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引导的发展战略。该计划的基本思想概括来说就是两条:第一,大力发展自由经济,鼓励私人资本和自由竞争,以市场经济的法则来改造土耳其经济结构,从混合经济体制转向全面发展私营经济,逐步改变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在土耳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并把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减少到最低的程度。第二,对外开放,大力刺激出口,鼓励建立开放型的企业,减少进口限制,扩大吸收外资,使土耳其的经济从封闭型转向为开放型。同时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不热衷于发展需要先进技术和大量投资的重工业。但遗憾的是,这一计划由于土耳其经济和政治危机并发,在当时未能得到贯彻执行。1983 年土耳其军政府还政于民以后,新上台的厄扎尔政府在该计划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一番充实和发展,制订出新的发展战略,大刀阔斧加紧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

首先是积极鼓励出口,努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厄扎尔政府对发展出口极为重视,把它视为创汇的主要手段。希望以出口促生产,让出口产品参加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带动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引进。土耳其的国内市场非常有限,因此,寻求国外市场便成了土耳其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土耳其过去传统的贸易伙伴主要是欧美国家,1964 年土耳其成为欧洲共同市场的“联系成员国”,1987 年 4 月正式申请成为欧洲共同市场的全权成员国,希望以此扩大向欧、美、日等国家的出口,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

成效不大。

厄扎尔政府改变了过去历届政府只注重西方，忽略东方的传统做法，坚定地执行了一条东西方并重的对外贸易原则，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上进行了重大调整，有意同西方国家拉开距离，强调“伊斯兰团结”，更多地利用宗教信仰上的一致，加强同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关系。土耳其从建国后，虽然一直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但从 80 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土耳其都参加了，并且所有伊斯兰国家在土耳其召开的会议，总统或总理都出面亲自主持。这些前所未有的措施，导致了土耳其与伊期兰国家关系的改善，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联系的加强。1986 年，土耳其积极参加“伊斯兰市场联盟”的创建，从此，土耳其以它相对发达的工业优势，打入了伊斯兰国家的市场，土耳其的工业品和食品在中东地区相当广泛地销售开。在 1979 年，土耳其对中东地区的出口额仅占出口总额的 12.6%，这种状况 80 年代以后有了急剧的变化。1980 年土耳其对中东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 25%，1981 年达 41.6%，1982 年达 47.8%，呈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1981～1985 年间，土耳其对中东国家的出口额从 20 亿美元，增至到 33 亿美元。尤其是土耳其利用两伊战争造成的产品短缺，遂机大量出口本国的工业产品和食品，并利用它对两伊的特殊关系，如伊拉克基尔库克地中海输油管道从土耳其过境，伊朗的中转贸易等，从两伊得到价格较低，条件优惠(以产品补偿)的进口石油。总之，同中东国家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增长，使土耳其迅速摆脱了过分依赖西方市场的被动局面。据有关资料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土耳其的出口贸易发展极快，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土耳其的出口总额 1980 年为 23.65 亿美元，1983 年为 57.01 亿美元，

而1987年土耳其的出口总额达到了101.9亿美元,出口总额比1980年增长了近5倍。

其次是从国家控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提高生产部门尤其是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先决条件。长期以来,土耳其的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产值一直占土耳其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左右。但在1980年以前,由于政府行政干预过多,造成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一直不佳,50%以上的国有企业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每年对国有企业进行大量补贴,从而给土耳其财政造成极大的负担。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厄扎尔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逐步将一些国有企业私有化,售股所得再用于新的投资;二是把产品定价、工资和奖金的确定,经理的任命,职工的雇佣和辞退,投资、外贸,以及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借贷等一系列原属于政府的权限下放给国有企业,并且取消了对国有企业的绝大部分补贴和优惠政策。从此,土耳其的国有企业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在竞争中提高经济效益,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总的来说,由于得到了经济管理的必要权限,土耳其的国有企业一般都通过大幅度提高曾被严重压低的产品价格,辞退冗员,引进和改善生产设备,高薪聘请企业优秀管理人才,增加出口等措施,显著地提高了经济效益。仅仅几年的时间,土耳其的国有企业就从国家财政的负担变成为国家财政净收入的来源。从1980～1985年间,国有企业创利从零增加到了大约18.5亿美元,1986年为国家财政净创收入是2.1亿美元。

最后是建立自由经济区,积极吸收外资,大力发展旅游业。为了吸收外资增加出口,土耳其决定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地方

建立自由贸易区和自由工业区。1985年6月，土耳其又通过《自由区法》，规定对于有利于出口和引进新技术的投资者给予更加优惠的待遇。如进入自由工业区的商品可以免除关税，自由区的外国资金可以自由转出国外，允许提高外国投资的数额，扩大投资的领域，允许外国人在土耳其开设银行，允许外国人，主要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公民在土耳其可以购置不动产等，以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总理厄扎尔对吸引外资有着更宏伟的设想，他宣布土耳其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叉路口，应成为东西方的桥梁，应取代黎巴嫩在中东地区的金融中心地位。土耳其对外资所给予的优惠和鼓励政策，极大地吸引了国外的投资。仅1980～1985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向土耳其提供了51亿美元的优惠国际收支贷款。此外，1980年在土耳其的外国银行仅有4家，到了1987年底已达到20多家，其中1/4属于阿拉伯国家。总之，大量吸引外资对于解决土耳其的债务危机，稳定国家的财政，促进土耳其经济迅速向前发展，都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并且厄扎尔认为："开放型经济需要现代化的再生产基础，这种基础的建立只能靠引进资金和技术，靠吸收工业发达国家的公司参与开发和经营，充分发挥强大的科技力量。"到1987年初，土耳其企业已拥有电子计算机上百万台，许多大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科学中心，尤其是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的速度加快，从而全面推动了土耳其工业的科技进步。

另外，土耳其气候宜人，特产丰富，历史文化悠久，人文景观繁多，是一块世界旅游圣地。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土耳其的旅游业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开发。政府投资少，旅游设施陈旧落后，各方面的服务条件差。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1976年与土

耳其相邻的希腊，在旅游业方面的创汇是7.34亿美元，而土耳其由于来访的外国游客少，再加上本国到外国旅游的公民多，所以在旅游业方面不但没有创汇，而且在1976年还赤字2 700百万美元，1977年达到6 500万美元。为了扩大外汇的来源，弥补国际支付赤字，从80年代以来，土耳其采取一些相应的积极措施。如给国内旅游部门免税，提供低息贷款，增加对旅游基本设施的建设，努力改善旅游环境，为国内外企业界人士对旅游业投资提供各种优惠条件等。同时，加强对旅游业的服务工作进行职业培训，努力培养中高级旅游管理人才和外语人才。另外，为了节省外汇，土耳其政府也有意对土耳其公民到国外去旅游进行了一些限制。如规定每个土耳其公民每两年才能被允许到国外旅游一次，每个公民去国外旅游所带的外汇被限制在300～500美元之间，并且还要征收50%的旅游税。由于土耳其政府对发展旅游业高度重视，并且措施得当，自80年代以来，到土耳其观光访问的外国游客每年都在100万人以上，1987年达到300万人以上。每年创汇的收入1980年为3.26亿美元，1981年为3.81亿美元，1982年为3.95亿美元，1987年达到17亿美元，仅伊斯坦布尔一家著名的旅游公司经营的54家联锁商店在1988年就获得了1亿美元左右的收入。发展旅游业不但使土耳其解决了大量的人员就业问题，而且还促进了与土耳其旅游业有关工业的发展，使土耳其每年获得大量的外汇。旅游业现已成为土耳其的一项重要产业和外汇的主要来源，成为土耳其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

总之，从80年代以来，厄扎尔政府采取的自由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新战略获得了明显的效果，它不仅使土耳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而且还使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

成就。经济增长速度快，是这一时期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1983年土耳其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为3.3%，1984年为5.9%，1985年为5.1%，1986年达到8%。土耳其的这种高速经济发展，不仅同70年代末国民经济增长出现负数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成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该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普遍下降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另外，同1980年相比，1985年土耳其工业增长率由-2.9%上升到6.6%，工厂开工率从30%提高到了72%，农业增长率也从1.7%增至到了2.8%，土耳其的通货膨胀从1981～1987年一直稳定在28.2%～38.9%之间，大大低于70年代后期的159%。因80年代土耳其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一些外国专家学者把土耳其称之为“半工业化国家或准工业化国家”。其中此类国家还有巴西、阿根廷、韩国等。世界银行组织根据1983年土耳其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人均收入1 240美元，把土耳其划分为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三、军队在国家中的作用与影响

土耳其军队的概况

土耳其军队的前身是土耳其国民军。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抗击外国的武装入侵，争取民族解放，由奥斯曼帝国的部分军队和少量分散的农民武装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反对外来侵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世俗共和国的斗争中，立下不可磨灭

的功勋，享有崇高的威信。土耳其军队在其后数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武器装备均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接受了大量来自这些国家的军事援助，长期与这些国家军事结盟，受他们的影响甚大。1949 年土耳其与美国签订《军事互助条约》，1950 年派兵追随美国赴朝鲜参战，1952 年 2 月 18 日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抗衡苏联，加强地中海东岸、欧洲大陆南翼安全的坚定盟友。

根据土耳其宪法的规定：凡年满 20 周岁的公民，除残废或教育未中断者外，都必须服兵役 18 个月。这不仅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也是他们参加社会生活的先决条件。土耳其军队内部官兵成分的构成差异较大，士兵主要来自农村和城镇，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在服役期间，他们每个人都要接受严格而艰苦的军事训练，自觉养成遵守军纪和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的习惯。土耳其军队有军官 8 万人左右，都在各级军校受过专门的培训和严格的军事操练。低级军官通常来自商人、富裕农民和政府职员等工薪阶层，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军事素养。政治态度一般都比较激进，更加倾向对国家实行较长一段时间的军事独裁统治，以便迅速实现凯末尔那种激进模式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高级军官大多数来自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高级军官都去过美国等西方国家受过训练和深造，受西方价值观念和美国生活方式影响较深，政治态度一般比较温和，被视为“军队的精英分子”，具有严明的纪律性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过去，土耳其军队的武器装备比较陈旧落后，在加入北约组织，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结盟，接受了大量来自那些国家的军事援助和先进的武器装备之后，武器装备更新的速度非常快，

目前基本上已经实现现代化。近年来，土耳其为了实现军事现代化，耗资了大约2 000亿美元，除了积极与西方国家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关系，大量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之外，还积极在中东地区寻找军事盟友。1996年2月，土耳其与中东地区军事强国以色列缔结了军事合作协议。《土以军事合作协议》规定：土耳其将允许以色列飞机进入其领空，允许以色列利用其机场作紧急着陆，两国海军船只可以进入对方港口，举行军事演习等；以色列将帮助土耳其空军实现现代化，提高土耳其现有美式战斗机的作战能力。土耳其还与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签订了一项关于改进其6个中队的164架F－4型飞机，使其使用寿命延长达20年的合同。以色列议会对这项总金额为6亿美元的合同立即给予批准，并向土耳其提供4.3亿美元的贷款。此外，一项耗资1.5亿美元改进土耳其70架过时的F－5型战斗机的合同也已经签署；以色列的埃尔比特工业公司还与土耳其签署了一项新合同，向土耳其陆军出售大量新式的自动步枪。土耳其与以色列签署的这一系列军售合同，只是土耳其计划投入大量资金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一部分。目前，土耳其已成为中东地区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之一，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着巨大的影响。

另外，根据土耳其宪法的规定，土耳其军队是一支超党派的力量，军人不得参加选举，不得参加任何政党，在军队内也不准有任何党派活动。根据土耳其武装部队章程第35条的规定：土耳其武装部队的任务是保卫和保护土耳其领土和由宪法规定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国元勋凯末尔坚决反对军队干预政治。如有些将军曾要求凯末尔解散议会，因为议会批评了军队，但凯末尔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最好是习惯议会的批评，

告诉他们批评是议会的主要职责之一。1924 年,凯末尔要求军官们在从军还是从政中必须选择其一,结果一些军官辞去军职进入了政界,另外一些军官退出议会保留其军职。1927 年,凯末尔和伊诺努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的老军人们也宣布退出军队,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土耳其军队与政治相分离,不在对政治发挥直接影响的历史转变过程。此外,根据 1982 年土耳其宪法的规定,土耳其的国防体制是:共和国总统代表大国民议会,担任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总参谋部直接实施对陆、海、空三军及宪兵部队的领导,总参谋长是武装部队司令,战时,可代表共和国总统行使最高统帅的职责。

作为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军事强国之一,土耳其兵员之多,也为该地区诸国之冠,就是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北约军事组织中,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目前,土耳其的陆、海、空三军及准军事部队的总兵力为 80 万人左右,三军的预备役人员为 100 万人。其中陆军为 50 多万人,编成 4 个集团军司令部和 10 个军司令部。兵种为 14 个步兵师、2 个全机械化师、6 个装甲旅、4 个独立机械化旅、11 个独立步兵旅、2 个突击队旅、5 个海岸防卫营。主要武器装备为:美制 M－47、M－48 型和德国豹式坦克 4 000 辆左右,美制 M－59、M－113 式为主的运兵装甲车 3 400 辆左右,各种口径的火炮 6 000 门左右,其中 100 毫米以上大口径火炮为 3 000 门以上。此外,土耳其陆军还配备有大量美制“眼镜蛇”式、“陶”式和法制“米兰”式反坦克导弹 3 000 多枚,英制“轻剑”式防空导弹 250 多枚和数量不明的美制“红眼睛”式地对空导弹。配备的轻型飞机和直升飞机共 450 多架,另有陆军预备役人员 80 多万人。土耳其的海军共有 5 万多人,编成 1 个海军司令部,1 个舰队

司令部,1 个黑海区域的司令部和 1 个地中海海岸区司令部。主要装备有驱逐舰 15 艘,护卫舰 10 艘,导弹快艇 20 艘,鱼雷快艇 8 艘,布雷舰 10 艘,扫雷舰 40 艘,坦克登陆舰 10 艘,巡逻艇 30 艘,以及各种辅助舰艇共 150 多艘。土耳其的海军航空兵配备有作战飞机 50 多架,武装直升飞机 20 多架。海军陆战队为一支编有 4 000 多人的旅,海军预备役的人员为 7 万多人。土耳其的空军人员为 6 万左右,编成 2 个战术空军司令部、一个训练司令部和一个空勤司令部。主要构成为:15 个地面攻击机中队,3 个截击机中队,4 个侦察机中队,其中一个为无人驾驶侦察机中队,2 个反潜机中队,5 个运输机中队,10 个教练机中队和 12 个地对空导弹中队。空军配备的装备主要有:美制 F-4、F-5、F-6、F-100、F-104 等型号的作战飞机 600 多架,配备有夜视仪的眼镜蛇武装直升飞机 50 多架,以及美制“奈基Ⅱ”地对空导弹和以色列研制的“瞪眼Ⅰ”防空区外发射的膛式空对地导弹 200 多枚。另外,根据土耳其与以色列签署的协议,两国耗资 1.5 亿美元联合生产的、安装了数字航空电子设备的几百枚“瞪眼Ⅱ”导弹,现已装备了土耳其空军。土耳其的准军事部队共有 12 多万人,主要装备为运输机、海岸巡逻艇和一些轻型装甲车。此外,土耳其还在海外塞浦路斯驻扎有一个军 2.7 万人的部队,编成一个机械化师和步兵师,长年保卫在那里居住的土耳其人。

土耳其军队的社会地位

在土耳其共和国 70 多年的历史发展中,除 50 年代民主党上台执政,使土耳其军队受到严重的政治挑战,被削弱了其社会地位之外,土耳其军队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享有极高的地位,成

为一支不受文官政府领导的自治组织和影响国家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1950 年 5 月，民主党通过大选，击败了执政 27 年之久的共和人民党上台执政，开始了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由文官担任总统和总理的时期，改变了过去国家、政党和军队三位一体，军队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极高地位的政治传统。民主党一上台执政，就撤换了军队正副总参谋长及各军种司令，使新上任的总参谋长无权，把军队置于由文官领导的国防部控制与监督之下，并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大量清洗军人出身的议员，使其原来在议会中军人出身的议员占总数议员的 1/2，下降到了 1/25，在政府内阁成员中基本上实行了文官化。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土耳其军队不仅失去了社会政治地位，而且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由于民主党政府不给军队增加工资，使其社会经济地位也大大地下降，引起军队强烈的不满，使其成为 1960 年 5 月 27 日军队发动军事政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在土耳其的政治文化以及普通民众心目中，军队一直被视为争取实现民族最高理想的领袖，世俗共和政权的保卫者，土耳其社会惟一的健康机体，国家的精华。自土耳其建立共和国以来，迄今共有 10 位总统，其中只有 4 位总统是文官出身，其余 6 位都是职业军人出身的高级将领，都毕业于土耳其的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都担任过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如首任总统凯末尔曾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奥斯曼帝国中担任过军长、集团军司令。在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中担任过国民军总司令。第二任总统伊诺努曾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担任过军参谋长，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担任过国民军总参谋长。第四任总统古尔塞勒曾任陆军司令，领导了 1960 年的军事政变，后还政于民，并通过合法大选成为总统。

第五任总统苏奈，曾担任过军队总参谋长。第六任总统科鲁蒂尔克是一位退役海军司令。第七任总统埃夫伦曾任军队总参谋长，是1980年军事政变的主要领导人。

另外，在土耳其，领导军队总参谋部并指挥全军的总参谋长的政治地位非常高。虽然土耳其宪法规定，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由总理提名，在履行其职责时对总理负责，但实际上60年代以来，文官政府并不能领导和指挥军队。1961年的宪法明确规定，总参谋长是武装部队司令。1982年的宪法又进一步补充规定，总参谋长在战时可代表总统行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职责。总参谋长除了有决定军队全部事务的权力以外，在日常国家事务中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他个人的权力，同政府的有关部长、办公室和机关联系工作。此外，总参谋长在国家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总统、议长和总理，而居于内阁其他成员之前，是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实际领导者和决策人。另外，根据土耳其宪法的规定，除了总参谋长之外，陆、海、空、宪兵四大军种司令也均享有合法的参政权，从而为军队干预国家政治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条件。

在土耳其，军队的建设和发展长期受到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支持。自1952年加入北约组织以来，土耳其一直保持着一支近百万人数的军队，其防务开支年均大约占国家财政开支的20%，国民生产总值的5%。议会在每年讨论军队预算时，议员们总是在赞扬军队的同时，迅速通过其拨款议案。此外，在土耳其还长期形成了一种政治习惯，即禁止公众细查军费预算，更不允许公众公开辩论和批评军费开支，哪怕是温和善意的批评也不允许。西方国家议会中那种对军队的防务和军事拨款进行猛烈抨击和严厉批评

的做法，在土耳其的政治文化中则被视为一种犯“叛国罪”的行为。在国家尽量满足军队需要的情况下，军队的建设和发展还得到了土耳其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如70年代，土耳其军队分别成立了加强陆、海、空三军现代化建设的基金会，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捐款，随即得到了土耳其国民积极地响应，广大民众纷纷涌跃捐款，对军队筹措资金发展本国的军事工业，加速实现军队武器更新和现代化发展步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土耳其，由于军队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所以现役军官的物质待遇非常优厚，退役军官也受到国家特别的优待和高度的关怀。在土耳其，现役军官物质待遇优厚的主要表现，是他们的工资比同级国家行政官员的工资高。如1988年，一名少将军衔师长的纯月薪为95.6447万土耳其里拉，而同级政府部门司长的纯月薪仅为55.5106万里拉，而一名副部长74.8351万里拉的纯月薪也比一名少将军衔师长的纯月薪少20多万里拉。一名上校军衔团长的纯月薪为68.7872万里拉，而一名同级文官处长的纯月薪只有41.6841万里拉。一名少校军衔营长的纯月薪为42.6714万里拉，而同级一名科长的纯月薪只有25.9201万里拉。在土耳其，除了现役军官的工资比同级文职人员高之外，军官们的居住条件也比文职人员好。此外，土耳其全国各地还设有许多“军人商店”、“军官俱乐部”和“军官休假”营地，供军人们免费休闲度假，购买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在土耳其，不仅现役军官的物质待遇优厚，而且退役军官也受到国家的优待和重视，每人每年可领取丰厚的退伍金，并可优先去国营或私营企业供职。有些军功显赫的退役高级将领还被国家派往国外担当大使，甚至有些当选为国家领导人。另外，土耳其军队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极高，还表

现在舆论报纸可以批评或指责总理以及政府内阁其他成员，但决不能攻击指责军队或总参谋长。这种政治现象，不仅在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中绝无仅有，而且在中东诸国乃至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里也是罕见的。

土耳其军队的作用

长期以来，土耳其军队在国家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以及高级军官们享有许多参政的特权，他们在创建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同外国入侵者和封建君主势力作斗争，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在保卫世俗共和政权中，多次同宗教势力、分离主义、恐怖暴力活动和颠覆社会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为保卫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和公益社会活动中，提高了军队的社会形象；在防止外来力量可能的侵犯中，加强了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其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历时 6 个世纪之久的奥斯曼帝国。17 世纪围攻维也纳的失败，是其走向衰亡的转折点，到了 19 世纪末，它在欧洲和北非的疆土已大部分丧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斯曼帝国参加同盟国方面的作战，1918 年 10 月战败投降后，它不仅丧失了所有的属国，而且连其本土也面临被英、法等协约国瓜分的局面。在此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以军人阶层为主的爱国知识分子领导土耳其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反抗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在军人阶层中最杰出的代表和领导者，是奥斯曼帝国年轻的将领凯末尔。1919 年 5 月，他以驻埃尔祖鲁姆第三集团军军民联合检阅使的身份来到了当时的民族救亡活动中心萨

姆松，并怀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投入到了争取土耳其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1921 年初，为了对付装备精良的希腊侵略军，凯末尔在伊诺努等爱国将领的协助下，迅速地把奥斯曼帝国残存的部分军队和少量的农民武装游击队整编训练，组建成了一支守纪律，有较强战斗力的正规军队——土耳其国民军，并亲自担任国民军总司令。1922 年 8 月 28 日，土耳其国民军发动了代号为“总司令”的战役，与希腊侵略军展开了生死大决战。土希大决战最后以土耳其军队获得胜利而告终。土耳其军队获得的胜利，使西方列强妄图瓜分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成为一纸空文。1922 年 11 月 1 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废除封建的素丹君主政体。1923 年 7 月 24 日，西方列强被迫签署了《洛桑和约》，正式承认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1923 年 10 月 29 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战功卓著的凯末尔和伊诺努分别出任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和总理。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土耳其共和国是在以凯末尔为首的一批职业军人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土耳其军队及其领导人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之所以享有很高的地位并受到社会尊重，是与他们创建共和国的历史功勋分不开的。

土耳其在建立共和国后的最初 27 年中，国家、政党和军队三位一体。共和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执政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由于军人出身的总统实际上是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最高代表，所以军队长期完全置身于国家政治之外。特别是战后实行多党制以后，军队的政治作用进一步受到了限制，基本上远离了政治，但是军队作为土耳其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开明先锋，广大官兵们还是时刻关注着国家重大的事务。因此，从 60 年代开始，当国家

政局恶化的时候，军队又重新走上了国家政治舞台，以土耳其高级将领为首的军人集团，在20年间曾先后3次干政，在保卫世俗共和国政权中，对稳定社会政局，推动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国内外舆论普遍的赞扬。

长期以来，土耳其军队不仅在创建共和国，保卫世俗共和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等各项社会活动。1961年1月，土耳其军队作为发起人组建了一个名为“军队互助协会”的基金会组织，根据该协会章程规定，土耳其武装部队的8万名军官均为其会员，他们必须拿出其10%的工资给“协会”作基金，把它投入到工业、建筑和商业等经济部门，其中一部分基金用于发展军工业，加强国防建设。“军队互助协会”成立后发展很快，1961年刚成立时只有基金4 390万土耳其里拉，1970年已经发展为5.02亿里拉，到1983年底，已拥有190亿里拉的资金。“军队互助协会”基金在土耳其汽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和在土耳其投资的法国雷诺汽车公司都占有股份。此外，还拥有土耳其国有石油公司8%的股份，还拥有1个保险公司、1个水泥厂和经销公司等。“军队互助协会”目前已成为土耳其国内最庞大的工业和商业集团之一，它还和土耳其国内一些民间加强陆、海、空三军建设的基金会合作，发展本国的军事工业，以加速实现军队武器装备的更新和现代化的宏伟计划。另外，60年代，国防部和国民教育部曾联合发展改善国民识字水平的运动并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的规定，中学毕业生在履行服兵役的两年期间内，必须去农村学校当6个月的教师，以解决农村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另外，军队除了日常的军事训练外，还要按照有关部门

的安排，参加农业保护计划以及植树造林、修建公路、抢险救灾等项活动。积极参加这些公益性的活动，使军队在国民心目中树立有良好的社会形象。此外，土耳其军队有一项重要的社会职能，那就是吸收各地区、各民族的年轻人来军队服兵役和军校学习时，除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纪律培养和军事技能学习外，还以共和国之父凯末尔现代化、世俗化和西方化的思想，教育他们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还教授他们一些现代知识、商业知识和管理技能，为官兵们退伍后找工作创造条件。总之，土耳其军队是一支庞大而严密的武装集团，各政党等社会力量根本无法与其相抗衡，它在各种社会斗争中对稳定政局，在国家建设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开明运动的先锋。

土耳其军队干政的原因和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建立了以多党制为核心的西方式民主制度，而土耳其军队对政治的频繁干预又成为多党制发展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因此，土耳其在战后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其趋势不可阻遏，其行进又步履维艰，一直存在着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与国家政治框架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强大到足以克服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现代政治文化。所以，尽管土耳其以一党制向多党制演变的模式是以西方民主政治为榜样，如实行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自由选举、新闻监督、司法独立，但民主政治对军队的制约在土耳其却一直并没有实现，军队并在短短的 20 年中成功地发动了三次军事政变，这种干预国家政治的军事政变几乎平均每隔 10 年一次。

造成土耳其军队周期性干预国家政治的原因有许多,但主要原因是土耳其国内政治与经济的不断恶化,导致社会秩序动荡失控的结果。土耳其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总是相互制衡着,而是国家这头特别强大,社会显得相当软弱无力。特别是在民主机制与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的初期,国家通过集权的政治造就的强有力的政府经常干预政治与经济生活来弥补社会机制的不足,从而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稳定政局,引导经济和改良社会三面方必不可缺少的支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耳其军队周期性干涉政治的本质,实际上是在国家政治与经济状况恶化失控的情况下,由军队代表国家直接干预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具体表现,是重建国家权威的一种尝试。它对于稳定土耳其的国家秩序,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促进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土耳其的政治与经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土耳其军队因社会政治与经济危机干涉政治,又因促进社会的发展而还政于民,确实地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尤其是它同土耳其建立民主政治久远目标的要求,是一个二律背反,具有许多消极的因素。首先是它开创了以后军队频频干政的先河,导致了土耳其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频繁中断,对政党建设和民主发展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次,它使军队凌驾于一切政党之上,成为了国家的救世主、太上皇和仲裁者,限制和削弱了议会和政党的权力,使得文人政府在处理国家重大事务时缩手缩脚,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平衡机制,严重损害了公平竞争的民主原则。因为每一次军队的干预都伴随着新闻、出版管制,禁止游行罢工,任意逮捕审讯民众,其中许多是无辜的人。例如,1971 年军队在镇压激进

分子时，上万个稍有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被捕，还逮捕了许多纯粹是言词上反对的人，其中包括著名学者和一些记者。1980 年军队对国家政治干涉后，对公民权力限制更多，土耳其电台和电视台都直接由军人政府控制。尤其是 1983 年颁布的出版法规定，由军人高级将领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权对那些危害安全，破坏团结或危害公共道德的新闻记者处以监禁和罚款。最后，军队频频干预国家的政治事务，虽然使军队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但它影响了军队职业化的发展，导致了政府军事化和将领政客化的双重恶果，不利于土耳其军队长远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这一行为破坏了国家民主法制的形象，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影响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提供的军事与经济援助。

另外，土耳其在建立以多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过程中，军队作为一支重要的干政力量，是土耳其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土耳其军队的干政，又与某些亚非拉国家的军事政变有若干不同之点：①土耳其军队接管文官政权前，总是要事先发出警告提出要求，当警告和要求无效时，才接管政府。如 1960 年和 1980 年的两次军事接管政权。但文官政府如果接受其警告和要求，主动辞职，则军队对政权不进行军事接管，而只采用温和的“备忘录”式的干政。如 1971 年军队以一纸“备忘录”就迫使文官政府辞职，从而组建了一个由军队控制的超党派政府。②土耳其军队干政，都是由高级军事指挥将领直接实施或领导，这些政治态度比较温和与年长的高级军官们则希望经过一段很短的过渡时期，便把国家政权移交给符合宪法的文官政府，否则，均不会成功。如 1962 年 2 月和 1963 年 5 月，土耳其发生过由塔拉特·阿依德米尔上校为首的一批政治态度比较激进的青年军官发动的两次未遂军事政变，均

遭镇压失败。③土耳其军队接管政权后，一俟政局稳定，国家政权就根据军方先前的承诺交还给了文官政府，而不建立长期的军人政权，从而向人们表明，军人们选择的是自由与民主的原则，这与大多数发生军事政变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变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土耳其军队三次干政所取得的实际成效来看，尽管对稳定政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军人干政对土耳其未来的民主政治发展确实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带来了一定的负效应，这也是像土耳其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四、战后土耳其的对外政策

战前中立的外交政策

从 1923 年到 1938 年的整个历史时期，土耳其共和国得到了近代以来历届统治王朝所没有得到的一个大好处，那就是同许多国家建立了真正平等相处的友好关系，没有大国干涉的任何苦恼。“国内繁荣，对外和平”是凯末尔的训示。与 1923 年战争结束以来关系一直比较紧张的希腊，通过 1930 年签订和平条约之后，关系有了极大的改善，达到了友好相处的地步。与伊朗的长期边界纠纷，通过谈判最后也获得了解决。与苏俄的友好关系，在 1925 年签订的条约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该条约后经过重新修改并予以延长。特别是在 1936 年土耳其承认了把摩苏尔交给英国托管的事实后，与英国的关系从此得到了极大改善。1932 年，土耳其共

和国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

30年代希特勒的兴起和墨索里尼的侵略势力，使凯末尔深感不安，他采取了几个方面的措施来维护和改善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一是1934年与希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签订了维护现状的《巴尔干公约》。这是防止亲德国的保加利亚试图修改《洛桑条约》，扩大版图的有力保障。二是1937年与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等国签订了互不侵犯的《萨阿达巴德条约》。由于墨索里尼人侵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希望欧洲大国允许其在海峡地区设防的要求更加迫切，因为《洛桑条约》规定海峡地区实行非军事化。1931年召开的蒙特勒国际会议同意了土耳其的这个合理要求。与意大利咄咄逼人的好战态度相比，土耳其则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土耳其良好的对外关系，是凯末尔坚决抵制一切重振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扩张主义活动的结果。长期的战争生涯和繁重的国务工作，严重损害了凯末尔的健康，使他身患多种疾病。1938年12月10日，凯末尔终因急性心脏衰竭抢救无效病逝于一度是素丹避暑的圣地巴切宫，终年57岁。凯末尔逝世后，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与他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伊诺努成为自然继承人。伊诺努执政后，即面临着险恶的国际局势。他出任总统的时候是慕尼黑会议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是土耳其经历着惊涛骇浪的历史阶段。希特勒的东进计划，酝酿着一场对巴尔干国家的侵略战争，从而也是对土耳其的威胁。墨索里尼在地中海的侵略行径和占领阿尔巴尼亚，更引起了土耳其的严重关注。土耳其政府认为，为了维护现状和国家利益，明智的办法是谋求和西方大国建立更为密切友好的关系。1939年5月，土耳其首先与英国发表相互保证的声明，6月又同法国缔结了互不侵犯的和平

条约。1939 年 8 月 23 日,德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表明,土耳其要谋求自身安全更加困难了。从这时起,土耳其便夹在了两大集团中间。土耳其对于参加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记忆犹新,希望保持中立和维护国家安全,于是谋求与苏联签订一项新的和平条约。但是土耳其外长的莫斯科之行毫无结果,没有得到苏联的任何保证,其原因是土耳其不同意苏联要阻止它与英、法结盟的条件。失望之余,土耳其与西方英、法等几个主要国家在 1939 年 10 月 19 日签订了相互保卫同盟条约。根据条约,如果战争扩及地中海地区,土耳其将提供军事援助,但有一项特别条款规定,土耳其没有履行与苏联作战的义务。虽然德国在 1940 年 6 月对法国的武装进攻,实际上已经把战争引到了西地中海,但土耳其政府认为这时采取战争行动,会损害土耳其的国家利益,所以一直试图在两大集团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立场。

法国的迅速垮台,使轴心国的胜利给土耳其的政府越来越深刻的印象,同时,轴心国的胜利也使得土耳其政府感到万分的危险,特别是 1941 年春,德国军队经南斯拉夫大举入侵希腊,并占领了土耳其沿岸的爱琴海岛屿,以及不久占领了离伊斯坦布尔不远的保加利亚之后,在这种部分被包围的情况下,土耳其屈服于德国的压力,在 1941 年 6 月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土耳其同时依然坚持与英、法签订的同盟条约有效。接着是 6 月 22 日德国军队进攻苏联之后的迅速挺进,这证明德国的压力更加难以抵挡。1941 年秋,土耳其被迫签订了一项对德国出售铬矿的协定,铬是当时制造硬度很强钢材的必需品,但土耳其政府在签订这项协定的同时,仍然履行它早期向英国出售铬的义务。同时,土耳其政府坚持抵制了德国要求针对苏联进行政治与军事合作的建议,虽然

那些德国军队正在跟土耳其历史上的那个北方宿敌打仗。1942年下半年，战局突变。随着英国在埃及阿拉曼战役中获胜，俄国人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以及美国军队登陆法属北非，轴心国开始缓慢后撤，这时各有打算的美、英、苏三大盟国开始谋求土耳其的援助。美、英希望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他们同土耳其政府官员进行了一系列会谈，最后在1943年12月罗斯福、丘吉尔与伊诺努举行的开罗会议上，土耳其原则上同意为盟国提供军事设施，但土耳其提出一个条件，盟国必须向其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以防德国人的轰炸和入侵，但关于土耳其是否应该参战的争论在政府内仍然继续。美、英对土耳其所持的中立立场非常不满，多加指责，但却被土耳其政府顶了回去。土耳其指出，盟国领导人除了丘吉尔之外，并不真心的希望土耳其放弃中立，因为冒着德国人入侵的风险，开辟土耳其新战场，需要盟国从其他战场运送大批战略物资，而此时盟国却恰恰最需要把一切可以集中起来的战略物资用于目前的那些战场，所以土耳其所持的中立立场是正确的，是符合美、英根本不需要开辟新战场的战略方针。尽管土耳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的1945年2月23日正式宣布参战，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参战，其目的是为了土耳其可以派代表出席即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员组织会议。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周旋于两大交战集团之间，力图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又不开罪于任何一个大国，左右逢源，待价而沽，奉行一条中立的外交政策，在夹缝中求生存，是土耳其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核心。

战后的土苏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不出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得以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使苏联深感不快，大为恼火。苏联不仅强烈指责土耳其迟迟不参战的行为，而且也对美、英不强迫土耳其对德国早日作战表示异议。据苏联军方估计，如果土耳其在1943年底就参战，那末还可以从苏德战场上吸引开15个德国师团，从而缓解德国人对苏联的军事压力，但如果拖到1944年才参战，到那时土耳其的参战将是多余的，因为苏德战场上的形势将会朝着有利于苏军方面的方向发展，而土耳其参战后只要花很少的代价便能分享胜利的果实。因此，苏联对土耳其在对德作战的问题上长期持一种暧昧的态度深感不满，苏联对土耳其不满的发泄很快便集中到了黑海海峡的管理问题上。

黑海海峡是苏联进入地中海的必由之路，是这个大陆国家走向海洋的一条生命线。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俄罗斯便为争夺这个南方的出海口而大动干戈，连年征战不休。19世纪，俄罗斯曾数度在海峡地区占有优势，一战期间，也曾得到过英、法的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控制整个黑海海峡。十月革命后，苏联一度国力衰微，无法与西方大国相抗争，1939年签订的蒙特勒公约使它完全失了对黑海海峡的控制。二战期间，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不仅要保持住苏联既有的领土和权益，而且还要利用一切可能去夺回俄国时代曾有过的领土和权益。在斯大林的眼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他的目光于是便很自然地落到了黑海海峡上。1939年9月，土耳其外长萨拉若卢访苏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便提出立即封闭黑海海峡的要求，但遭到土耳其的

拒绝。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访德时曾表示愿意同土耳其达成某项协议，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取道黑海海峡进攻苏联。不久，苏联又要求德国出面干预，促成土耳其同意，使苏联得以在黑海海峡地区设置军事基地。美、英与苏联结成同盟后，对后者的这一意图很快表示理解，英国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1943 年初，美英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会晤时，丘吉尔公开表示，如果土耳其拒不参战，那末在黑海海峡问题上英国就不会再支持土耳其，可见当时丘吉尔试图把黑海海峡问题作为强迫土耳其参战的一张王牌。1944 年秋，受到丘吉尔这一信息鼓舞的斯大林，对前来莫斯科谈判巴尔干问题的丘吉尔再次提及黑海海峡问题，丘吉尔对苏联希望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要求表示完全理解。在 1945 年 2 月召开的雅尔塔三大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开始对黑海海峡问题紧追不舍，强调苏联无法再忍受土耳其扼制自己咽喉的局面，应该立即修订《蒙特勒公约》，要求成立一个组织专门来研究黑海海峡问题。当时因欧战尚未定局，美、英都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因此便爽快地答应了苏联的这一要求。1945 年春，希特勒德国覆灭在即，苏联国威与日俱增。苏联政府认为解决黑海海峡问题的时机已到，决定迫使土耳其让步，所以在 3 月 19 日致土耳其的照会中称：即将到期的土苏中立互不侵犯条约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应作重大的修订，土耳其随即表示同意。在 6 月举行的双边谈判中，土耳其主动建议签订两国同盟条约，苏联则乘机要求在黑海海峡建立军事基地，并索还 1878 年并入俄国，1921 年又重新划归土耳其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地区，苏联的这一要求震惊了土耳其朝野，土耳其政府断然加以拒绝，土苏谈判遂陷入僵局。

此时，欧战已经结束，美、英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英国在黑海海峡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改变。得到西方大国撑腰的土耳其在7月宣布,《蒙特勒公约》是一个多边公约,因此不能由土耳其和苏联两国单方面来进行修改。在7月22~24日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和丘吉尔、杜鲁门连日紧张地讨论了土耳其问题。丘吉尔虽然仍表示赞同修改蒙特勒公约,以保证苏联的船只能自由进入黑海海峡,但却坚决反对苏联得以在黑海海峡地区设置军事基地,为此曾和斯大林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而杜鲁门只是含糊地建议,美、英、苏等大国的船只可以在世界上各大海洋自由进出,以此回避苏联要求的实质。波茨坦会议的议定书最后称,三国政府认为:"在蒙特勒签订的关于海峡的公约已不适合目前状况,应予以修改。此后应由三国政府各自与土耳其政府直接谈判"。因此可以说,黑海海峡问题在二战中并没有得到解决,它是二战留下的一个遗案,是导致土苏关系不断恶化的障碍之一。

二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苏、英三大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美、英两国彻底改变了它们对黑海海峡问题的立场,都不主张立即修改《蒙特勒公约》,并在土苏激烈的争执中,公开站在土耳其一边,支持土耳其与苏联对抗。1946年3月和9月,为对付苏联对土耳其所施加的强大政治和军事压力,美、英舰队曾两度进入地中海和黑海海峡向苏联公开示威。特别是随着土苏之间紧张对峙的不断加剧,美国杜鲁门政府先后派遣著名的"密苏里"号战列舰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前往土耳其,最终导致了美国直接介入到了土耳其同苏联的对抗之中,也使得土耳其从此陷入到了东西方角逐的冷战旋涡之中。1951年秋,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同意接纳土耳其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土苏关系更加尖锐恶化。1951年底至1952年底,苏联

政府又根据土耳其要参加组织“地中海司令部”,将中近东各国吸收到北大西洋联盟来,并把这个地区变为以北大西洋联盟为首的各国武装力量的前进基地,向土耳其提出严厉的警告。在冷战时期,土耳其与苏联的各种关系完全处于一种停顿的状态。在1946~1950年间,双方的贸易往来实际上等于零,两国间在5年中的贸易总额还不到100万卢布,土耳其为偿还1934年的贷款向苏联提供的出口产品是微不足道的,苏联也根本没有向土耳其出口。二战中在土苏关系上产生的信任危机,在冷战时期发展得更为突出。

从60年代开始,土耳其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那种亲密的联盟关系开始出现紧张的迹象,从而使得苏联在与土耳其交往中变得温和了。苏联与土耳其关系新时期到来的象征,是1966年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土耳其。此后,苏联对于土耳其大规模的工业规划予以大量的经济援助,土耳其成为苏联对外援助的受益者之一,国内所需的许多工业产品都来自苏联的进口。土耳其国内每年7%的电力是依靠苏联盟友保加利亚的供应,伊斯坦布尔所需要的天然气也是由苏联供应的,并且在1975年,苏联还帮助土耳其无偿在伊斯坦布尔修建了一个年产量140万吨的钢铁厂。尤其是1978年土耳其与苏联双方签署协定,规定任何一方都不得允许利用自己的领土从事侵略或颠覆另一方的活动。这一协定的字面解释,就是防止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利用土耳其本土联合监视苏联的航空飞行和监督苏联按照限制性战略武器条约所进行的导弹实验。总之,苏联通过利用美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恶化,以缓和性外交,成功地使土耳其这个南部邻邦保持了新的中立。然而,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出兵占领阿富汗,以及对土耳其境内

库尔德人的武装在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都进一步促进了土耳其积极寻求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恢复友好关系的要求，苏联再一次被视为扩张主义者，土耳其国内舆论普遍认为，苏联军事占领阿富汗，对中东国家的独立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土耳其必须关心自己的安全，获得北约组织的保证，对苏联保持高度的警惕。

亲西方的对外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苏联向土耳其提出归还过去割让的领土和共管黑海海峡的要求，导致了土耳其与苏联关系的不断恶化。鉴于土耳其这个与苏联毗邻的，在中东北部地区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美国政府答应向土耳其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和安全保护，遂趁机拉拢土耳其，使土耳其完全投靠美国，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亲美、亲西方外交路线。

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对争夺世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战后中东地区就一直成为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目标。美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中东北部、东地中海区域的战略地位，认为这是遏制苏联军事力量进入地中海与中东的防御地带。国外一位著名的军事专家曾经说过："谁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谁就控制了地中海，谁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谁就控制了黑海"。所以，土耳其这个与苏联毗邻的中东北部国家，理所当然地被美国政府视作为遏制苏联军事力量南下的前哨。1947 年 3 月 12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大规模援助土耳其。1947 年 6 月，一个由军事专家、经济专家、国务院官员和将军等 40 人组成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估价土耳其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以及土耳其在

军事上的需求。经过双方磋商，于同年 7 月 12 日，美国与土耳其政府正式签订了一项《关于援助土耳其的协定》的计划。该计划有以下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改组土耳其军队，增加土耳其军队的现代化和机械化的程度；第二个目的是改善土耳其的军事设施、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以增加土耳其军队的机动性。事实上，这一项关于增强土耳其防御能力的计划，是美国试图把土耳其变成为美国在海外最重要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基地。根据美国援助土耳其协议的规定，美国将向土耳其提供军援 1 亿美元，以改善土耳其军队的装备及增加基础设施的费用。1947 年 10 月，美国政府向土耳其提供了 7 0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用于购买土耳其陆、海、空三军所急需的武器装备。美国除了源源不断地向土耳其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外，还一直试图把土耳其拉入欧洲集团，以增强欧洲南翼的防御力量。土耳其历届政府也希望加入欧洲集团，认为加入欧洲集团后，可以得到更多西方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更加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增强全面的军事防御力量。1949 年 8 月 10 日，土耳其加入欧洲议会，1950 年 8 月 1 日，土耳其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2 年 2 月，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土耳其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后，爱琴海和黑海海峡被完全纳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控制之下。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土耳其共修建了 100 多个大小机场，其中南部沿地中海的阿达纳空军基地的规模最大，拥有一条 4 270 米的跑道，可供当时最大型的轰炸机起落。从土耳其机场起飞的飞机，不但使苏联的高加索地区在它的航程之内，而且使苏联的乌拉尔工业区也在其威胁之下。

根据“杜鲁门主义”，美国给予土耳其的援助，主要是军事性质

的。1948年7月，土耳其与美国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即参与“马歇尔计划”。从1948年7月1日至1951年6月30日，马歇尔计划向土耳其提供的经济援助共计2.59亿美元。根据土耳其外交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数字，截至1952年上半年，土耳其从美国获得经济援助金额为3.52亿美元。到1954～1955年财政年度，美国的经济援助金额猛增加到5.43亿美元。在同时期美国对中东别的国家的经济援助名单中，土耳其名列第一。美国对土耳其的经济援助主要用于修建道路的设备、材料、车辆和燃料占31%，采矿业和建立电力站占22.7%，农业方面占17%，加工制造业占5%。美国对土耳其的经济援助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主要用于同军事有关的工程，占全部经济援助的31%。其次为了掠夺土耳其的战略资源，表现为美国向土耳其提供的贷款相当一部分用于扩大采矿能力。最后是美国向土耳其提供的贷款，不能用于去发展与美国商品有竞争能力的土耳其民族工业。

虽然美国对土耳其援助的目的，是从它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在经济、军事方面具有不平等的一面，并给土耳其维护国家主权带来了一定的负效应，但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美国提供的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客观上对战后土耳其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据欧洲经济公署1954年统计公报有关的资料数字，以1950年土耳其各生产部门的产值为100，到1953年的增长率，采矿业为145，食品工业为130，加工制造业为116，纺织业为114。土耳其为了回报美国对它提供的大量经济、军事援助，在政治上心甘情愿地为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服务，成为美国麾下最卖力的一名马前卒。如1950年，土耳其在朝鲜半岛

冲突中派出了几万人的军队赴朝鲜参战，直接与中朝两国人民对抗，是中东地区惟一参加美国在远东军事行动的国家。

土耳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形成，使得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的睦邻友好的中立对外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苏联对土耳其的东部领土和黑海海峡提出无理要求的巨大压力下，为了求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保护，以抵御苏联的扩张，全面接受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大量获取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从此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

土耳其积极追随美国全球战略利益，主动地为其中东政策效力，导致与中东许多国家关系不断恶化，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1955年11月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在西方国家操纵控制下的，其目的是为了打击阿拉伯民族主义，破坏中东地区蓬勃发展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军事集团——巴格达条约组织，充当美国在中东地区镇压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打手和宪兵。成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主要成员，积极地为美国的中东政策服务，激起了许多国家对土耳其的不满，特别是埃及和叙利亚的坚决反对，导致土耳其与埃及曾一度断交。特别是土耳其于1957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曾陈兵叙利亚边境，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使土、叙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因此，在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资助下，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组建阿拉伯联邦，以抵消土耳其的军事威胁。

1958年夏，当黎巴嫩爆发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夏蒙总统独裁统

治的起义时，美国军舰驶近黎巴嫩沿海，准备进行武装干涉，而土耳其政府竟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边，表示也要出兵帮助进行军事镇压。1959 年 3 月，土耳其与美国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同年 10 月，土耳其政府总理曼德列斯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中央条约组织例会。这时，美国和土耳其双方已就在土耳其领土上建立部署装有核弹头的美国导弹基地一事达成了原则协议，从而更增加了中东许多国家对土耳其的不满和畏惧，使土耳其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越来越疏远。总之，战后在中东地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土耳其政府不但不对中东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控制下挣扎出来摆脱奴役的斗争持同情态度，反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怂恿下，往往表示要用武力干涉中东各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而使它的对外政策偏离了凯末尔制定的"国内繁荣，国外和平"的原则。

从 80 年代开始，土耳其为了摆脱在国际事务中经常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困境，开始采取了一种更加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继续维护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一方面重视发展与中东地区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不但使土耳其在国际事务中逐渐地摆脱了孤立的困境，而且通过获得大量新的经济援助，也为土耳其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80 年代初，厄扎尔政府上台以后，改变了过去历届土耳其政府只注重西方，忽略东方的传统做法，在对外关系上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有意同西方国家拉开了距离，强调"伊斯兰团结"，更多地利用宗教信仰上的一致，加强同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坚定地执行了一条东西方并重的对外政策。

在政治上，土耳其改变了以往追随美国在阿以冲突中袒护以

色列的路线，完全站到了阿拉伯民族一边，坚决谴责以色列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和剥夺巴勒斯坦人民建立国家的合法权利，在道义和物质上为阿拉伯民族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提供帮助。

在经济上，土耳其领导人看到了中东伊斯兰国家作为西方的替换者，可以改变以往土耳其对西方财政援助的依赖性。土耳其政府一方面继续寻求美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一方面大量吸引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美元到土耳其来投资，并不断增加土耳其向这些石油生产国的出口。在这一时期，许多中东国家都先后在经济上给予了土耳其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利比亚成为土耳其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包括特惠价格的能源，成百万美元的馈赠和6万土耳其工人的就业。到1982年底，利比亚对土耳其的财政援助已超过20亿美元。此外，加强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合作，也使得土耳其以它相对发达的工业优势，打入到了伊斯兰国家的市场，为土耳其的工业产品和食品在中东地区相当广泛地销售创造了条件。在1979年，土耳其对中东地区的出口额仅占出口总额的12.6%，而这种状况在80年代以后有了急剧的变化。总之，通过大量吸引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外资，不断发展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贸易往来，对于解决土耳其的债务危机，稳定国家的财政，摆脱过分依赖西方市场的被动局面，促进土耳其经济迅速向前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第五章 后冷战时期土耳其的社会走向

一、伊斯兰教与土耳其政治

伊斯兰复兴运动概况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凯末尔主义的指引下，很快在组织和制度层面解决了土耳其的世俗化问题，成为当时伊斯兰世界惟一生机勃勃的国家，被人们誉为中东地区世俗化、现代化的一个样板。但是近年来，土耳其的现代化严重受阻，被许多社会问题所困扰，尤其是国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持续高潮，使土耳其已经实行了70多年之久的世俗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中东地区一个具有伊斯兰传统的国家，土耳其把建立以多党制为核心的西方式政治体制模式作为突破口，不仅对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伊斯兰教的复兴和发展，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战后土耳其民主机制的运作下，国家对于表达各种意见都给予了更多的自由，其中自然也包括宗教界领袖们的意见。他们这些人此时越来越公开地

表示对世俗主义的敌视，越来越公开地提出了复兴伊斯兰教的要求。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势力勇敢地向世俗主义挑战，公开站出来进行辩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宗教教育问题。最初，辩论是由个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探讨，随后在 1946 年 12 月 24 日那天，大国民议会在首都安卡拉举行了这一问题的正式辩论，在辩论中，有几位执政党的议员发言表示赞成恢复宗教教育。随后，在土耳其全国的报刊上，在国家的各级会议里，以及在人们居住的任何地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不久，争论的问题经过折衷终于得到了解决。1949 年初，土耳其的学校又重新恢复了宗教教育，把它作为每星期六下午两个小时的选修课。1950 年 10 月，国家教育部门又决定把宗教教育列为必修课，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有当学生家长主张要时才得选修，并决定重新恢复神学院，培养能够在学校中担任讲授宗教课程的人和能够胜任清真寺内各种宗教职务的人。

由于土耳其政府对于伊斯兰教的复兴表示出越来越多的宽容，这也就很自然地鼓舞了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企图东山再起的决心。这一时期到清真寺做礼拜的人数不断地增加，许多清真寺都安装了扩音器，手写的阿拉伯语经文出现在了咖啡店和小商店的墙壁上面，以及出租汽车的车篷上和各大商场里，并且在大街小巷公开出售。尤其是宗教书籍及小册子的写作和出版不断大量地增加。除了大量通俗的宗教性小册子外，都是一些关于伊斯兰的书籍，先知以及其他人物的传记、有关伊斯兰教的历史、神学和神秘主义的著作。此外，这一时期宗教复兴的另一表现为，已经开始有相当多的土耳其人到麦加去朝圣。据有关资料统计，仅 1950 年就有将近 9 000 人前往麦加。由于大多数报刊对宗教事务越来越注

意，所以有三家著名的伊斯坦布尔报纸都派出记者专程随同报道了朝圣麦加的情况。

在战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蓬勃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在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些与世俗化根本不相容的事件，这就是创立了两个公开宣称以伊斯兰教为政治思想纲领的政党，民族行动党和民族秩序党。民族行动党的领袖土尔克什是一个退役的上校，早在1944年他就因宣传泛突厥主义而受到法庭的审讯。此后，他不仅宣传泛突厥主义，而且还利用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主张全面恢复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公开反对凯末尔的世俗化原则，主张要以土耳其穆斯林的精神价值，来鼓舞教育青年，为把技术专科学院和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室与各个神学院的走廊连接起来而斗争。民族秩序党则极力鼓吹要恢复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及哈里发制和伊斯兰教法典。换言之，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向凯末尔主义者所创立的世俗共和国基础宣战。由于民族秩序党猛烈地抨击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穆斯林兄弟，谴责给予外国异教徒的资本与土耳其的资本以同等的权利，以及向广大民众许诺，要通过复兴伊斯兰教的道德与德行，为他们提供普遍的幸福和安宁，所以民族秩序党得到了许多农民、僧侣以及受到大商人排挤的中小资产者的拥护。

1971年5月21日，土耳其宪法法庭宣判民族秩序党的政治纲领与载入宪法的世俗化国家的原则相抵触，取缔了这个具有伊斯兰教性质的政党，同时还取缔了与民族行动党有密切联系的泛伊斯兰主义协会，查封了一大批具有伊斯兰教倾向的报刊。然而，在整个70年代里，土耳其的许多政党在政治斗争中仍然继续利用伊斯兰教。在大国民议会和地方政权机构的选举中，这些政党的

头目们不断参观拜访清真寺,在谈话中也尽量多次地提到真主,在报刊中公开攻击共和国世俗化的性质,并且刊登自己在祈祷和做礼拜的一幅幅照片。所有这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博得伊斯兰教徒们的欢心,争取他们的选票。面对这一局势,1980 年 9 月 12 日,土耳其的军人们废除了右翼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公开表明忠于凯末尔主义,斥责在国家政治斗争中利用宗教矛盾,强调如果谁把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将追究其罪行。

土耳其的宪法第 24 条明文规定,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利用或滥用宗教,或宗教感情,或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达到产生个人或政治影响的目的。刑事法典第 163 条甚至规定,组织与管理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可以判处 15 年徒刑。并且军人们以捍卫世俗化原则为借口多次干涉国家政治。但是,从战后土耳其实行多党制以来,与凯末尔主义者坚持的世俗化原则相背离,而要求恢复伊斯兰教传统的趋势像波浪似地不断向前发展,以至到了 90 年代达到了新的高峰,成为土耳其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原因

战后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教的复兴崛起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是土耳其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社会矛盾不断发展的某些客观必然性的一种反映,此外,也有一定的国际与地区形势变化的背景。

首先,土耳其是一个具有数百年伊斯兰历史的国家,在 99% 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中,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艺术全部都深而又深地渗透着古老的伊斯兰传统,尽管这些传统已经转变成为一些显然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新东西,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

依然毫不动摇地保持着伊斯兰特色。虽然从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开始到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西方化运动之后，土耳其的社会有了极大的变化，其程度也是任何外界观察家所想象不到的，但是其宗教价值观和历史传统仍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土耳其生活和文化的最深远的伊斯兰的老根仍然活着，作为在土耳其穆斯林的这项标志，仍然是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为战后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教再度复兴并得到弘扬，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其次，战后随着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政体的演变，伊斯兰教复兴在土耳其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是不容易估计的，伊斯兰教必然地又变成为一项社会政治争端的工具。土耳其历届政府由于维护其执政的需要，不断放宽对宗教的限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宗教发展的政策与法规，从而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扩大影响大开方便之门。此外，土耳其的一些主要党派由于害怕让对方得到宗教的支持之利，特别是出于竞选的需要，也极力地迎合社会上的宗教情绪，把赌注押在选民的宗教感情上。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势力也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扩大宗教组织，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宗教骨干和中坚力量，同世俗主义争夺阵地，以致土耳其的各个党派，谁也不敢对它加以忽视，更不要说去表示反对。

另外，战后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的转型，导致土耳其的政局多变，社会动荡，加上经济又不景气，物价高昂，失业增加，腐败蔓延，贫富分化和贫富悬殊现象极为严重，造成社会矛盾特别突出，而历届政府又治国乏术，建树不大，使得广大民众的失望情绪和离心倾向与日俱增。面对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们开始思考西方化的道路是否适合土耳其，现代化是否一定要牺牲伊斯兰教，伊斯

兰教能否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这种思考无疑是对凯末尔主义的挑战。随之,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势力抓住广大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和求变心理,大力宣传其有关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说教,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引起共鸣,促成了他们宗教意识的增长,加大了伊斯兰教价值观的社会吸引力。

最后,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也为土耳其伊斯兰教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战后冷战政治格局中,土耳其落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压制社会进步势力,在政治宣传中开始利用伊斯兰教的思想,借助宗教势力进行斗争。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抬头,推动和影响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土耳其的加速发展。土耳其同中东地区的一些伊斯兰国家和组织往来频繁,关系密切,甚至做了许多有悖于土耳其世俗主义原则的事情。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受其影响,土耳其民众的宗教意识明显增加,许多书店里大量出售伊朗伊斯兰革命精神领袖霍梅尼的著作。1987 年 4 月,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一些城市的女大学生们为了争取戴头巾进入课堂而上街游行示威时,就得到了伊朗社会的声援。而每当中东、中亚和巴尔干地区发生与穆斯林有关的事件时,土耳其国内就会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表示声援或抗议。此外,冷战结束以后,土耳其与伊斯兰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频繁互访,伊斯兰发展银行和科威特基金会增加了对土耳其的经济援助,土耳其向伊斯兰国家的出口也逐年增加,以及一系列双边与多边政治、经济和军事协定陆续地签订,这一切都说明土耳其在外交上向伊斯兰国家的倾斜政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既是土耳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国内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对外关系

上的延伸。这一重要的客观效果,是有利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与加强,反过来,它的崛起与发展,也呼应了中东地区伊斯兰宗教趋向的膨胀势头。

伊斯兰政治的发展与繁荣党的兴起

1989年秋,埃夫伦总统任届期满,厄扎尔利用祖国党对议会的控制顺利当选为土耳其第八任总统。为符合宪法的规定,他退出祖国党,提名大国民议会的议长阿卡布鲁特为总理和祖国党主席。厄扎尔作为执政党的建立者和前总理,有优势从幕后既控制内阁又操纵祖国党。1991年土耳其举行大选,德米雷尔领导的正确道路党获得议会中的179席而成为第一大政党,祖国党仅在议会中获得112席而屈居第二位,政治元老伊诺努领导的社会民主平民党获得91席位居第三,繁荣党和左派民主党分别获得61和7个席位。德米雷尔以议会中第一大政党领导人的身份与正确道路党、社会民主平民党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1993年4月17日,厄扎尔总统因心脏病突然逝世,5月16日,德米雷尔宣誓就职,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九任总统,伊诺努就任临时总理。6月13日,正确道路党召开党代表大会,奇莱尔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当选为执政的正确道路党新主席。6月14日,德米雷尔总统任命奇莱尔担任联合政府总理,使她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奇莱尔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德米雷尔的干女儿,也是德米雷尔担任总理时的经济顾问。西方化历史相当长的土耳其出现一位女总理并不是一件什么特别稀奇的事情,土耳其国民对这位美丽动人,并且在政界非常清纯的女总理寄予厚望。然而,1994年土耳其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

机,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4%,特别是长期困扰着土耳其国民生活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达到了150%,使1 000万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面对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人们对西方化道路的怀疑日益加深,转而希望从伊斯兰教中寻求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新办法。军队和政府中的许多上层人物也不断强调伊斯兰教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土耳其伊斯兰教的复兴起到了进一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土耳其伊斯兰教的复兴在其社会政治生活中最惊人的事件之一,是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繁荣党的兴起,使土耳其的国内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3年7月19日,土耳其繁荣党宣告成立。繁荣党的前身是1980年9月12日在军人干政中被取缔的救国党,而救国党的前身是于1971年5月21日被宪法法院宣布为违反宪法世俗化原则而被取缔的民族秩序党。繁荣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迥然有别于其他党派的政治主张而在土耳其政坛上独树一帜。该党以伊斯兰为旗号,突出宗教和民族意识,反对现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制度,主张严格按照伊斯兰的教义治国,建立伊斯兰式的社会公正秩序。经济上反对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认为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生产才是土耳其繁荣昌盛的惟一途径,要求建立公正的生产和分配体制,取消银行利息,建立伊斯兰统一市场和货币。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实行以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为主旨的外交政策,反对土耳其保持北约成员国的地位,不赞成土耳其加入欧洲关税同盟和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主张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抗衡美国和西方,使得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主导作用。

繁荣党在成立之初实力并不强大,但发展迅猛。该党在1987

年11月29日的土耳其第18次大选中，虽然仅获得7.5%的选票，但在1991年10月20日的土耳其第19次大选中，获得了大约13%的选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繁荣党在1994年3月举行的全国地方选举中，一鸣惊人，获得了19.01%的选票，并赢得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等重要都市的市长位置，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在1995年12月24日举行的土耳其第20次大选中，该党再创佳绩，以21.38%的得票率夺魁，赢得了550个议会席位中的158个，一下跃居为土耳其的第一大政党。这不仅震动了土耳其政坛，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引起了整个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最早实行世俗化改革的国家，它一向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海洋中一盏非宗教的指路明灯。因此，具有伊斯兰性质，得到广大穆斯林支持的繁荣党，在土耳其政治舞台上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对伊斯兰世界的鼓舞，都是可想而知的。

1996年1月9日，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依照惯例，首先授命第一大政党繁荣党主席埃尔巴坎组阁，正式揭开了由繁荣党组阁的帷幕，但由于繁荣党的政治主张难为其他各政党接纳，因而各政党领导人纷纷表示不愿意与其为伍，繁荣党终因找不到合作伙伴，难圆执政之梦，不得不交回组阁权。1996年3月6日，由土耳其第二大政党祖国党与正确道路党组建的第53届政府成立。虽然土耳其总统和军方出于抑制伊斯兰宗教势力的扩张和稳定政局的需要，公开支持两党的联合执政，但好景不长，由于执政两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导致了联合政府的垮台，从而为繁荣党再次面临组阁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执政大局，繁荣党吸取了上次组阁失败的教训，审时度势，对其政策作了必要的调

整。首先注重挑选党内温和派人士入阁，减少了强硬色彩，并明确承诺将坚持世俗制度和民主，遵循凯末尔主义的原则，同时还通过一些军人出身的议员，向军界首脑疏通。在经济方面，同意实行市场经济机制，继续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快私有化进程，并允诺加快与欧洲关税同盟统一的步伐，履行对其承担的义务。在对外政策方面，繁荣党明显降低了反西方的调子，表示在增进同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同时，将保持土耳其同西方的密切关系，并遵守土耳其承担的国际义务，继续谋求加入欧盟。繁荣党的举措，对改善其形象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当主要繁荣党成员参加的新政府组成和施政纲领公布以后，土耳其的传媒舆论总体上反应平和，以捍卫凯末尔世俗主义原则而著称的军方对繁荣党的态度也趋向缓和，一些著名的经济界人士也表示审慎的欢迎。特别是新政府成立的当天，伊斯坦布尔股市的综合指数即上扬了3.33%，显示了一个好兆头。然而，鉴于繁荣党一贯坚持反西方与反世俗化的伊斯兰强硬立场和主张，加之组成本届联合政府的两大党派繁荣党和正确道路党的政策大相径庭，人们对新政府的疑惑尚未冰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忧心忡忡。

1997年6月18日，在执政不到一年的时间，繁荣党主席、土耳其总理埃尔巴坎向土耳其总统提出辞呈，总统德米雷尔接受了他的辞呈，并于6月30日批准了由土耳其祖国党、民主左派党和民主土耳其党组成的新内阁。自1997年初以来，土耳其军方不断向埃尔巴坎政府施加压力，以防止其领导的繁荣党推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例如1997年2月3日，繁荣党人的市长在首都安卡拉以西25英里的辛詹镇，组织了一次“耶路撒冷之夜”集会。这次集会不仅张贴了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画像的标

语牌，而且伊朗驻土耳其大使巴益里在集会上还公开提出在土耳其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口号，并有一名电视台女记者遭到殴打，这就是震动土耳其的"辛詹事件"。2月4日，土耳其军方的20辆坦克和15辆装甲车沿着该城镇的主要街道驶过，名为"军事演习"，实为一次"软政变"，表明土耳其军方不允许出现背离政教分离原则事件的决心和态度。此外，土耳其军方还向宪法法院提交了指控繁荣党与非法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联系的证据，要求取缔这个政党。在6月初，土耳其最高的司法机构宪法法院也对繁荣党提起诉讼，指控繁荣党使这个国家处于内战的边缘，并破坏了这个国家的世俗制度。按照土耳其的宪法，最高法院有权取缔挑起人民之间的仇恨，并进行反对世俗制度活动的政党。此外，与繁荣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正确道路党内部也对繁荣党的反世俗主义势力表示不满，并且威胁要退出联合政府，在这种形势下，作为繁荣党主席的埃尔巴坎总理不得不提出辞呈。

具有伊斯兰宗教色彩的繁荣党成为主要执政党，在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一方面将使土耳其已经实行70多年之久的世俗社会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土耳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中，主导者仍然是凯末尔主义，伊斯兰的社会趋向只能是有限度地发展。根据土耳其的第20次大选结果情况来看，参加竞选的政党获得10%以上选票而进入议会的五大政党中，除繁荣党外，其余具有世俗性质的祖国党、正确道路党、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左翼党共获得选票74.18%，这说明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原则在土耳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伊斯兰宗教要想完全取代凯末尔主义还是有较大的困难。

土耳其未来的政治发展

作为繁荣党主席的埃尔巴坎总理在被迫辞职前，曾于1997年6月1日与奇莱尔副总理共同宣布，两人已达成协议将总理的职位交给奇莱尔，并在辞职的同时向德米雷尔总统递交了一份由正确道路党、繁荣党和大团结党起草的三党联合宣言，要求授权奇莱尔组阁，组成正确道路党和繁荣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但是德米雷尔总统于6月20日傍晚授权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祖国党的领导人耶尔马兹组阁，使奇莱尔继任总理的希望破灭。1997年6月30日，耶尔马兹向德米雷尔总理递交了内阁名单，并立即获得批准，这样，以耶尔马兹为总理的土耳其第55届政府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持续数月的土耳其政治危机进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历史阶段。

耶尔马兹政府组成后，在国内政策上其基本原则是保护和发展世俗化的民主共和国，并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与前政府明显的变化是现政府以迎合与满足军方的需要和愿望为准则，捍卫政教分离原则，减少宗教教育，扩大世俗教育，并加强对清真寺的管理，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把清真寺当作动员民众的场所。在内政方面还有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军方进一步加大了对社会控制的力度。为此，土耳其军方成立了专门机构，全面负责监视社会的一切领域，密切关注社会的动向，以便随时对付可能发生的伊斯兰暴乱，并多次警告民众不要支持伊斯兰分子开设的企业或商店。第三个变化，是军方下决心要把具有伊斯兰宗教色彩的繁荣党彻底赶下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为此，国家宪法法院准备公开审理繁荣党违宪的行为，并表示要对该党的主要领导人分别绳之以法。2000年3月10日，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以煽动仇恨罪判处前总

理埃尔巴坎一年监禁。

在对外政策上，耶尔马兹政府坚持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维护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特别是不顾伊斯兰国家的强烈反对，大力加强与美国盟友以色列的关系。1997 年 12 月 8 日，以色列国防部长莫迪凯首次访问了土耳其，表示两国要进一步加强双边军事关系。此前，土耳其总参谋长卡拉达耶和前国防部长塔扬曾访问了以色列。随后，以色列总参谋长沙哈克中将访问了安卡拉。此外，耶尔马兹政府还致力于恢复和加强同操突厥语国家的关系。耶尔马兹总理在上任时称，恢复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关系，将是其政府最优先考虑的一个重点。耶尔马兹本人也于 1997 年 9 月 9 日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并批评他的前任埃尔巴坎忽视发展与操突厥语国家的关系。此外，土耳其在寻求加入欧洲联盟的努力一再受挫的同时，邀请俄罗斯总理于 1997 年 12 月中旬访问了土耳其，并签署了俄罗斯通过黑海向土耳其提供天然气的双边协议，规定俄罗斯每年向土耳其提供 3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使土耳其在 21 世纪初将成为继德国之后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第二大进口国。该协议的签署极大地改善了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

1998 年 11 月 25 日，因总理耶尔马兹涉嫌腐败丑闻，导致其政府在议会信任投票中垮台。1999 年 1 月 8 日，德米雷尔总统授权议会中的第四大政党民主左派党主席埃杰维特组阁，16 日，土耳其议会以 306 票对 188 票的绝对优势通过对埃杰维特政府的信任投票。由于按照宪法的规定，土耳其定于 1999 年 4 月 18 日举行议会选举，因此本届政府仅能维持 3 个月的时间。1999 年 4 月 18 日，土耳其举行了全国大选。这次大选是自具有伊斯兰宗教色

彩的繁荣党在1995年的大选中获胜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因此备受世人瞩目。4月27日大选结果揭晓,现任总理埃杰维特领导的民主左派党获得22.17%的选票,极右翼的民族行动党异军突起,紧随民主左派党之后,获得了17.09%的选票。继承了繁荣党衣钵的道德党退居第三,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则敬陪末两位。大选的结果一公布,无论是外国的观察家还是土耳其本国的记者、政界人士都连呼太出人意料了。如果将这次大选与1995年的大选作一下比较,可以发现这次大选的一大特点,即传统大党逐渐失势,而一些不被人们看好的小党则表现突出,议会中的力量更趋于分散。根据统计,在上次大选中位列三甲的繁荣党、正确道路党和祖国党在这次大选中均表现不佳,接替繁荣党的道德党的得票率仅为15.39%,代表中右两大党的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也仅维持在13%左右,三党的议席各锐减40席以上,可谓元气大伤。而由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凯末尔一手创建的共和人民党则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只赢得了8.72%的选票,未能达到进入议会的10%的法定标准,历史上第一次被排除在了议会以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主左派党的议席由上届的76席猛增至136席,而民族行动党更是本届大选中最大的一匹黑马,从上届的一无所获到这届的129席。土耳其此次大选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结果,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国际背景。首先,国内人心思定。自1995年大选之后,政府几经更迭,先是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的联合政府闪电般地倒台,继之而起的繁荣党埃尔巴坎政府也仅维持了一年左右时间,而接替它的祖国党耶尔马兹政府上台一年半不到,就因政府丑闻于1998年底被议会弹劾下台。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副总理埃杰维特担任看守总理直到大选。政府

的频繁更迭使得土耳其政府长期处于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不少选民将这种不稳定归咎于国内党派的政治斗争。其次，不少政治分析家认为，选民对政府腐败的不满也是他们摒弃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的原因之一。在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执政期间，政府官员腐败甚至与黑手党勾结的消息不断传出，使得两党在选民中的口碑越来越差，选民渴望看到廉洁勤政的新面孔。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民主左派党只所以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部分归功于党的主席埃杰维特诚实的个人品质。埃杰维特一向以廉洁自律在土耳其的政坛上闻名。据报道，埃杰维特的生活非常朴素，在他过去担任总理期间，他不但拒绝搬入豪华的总理官邸，还把提供给他的奔驰轿车封存了起来，而代之以国内组装的菲亚特牌轿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正如土耳其一位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所说的："在 1995 年的大选中，我们目睹了伊斯兰主义的崛起，然而，在 1999 年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面临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尽管土耳其的民主左派党和民族行动党分属左右两派，但双方都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在库尔德人、塞浦路斯等问题上有着不少共同的语言。1974 年，正是埃杰维特担任土耳其总理期间，他下令土耳其军队入侵了塞浦路斯，一直到现在，他仍然坚持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采取不妥协立场。他认为三万名长期驻扎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军队，对实现当地的和平是必需的。此外，在埃杰维特的字典里，"库尔德人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他主张用武力来对抗库尔德人的恐怖主义活动，认为政府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为了对付极少数分裂主义者的叛乱。与民主左派党相比，民族行动党的政治主张在民族主义方面显得更为激进。该党的前任主席图尔凯希是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运动"的领袖，梦想将土耳

其、巴尔干地区、中亚地区乃至东方的突厥民族联合为一体，狂妄地宣称要创立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广大联盟。该党坚决反对与库尔德人妥协，特别是在沸沸扬扬的“奥贾兰事件”中异常活跃，频繁地组织民众游行，要求意大利政府引渡奥贾兰，多次为在与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冲突中丧生的土耳其士兵和平民举行公开葬礼，并将这些集会转变为激进的示威活动，这些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行动党在民众中的威望，其支持率迅速上升。另外，由于欧盟长期以来迟迟不肯接纳土耳其，土耳其民众的不满情绪逐渐地积累了起来，并转为对欧盟的怨恨。埃杰维特就曾多次抱怨，认为欧盟要求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即改善人权记录，帮助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和库尔德人问题，只不过是把土耳其摒弃于外的种种借口，真正的理由是他们不希望一个穆斯林国家跻身于他们之中。这些不仅是埃杰维特的个人看法，也反映出许多土耳其民众的心声。在大选的纲领中，民主左派党的民族行动党都主张要重新考虑与欧盟的关系，这使得许多土耳其选民感到无比的振奋。

虽然民族主义帮助民主左派党和民族行动党赢得了大选，埃杰维特也在25年内第五次出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理，但是仅凭民族主义根本无法解决土耳其的一切社会问题。特别是新世纪的土耳其将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挑战和困难，因此，对于新的一届土耳其政府来说，降低民族主义的调门，推行较为务实的方针政策才为上策。所以，任重而道远的新政府首要职责是维护政治稳定，彻底改变土耳其长期政局动荡的局面，为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此外，对于土耳其来说，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其早日加入欧盟的计划，这关系到21世纪土耳其的前途和国际地位。

2000 年 5 月，德米雷尔总统任期届满，5 月 5 日，经过大国民议会的选举，土耳其宪法法院的院长塞泽尔大法官出任土耳其历史上的第十任共和国总统。新总统塞泽尔早年毕业于安卡拉大学法学系，长期从事司法工作。虽然土耳其的总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但多年来随着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总统一职也不完全再是礼仪性的，议会授予总统有较大的权力，特别是在政局动荡，国家危难的时刻。总统对于稳定政局，协调各种社会矛盾，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国内外许多政治家把目前土耳其的政体称之为具有土耳其特色的多党制半总统制。土耳其的这种政体，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民主化程度上尚有较大的差距，但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相比，民主化、法制化和世俗化的程度又较高。总之，土耳其在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和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将会继续艰难地向前跋涉。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

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潮流蓬勃兴起。汇入这场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潮流的既有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包括了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大批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在按照各自的需要进行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土耳其正是顺应了这种新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在全球化和世界

经济权力的重大转移以及重新组合中，正式提出了利用自己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加入欧洲共同体的要求并在国内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其目的在于能够尽快使土耳其的社会经济迅速摆脱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停滞不前的阴影，缩小国内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以适应后冷战时期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以便重新确立土耳其在未来新世纪中的世界地位。

土耳其政府在制定的第五个五年计划（1985～1990 年）中明确指出：土耳其要在自由、文明和安宁的气氛中提高土耳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工业产量，提高就业率，减少青年失业人数，调整收入分配以利于低收入阶层；加速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以此带动出口的增加；开发利用现有资源，发掘农业生产潜力，等等。于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土耳其开始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概括地说，就是采取放开的价格，实行浮动的利率，积极鼓励出口，全面推行进口自由化，完全取消对外汇的管制、汇率的浮动以及对国有经济企业实行私有化等多种措施。在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过程中，土耳其以纺织品与服装工业为代表的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十分迅速。这一部门所获得的外汇收入已占全国外汇收入总额的 37.7%，该行业职工占全国职工总额的 21%，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9%，在制造业的产出中占 20%，在制造业职工总数中占 1/3。其生产能力仍有继续扩大之势，国产纺织工业原料已不敷使用，需要每年从国外大量进口。1995 年土耳其进口纺织原料 26 亿美元，而同年出口的纺织原料只有 21 亿美元，成为纺织原料净进口国。由于土耳其距离欧洲市场较近，所以生产出

来的产品都以欧洲为出口的主要市场。1995 年土耳其输往欧洲市场的纺织品与服装额占土耳其纺织品与服装出口总额的 64%。

由于出口收入增多,进口其他工业部门发展所需要的设备、原材料与零部件得到保证,生产得到发展。经过调整,土耳其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特别是钢铁、汽车、水泥以及家电等工业发展迅速,其中有不少产品还可以用于出口,使其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1 年土耳其的工业品出口额在商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 52.8%,1995 年上升为 87.5%,2000 年为 95.2%。出口金额较多的商品有成衣、纺织品、金属、电器、化工品、汽车及零配件等这六类商品的出口金额即占出口总额的 70%。

除了物质生产部门以外,土耳其的服务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在外汇和平衡经常项目收支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是旅游业的发展。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兼有亚热带、温带和寒带的气候。从东部《圣经》传说中的诺亚方舟停落地大阿勒山,到西部传说中的特洛伊遗址,名胜古迹众多,自然景色瑰丽。特别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土耳其货币里拉贬值,旅游费用降低,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旅客到土耳其观光,使其旅游业出现一派繁荣的景象。而外国投资于土耳其旅游业者也日益增多,除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伊斯兰国家的企业家之外,欧美旅游业财团也纷纷到土耳其投资,修建设备豪华的饭店以经营旅游业。土耳其旅游业的国际收入,1980 年为 3.26 亿美元,1995 年上升为 49.6 亿美元,2000 年接待游客达 1 000 多万人次,经济收入突破 60 亿美元大关,在发展中国家旅游业收入前 10 名的排名中居第 5 位。土耳其的另一项收入是侨民的汇款,1986 年为 16.34 亿美元,1995 年上升为 33.21 亿美元,2000 年突破 50 亿美元大关。旅游业收入与

侨汇两项抵消掉相当一部分土耳其的有形贸易赤字。此外,土耳其还积极发展对外建筑工程承包,以获取更多的外汇收入。至1999年底,土耳其国有建筑工程公司在国外已承揽的建筑工程为600多项,工程款高达400多亿美元。

经过调整,土耳其的货物和劳务出口不断增加,国际收支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1981年土耳其商品出口额为47.03亿美元,1996年上升为237亿美元,2000年突破300亿美元大关。商品出口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1980年为5%,至1995年商品与劳务的出口额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上升为19.7%。1996年10月土耳其的外汇储备(不含黄金)为173.88亿美元,相当于8个月的进口额。此外,经过调整,土耳其私营部门的作用较前大为增强,已经成为投资领域的主角。调整以前,在进出口贸易中国有企业部门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此后已逐步让位于私营部门。至90年代末,由国有部门经营的进出口额在国家整个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不足1/5,而私营部门的这一比重已经超过了4/5。

总之,土耳其所采取的各项调整措施带动了其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1981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39.1亿美元,1994年上升为1 310.14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6%。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位次已由1981年的第13位上升为1994年的第9位,人均国民收入已由1981年的1 540美元上升为1995年的2 713美元,2000年突破3 500美元。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应当说还是不错的,它标志着土耳其从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对外经济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土耳其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用“经济外交”手段，以较大的幅度调整各种对外经济关系，谋求同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从而维持经济总量的平衡，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在土耳其所有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发展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因为在经济上，土耳其离不开西方的帮助，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土耳其是世界上第三大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位于以色列和埃及之后。土耳其历届政府多次表示不仅同美国保持军事战略关系，而且应该积极发展经济方面的关系。德米雷尔于 1992 年 2 月和 1993 年 10 月先后以总理和总统的身份访问美国，双方就增强伙伴关系达成共识。美国承诺继续每年向土耳其提供大约 4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如果没有这笔固定的钱，土耳其的经济一旦陷入困境的时候，很有可能将崩溃于旦夕之间。此外，土耳其还积极发展同西欧的经济关系，谋求早日加入欧盟。土耳其的历届政府都认为，发展同西欧的经济关系是土耳其的深切愿望，加入欧盟是土耳其的主要目标和最终的必然归宿，是推动土耳其经济持久发展的强大动力。为此，曾先后邀请法国总统、德国总理和英国外交大臣访问土耳其，全面发展土耳其同西欧国家的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以西欧为其主要的贸易伙伴，别的不说，光是每年到土耳其观光的 600 多万西方游客，就会带来可观的就业机会、50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和无限的商机。

在奉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好对外经济关系的同时，土耳其还积极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关系。首先利用苏联

解体，东欧剧变的大好时局，土耳其一方面积极重新构筑同高加索、中亚地区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关系，一方面抓住时机缓和并改善同俄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外经济关系。1993 年 9 月，总理奇莱尔访问俄国，表示在两国关系上，土耳其“愿望翻开新的一页”，希望与俄国发展经济关系，建议在今后 5 年内把目前双方 25 亿美元的贸易额增至 100 亿美元，并且俄国以前所欠的 5.5 亿美元债务可用天然气偿还。目前，土耳其私营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超过 85 亿美元。其次，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国家的独立，为土耳其同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1992 年初，德米雷尔在出任总理后便首先出访中亚各国，向中亚国家提供了 12 亿美元的援助和信贷，对中亚国家的投资额达到 40 亿美元，参与了 200 多个发展项目。近年来，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势头不断发展，土库曼是土耳其投资最多的国家，截至 2000 年 8 月，在土库曼的投资项目有 100 多个，资金达 20 亿美元。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土耳其创办了数十家合资企业，涉及建筑、建材、棉花加工、纺织、皮革加工、运输、采矿等；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土耳其帮助改造和新建了一系列项目，包括通讯设施、卫星地面站、皮毛加工厂等。1995 年 6 月，德米雷尔总统访问了哈萨克斯坦，两国签署了深化经贸关系的联合声明。根据有关的双边经贸条约，土耳其一家财团还与哈萨克斯坦能源公司签订了在阿克秋宾斯克地区修建一座 954 兆瓦的发电站合同。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对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比 1992 年增加了 10 倍，同中亚国家的贸易总额已达 20 多亿美元，是 1992 年的 5 倍。总之，土耳其利用中亚国家在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认同感，不断加强双边的经济关系。

另外，土耳其政府更加重视同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以它相对发达的工业优势打入伊斯兰国家市场。1996年8月，土耳其与伊朗签订了购买200亿美元天然气的合同，并提出组建有利于经济贸易往来的“穆斯林八国集团”，两国贸易进出口额年年增长。另外，由于土耳其在海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海湾国家的经济补偿。沙特阿拉伯承诺免费向土耳其提供了11亿美元的石油，这对于所需石油的60%要从伊拉克进口的土耳其来说，算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外，土耳其主张尽早解除对伊拉克的禁运。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是土耳其的重要经济伙伴之一。伊拉克的石油管道经土耳其出口油，土耳其每年可获得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战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迄今为止已使土耳其遭受到大约200多亿美元的损失。对此，土耳其政府表示对伊拉克的制裁，不仅使伊拉克人民饱受苦难，同时也给土耳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认为伊拉克早日返回国际社会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呼吁应该完全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并针对制裁伊拉克给土耳其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土耳其政府希望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够给予弥补。然而，美国却以美国纳税人的钱不能用来补偿土耳其的经济损失作答，拒绝加以补偿。这一自私和冷漠的态度，致使土耳其对制裁伊拉克的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弥补这一损失。1994年9月，土耳其一个庞大的贸易代表访问了伊拉克，并在巴格达与伊拉克签订了一个发展双边贸易关系的备忘录。此后，土耳其重新开放了关闭了4年之久的边境口岸哈布尔，恢复了土伊两国之间的易货贸易。不久，数以百计的土耳其卡车拉着“人道主义”的物资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巴格达，伊拉克政府热情地用红地毯欢迎车

队的到来，当车队返回土耳其时满载着廉价的伊拉克石油。另外，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结盟，使其在经济上获得了极大的好处。据1997年4月8日沙特阿拉伯的《中东报》报道，到2000年，土耳其与以色列的贸易增长了4倍，达到20亿美元。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是土耳其在中东的重要贸易伙伴，1996年时，两国的贸易就已达5亿美元左右，两国最大的贸易是淡水。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它的水每立方米卖0.5美元，而从马来西亚运来的水每立方米要卖6美元。土耳其打算用大量出口淡水来弥补进口石油的巨额亏空，以色列成为它的最大客户。以色列决定购买土耳其南部马纳夫加特河的水，每年至少要买1.5亿立方米的水，仅此一项，土耳其每年就可以获得8 000万美元的进账。总之，土耳其政府凭借着自己经济和政治地缘优势，使用“经济外交”手段，扩大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取得显著的成效，也是其近年来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今天的土耳其已成为中东地区堪称榜样的经济大国。无论是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来看，还是从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状况来看，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世人瞩目的。但是，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土耳其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它在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尚处于发展的阶段，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阻碍社会经济进一步迅速向前发展的困难和问题，仍然面临着不少严峻的挑战。

首先是通货膨胀问题。虽然在80年代，土耳其厄扎尔政府把通货膨胀率一直列为头号目标来治理，但由于预算赤字绝对额的

不断增加,历届政府行政开支过大,以及随着经济调整而来的成本推动和货币贬值等原因,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始终高居在28.2%以上,并且在1988年以后再度抬头,骤然回升到了75.5%。此后从1988年起,已连续有9年都在60%以上,1994年又猛升为106.3%,这是土耳其历史上此项指数较高的纪录之一。1995年略有所下降,为93.6%,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因物价不断上涨而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历届土耳其的议会选举中,降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各政党竞选的重要承诺之一。1998年7月,耶尔马兹总理表示争取在1998年度之前,将通货膨胀率降到50%,1999年底再降到20%,但经过耶尔马兹和埃杰维特两届政府的努力,当前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在60%左右。

其次,外债不断增加,债务负担日益沉重。土耳其的外债问题虽然在80年代初靠重新安排而得以暂时缓和,但一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所以当土耳其重新返回国际金融市场之后,又不断增添新债,又重新面临着偿债高峰。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土耳其历届政府一是举借外债,一是引进外资。自1989年以来,举借外债最多的年份为1993年,这一年的外债总额由1992年的555.92亿美元,上升为673.56亿美元,增加了117.64亿美元。至1995年,土耳其的外债总额为732.78亿美元,其中中长期债务为575.77亿美元,短期债务为157.01亿美元,光1993、1994两年土耳其支付的利息分别为31亿和39亿美元。从1981年至1995年,土耳其实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70.97亿美元,仅1996年一年就引进了外资47亿美元,外资的大量流入成为土耳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不过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已引起土耳其政府的注意。因为过重的外债负担,必将影响土耳其的国

家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来源。截止 1999 年，土耳其的债务负担已达 970 亿美元，外债率高达 31.9%，而国际货币储备仅有 200 亿美元，使得土耳其的金融信誉等级不断降低。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路途艰难。土耳其自 30 年代实行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原则以来，国有企业掌握着土耳其的重要经济命脉，遍及钢铁、电力、炼油、纺织、化工、采矿、航空、海运、铁路等行业，其产值占土耳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在土耳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从 80 年代以来，土耳其政府为了向市场经济转变，放下国有企业长期亏损而由国家补贴的包袱，一直致力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并且于 1986 年 5 月 28 日颁布第 3291 号法令，明确规定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框架，并授权公众参与和住房基金委员会予以实施，但是，土耳其国内在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改革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国有企业在土耳其的经济发展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卖掉它会动摇土耳其经济的基础结构，所以不赞成出售国有企业。有的人同意出售国有企业，但不赞成卖给外国人，主张将股份出售给职工。而土耳其政府却认为，国有企业不实行私有化就很难继续保持赢利，就很难通过实现产品的多样化和现代化，使土耳其的产品提高竞争能力，打入国际市场，因此，土耳其政府虽然想要逐渐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由于阻力重重，所以在实际步骤上却十分慎重，进展相当缓慢，被一些外国报刊称之为“蜗牛爬行速度”。1998 年土耳其的私有化收入计划为 45.79 亿美元，但实际出售仅为 31.59 亿美元。在所有的国有企业中，盈利的企业只占 15%，而国有企业的亏损额每年为 30 亿美元左右，成为土耳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沉重包袱。

第四,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土耳其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濒临爱琴海靠近欧洲的西部地区经济一直发展比较快,而远离出海口,靠近伊朗的东部及东南部内陆高原地区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土耳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均收入不平衡。土耳其的全国人均收入是3 500 美元左右,西部经济发达省区的人均收入是 5 000 美元左右,而经济落后的东部省区的人均收入仅为 1 000 美元左右,两者之间的差距之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其次是自然环境和社会服务设施之间的不平衡。土耳其东部省区大部分是山区和高原,工业化程度低,交通运输及长距离联络困难,市场规模不能适应企业生产规模,私人投资者很难在这些地区投资,资金严重外流。另外,该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不及其他地区,医院床位和医生人数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人数。并且学校的教育水平以及人均文化程度都相对低于其他的地区。最后是人才外流比较严重。为了寻求工作和接受更好的教育,人们纷纷离开这一落后地区,流向大城市,使得经济落后地区很难留住高质量的人才。近年来,土耳其政府也看到了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加速发展东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土耳其政府也相应制订了一些具体措施,如为经济落后地区提供足够的社会基础设施,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外和私人对该地区的投资,并对这些经济落后地区进行的工业基础设施投资给予鼓励和补贴,投资补贴还受到投资规模大小的影响。

最后,人口和失业问题。土耳其人口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人口的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2.5%。1984 年土耳其的人口为 4 800 万,1985 年为 5 000 万,1986 年为 5 100 万,2000 年的人口已经达到 6 500 万。这种急剧膨胀的人口,使土耳其平均每年有 40 多万

人涌入就业大军，造成失业率常年居高不下，失业人数经常保持在450万以上，2000年达到500万人。这样庞大的失业队伍，无论对土耳其的经济或社会来说，都投下一条长长的阴影，成为历届土耳其政府最感头痛的问题。此外，由于土耳其人口的过度膨胀，也给食品、能源、公共设施，以及教育卫生等都带来了很大的紧张。由于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根据土耳其的立法，对失业者又无任何补贴，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从而为土耳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抬头创造了条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以前已被查禁的宗教派别开始恢复活动，这些都是人数相当多而且非常好斗的极端宗教组织，现已成为土耳其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

经济改革的发展趋势

土耳其人民有理由为自己在社会经济发展当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骄傲，但土耳其要想由一个中等收入的半工业化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发达国家，早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也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土耳其人民还需要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变，克服在社会经济发展当中新旧体制长期并存的状态，才能真正建立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新型经济体制。面对当前土耳其社会经济陷入的困境和存在的高通货膨胀、高赤字和高债务等经济痼疾问题，历届土耳其政府一上任就都表示要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坚决放弃指令性经济，积极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有竞争的市场经济为政府经济财政政策的基础，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经济平衡，为此，坚持国家不要干预经济，政府必须放弃对物价的管制，而应由市场来决定利率和外汇比价等方针，充分发

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目前在中东地区，土耳其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发展最快的国家。

另外，为了保证社会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历届土耳其政府都将银行、税收、社会保障改革列为政府优先的工作日程。土耳其是执行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方案”做得比较彻底的国家之一。土耳其政府通过建立强大的银行系统，依照国家标准建立独立机构对其进行监管，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民众的储蓄，有效地加大了对生产和出口的投资支持。此外，土耳其政府特别注意在经济改革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强调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要关心下层民众的生活，建立牢固的社会保障体系。土耳其政府在社会保障改革方面的主要内容，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失业保险，对低收入者实行免税，提高退休年龄和退休者的福利水平，从而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在税收方面的改革，土耳其政府主要是制定和颁布各项有关的法律法规，从而扩大税收面，增加财政收入和鼓励出口。

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土耳其政府提出要对亏损的国有企业加速实行私有化。因为在导致土耳其财政赤字扩大的诸因素中，国有企业的长期亏损是一个突出的因素。所以土耳其政府把解决财政赤字这一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私有化上。目前，土耳其议会批准了政府的经济改革方案，通过了全面私有化的各种法律，规定2000年私有化的总收入要达到400亿美元，并且决定在私有化过程中，如果工人们愿意管理这个企业，应首先把企业转让给他们经营。在加快私有化的进程中，土耳其政府要想取得公众的信任，就必须确保透明度与公共利益。目前，降低通货膨胀率仍是土耳其政府的首要任务，土耳其政府试图通过加强财政纪律，削减财政赤

字，控制货币发行量，打击地下经济，鼓励私人投资和出口，大力发展旅游业，修改阻碍投资和出口的法律，从而计划要将老大难的通货膨胀率降到一位数。此外，消除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不公平的分配状况，发展农村的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是土耳其政府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例如近年来，土耳其政府给予价格支持的农产品数目逐年的增加，已由过去的10种增加到了目前的26种，从而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总之，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全面发展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已成为历届土耳其政府的决策者们探索和实践的目标。但是对于土耳其来说，迈向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有漫长、艰苦的路程，而且还要迎接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

三、后冷战时期土耳其的对外政策

土美关系的变化

在冷战时期，土耳其与美国在对抗苏联的共同目标下，保持了一种亲密的同盟关系，成为西方阵营中第一道包围苏联“新月”中的一环，在北约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在中东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一个国家。80年代末，伴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及冷战时代的结束，土耳其作为北约南翼的战略重要性有所下降，加之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与库尔德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使美国对土耳其有些冷淡，逐渐对它失去了昔日的热情和重视，相互之间龃龉增多。

自1984年以来，土耳其历届政府均对库尔德工人党采取坚决

镇压的方针。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斗争，土耳其政府推行了类似越南战争的“战略村”的村落联防制。海湾战争后，土耳其政府军则进一步采取了所谓“无人区”的作战行动。“无人区”的作战行动使 4 000 多座库尔德人的村镇被炮火夷为平地，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一度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宣传媒体关注的焦点。土耳其政府认为，镇压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纯系围剿分裂主义恐怖力量的内政问题，而美国则指责土耳其的人权有问题。在美国国务院和大赦国际每年发表的人权报告中，罗列了土耳其在过去一年中的种种“罪状”，土耳其往往与白人统治时的南非为伍。这给人们一种印象，土耳其的人权状况很差，距一个真正“西方国家”的标准尚远。土美彼此立场的不同，自然增加了矛盾并导致了摩擦。此外，美国在冷战后进一步把对外援助政治化，加强了在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的倾向，美国的这种做法也一度波及土耳其。例如，1994 年 8 月 26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 1995 年度的美国援外法案，从给土耳其援助款的 3.63 亿美元中扣除了 10%，并声称这 10%的援助是否最终给土耳其要视它的人权状况而定。此外，美国政府在 1994 年的一年中，曾经终止了 4 批运往土耳其的武器装备，其理由是土耳其的人权记录不佳，土耳其则称之为“非正式武器禁运”。

尽管土耳其与美国有许多令人不快的争执，但土耳其也不可能偏离与美国结盟的大方向，因为在它的整个外交格局中，土美关系是它最重要的一环，是完全符合它长远的国家利益的。近年来，土耳其的领导阶层也逐渐地认识到，它承受不了与美国关系疏远所造成的损失，它不能离开与美国结盟的这条老路。特别在国家安全上，土耳其离不开美国的帮助，因为它的 95%的军援和 85%

的武器都来自美国。近10年来,美国卖给了土耳其近百亿美元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并用贷款和赠款支付了其中大部分的货款。尽管美国仍然在指责土耳其有人权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未阻挠向土耳其提供武器。相反,当土耳其于1992年对库尔德工人党的镇压升级后,美国还提高了它对土耳其的军事援助。

此外,为了向美国证实在东西方关系和解,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对美国仍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海湾战争爆发后,立即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对伊拉克的联盟。为配合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土耳其关闭了伊拉克经土耳其本土通向地中海的输油管道,忍受了20亿美元的巨大损失。为配合美国军队对伊拉克实施的海空封锁以及后期“沙漠风暴”的行动,土耳其向美国空军部队提供了位于阿达纳省境内的因契尔利克空军基地。为配合美国军队的地面进攻,土耳其在伊土边境部署了18个主力师,多达13万人的军队,从而将伊拉克第五军团的10个师牢牢地牵制在伊拉克的北部地区。特别是海湾战争结束后,土耳其在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实行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安抚行动”中,允许以美国军队为首的多国部队以土耳其作为基地去帮助库尔德人,同意在土耳其的东南部布署多国快速反应部队,以对付伊拉克军队对建立的库尔德人安全区的袭击,从而为美国保护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安全区的“安抚行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感谢土耳其对美国的大力支持,美国政府增加了对土耳其的经济援助,扩大了同土耳其的贸易,把进口土耳其纺织品的限额增加了一倍。美国政府并促使英国、沙特、科威特、埃及等国家帮助土耳其挽回在海湾战争中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促成埃及购买了土耳其生产的40架F-16战斗机,帮助土耳其获取了大量的

外汇。在美国的主导下，海湾危机财政协调集团为土耳其提供了40亿美元的援助，海湾地区反对伊拉克联盟为土耳其防务基金提供了25亿美元。特别是1991年7月下旬，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了土耳其，布什发誓要以支持土耳其实现军事现代化作为对土耳其参加以美国为首的反伊联盟的报答，从而使土美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美国朝野的要员们也不断发表文章，认为需要与土耳其保持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在政治和经济上帮助土耳其，确保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不会转向，因为土耳其在冷战后并没有失去它的重要性，现在变得对美国更为重要了。许多政策分析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全球战略的疆域已从南斯拉夫延伸到了阿拉伯海，土耳其将是支撑美国在穆斯林国家中的一个中流砥柱。如果土耳其在冷战时期扮演了北约警察角色的话，那么现在它表演的舞台在中东地区，它在那里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位置。在对付冷战后日益突出的民族冲突、恐怖主义、难民潮、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地区稳定等问题方面，土美两国需要更多的相互支持和协助。1996年7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表示，土耳其有充分的权利粉碎库尔德反叛分子的分离主义倾向，尊重土耳其的领土完整，不再指责土耳其政府践踏人权，从而保证土耳其对库尔德反叛分子采取镇压行动的合法性。在对待塞浦路斯问题上，对土耳其违反联合国决议，占领塞浦路斯北部达12年之久的行为，美国政府在同一年表示完全理解。美国政府的这一表态，极大地缓解了国际社会对土耳其的压力。此外，美国与土耳其联手争夺黑海两岸的石油管线，支持土耳其与以色列建立军事合作关系，支持土耳其圆欧盟的梦。总之，美国根据其中东战略自身

利益的需要，对土耳其的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使得土美关系随之也一步步走出低谷，由冷变暖，两国的战略同盟关系日趋紧密更加成熟。

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

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土耳其，虽然仅有3%的领土位于欧洲，97%的领土都在亚洲，但它始终坚持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一直把靠拢和融入欧洲当作基本国策。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时期，就开始了接近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共和国成立初期，土耳其在向外派驻的26个外交机构中，就有19个在欧洲国家，可见它对欧洲的重视。早在1963年，土耳其就与当时只有6个成员国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前身)签署了联系国协定，该协定不仅允许土耳其公民从1986年开始可以在共同体内自由迁徙，而且还答应它加入共同体。1973年土耳其又与欧共体签订了至1995年逐步取消关税的附加议定书。1987年土耳其觉得时机成熟了，正式提出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的要求，欧洲委员会也认为它基本符合条件。目前，土耳其有50%以上的外贸是同欧盟进行的，有60%以上的外资是由欧盟国家提供的，每年在欧盟打工的数百万土耳其人寄回国内的外汇就达数十亿美元。因此，加入欧盟对于土耳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欧盟直接和间接的帮助，土耳其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就会进一步加剧，而加入欧盟是它迅速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关系到它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以早日加入欧盟是土耳其的基本国策和历届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就称，加入欧盟是土耳其“与生俱来的权利”，表达了土耳其强烈入盟的愿望。

尽管土耳其历届政府打定主意，一心一意地想要加入欧盟，早日融入“欧洲大家庭”，但欧洲人怎么看土耳其人也不像欧洲人，欧盟认为土耳其离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还差得甚远。1989 年 12 月，欧盟决定无限期地拒绝考虑土耳其要求成为欧盟正式成员的申请。最使土耳其感到忿忿不平的是，许多在它后面提出申请的国家，如瑞典、芬兰和奥地利等国，却先于它成为欧盟成员国。不仅如此，为了配合北约东扩的战略，欧盟于 1997 年 12 月中旬，在卢森堡举行的第 58 届欧盟首脑会议上，决定吸收 80 年代末期政治和经济体制开始转机的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以及地中海上的岛国塞浦路斯等几个中东欧国家，而却明确地把土耳其给排除在外。消息传来，土耳其举国上下群情激愤，认为这是对土耳其的莫大讽刺和侮辱。应邀与会的土耳其总理耶尔马兹大发雷霆。他示威性地拒绝出席东道主举行的正式晚宴，而后连连发表讲话，对欧盟大加抨击，声称这是对土耳其的歧视，扬言要撤回入盟申请。他还宣布，不准备与希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继续谈判。随后，耶尔马兹总理利用访美之机，进一步抨击欧盟拒绝土耳其加入欧盟，是出于宗教偏见，是想建设一个“基督教徒俱乐部”。他说，如果欧洲联合进程把土耳其排除在外，欧洲将是一个“不宽容和充满偏见的欧洲”。土耳其国内的一些报刊，形象地评论道，欧盟和土耳其的关系如同一对早就订了婚，却迟迟结不了婚的恋人。

从 1952 年 2 月土耳其加入北约组织之后，在政治上、军事上一直同西方国家站在一起，所以多年来欧盟对土耳其要求加入欧盟的呼声，也非充耳不闻，只是迫于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把土耳其入盟的问题挂了起来。1993 年的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为入

盟定了三条先决条件：第一，建立稳定的、制度化的国家机器，保障民主、法制秩序。保护人权，切实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第二，建立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能顶得住欧盟内部竞争的压力；第三，承担成员国义务，把政治、经济货币联盟作为自己的目标。欧盟认为这三条土耳其都差得甚远。首先，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土耳其与欧盟差距还很大。据有关资料统计，1995 年在欧盟的 15 个国家中，最低的葡萄牙为 6 650 美元，而土耳其仅为 3 150 美元，不及葡萄牙的一半。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土耳其虽然地跨欧亚两大洲，但绝大部分领土在亚洲。尽管土耳其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但是欧盟国家并不这么看。1998 年 3 月 11 日，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访问的比利时副首相梅斯达德甚至向土耳其领导人建议："土耳其是否可考虑其他选择，比如说转向亚洲？"另外，欧盟认为土耳其的人权问题不少，指责其政府刑讯、监禁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把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单纯当成"恐怖分子"横加镇压，人权记录太差。此外，土耳其与它历史上的宿敌希腊至今关系不和睦，两国在领土、民族等问题上争端不断，欧盟多次调解而无结果，这也是欧盟成员国不愿接纳土耳其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最后，还有一个人们不愿意触及，但又心照不宣的敏感话题，那就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背景。欧盟成员国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而土耳其 99％的公民却信奉伊斯兰教。曾经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范莱尔洛在欧洲议会上的一次讲话中，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道："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大国，我们欧盟能接纳它吗？"因为在欧盟来看，如果土耳其的 6 000 多万穆斯林人口在欧盟内"自由流动"，发生流血的"文明冲突"是极有可能的。最近，欧盟的许多政治家纷纷在报刊上撰文，主张欧盟不必遮遮掩掩，应该拿出

勇气对土耳其说，你不属于欧洲传统文化圈，欧盟就是不要你。

鉴于以上的原因，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土耳其要加入欧盟难度较大。但是，欧盟在总的原则上又为什么要紧紧地拉住土耳其呢？看看地图吧，土耳其突入中亚、西亚，辐射亚洲腹地，确实是欧盟向亚洲伸出的一座天然桥梁。欧盟21世纪的新蓝图是面向全球制订的，所以扩大在亚洲的影响，保持与亚洲的紧密接触，使欧盟在世界事务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都离不开土耳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另外，虽然欧盟多次婉言拒绝了土耳其要求加入欧盟的事情，但土耳其对加入欧盟的初衷不变，认为它手里有两张王牌，使得欧盟不敢断然对它彻底关上大门。土耳其手里的两张王牌，一张是它的北约成员国身份，另一张是有美国对它的支持。美国认为，土耳其扼守中东、巴尔干和盛产石油的黑海盆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这些地区一直都存在着冲突和动乱，前景难测，因此要把土耳其稳在西方阵营内。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曾经多次表示，完全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对欧盟指责土耳其人权记录不良，美国认为人权不应该成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惟一标准。此外，土耳其也仰仗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多次要挟说，如果欧盟不接纳它，它就否决北约东扩。为此，欧盟也不能不考虑土耳其这两张王牌的分量。

在20世纪最后的时间里，1999年12月欧盟15国首脑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聚会，批准了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候选资格，使得土耳其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伊斯兰国家。虽然从1987年正式提出入盟申请起，12年过去了，土耳其才蒙恩准获得到了一个排在许多国家之后的候选资格，但对于土耳其来说，是其进一步靠拢欧盟，实现早日加入欧盟新战略的重大胜利，因为这关系到

21 世纪土耳其的前途和国际地位。有些国际政治家分析，虽然欧盟倾向于接受美国对土耳其战略地位的分析，表示欧盟的大门对土耳其是敞开的，土耳其最终也可能会被欧盟所接纳，也会在经济上给予土耳其适当的照顾，但在短时间内土耳其不会成为欧盟成员国。如此看来，土耳其与欧盟之间那种关系密切，但又不会很快成为其成员国的特殊地位，将会长期维持下去。

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

在巴尔干地区，土耳其除与保加利亚就该国对待土耳其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存在有一些龃龉外，在所有的巴尔干国家中，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最糟，两国在塞浦路斯和爱琴海上的争端有时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长期以来，土耳其与邻国希腊的关系一直不和睦，两国互为宿敌，这即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存在的现实问题。在历史上，希腊曾经被土耳其所统治。希腊独立后，于 1920 年派兵入侵土耳其，后被打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于 1930 年 12 月 30 日，与希腊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以解决边界及居民的交换问题。双方议定，在东部地中海，两国海军保持均势，双方一致肯定了现状。1959 年 2 月 11 日，土耳其和希腊在瑞士签订《苏黎世协议》，同年 2 月 19 日，土耳其、希腊、英国三国政府的代表和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代表签订了以《苏黎世协议》为基础的《伦敦协定》，确定了英国在移交塞浦路斯主权后，英国基地的主权和土耳其、希腊两国在塞浦路斯的驻军，以及塞浦路斯独立后议会政府的组成等事宜。1960 年 8 月 16 日，根据签订的《关于建立塞浦路斯共和国条约》、《英、希、土、塞保证条约》和《希、土、塞同盟条约》，塞浦路斯共和国宣告独立。

根据上述条约，塞浦路斯的正副总统分别由希、土两族选举产生，希腊族人马卡里奥斯任总统，土耳其族人库楚克任副总统，他们对涉及国防、外交和财政等问题享有否决权。希、土两族在内阁和议会上的比例为7:3；英、希、土三国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安全和领土完整，在条约被破坏时三国可集体或单独进行干预；希、土两国在塞浦路斯可保留部分军队。这些条约的实施，为后来塞浦路斯希、土两族人民的冲突和外来干涉埋下了伏笔。

在历史上，塞浦路斯原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岛上居民的80%为希腊人，其余为土耳其人。出于对塞浦路斯战略地位的觊觎，英国于1870年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获得对该岛的租让权。1914年英国正式吞并塞浦路斯，1925年又把它变成直辖殖民地。在英国统治之前，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人民一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1931年，英国当局解散了希腊族人在其中占多数席位的立法委员会，这激起了希腊族人的愤慨，他们开始要求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相反，土耳其族人则为英国的托管尚未结束，不同意与希腊合并。于是，英国殖民当局故意对土耳其族人的要求予以支持，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最后在塞浦路斯形成了希腊族人、土耳其族人与英国殖民当局鼎足而立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要求与希腊合并的呼声日高，而土耳其族人相应提出北部土族区与土耳其合并，造成希腊与土耳其两族人之间的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为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从1956年开始英国政府先后制订过几个和解方案，结果均遭希腊、土耳其两国政府和塞浦路斯居民的反对，并且联合国与北约组织的调停也宣告失败。在此期间，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各自向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居民提供大量的物质以及

道义上的援助，使得希、土两族双方僵持不下。1959 年 2 月，英、希、土三国政府与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领袖终于就塞浦路斯未来的体制达成协议。虽然 1960 年 8 月塞浦路斯共和国宣告成立，但希、土两族由于在制宪上的分歧及历史原因，两者之间不断发生流血冲突。

1974 年 7 月 15 日，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希腊军政府的策动下发动了政变，试图实现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计划。在英国拒绝援助的情况下，土耳其政府于同年 7 月 20 日，以保护土族居民安全为理由，单独出兵塞浦路斯北部，占领了塞浦路斯大约 40% 的土地面积。翌年 2 月 18 日，塞浦路斯的土族在北方宣布成立“土族邦”，设立了独立的政府、军队、警察机构，在经济上也自成体系，流通的货币是土耳其里拉。至此塞浦路斯两族联合政体完全瓦解，塞浦路斯出现了两个并存的政权，形成了对峙的分裂局面。塞浦路斯问题既是岛上两族间的问题，更受希、土两国关系的左右，使得土耳其与希腊都卷入了这一政治漩涡，造成两国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为和平解决塞浦路斯争端作出了许多努力，但一直未取得突破。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希、土两族在领土划分、难民遣返、制宪以及外国军队撤出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时难以弥合；更重要的还是希腊、土耳其两国政府对此问题的长期干涉，各自支持塞岛的一方，塞浦路斯问题实际上成为希腊与土耳其两国之间矛盾的延伸。此外，爱琴海问题也是土希两国长期交恶的重要原因。1987 年 3 月，土耳其和希腊就爱琴海大陆架石油开采权的问题发生争执，几乎爆发一场战争。1996 年 1 月，土希两国因爱琴海岛屿的归属而再度引发纠纷。在经历了 4 天的

“换旗事件”和向该海域互派军舰，两国军队对峙后，土耳其军队在伊米亚岛的一个岛礁登陆，冲突一触即发。后由于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亲自斡旋，才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军事冲突。此后，1998 年塞浦路斯的希腊政权执意要在同年 10 月份部署俄制 S－300 防空导弹，立即遭到土耳其族及其母国土耳其的强烈抗议，指责这一“挑衅性”事件有“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双方一度剑拔弩张。

由于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在塞浦路斯、爱琴海等问题上分歧严重，难以调和，两国关系危机不断，隔阂很深。但土、希两国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也存在着努力改善与缓解紧张关系的一面。就土耳其方面来说，改善同希腊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其早圆欧盟梦，得到其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必要资金，因为在欧盟内，希腊掌握有否决权，而且也有种于其避免同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攻击，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国内的库尔德工人党和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来自叙利亚、伊朗的威胁，同时又有利于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扩大影响。对于希腊而言，土希关系涉及到希腊的稳定和繁荣。希腊在欧盟的贫富排行榜上属末尾，它迫切需要将主要的精力用于发展社会经济，从而不被甩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快车。此外，希腊领导人希望能尽快解决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问题。欧盟业已把塞浦路斯列入到了扩大国的谈判名单，然而，没有土耳其的合作，希腊的愿望很难得以顺利实现。

近年来，土、希两国的关系有所缓和，1997 年 7 月，土耳其与希腊两国领导人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了会谈，会谈后两国正式发表声明，双方同意不在爱琴海的岛屿争端中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表明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强烈愿望。此后，双方多次举

行会谈，就一些棘手问题达成了协议。特别是1999年8月15日土耳其遭受特大地震的破坏，死伤1万多人之后，希腊政府立即派去大批的救护人员，又送去大批急需的救灾物质。土耳其也一样，当希腊此后也发生地震时，土耳其也派去了大批的救护人员和送去了大批的救灾物质，使得两国关系趋向和解。总之，土希关系早已越出它们两国的范围，已直接关系到巴尔干以及欧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只要土希两国在今后的会谈中坚持和平协商的原则，互谅互让，那么，在联合国和欧盟的推动下，两国关系最终会实现正常化。

土耳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80年代末，伴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以及冷战时代的结束，土耳其的外交变得十分活跃。一方面进一步密切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加强同西亚、中亚等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广泛与这些国家进行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合作。土耳其加强与西亚伊斯兰国家的合作，主要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家领导人频频出访这些国家，会晤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共同讨论加强合作的问题。特别是与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等国家共同提出四边合作新举措，确保各自边界的安全，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其次，加强同伊朗等国家的经济合作，创建伊斯兰共同市场，输出具有土耳其特色的"经济转换模式"。特别是想和平利用其境内的淡水资源，以加强与西亚国家的合作。土耳其是西亚地区惟一拥有丰富淡水资源的国家，西亚著名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均发源于土耳其。近年来，土耳其已通过政府间的途径，与叙利亚、约旦以及海湾六国接触，探讨修建土耳其—海湾和平输水工程的问题。该工

程拟将土耳其境内的塞伊河水和杰伊汉河水引至上述国家，以解决这些国家的用水需求。该项工程宏大，耗资甚巨，工程概算大约为200亿美元，由受益国分摊，美国财政界表示支持。土耳其声称，修建引水工程比淡化海水合算，而且是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同时也能为受益国创造就业机会。在西亚地区水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这一计划确有诱人之处，但上述国家同时也担心土耳其将来会凭借着手中掌握的淡水资源对受益国提出非分要求。目前，水利工程建议在一些国家已得到积极的响应，但个别国家仍在犹豫之中。世界舆论普遍认为，土耳其完全有可能用“经济淡水”来换“石油美元”，也可能将“经济淡水”变成为“政治淡水”。

另外，调解阿以冲突，也是土耳其愿致力于与西亚国家进行广泛合作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土耳其官方曾多次表示愿意充当召开中东和平会议的东道国。因为土耳其认为它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它即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与阿拉伯国家有着传统的良好关系，但同时它又与以色列建有外交关系，有着全面的合作往来。土耳其的上述想法，已得到美国和欧盟的赞许。

冷战结束以后，苏联解体，原苏联中亚共和国纷纷独立，在中亚形成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地区，使土耳其陡然成为中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土耳其地跨欧亚两大洲，位于中亚西部，并扼有中亚内陆的出海口，占据向中亚地区施加影响的优越地理环境。中亚的多数国家与土耳其在语言、文化和宗教上又有共同点，一些土著居民还具有土耳其血统。因此，土耳其一直想凭借自己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建立某种形式的以土耳其为核心的“突厥人共同体”。然而在冷战时期，土耳其与中亚之间那种深厚的渊源关系被阻断。苏联解体后，土耳其抓住

时机，抢先在中亚地区积极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攻势，试图恢复与中亚各国业已存在的古老纽带。

首先，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率先承认中亚各国的独立，并把这些国家作为土耳其对外政策议事日程上最优先考虑的问题，迅速组织专门班子和机构，调整其对中亚各共和国的政策，主动邀请中亚各国领导人访问土耳其，并与他们签订了一系列合作的协议。而土耳其的国家领导人也逐一回访了这些国家，进一步密切了相互关系。

其次，在经济上慷慨解囊，给予大力支援。土耳其在经济上力图满足中亚各国的所有要求，几乎向每一个中亚国家承诺帮助它们发展经济，并已着手向一些国家提供信贷、物质和技术帮助。中亚国家独立后，面临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任务，因此，土耳其不仅派人到中亚各国帮助建立市场经济，同时还允许这些国家派代表团来土耳其考察政治和经济政策，学习“土耳其模式”。

第三，在政治上竭力笼络。土耳其积极帮助中亚国家加入“欧安会”，力促阿塞拜疆、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参加由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该组织涵盖从西亚到南亚次大陆，北至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 10 个国家，总人口为 2.2 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国际经合组织。同时，土耳其尽力把一些国家纳入由它倡导的“黑海经济合作”计划之中，并提出要与独联体五个突厥语国家建立“突厥语国家联盟”的设想。

最后，在文化上加强渗透。土耳其每年拨出大批专款用于向中亚各国提供文化援助，并投资 1 000 多万美元修建了一个卫星传播系统，每天向中亚地区播放土耳其语的广播电视节目。土耳其还向中亚国家送去了大量的教科书，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文字改

革。近年来,土耳其向每个中亚国家提供了数千名上大学的名额和数百名高中生的名额,帮助中亚国家建立"中亚技术大学",培养中亚各国的企业家、银行家和外交官等。

土耳其如此积极地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其目的在于以其经济优势,一举占领中亚广阔的市场,形成以土耳其为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圈,扮演"地区性大国"的角色,在中亚发挥战略作用。这将有利于促进土耳其经济更快发展,并通过充当中亚各国与西方国家经贸联系的桥梁,加强土耳其在西方的经济地位。在西方国家看来,土耳其在中亚地区影响的日益增长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因为与土耳其合作,既可以对付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可以促使中亚国家面向西方。因此,西方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积极配合土耳其在中亚的活动。

土耳其在中亚地区雄心勃勃,但它要实现其既定目标也远非易事。首先,国力有限。中亚各国目前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政局不稳,亟需大量支援。而土耳其国力有限,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方面,都不能满足中亚国家的需求,给予他们急待重建经济的实质性帮助,因而缺乏巨大的凝聚力。其次,面临伊朗的挑战。伊朗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也在中亚积极行动,力图在该地区建立以它为主导的"穆斯林共同市场"。伊朗的动向与来势凶猛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密不可分,在中亚各国也颇具影响。因此,土耳其和伊朗在中亚地区一定会有一番激烈的争夺。最后,中亚各国也心存疑虑。中亚不少民族虽然在语言和种族上与土耳其同出一源,但他们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与土耳其建立过任何共同体,种族认同感在中亚国家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中亚各国在经济、政治上对土耳其有所期待,但它们对土耳其的意图也抱有程度不同的疑虑,不愿意

完全倒向土耳其一方，所以，在中亚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与土耳其发展关系只是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现实考虑，并不能完全排在与俄罗斯，西方国家发展关系之前。

总之，不管土耳其的真实想法如何，至少在目前，土耳其根本无力实现“大土耳其斯坦”的理想，因为对于土耳其来说，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其早日加入欧盟的计划，这关系到21世纪土耳其的前途和国际地位。

第六章　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

一、古代的中土关系

悠久的历史交往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历史和文化交往的大动脉，而中国和土耳其正位于这条大动脉的东西两端，丝绸之路这条金光闪闪的大道，把世界上两大民族紧密地连结了起来，使中土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族与中原就有友好往来，在突厥政权的强盛时期，与中原的交往更加密切。这种交往有战有和，特别是在和平年代交往甚密，有过通婚、公主互嫁王室等举措，魏长东公主、隋淮南公主以及突厥木杵可汗的公主，都是友好睦邻的使者，两大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代表人物，相互建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此外，历史上还有不少突厥人到中国诸王朝做官，建立过丰功伟绩。例如阿史那思摩可汗被唐太宗封为大将军、都督，官至兵部尚书，死后陪葬于陕西乾县昭陵。联姻和入官说明突厥人与中原人交往亲密。

土耳其民族在中国的史书上称为突厥，最早始见于公元542

年的中国史籍之中。据《周书·突厥传》所载:"突厥者……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阳……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和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及两河流域都是人类古老文化的发源地。作为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在公元 5 世纪后半期,突厥人主要活动于准噶尔盆地之北的阿尔泰山地区,阿史那氏是突厥中最尊贵的种姓,被称为蓝突厥。当时正值漠北柔然汗国强盛之际,突厥人因精于冶铁而为"茹茹铁工",向柔然输送工具和兵器作为贡赋。公元 6 世纪中期,由于柔然威胁中原,公元 545 年,西魏宇文泰遣酒泉胡安诺槃陀出使突厥,以共击柔然。公元 546 年,铁勒将伐茹茹,突厥首领土门率所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人。由于突厥实力骤强,乃求婚于柔然,以期争得平等礼遇。但柔然首领阿那瓌却大发雷霆,说:"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亦怒杀柔然使者,随即于公元 552 年正月,"发兵击茹茹,大破之于怀荒北,阿那瓌自杀。"柔然汗国崩溃。"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一般历史上都以此为突厥汗国建国之始。突厥政权建立不久,伊利可汗的兄弟室点密领兵攻占西域各地,公元 562 年被立为西面汗。其南牙在鹰娑川为冬都,继之又在塞叶河流域之千泉建北牙为夏都,因此,突厥汗国的西部实际是在室点密的统治之下。由于东突厥的汗位继承问题,以及中原隋朝分化突厥的策略,而使得突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公元 583 年,室点密之子达头联合大逻便阿波可汗等反对东部的沙钵略可汗,导致了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二汗国,即以蒙古为中心的东汗国和包括中亚在内,以七河流域为中心的西汗国。

早期突厥汗国乃是同中原诸王朝相对峙的政权,所控占地区乃不属于中原诸王朝所统辖的漠北与西域。所以,这一时期的突

厥理应属于域外民族。东西突厥分裂以后，突厥属于跨国民族，其中东突厥自启民可汗已正式接受了中原隋朝的册封，成为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西突厥则自十姓归唐之后，也开始加入了中原多民族统一国家总体的行列之中。后东突厥汗国脱离中原唐朝的独立，标志着东突厥诸部落又恢复成为了域外民族，而西突厥则一直保持着中原的唐朝羁縻统治。公元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进中亚地区，突厥人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接受了伊斯兰教。中亚地区虽然属于阿拉伯帝国的版图，但突厥人先后都建立起地方政权，如公元11世纪建立的突厥塞尔柱王朝，公元14世纪建立的突厥奥斯曼王朝等。在我国历史上，宋代称突厥王朝为“芦眉国”，明代称“鲁迷国”，清代正式采用土耳其一名称。

11世纪在马立克素丹执政的突厥塞尔柱帝国昌盛的时期，其版图西至地中海东岸，东到布哈拉、撒马尔罕一带。11世纪末被中原宋朝称之为“芦眉国”的突厥罗姆素丹国在其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城镇和良田。宋朝赵汝适对该国有一段叙述：“芦眉国自麻啰拔西陆行三百余程始到，亦名眉路骨国。其城屈曲七重，用黑光大石甃就。每城相去千步，有番塔三百余。内一塔高八十丈，容四马并驱而上，内有三百六十层。人皆缠头塌顶，以色毛缎为衣，以肉面为食，以金银为钱。有四万户，织锦为业。地产统销、金字越诺布、间金间丝织锦绮、摩娑石、无名异、蔷薇水、栀子花、苏合油、硼砂及上等碾花玻璃，人家好畜驼马犬。”此段文字的记载，说明宋朝的中原民众已经对土耳其有了详细的了解。另外，据有的史书记载，中原人种植棉花晚于突厥人，因此突厥棉和“白叠”布作为特产输入了中原。而唐代大量的锦、绮、罗、缎、刺绣等物也源源不断地进入突厥人地区。此外，古代中国发明了造

纸，对人类传播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在汉朝的时候，纸就已经在突厥人的区域广泛出现，可见传播之快。总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土两国人民始终保持着友好的交往。

隋唐时期的交往

隋唐时期，中国是东方最强盛的国家。此时中国与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族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两民族之间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战争的形式来实现的。6世纪末叶亚洲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厥这个游牧民族南邻的中原地区，结束了绵延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一个强盛统一的隋王朝正在兴起。

中国历史上，自晋室南渡以后一直南北分裂，南方东晋以降又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汉族王朝，北方先是五胡纷争，各建帝号，至鲜卑北魏崛起始出现了短暂的统一，后来又复分裂为东魏、西魏，进而嬗变为北齐、北周。这种三国鼎峙的分裂形势，有利于漠北游牧民族政权实现自身的霸业。故突厥取代柔然、呎哒君临漠北、西域以后，周、齐二国皆争相结好突厥。在周武帝实现统一中原的大业中，汉人杨忠家族起到了卓越的作用。其从周太祖起兵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周武帝天和三年(568年)卒。子杨坚袭爵散骑常侍、本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次年迁骠骑大将军。周武帝建德二年(578年)，以其长女杨丽华嫁周太子赟为妃，遂成周帝外戚。陈大建十三年(581年)春正月，静帝改元大定。二月甲子，杨坚逼静帝逊位，建国号隋，年号开皇，是为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兴兵南伐，次年灭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南北统一。隋朝的崛起，结束了中原纷扰和衰落的漫长岁月，掀开了强大昌盛的历史新篇章，从而终

止了突厥独霸亚洲的时代。

从开皇元年(581 年)开始,突厥与中原的隋朝之间,就不断发生局部的边境战争,其全面侵隋始于开皇二年(582 年),但都被隋朝的军队击败。据《资治通鉴》中记载,“大将军韩僧寿破突厥于鸡头山,上柱国李克破突厥于河北山”。公元 583 年,突厥人再度合兵犯隋,此时隋朝早已经过周密的准备,主动发起进攻,大败突厥军队,进而收复营州,全面完成了北方的统一。而突厥因战败,加剧了内部的矛盾,出现了两大集团的分裂和内战。开皇八年至十三年(588～593 年)突厥正统大汗势力复兴,乃于还牙漠北以后,进一步西征达头,以期再建统一,光复祖业。此时的隋朝形式上作壁上观,实则仍然奉行传统的离强合弱政策,幕后操纵局势的演变,促进了突厥各派政治势力的分解与组合,导致了突厥大汗的统一事业功败垂成。在隋王朝离强合弱政策的巨大影响下,加深了突厥汗国的内部矛盾,导致突厥汗国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分。位于漠北,由启民可汗初建的东突厥汗国,为隋王朝所册立,实际上是隋王朝下属的边疆民族自治政权,强国的宗藩纽带连结着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但随着周邻诸国形势的变化和东突厥与隋王朝国力的消长,这一宗藩纽带不断发生变化,最后在隋、唐之际由于中原内战,而同隋王朝的残余势力一起灭亡。因此,在隋王朝时期,是突厥民族同中原关系全面加强,由外域民族变为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国家成员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

唐王朝是取代隋王朝君临中原的,而东突厥则奉行复隋政策,册立隋裔杨政道居于定襄,隋义成公主居可敦重位,这就决定了东突厥与唐王朝关系间的根本对抗性质。唐高祖于武德八年(625年)开始对东突厥采取强硬的政策,志在消灭这一对手,维护中原

统一大业。首先利用和平互市机会大量购买突厥战马、耕牛，积极备战。突厥地区盛产良马，而且突厥人善于养马。过去在突厥可汗对隋王朝的贡品中均有这些马匹。这些良马既可装备军队，又可用于农耕和交通。突厥马对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次再度同西突厥缔结军事同盟，并进一步发展和亲关系。最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塞守，做好了一切军事上的反攻准备。

武德九年(626年)下半年度至贞观二年(628年)，东突厥国中大乱，开始全面衰落，唐王朝采取积蓄实力，静以观变的政策，乘势翦除了依附于东突厥的残余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一统华北的大业。贞观三年至四年(629～630年)东突厥汗国的局势更加恶化，急剧走向衰亡。唐王朝册立薛延陀酋夷男为可汗与之联兵，共攻东突厥。突利可汗先于贞观三年降唐，颉利可汗则于贞观四年为唐王朝派遣的北伐军所破，俘解长安，从此结束了东突厥汗国的历史。此时，唐王朝已把东突厥人完全视同大唐子民，东突厥已由域外民族变成为华夷一统的大唐帝国诸民族成员之一。

西突厥自建国以来，一直同中原诸王朝关系笃睦。泥撅处罗可汗向隋王朝称臣，射匮可汗乃隋王朝册立，统叶护可汗同唐王朝结有共同对抗东突厥的军事同盟，咄陆可汗、咥利失可汗皆受唐王朝册命，这种关系对于加强西突厥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促进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保证汗国境内各族人民获得切实的物质利益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唐王朝国势更盛。唐王朝之西域已与西突厥接壤，从而引起乙毗咄陆可汗的严重不安，决心抛弃传统政策，立意与唐王朝为敌，结果导致西突厥的溃灭与大唐王朝的安西大都护府接管西突厥全境。

西突厥全境归唐王朝以后，阿史那氏的汗统并未中断，唐王朝推行的羁縻政策保证了这一汗统的延续并衍作数支继续统治西突厥原来的部众，历史上把他们称之为西突厥，其兴亡盛衰同唐王朝休戚相连。这些后西突厥诸羁縻政权都为巩固和维护唐王朝西疆的安宁建立过不朽的功勋，为加强和聚合华夷一统的大唐帝国做出过辉煌的贡献。此后，伴随着这些羁縻政权的相继殒灭，不仅结束了古突厥的历史，而且也结束了大唐盛世。

元明清时期的关系

大约在公元 6～7 世纪，作为游牧民族的突厥人开始大规模地向西南迁徙，进入中亚，11 世纪到达安纳托利亚高原，最后到达小亚细亚半岛，从此，小亚细亚半岛成为了土耳其人的祖国。在近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一个住在土耳其并说土耳其语的土耳其民族，经历了突厥塞尔柱王朝的强悍，目睹了奥斯曼帝国的憾人雄风，最终于 1923 年正式宣布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

13 世纪中叶，蒙古民族入侵小亚细亚半岛，突厥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沦为蒙古民族的藩属。由于蒙古民族占领了中原、中亚和西亚，因此从大都经西域、伊朗高原、两河流域至小亚细亚半岛，这大片的土地均为元朝的一统天下，使得连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更加畅通无阻。所以可以这样说，蒙古民族的大举入侵，虽然使这些地区的平民百姓受到了因战事所带来的灾难，但东西方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往，得到了历史上空前的加强。

土耳其地跨欧、亚、非的三角地带，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中国商品西运波斯，抵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由土耳其人再转运西欧，他们又把西方的商品东运，非洲的产品也经过土耳其人转运到

中国,例如象牙等产品,非洲人卖给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又卖给中国人。中国的纸和火药也经过土耳其地区西传。因此,土耳其人在中国与非洲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与欧洲的交往中,土耳其人所起的作用更大。在元代,从中国去土耳其如古人所言,“行万里如出邻家”。伊尔汗国首都大不里士,是西亚文化、商业、交通中心,中国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欧洲人汇集于此,形成了一个国际大都市,是国际交往的最好场所,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工农业产品、手工艺品以及动植物在广泛交流的过程中,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国人同土耳其人在直接与间接的交往中,相互学习,相互了解,建立起了新的友好关系,在国外的许多史料和大量的游记中,都有过详细的记载。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亲自见到过中土广泛交往的情景,并把它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他早年从威尼斯出发来到中国,在回国的途中经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他在该城市中的各大商场里,看到了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也看到了许多土耳其工匠们认真学习中国的技术制造瓷器,制造出来的产品具有浓厚的中国风格。

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建都于伊斯坦布尔之后,他们怀着与中国悠久历史交往的情感,致力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例如,土耳其历史上著名的苏莱曼大帝在位44年中,多次派遣使节来中国访问。在1544年,他曾经派出了一个90多人的庞大访华团,在土耳其历史上,像这样人数众多的访华使团是少见的。访华使团的成员来到中国后,受到了中国皇帝的多次接见,双方并互赠厚礼。由于土耳其人的素丹重视发展中土友好关系,因此大批的土耳其商人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华贸易,与中国人友好相处,犹如亲友团聚。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有一位土耳其传教人员在游遍中国各地之

后，向人们叙述道，他是由陆路东行经波斯，与骆驼商队结伴前进，至嘉峪关上驿道，夜宿驿站，而且供给饮食，顺着驿站直达大都。此外，来华从事商贸的土耳其商人按照有关规定，必须把所带的一些贵重物品贡给中国皇帝，其余的商品才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并购买中国土特产品以及丝绸、瓷器等。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土耳其商人回国时，"带有奇草根、异花果或异石等物。……带有小根一条，藏之身畔。疲倦及受寒时，则取一小块咀嚼之，吞咽后，即觉身体发温，精神振奋。"此根即人参。中国人参出口，这是中外关系史上第一次见到的记载，完全是土耳其商人的功劳。

明代中国与土耳其的交往，可以从《明史》（卷三三二）记载中得以证明："鲁迷，去中国绝远。嘉靖三年，遣使贡狮子、西牛。……五年冬，复以二物来贡。即颁赠，其使臣言，长途跋涉，费至二万二千余金，请加赐。……二十二年，偕天方诸国贡马及方物。明年，还至甘卅。会迤北贼入寇，总兵官杨信令贡使九十余人往御，死者九人。帝闻，褫信职，命有司棺敛，归其丧。二十七年、三十三年入贡。其贡有珊瑚、琥珀、金刚钻、花瓷器、锁服、撒哈剌帐、羚羊角、西狗皮、猞列狲皮、铁角皮之属。"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明朝的时候，土耳其人常来中国访问。特别是在嘉靖的44年间，土耳其五次派使团来华访问，其中一次使团的成员达90余人。对于这些土耳其的使团，中国皇帝极为重视，下旨热情相待，甚至在回程途中所遇到的问题，都要亲自过问，妥善处理。这表明在当时中土友好交往是朝廷中的头等大事。

"土耳其"一名在汉文字中正式使用是从清王朝开始。清王朝虽然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与外部世界交往甚少，但中土民间交往并未中断过。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19世纪末，土耳其阿布

杜尔·哈米德二世就任素丹25周年之际，清王朝光绪皇帝赠送珍贵的特别工艺品以表祝贺，这件工艺品是以唐代郭子仪祝寿图案用金、银、珊瑚等制成，现珍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里，它象征着中土两国人民的友谊，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在中土两国人民悠久交往的历史上，也有许多文化、宗教等各界人士互相访问学习的事例。乾隆年间，从事航海工作的中国人谢清高在他留下的《海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土古（土耳其）国疆域极大，本回回种类，人民强盛，穿大袖衣、裹头，服皮衣。"这是谢清高到土耳其所见过的情况。清王朝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我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马德新、马安礼、马开科等人在朝觐伊斯兰圣地麦加后，取道访问土耳其，他们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受到了土耳其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的热情接见。他们三人还应邀参加了王宫喜宴，素丹还下令派专人陪同他们参观游览。马氏三人虽然不是官方代表团，但作为中国穆斯林，受到贵宾礼遇，充分体现了中土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马德新回国后所著《朝觐途记》，也成为记载中土友好交往的重要史料。中国另外一位伊斯兰教学者王宽在访问土耳其时，也受到了土耳其方面的热情接待。他在访问过程中认为有两大收获，一是兴学强国，二是缔结邦交。王宽回国后，为这两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实为后人敬佩和怀念。

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最早的中西国际交通线，中土两国位于东西两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把中土两国紧紧相连，不仅沟通了中国人民与土耳其人民之间的经贸往来，而且还促进了中土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国是蚕桑丝绸的发源

地，也是瓷器的故乡。在历史上，丝绸和瓷器是最早的国际贸易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这座沟通东西方的黄金桥梁，使得这些商品远销到了土耳其等地。土耳其人民非常喜爱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视它们为世界之宝，被它们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所深深地吸引，亲切地称瓷器为“绥尼”，意为“中国的”。同样，不少的土耳其商人带着当地的特产，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来到东方文明昌盛的中国进行贸易。像玻璃、玛瑙、珊瑚、硼砂、香料、乳香、丁香、石榴、鸵鸟、斑马、胡羊、狮子、犀角等珍贵物品，都从土耳其运到了中国，有的作为礼品献给了中国皇帝，有的作用贸易之物在市场上出售，其中不少珍贵物品来自欧洲和非洲。

随着贸易的发展，中土两国人员的交往也日益增多。1560年，荷兰人白斯拜克出使土耳其，驻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常与游历中国的土耳其人交谈，留下一段记载：“土国游客又言契丹人，精于各种技艺，开化文明，深知礼记。……其人有印书术已数百年矣。土国游客在其国见活字版印成书籍至多，可以证明此事也。印书之纸，皆极薄，为蚕丝所制成。仅能一面印，他面则留空白。”著名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有过记载。他在游历中国杭州城时，见到过许多土耳其商人和学者。当时土耳其的苏达克港和中国泉州港都是国际性大港，商船来往不绝，非常方便，因此许多土耳其商人都特别喜欢来华经商。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在中国的广州、泉州、杭州等城市确实有许多土耳其人客居或经商，他们并还保持着土耳其人的风俗习惯。这些历史资料不但说明中土两国之间在物产方面有着广泛的交往，而且也证明了中土两国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土耳其人在历史上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中土两国不但在经贸方面有着广泛的交往，而且在科技、文化交流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根据著名的鄂尔浑碑文的记载，在土耳其人早期的文字中，就存在着许多汉字母。由于土耳其人同中原诸王朝存在着长期甚为密切的交往，所以土耳其语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汉语的重大影响。例如汉语里的一些单词"茶叶"、"瓷器"、"水"、"衣服"等都被土耳其语所吸收，发音和汉语特别相近。此外，早期土耳其人所采用的十二生肖，就是最典型的中原文化，也是两国文化广泛交流，互相影响的最好例证。另外，12 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皮影戏传到了土耳其，而且流传至今，土耳其人把皮影戏称之为黑眼睛剧场。剧中多是反映土耳其人家庭生活趣味的内容，主题多是些劝善惩恶的说教，故事剧情的矛盾解决，也都是落到了伊斯兰教经典规范的准则上，使人们在皮影戏这个小巧玲珑的舞台方寸之间，领略到无穷无尽的乐趣。在现代电影没有出现之前，皮影戏是土耳其人民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形式之一。

在研究中土文化交流的历史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它是一座研究中土文化交流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宝库。在土耳其人灭亡了拜占廷帝国 25 年之后，土耳其的素丹穆罕默德二世于 1478 年下令在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修建了托普卡帕宫，在此历经了 25 位素丹，今天已成为土耳其国家历史博物馆。这座宫殿是中土文化、绘画建筑融合的艺术体。宫殿的门檐彩画和中国故宫里的山水彩画构图着色、笔调风格十分相似。这种艺术风格的传播和互为影响，也是中土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友好交往的必然结果，人们无不为这种源远流长的友谊而感到自豪。

此外，在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里，还陈列和收藏着中国

宋、元、明、清时代的上万件珍贵瓷器。其中有一件稀世之宝瓷器最引人注目，瓷器上绘制着赤壁图以及苏东坡的《赤壁赋》，这不仅仅是一件宝瓷，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在土耳其闪闪发光的佐证。在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里，除了陈列和收藏着上万件珍贵的中国瓷器之外，还陈列和收藏着拜占廷帝国王侯们穿过的袍服。那些王公大臣们穿过的袍服，都是用中国绸缎所制作的，也可以说是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最宝贵的文物了。土耳其人历史上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是世界历史名城，它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西端，是东西方商贸物资转运的中心。中国的商品经丝绸之路运抵土耳其人的首都伊斯坦布尔，由土耳其人再转运到欧洲，中国的纸和火药就是由土耳其人传播到欧洲的。随后土耳其人又把欧洲大量的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运往中国。在历史上，由于土耳其地垮欧亚非三大洲，所以非洲的产品也是经过土耳其人转运到中国的，例如象牙、动物等物品。因此，土耳其人在沟通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马克思把土耳其人的首都伊斯坦布尔称之为“沟通东西方的黄金桥梁”。

为了不断增进中土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交往，在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的倡议和关怀下，土耳其于 1935 年在安卡拉大学成立了汉学院，此学院是中东地区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汉学研究中心。到目前为止，已有数百名学生毕业，成为中土交往的重要使者。中国领导人李先念在 1984 年访问土耳其时，向安卡拉大学的汉学院赠送了 670 册中文图书。该校先后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翻译了中国的《论语》、《老子》、《孟子》、《诗经》、《史记》、《汉书》、《孙子兵法》、《李白、白居易诗集》、《狂人日记》、《阿 Q 正传》、《茶馆》、《雷雨》以及《丝绸之路》和《新疆历史文物》等著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土文化

的广泛交流，加深了中土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二、现代的中土关系

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中土关系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以后，坚持了一条谋求和平的外交原则，广泛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其中也包括积极主动地谋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历史上，中土两国人民之间虽然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交往和深厚的传统友谊，但以前从来没有签订过正式的通商条约，建立过任何直接的外交接触。于是在1925年10月17日，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共和国，主动谋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让当时土耳其驻比利时代办谒见中国驻比利时公使王景岐，表示土耳其政府有意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签订通商条约。并表示为了慎重期间，可否在相互平等的原则下，先在比利时的首都正式交换订约意见。中国北洋政府接到土耳其政府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信息后，外交部立即电令中国驻比利时公使王景岐，让其与土耳其代办进行联系，以磋商签订有关通商条约。但由于土耳其代办宣称在签订的通商条约中应采取用一般的最惠国条款，遭到中国北洋政府的坚决反对，使得中土两国签订通商条约的谈判不得不搁浅。不久，王儒堂继任中国北洋政府外交部部长。他认为中土两国同属亚洲大国，应早日签订通商条约，建立友好关系，但鉴于通商条约中的款项较多，需要时间进行认真磋商，所以决定先进行签订友好条约的谈判，并把谈判地点移至莫斯科。1926年3月4日，中国北洋政府外交部致电驻俄代

办郑延喜，让其与土耳其驻俄大使捷凯赛利接洽。在郑延喜代办与土耳其驻俄大使磋商谈判的时候，以王曾善、马宏道等165人长期居住土耳其的华侨联名呈请中国北洋政府迅速与土耳其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中国北洋政府原拟定的中土友好条约草案共计八条，其中一条规定了中土两国以后磋商签订通商条约的范围，但由于在此点上中土双方意见不一致，加之当时中国新疆省的省长杨曾新致电中央政府，坚决反对与土耳其签订任何条约，害怕土耳其利用突厥血缘关系对新疆地区的穆斯林产生影响，妨碍地方管理，以及不久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使郑延喜在莫斯科与土耳其大使商谈签订友好关系的工作遂告中断。

1928年9月，旅居土耳其的华侨代表王曾善、马宏道、赵洪堃等人又联名呈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恳请与土耳其签订友好通商条约，以利侨民。此时，国民党驻土耳其支部也呈国民党中央党部，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迅速与土耳其签订友好通商条约，以使加强两国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遂电令中国驻美大使伍朝枢，指示他在华盛顿与土耳其驻美大使墨泰培商议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并于1929年2月向伍大使颁发了与土耳其驻美大使商议友好通商条约的委任状以及全权证书。但土耳其驻美大使称他只有全权签订两国友好条约的权力，而没有签订两国通商条约的权力。南京国民政府立即电复伍大使，认为应以友好条约和通商条约同时签订为原则，所以让伍大使告诉土耳其大使，转请土耳其政府给予他同时签订友好条约和通商条约的权力。然而对此要求土耳其政府表示不同意，希望与中国先签订友好条约，再继续商议通商条约。为了能够与土耳其早日建立正常邦交关系，南京国民政府作了相应的妥协，授权伍大使与土耳其驻美大使先协商签订友好条约。

在双方正式商议后不久，土耳其政府突然派代表到中国南京，求见外交部部长，声称为了加快商议的速度和提高效率，希望能够在南京同时商议签订友好条约和通商条约。于是中土两国磋商签订条约的地点，遂由华盛顿移至南京，中方改派外交部次长李绵仑全权负责与土耳其代表商议签订友好通商条约。

1930 年 6 月 24 日，土耳其代表到达南京，双方正式开始磋商条约的签订工作。在磋商的过程中，中土两国政府对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均提出了自己的草案，经过数次的谈判和磋商，双方立场逐渐一致。然而，就在此时，正在日内瓦访问的土耳其外交部部长突然向也正在日内瓦访问的中国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家桢提议，希望能够改在土耳其签订友好通商条约草案，其理由为土耳其无驻中国正式代表。然而王家桢外长认为此事不妥，其理由是中土两国友好通商条约草案尚未完全议妥。不久，中土订约谈判停顿，直到 1933 年 4 月，才由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办事处处长胡世泽，让其拜访土耳其驻瑞士代办，探询土耳其政府关于磋商条约的意见。不久，土耳其外交部部长表示可由土耳其驻瑞士的大使与胡世泽处长重开谈判，磋商条约的签订。中国南京政府也立即将条约草案寄给胡世泽，并指示他如果通商条约的谈判遇到障碍，可先签订友好条约。但土耳其驻瑞士大使却一再拖延谈判，其理由是未接到土耳其外交部让其谈判的正式指令，所以不肯开始磋商条约的签订工作。1934 年 2 月，胡世泽赴埃及首都开罗出席万国邮政会议，在会议期间，南京政府外交部电令胡世泽，让其会议完毕后返回瑞士时，以非正式的名义绕道赴土耳其与该国政府接洽，商谈签订条约的事宜。1934 年 4 月 1 日，胡世泽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并立即会晤了该国的外交部部长，

转达了中国政府希望能够马上与土耳其签订友好条约的意见,土耳其政府研究后表示同意。于是南京政府外交部于4月2日电授胡世泽为签订条约的全权代表。4月4日下午5时,9年来一直在商议之中的中土两国友好条约终于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签订,从而使此项工作暂告一段落。该条约原文为法文,其译文于6月9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表全文。中土两国签订的友好条约全文共计四条。第一条的内容为:大中华民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及两国人民间应永敦和好,历久不渝。第二条的内容为:两缔约国同意按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建立两国间外交关系。两缔约国约定此缔约国外交代表在彼缔约国领土内在相互条件之下,应享受国际公法普遍原则所承认之待遇。第三条的内容为:两缔约国同意对于设领事及商务关系,以及此缔约国人民在彼缔约国领土内居留住处问题,留待日后另订条约规定之。第四条的内容为:本约应由两缔约国按照各本国法律于最短时间批准,批准交付应于批准后三个月内在日内瓦互换。自互换后第十五日起,本约应立即发生效力。为此两全权代表将本约二份签字盖印,以照信守。1934年5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对中土新条约审查通过。5月30日,南京国民中央政府批准。土耳其政府也于6月4日批准中土新条约。8月17日,土耳其驻瑞士代办与中国驻荷兰公使在日内瓦相互交换了被本国政府批准的文件,并规定自9月1日发生法律效力。

中土两国虽然在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方面,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反复,但双方都能够以中土两国友谊的大局为重,持之以恒,不断磋商,最终相互妥协达成了协议,签订了中土友好通商条约,实现了中土两国邦交关系的正常化,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中

土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更加频繁。据中国海关报告，中土两国正式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之后，中国当年对土耳其的贸易出口额为10.5325万银元，比过去的贸易出口额增加了一倍，占中国贸易总出口额的2.5%。特别是土耳其公民到中国来考察访问的人员不断增加，中国公民到土耳其学习与经商的人员也越来越多，极大地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各种交流。

此外，自近代以来，中国与土耳其的社会发展经历非常相似，都被迫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都面临着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当中国人民获悉亚洲西部的"病夫"土耳其，在陷于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广大民众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奋起反抗，挣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获得了民族解放之后，对此感到无比的钦佩和赞赏，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决心。特别是土耳其军队全歼入侵之敌并在洛桑和会上获得完全独立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后，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在其《向导》周报第三期上发表了两篇洋溢着革命热情的文章，充分反映了广大中国人民对土耳其革命胜利的祝贺之忱。在由蔡和森同志署名的《土耳其国民党的胜利》和由高君宇同志署名的《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这两篇文章中，盛赞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领导下取得的胜利，称凯末尔为"伟大而有胆识的将军"。文章还指出，土耳其的胜利，"不仅挽回了土耳其和近东几千万穆斯林的命运，而且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以最好的模范和印象"。并且还说："我们羡慕他们，便要学习他们的好榜样，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

另外，还有许多关注土耳其共和国社会发展的专家学者们也纷纷在《东方杂志》等学术刊物上撰文评述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历史与文化，使中国民众更多地了解土耳其社会进步的情况。例如，

杜衍的文章《土耳其今后的政治经济方针》、颂华的文章《土耳其对于交通及关税的新措施》、育韩的文章《土耳其最近的经济状况》、陶白川的文章《训政时期的新土耳其》、沙生的文章《土耳其的国防与外交》、樊仲云的文章《新土耳其》、哲生的文章《土耳其何以要决意采用新字母》、幼雄的文章《土耳其革新事业的种种》、颂华的文章《土耳其与阿塞拜疆改革文字之得失》、鼎新的文章《王孙末路中的废土耳其皇储》、哲生的文章《凯末尔不容易揭去土耳其妇女的面幕》、冯贞用的文章《新土耳其的妇女》、微知的文章《土耳其废皇的新婚与新回教运动》、哲生的文章《土耳其发现中世纪基督教的艺术珍品》与《旧土耳其素丹宫中的宫女和太监》、颂华的文章《土耳其人口调查及其意义》、王光的文章《中土外交关系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等。此外,在《东方杂志》等学术刊物中还刊登了许多幅关于介绍土耳其社会变革的照片,使中国民众对土耳其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

总之,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社会进步的成就,的确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光辉榜样,中国民众纷纷表示要增进两国间的交往,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西方列强的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

冷战时期的中土关系

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71 年中土两国建交,由于受冷战这个国际大背景的影响,在漫长的 22 年中,中土关系历经曲折,陷入了冷战的深渊,成为美、苏战略棋盘上反复争夺的牺牲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初,当时土耳其国

内的许多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和消息予以祝贺，土耳其政府也准备立即同台湾国民党政府断交，予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时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的杰拉尔·拜亚尔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就指出："中国是一个潜在大国，应该和它发展关系。"他同时指派土耳其驻苏联的外交官广泛同中国驻苏联外交人员接触，商谈双方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但由于当时的中美关系非常紧张，土耳其又是美国的盟国，以及土耳其因与邻国苏联在领土上的历史纠葛，使它对社会主义阵营疑虑重重，而中国又是苏联的盟友，因此，土耳其为了不得罪美国，又时刻警惕苏联，所以在发展中土两国关系的实质性谈判中小心谨慎，不敢走得太快，故错过了两国友好建交的最佳时机。1950 年 10 月，朝鲜战争爆发。1951 年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土耳其公开地站在美国一边投了赞成票，其理由是"不对抗联合国多数国家的意愿。"此后，中土双方停止了一切外交接触。在朝鲜战争期间，土耳其加入了由美国操纵的所谓"联合国军"，前后共派出 25 000 人的军队跟随美国赴朝参战，与中国军队直接对抗。在朝鲜战场上，土耳其军队作战英勇，为美国的侵朝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被美国政府授予卓越功勋奖。土耳其之所以积极响应美国的战略目标，十分卖力地赴朝参战，直接与中国人民为敌，是有其特定原因的。早在 1950 年 5 月，为了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土耳其就申请要求加入北约，并视加入北约为其发展与西方紧密关系的基础，但被拒绝。土耳其希望通过派军队赴朝参战，向西方国家证明它的战略价值，以获取西方国家大量的援助，并促使北约接纳它为正式成员国。美国和西方其他北约国家的确因土耳其积极派军队赴朝参战而改变了态度，正式考虑接纳土耳其参加北约。1952 年

土耳其正式加入北约，这标志着土耳其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亲西方的外交路线。此后，中土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双方关系长期冻结，互不往来，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一些西方国家陆续开始同中国改善和发展关系。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土耳其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土耳其领导人追随西方，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表示不满，到60年代这种不满更加强烈。此时，土耳其的工商界人士、广大的知识分子、在校的大学生、工会组织以及媒体都在猛烈地抨击美国政府孤立中国、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要求土耳其政府重新审查本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要求政府实际地考虑土耳其的民族利益和国际舞台上所发生的变化，不要追随美国政府敌视中国人民的外交路线。所有这些，都明显地影响了土耳其政府的对华政策。土耳其政府又再次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地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1965年至1971年间，中土两国记者及贸易代表团进行了多次的互访。特别是1966年7月，土耳其国内著名的《和平报》的记者苏克鲁·艾斯梅尔曾来华访问，受到了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的热情接见。归国后，此人撰写了许多篇客观、详细介绍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文章，对土耳其社会各阶层民众全面公正地了解中国社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年土耳其发生大地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捐款捐物支援土耳其的灾区人民，不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访问了土耳其，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进一步促进了两国间的友好往来。1971年，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两次接见土耳其的友好人士和经贸代表团，双方加快了相互接触和改善关系的步伐。1971年，土耳其共和人民党新领导人埃杰维特在告广大选民书中说道："要发展

同所有国家，特别是同邻近的和接壤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且在世界局势缓和下来的条件下，土耳其不仅打算同苏联，而且也打算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事务关系。"总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土双方大量民间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为以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此，土耳其政府加快了与中国接触和改善关系的步伐，而中国政府也开始全面调整对土政策，放宽了两国间的一切民间交往。

1971 年 8 月 4 日，中土两国共同发表了关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声明两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于 1972 年 4 月互设大使馆，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断绝了同台湾当局的一切官方往来，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中土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中土建交，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历史性事件，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采取的一个重大外交步骤和对外关系中所取得的一个重要外交成果，有利于中国在中东地区和中东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利于促进中东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土建交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开辟了广阔的合作前景，双方可以通过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不断加深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

建交以后的中土关系

自 1971 年 8 月 4 日，中国与土耳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通过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有了长足的发展，两国人民之

间的传统友谊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政治方面:首先,土耳其一直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代表。除与台湾进行一些民间贸易之外,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立场,决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和官方往来。目前土耳其与台湾的关系仅限于经贸领域。1986 年,台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设立了"远东贸易服务中心办事处",1989 年台湾又在其首都安卡拉设立了"台北经济文化协会办事处",1990 年,土台双边贸易额超过 3 亿美元,1992 年达到 3.5 亿美元。多年来,中土双方一直没有因台湾问题使两国友好关系受到伤害。其次,双方高层领导频繁互访为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根据有关双边协议,中土两国在各层次都有定期的官方交流,特别是双方还建立了外交部官员的不定期政治磋商制度。1982 年,土耳其总统埃夫伦访华,受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亲切会见。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带着中国人民对土耳其人民的友好感情出访土耳其,受到土耳其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这两件最高的国事访问,是中土友好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极大地促进了中土两国人民之间传统友谊的发展。最后,1989 年 6 月,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指责和制裁,但土耳其政府则持不同立场,认为别的国家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采取的断然措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呼吁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即解除对中国的政治封锁和经济制裁,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经济方面,自 1974 年土耳其外交部部长图兰·居内什率领代表团访华,同中国政府签订中土贸易协定以来,双边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此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

协定”，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税协定”和“海运协定”等条约的签署，为中土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司法基础。1978 年，以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为首的中国外贸代表团访问土耳其，就两国开展贸易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一个双边经贸合约。1982 年，中土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委员会草签了一份备忘录，决定增加两国的贸易，并在水力和火力发电方面加强合作。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土耳其将向中国派出水稻种植、生丝、陶瓷器生产和地震预报考察小组。中国也将向土耳其派出牛奶工业、畜牧业以及棉花和烟草生产考察小组。根据中国的有关资料统计，1985 年，中土两国贸易总额为 0.98 亿美元，1988 年上升为 3.3 亿美元，1994 年达 6.48 亿美元，1997 年达 8.32 亿美元，1998 年头 11 个月的双边贸易额已达 7.78 亿美元。到目前为止，中土两国每年的贸易额已突破 10 亿美元大关，其中中国对土耳其的出口额为 7 亿多美元，进口额为 3 亿多美元。中国对土耳其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玩具、纺织半成品、光学产品和机器零配件等，而土耳其对中国的出口商品主要为钢铁、化肥，以及各种建材和优质皮革等。

1999 年，中土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又有了新的突破。作为两国加强经济关系的又一个发展性标志，是土耳其著名的担保银行在上海这个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中国第一大城市成立了代表处。土耳其担保银行以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活跃表现而著称，它已连续四年被《欧洲货币》杂志评为“土耳其最佳银行”，1999 年 8 月在世界银行分类中，又被国际金融权威部门评为小型银行类别中的“世界上最好的银行”。由于其积极开拓新兴的电子银行技术，又被网络业的权威杂志评选为“土耳其最佳网上银行”。该行实力雄厚，员工素质高，80％的员工拥有学士以上学历，三分之一以上的员工

会讲流利的英文，其创造性和多元化的融资方式极为著名，很多交易方式往往成为行业典范，并打开了其他土耳其银行进入国际市场的大门。在2000年底地土耳其金融危机中，以土耳其担保银行为首的几家大型银行为稳定局势起到了重大贡献，向市场展示了其稳定而雄厚的金融实力。该行于2001年10月与其下属的奥斯曼银行以担保银行的名称合并，以110亿美元资产成为土耳其最大的私有银行。土耳其担保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不仅致力于建立和加强中土两国银行业的联系，也将为整个中土贸易关系的发展而努力，同时为两国企业界相互拓展商业机遇而作出贡献。特别是土耳其担保银行驻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诺扬·罗拿先生，是一位十分热衷发展中土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活动家。他1982年毕业于土耳其安卡拉大学语言历史地理学院汉学系，1983年来到北京语言学院进修中文，随后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并于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诺扬·罗拿先生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加入土耳其外交部，于1988年被派住北京土耳其驻中国大使馆工作。1995年5月，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访问中国，他作为总统的首席翻译陪同，参加了中土两国国家领导人的各种会谈。从1996年至1999年初，他一直担任土耳其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职务。1999年5月，他离开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加入土耳其担保银行，并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土耳其担保银行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诺扬·罗拿先生曾多次向中国媒体表示，他对今后中土经贸关系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在全球经济中的潜力充满信心，认为中土贸易关系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土两国政府多次组织相互的展览会，互派代表团参加相应的节日，并互相派遣交流学者、科研人员和学生。

1973年，中国组团第一次参加了土耳其伊兹密尔国际博览会。1974年10月，土耳其阿纳多卢国家通讯社社长访华，同中国新华社签订了新闻合作协定。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中土两国在文化领域内的交流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1979年，中国首次派出了一个由97位著名的艺术表演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土耳其进行巡回演出。1980年，土耳其国务部长卡拉汉在总理府接见中国新闻工作者时说："希望土中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各个领域进行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不久，中土两国签订了1981～1982年文化交流计划，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在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广播、电视和体育等方面的合作。1981年，北京各界人士怀着敬佩之情集会纪念土耳其伟大的革命家、共和国创始人凯末尔诞辰一百周年。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土文化交流的步伐又有了新的进展。2000年5月，土耳其文化部部长伊斯泰米汉·塔拉伊访问中国，他到中国13朝古都西安参观游览的时候，专门约见了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彭树智教授和他培养的研究土耳其历史的黄维民博士，并同陕西省人民政府签订了一项文化交流协议。根据此项协议，2000年10月，陕西省派出了一个由200多人组成的庞大民间艺术代表团，赴土耳其进行巡回演出，受到了土耳其人民的好评。此外，安卡拉和北京、伊斯坦布尔和上海、伊兹密尔和天津、布尔萨和鞍山、科尔亚和西安已结为姊妹友好城市，进一步加强了中土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为中土友谊写下了新的篇章。

未来中土关系的展望

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与土耳其，在历史上曾经共享

过一段长达数世纪的文明，并且有着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因此发展友好关系有着坚定的基础。特别是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地区性大国，中土两国都在迅速崛起，都力争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与其本身增长的经济、政治实力相称的强大作用，而且雄心勃勃，都要在21世纪使本国的综合国力更加突出。因而中土双方建立一种长期的、行之有效的战略伙伴关系，已成为两国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两国领导人也把着眼于促进双边的战略利益和商业利益放在了首位。1995年5月，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出访中国，签署了《联合公报》，扩大了中土两国的交往，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2000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了土耳其，同德米雷尔总统进行了重建丝绸之路的会谈。双方承诺致力于打击一切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并决定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这不仅激发了两国发展未来双方关系的热情，而且还激发了中土两国经济界希望建立广泛商贸联系的热情，从而为进一步发展21世纪的中土关系奠定了基础。随后双方频繁的部长级访问都强调要翻开中土关系"新的一页"的政治愿望。2001年4月初，中国外交部唐家璇外长访问土耳其，签署了两国外交部《行动计划》，该计划确定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合作的具体措施，建立了一种高级别的磋商机制，决定双方继续保持官方高层往来，加强在国际和多边领导的相互支持、协调与合作。2001年4月28日，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也访问了土耳其，并分别会见了土耳其总统塞泽尔和总理埃杰维特，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伊兹吉进行了友好会谈。李瑞环首先介绍了中国人民政协的有关情况和中国的政党制度，伊兹吉议长表示愿与中方一道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经贸和旅游等方面的往来，使两国关系更

加密切，使两国人民更加亲近。李瑞环主席在伊斯坦布尔出席土中企业家理事会欢迎午宴时指出："中土经贸关系的发展潜力还很大，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市场将更加开放。"并表示愿意与土耳其政府加强合作，打击一切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2001 年 8 月，由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周可仁率 30 多家企业，参加了伊兹密尔市国际博览会。这是 1973 年中国开始派团以来第 20 届参加该会。来自河北沧州的杂技团，在开幕式上为与会商家表演了精彩节目。尤其是年仅 9 岁半的小演员崔文斌表演的"钻筒"，其惊人绝技让观众叹为观止。周可仁副部长向记者表示，中土两国贸易 90 年代以来突飞猛进，去年贸易额与前年相比，增长了 76.1%。总之，通过中土两国领导人和政府高层官员的不断互访，双方就相互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有益的交流与探讨，加深了彼此间的认识和了解，并就一些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或理解，有利于中土双方建立面向 21 世纪互利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

然而，从目前的总体上看，中土两国间的经济关系虽然有了一些长足的发展，但仍然低于两国间政治关系的发展，也就是说，双方的经贸关系严重滞后于政治关系，从而使得两国间的政治基础缺乏实质性内容的支撑。例如，虽然中土两国间的年贸易总额已经突破了 10 亿美元的大关，但这种贸易量还远远没有反映出两个年贸易总额分别达 3 250 亿美元和 4 000 亿美元国家的贸易潜力，而且土耳其在中国的投资仍然无足轻重，同样，目前中国在土耳其的投资总体上也仅限于一些小型的个人企业。造成中土两国间的经贸关系严重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双方都是发展中国家，彼此的经济结构和体制非常相似，所以在经济上互补

性空间较小，而竞争的势头却很强。二是发展模式不同，双方市场开放的程度尚存在差距，在加上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双方的公司和商品进入对方市场时必将受到很多阻碍与限制。三是双方的对外经济政策取向不同，土耳其基于地缘经济因素和历史传统的考虑，通常采取以欧洲为中心的经贸政策，对欧美市场和投资的依赖性较大，而一直没有制订出一项全面系统的针对亚洲地区的经贸政策。相形之下，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虽然中国也开始重视开发中东市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目前仍然采取的是侧重于美、日、欧和东南亚市场的经贸政策，而对西亚、北非缺乏应有的眷顾。总之，中土两国经贸关系的严重滞后，必然会影响未来双方的全面合作，动摇两国的政治基础。因此，在新的世纪怎样使中土两国经济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努力加强两国间的相互投资，推进科技、交通运输和旅游业方面的合作，使中土经济关系完全上一个新的台阶，已成为两国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中国和土耳其是当今世界上的两大重要市场，从各自的人口、地域、资源、物产和消费因素来看，双方的经贸合作还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中土双方的最高领导层以及政界、商界把握大局，进一步加强信任与合作，并付出艰苦的努力，中土两国的经济关系一定会有一个前途无量的发展前景，最终达到互利双赢。

近年来，通过中土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中国同土耳其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长足的发展，目前两国已从建设性的关系逐渐地向战略性伙伴关系发展，因为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是中土两国未来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在中土双方共同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过程中，也还经常存在着激化中土双边关系的一些消极因素。例如，受土耳其境内泛突厥主义的影响，在中国西北地

区具有突厥血缘的少数民族中，发生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事实上，中土两国取得相互谅解，增进合作，保持友好关系，不仅有助于克服影响未来中土关系健康发展的消极因素，而且有助于保证中国境内西北部地区少数民族的幸福和安宁。

人类社会已经跨入21世纪，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中，只有寻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同点，扩大合作，消弭对抗，才能确保和实现自己在全球中的战略利益。因此，中土两国只有平等相处，以诚相待，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全面合作，共同发展，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纵观21世纪，中国与土耳其未来关系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即：双方经贸关系的长足发展，政治领域内的充分信任以及对双方共同安全利益的真诚维护上。在这些层面上，中土两国完全有合作的基础。与土耳其加强合作，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将会成为中国未来中东战略极为重要的步骤，有利于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因为中国对中东地区石油能源的依赖性日益加深，而土耳其是与世界上最大的油气储藏地区接壤的地区大国，在世界上起着能源桥梁的重要作用。中国通过与土耳其的全面合作，既可以通过双方联合铺设油气出口管线确保本国的石油供应安全，又能为中国加强与欧美国家的经济联系提供新的渠道。此外，土耳其还是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统一台湾，加入WTO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可以借重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土耳其通过与中国的全面合作，不但可以扩大市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可以在战略上牵制对自己不那么友好的希腊、俄罗斯、叙利亚和两伊，培育并巩固自己在中东的地位，和中国一道强化自己在

阿以和平进程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土两国建立起来的那种互利合作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必将会最终导致在亚欧大陆建立起亚太国家、黑海国家以及中东国家三方合作的跨地区关系。这种新的战略态势,将成为抗衡地区乃至全球军事较量和军备竞赛,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一环,中国与土耳其将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主要参考书目

一、外文书目

[1] Amikam Nachmani, Israel, Turkey and Greece, Uneasy Relation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New York, 1997.

[2] Ataman Akso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urkey, New York, 1992.

[3] Bela Balassa, Adjustment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assessment, New York, 1984.

[4] Charles A. Frazee, Catholics and Sultans, New York, 1983.

[5] Daivd Barchard, Turkey and the West, London, 1985.

[6] Dankwart A. Rustow, America's Forgotten Ally, New York, 1987.

[7] Erik, The Union Factor: The Role of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 1905～1926, London, 1984.

[8] Ferenca Valic, Bridge Across the Bosperus, the Foreign Policy of Turkey, London, 1971.

[9] Frederick, The Turkish Political Elite, Cambridge, 1965.

[10] Feroz Ahmad, 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 London, 1977.

[11] Feroz Ahmad, The Young Turks: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urkish Polities: 1908～1914, Oxford, 1969.

[12] George MeGhee, The US-Turkish-Nato Middle East Connection, London, 1990.

[13] George Harris, The Origins of Communism in Turkey, Stanford, 1967.
[14] Geoge, Turkish American Proble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50～1971, Washington, 1972.
[15] Jacob, Radical Politics in Modern Turkey, London, 1974.
[16] John F. Kolars, Four Studie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urkey, London, 1967.
[17] Kemal H. Karpat Leiden,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1950～1974, London, 1975.
[18] Merik Celasun, Debt Adjustment and Growth: Turkey, Chicago, 1989.
[19] Mehmet,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New York, 1984.
[20] Kemal, Turkey's Politics: The Transiti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 Princeton, 1959.
[21] Metin,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London, 1991.
[22] Patrick. J. Conway, Economic Shock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s Turkey After 1973, New York, 1987.
[23] Roderic Parvidson,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187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4] Robert Cossaboom and Gary Leiser, Adana Station, 1943～1945: Prelude to the Post-War American Presence in Turkey, London, 1998.
[25]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6] Tosun Aricanlt and Pani Rodri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urkey, New York, 1990.
[27] Tevfik F. Nas and Mehment Odekon, Liberalization and the Turkish Economy, New York, 1988.
[28] Turkey, OECD Economic Surveys, France, 1978.
[29] Vojtech Mastny and R. Craig Nation, Turkey between East and West: New Challenges for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1996.
[30] Walter. F. Weiker,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New York, 1981.
[31] Wlliam,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1981.
[32] Z. R. Hershlag, The Contemporary Turkish Economy, London, 1988.

二、中文书目

[1]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2]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版。
[3] 左文华,肖宪:《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版。
[4] 刘明编著:《奥斯曼帝国》,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
[5] 刘竞主编:《中东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6] 李树藩,王德林主编:《最新各国概况》,长春出版社,2000 年版。
[7] 李援朝:《中东问题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8] 安·菲·末列尔著,集体译:《土耳其现代简明史》,三联书店,1973 年版。
[9] 伊兹科维兹著,韦德培译:《帝国的剖析:奥斯曼制度与精神》,学林出版社,1996 年版。
[10] 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11]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12] 张俊彦:《变化中的中东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13] 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14] 杨灏成,朱克柔:《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15] 肖宪著:《沉疴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16] 陈德成:《土耳其在政教分离和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艰难行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
[17] 陈德成主编:《中东政治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
[18] 凯马尔著,陈和丰等译:《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19] 费希尔著,集体译:《中东史》,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
[20] 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
[21] 黄维民:《奥斯曼帝国》,三秦出版社,2000 年版。

[22] 董友忱主编:《万国博览》(亚洲卷),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
[23] 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24] 彭树智:《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25]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26] 韩梅青编著:《对土耳其出口指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年版。
[27] 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28] 戴维森著,张增健,刘同舜译:《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1996 年版。

编 后 记

一

“土耳其病了！”

这是罗伯特·埃利斯 2001 年 6 月 1 日发表于英国《卫报》文章的标题。

罗伯特·埃利斯在文章中主要谈的是 2000 年 11 月开始的土耳其经济危机问题。进入 21 世纪，土耳其货币脆弱，股市反复无常，银行倒闭现象严重。危机期间，伊斯坦布尔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猛跌 50%，隔夜贷款利率飞涨到 1950%。英国《中东》杂志 2001 年 1 月号刊载的乔思·戈尔韦特的《土耳其的经济危机》一文中称，这是土耳其从 1994 年金融市场暴跌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罗伯特·埃利斯在上文中是这样描述土耳其的“病史”：

“现代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给国人的训戒是：‘自尊、工作、信任！’但自 20 纪世 80 年代土耳其经济在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领导下得到解放以来，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至少在过去 10 年里，人们的口头禅变成了：‘赚钱、欺骗、盗窃！’”

“病根”在哪里？土耳其武装部队参谋长侯赛因·基夫里克奥

卢将军宣布:经济危机的根源就是土耳其极其盛行的腐败之风。1999年4月凭着诚实执政的政纲当选为总理的比特伦·埃杰维特对有关部长贪污腐败的指控一直置若罔闻。据土耳其商会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个国家的政客们10年来挥霍了1 950亿美元。与此同时,已被国家接管的13家私有银行至少流失120亿美元。2001年元月,势力强大的军方,对能源部的腐败现象展开调查,从而导致15位官员和商人受到指控,能源部长被迫辞职。2000年2月,总统艾哈迈德·内杰代特·塞泽尔与总理埃杰维特之间在腐败问题上的对抗,引发了政府危机。

因此,罗伯特·埃利斯也认为,腐败害苦了土耳其经济。但问题不那么简单。土耳其外国资金协会指出,在91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土耳其排在第81位,它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4%。土耳其的名次如此靠后的原因不仅是腐败,而且还在于法律制度不完善,外国投资者的权利得不到保护。经济危机期间,神经紧张的外国投资者,甚至一天之内就从土耳其银行提走50亿美元。

昔日的"西亚病夫"莫非又卧病在床了?

人们会想起1997年的土耳其:当时土耳其人口居世界第17位,国土居世界第36位,国内生产总值1 814亿美元而排在世界第24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 890美元而列世界第67位,城市与农村人口之比为7:3,人口识字率为82.3%,人均寿命是71岁。直到2000年,土耳其的综合国力还居于世界第16位。至于军事实力,在北约组织中位居第二。早在20世纪前半期已摆脱了"西亚病夫"之名的土耳其,在20世纪末,已经是一个中上等发展中国家。它怎么在进入21世纪之时,又变成了一个"病夫"?

仔细考察国际大环境，其实，这种“病变”是同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有密切关系。对土耳其而言，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土耳其经过经济调整，经济稳定化取得明显的效果。同时，它也具有发挥国际经济作用的地缘优势。但是，土耳其的通货膨胀、外债过重、国有企业改革缓慢、贫富差距悬殊以及贪污腐败严重、金融体系不健全、法制不完善、投资环境存在不少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面对全球化世界潮流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要说“土耳其病了”，那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对全球化世界潮流的“不适应症”。从实质上讲，这是人类文明交往进入全球化阶段的土耳其经济发展上的“阵疼”。

全球化可以说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是土耳其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对于世界潮流的态度，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就是用革命和改革的积极对策来应对的。他的后继者也都用改革来应对现代化和伴随而来的全球化世界潮流，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例如土耳其外贸署和工贸部从 1995 年起通过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鼓励出口政策就是有效对策。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环保、海外市场调研、境外设立商店、鼓励就业、定期培训的各种资助，以及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中小企业专利申请和参加国际博览会资助，就大大提高了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土耳其全国 99.5% 的企业中，中小企业就占有 61.1% 的就业机会和 27.3% 的工业增加值。这些政策将使中小企业在土耳其整个国民经济中越来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主动融入全球化潮流。

从宏观考虑，以改革应对全球化，对土耳其来说，首先是调整国内经济，其中调整贸易政策、鼓励私营部门发展、完善有利于市

场经济、商业活动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投资环境、提高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等最为重要。其次是处理好与中东和欧盟之间经济合作关系，用参与来改善国际经济秩序，乃至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最后，地处中东，缓和该地区的国际关系，为经济调整的发展以及经济合作创造和平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总之，经济交往是适应全球化交往的基础，这就是发展的要旨所在。

二

全球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它是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新的世界潮流。然而全球化一开始就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与生产力相伴随的交往力的发展，在当代形成了以文明交往为显著特征的全球化潮流。

全球化的真谛是交往。经济全球化即全球性的经济交往。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的展开，各国金融联系的加强，生产活动的日益全球化，生态环境愈来愈具有世界性，都是人类经济交往活动扩大的结果。交往在经济范围的全球化，是指资源、资本、商品、劳务等生产要素按市场规律，以空前速度和规模在全球互动和重新配置，是指生产、流通、消费这些经济交往环节的有序运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人类经济生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实行全方位的沟通、联系、融合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

全球化的根本内涵是人类各种不同文明的交往。世界如何变为全球整体？它是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物质与精神的长期交往中逐

渐由民族、地区和由封闭、孤立状态而走向全球整体的过程。人类历史变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是18～20世纪，它经过了工业现代化到全球信息化的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全方位的沟通、联系、融合、互动，正是不同文明交往链条上的主要环节，而其关键处在于参与和理解，其途径是对话和合作。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在2000年11月的"全球化与中东北非地区"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对全球化概念的思考》一文中说："跨文明对话和相互依赖概念，是比全球化概念更可行的概念。"他以中东和平进程为例说："从表面上看，中东有很好的合作基础，而且反映了国际上对世界范围的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然而它缺乏文化和政治基础。"

在全球化的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新阶段中，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国家的地位问题显得特别突出。国家问题变成一个复杂的文明交往问题。土耳其不但在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着追求自身利益的民族国家所处的全球化背景问题，而且存在着全球化与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存在着世界多样化的问题。

土耳其民族国家是20世纪初期人类文明交往的产物。当时的世界潮流之一是亚洲和非洲被压迫民族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体系。这是继欧洲和北美、日本民族国家体系在19世纪形成之后，亚洲和非洲在殖民体系解体基础上出现的历史趋势。土耳其共和国是亚非民族独立国家体系中的国家之一，它是凯末尔按照西欧国家和社会模式建立的，它采取了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实行了宗教与国家分离。但同时保留了土耳其的文化传统，允许伊斯兰教在私人生活领域发挥其固有文明的作用。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这两种文明交往过程波澜起伏，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形

成了曲折的轨迹。现代性的思想,即欧洲的民族主义,取代传统性的伊斯兰宗教思想,成为土耳其主要的民族认同标志和有利于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力量。但是伊斯兰的乌里玛观念(认为所有信徒都是同一民族和共同体的成员),以及涵盖了所有信徒从生到死的生活所有方面的伊斯兰文明,同样在占人口绝大数群众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詹姆尔·德特默在美国《洞察》周刊 1999 年 8 月 9 日的《土耳其会走向东方还是西方?》一文中说,土耳其"是个充满了对立和否定的矛盾体。许多断层线把这个国家分隔开来——新土耳其与旧土耳其的对立,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的对立,支持现代化的人与凯末尔现实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这里所描绘的,是不同文明在土耳其民族国家中交往的具体图景。土耳其作为一个日新月异的多样化的国家,衡量它的试金石是社会凝聚力和一致性。直到今日,土耳其在面对不同文明交往的进程中,仍然保留着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固有特征:协调平衡土耳其民族传统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一方面它努力促进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另一方面又以西方改革模式加入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之中。

从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固有特征看,詹姆斯·德特默的概括似乎可以修改为:土耳其是一个充满了对立和否定的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的国家。土耳其是一个世俗国家,这个世俗国家要协调平衡多样化的文化因素。"一"和"多"同处于一个共同体——民族国家之中。国内诸多的对立因素除民族之外,主要有两个:一是伊斯兰宗教政党——道德党(前身为繁荣党),一是民族行动党。前者偏好伊斯兰国际组织,旨在保持伊斯兰传统。后者主张在突厥语国家之间进行协作,旨在保持土耳其文化和民

族特征。这两个政党都是传统文明的代表，它们都担心在全球化结构之下，土耳其将会不成其为土耳其。这两个政党的崛起，反映了在文明交往中的负面作用：一方面暴露了不同文明的相异性和排他性远比政体和意识形态要大得多；另方面在相互作用中强化自身文明意识和对不同文明差别处的认识。

特别是伊斯兰因素，在弱化了民族国家作为认同之源以后，在西方列强利益的各种行为披上全球化合法性外衣之后，已成为土耳其回归民族之根和伊斯兰化的重要力量。伊斯兰主义者把土耳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看作是中东而不是欧洲，这同“脱亚入欧”的土耳其主流是背道而驰的。尽管2000年7月的民意调查中，74.5%的人同意土耳其加入欧盟；而2000年5月的调查中，也只有21%的人要求建立伊斯兰国家。研究中东史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阿耶赫·施姆列维茨在土耳其个案研究中说，经济的地区主义确实正在逐步增长，“然而，成功的经济地区主义将会促使文明觉醒，但似乎经济地区主义只有当它植根于共同文明才有可能成功。”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与解决文化领域的差异相比，全球化更容易在解决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差异之处达成一种妥协。”

这个结论有其理由，但对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正面结果估计不足。在土耳其，不同文明之间的长期交往，已经在存异而求同的道路上，出现了多样化统一于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向。土耳其的任何政治力量，包括维护凯末尔民主政体的土耳其军队在内，当伊斯兰教有利于达到目的时，就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1980年军队发动军事政变使土耳其回到凯末尔主义道路之后，将军们规定学校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世俗政党也通常有自己的新伊斯兰派系，并经常同它们进行政治合作。凯末尔时代反对与宗教力量合

作的方针已经改变，土耳其加入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和10个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创立的经济合作组织。当内吉梅丁·埃尔巴坎的伊斯兰政党异军突起时，西方国家大呼伊斯兰威胁，总以为土耳其世俗政权会改变颜色。但詹姆斯·佩蒂费尔在那本出色的《土耳其迷宫》一书中就给了中肯的批评。事实上温和的逊尼派穆斯林在1996年成为执政党时，显示出他们多么务实。他们不再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虽然这种努力还一时看不到希望。何况许多著名的伊斯兰主义者中，不乏富有创造性的商人，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宗教和西方的行为方式融合在一起。

总之，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世俗化已由大中城市向乡村集镇普及，但同时伊斯兰复兴力量也由弱到强，作为独立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这两种对立的文明在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内部交往中，虽不时有冲突和分歧，但总起来说是处于一种容忍、让步和合作的状态。尽管受到宗教和民族力量的影响，但赞成世俗政权和全球化在土耳其仍居于主流地位。土耳其共和国作为多样化文明的矛盾统一体，可以用以下公认的话来概括："世俗的国家，信教的民族"。这也使人回忆起凯末尔的话："我国的新制度符合我国人民的传统，也符合现实情况，能更容易地吸取世界文明。"土耳其民族国家，的确是研究全球化文明交往问题的一个独特案例。

三

土耳其有句成语："山不相转，人总相逢"。2000年5月，土耳其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伊斯泰米汉·塔拉伊和我在西安会面的情景，应了这句成语。在唐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的长安，在西亚的

终点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们两个民族的先人，通过这条文明古道促进了东西方的文明交往。那时候，商队在驼铃和马蹄声中要艰难跋涉半年多时间。1999 年 5 月，土耳其航空公司开通伊斯坦布尔到北京的航线后，只需 9 个小时就到达北京，从北京很快就转到西安。分处于亚洲东西两端的中土人民之间交往更加方便了。

伊斯泰米汉·塔拉伊部长很关心中国学者对土耳其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生撰写土耳其的学位论文情况很感兴趣。他还建议双方进行合作研究，除历史和现实问题外，对中国史籍文献中有关土耳其的资料整理工作，特别关注。他希望新的丝绸之路也成为架起一座中土学术交流的桥梁。

由于伊斯泰米汉·塔拉伊部长是在江泽民主席于 2000 年 4 月访问土耳其之后来中国的贵宾，因此我们对一个多月前的情况还记忆犹新。江泽民主席在访问土耳其期间，有两段讲话，对全球化时代的各民族、各国家的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研究，尤其是对土耳其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0 年 4 月 19 日，江泽民主席在德米雷尔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两千五百多个民族以及多种宗教。正确处理世界上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应当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相互之间应提倡兼容而不歧视，交流而不排斥，对话而不对抗，共处而不冲突，在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挥各种文明的积极作用，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进步。”

江泽民主席还提出了中国与土耳其两国新型伙伴关系的框架:“1.政治上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不干涉内政、积极开展各层次的往来。2.经贸上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两国人民造福。3.在文化、教育、科技等其他领域加强接触、扩大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4.在安全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致力打击一切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5.就国际问题开展磋商,协调立场,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对土耳其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的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土两国共同的处境和命运,土耳其革命及改革的凯歌行进,激发了中国学者对土耳其经验进行理性的考察和总结。最为代表者当推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土耳其》一书。该书作者柳克述把土耳其的历史分为三编:一、土耳其发达史;二、土耳其衰落史;三、土耳其复兴史。全书分26章、附录2、附图4和中外文参考书刊目录,共450页,1933年又出了第2版。作者立意于取法凯末尔革命与改革的精神,比较土耳其与中国,在全书结论中认为两国“同为近东远东两大病夫,相似之处甚多,相念之情倍切……现在土耳其已经霍然病已,而中国转有病入膏肓之势;我们目睹彼邦人士激昂振奋,顺利进步之处,应该是如何的羡慕与惭愧呢?昔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不要徒然惭愧,我们还是进一步的努力去‘结网’罢!”

实际上在此之前,即1923年柳克述在《东方杂志》第25卷第26期上,就发表了《东方国家恢复国权之先例》一文。文章在比较了日本、土耳其和暹罗三国的民族运动之后,认为土耳其凯末尔革

命“接受时代潮流，反抗强权侵略，大刀阔斧，一往直前，群策群力，则实为土耳其国民党革命时代四五年中事。就此点而言，土耳其之恢复国权运动，实与日本有短时长期之不同，有军事行动与和平谈判之不同，有然断处置与按部就班之不同。而正是为吾人因时制宜，参酌取舍之资也。世无成法，适用则佳……由此可知进化潮流，势无可遏……我中国之恢复国权运动而果欲求得成功者，斯正其兼程并进之时矣。”

柳克述的《新土耳其》一书实为中国研究土耳其史开篇之著作，至今仍不失为有价值的参考书。除柳著之外，尚有 1942 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的《新土耳其建国史》。该书作者边理庭也总结了土耳其的经验，特别是对凯末尔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予以充分肯定。

对凯末尔革命和改革，中国研究者经历过一断曲折道路。20 世纪 40～70 年代，凯末尔和甘地一样，曾有过不公正的评价。在未弄清史实和内涵及各国国情的情况下，在有关书文中即对凯末尔(基马尔)主义予以教条主义的批判。在不恰当处理政治与史学关系的情况下，使史学失去了自己的本体地位。我在《时代、历史学家的步履和史学观》(《史学家自述》，武汉出版社 1994 年版)中谈到 1960 年自己因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半殖地革命中作用的文章，而遭到批判的情况。其中就涉及到对凯末尔革命的评价问题。我当时写道，批判者“硬要把亚非已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多彩的现实，填压在中国革命模式的单一框框中去”。1980 年，即被批判的 20 年之后，我为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年会提供了《凯末尔和凯末尔主义》一文，明确肯定了凯末尔的革命和改革。这篇文章后来发表于《历史研究》1981 年第 5 期；后又转载于三联

书店 1982 年出版的《世界现代史论文集》中；再往后又成为我写的《东方民族主义思潮》（1992 年西北大学出版社）著作中的一章。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国对土耳其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一系列有关论文和著作纷纷发表，许多译著也连续出版。仅《奥斯曼帝国》就有两本（刘明编著的由商务印书馆 1990 年出版，黄维民著的由三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杨灏成和朱克柔主编，2000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一书中，有两章专门探讨了土耳其世俗化改革和伊斯兰复兴运动问题。陈德成主编的《中东政治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出版）也用专章研讨了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肖宪的《沉疴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全面综论了改革的经验和意义。还应该提到的是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出版），对中国学者研究土耳其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杨兆钧著的《土耳其现代史》（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他早年就学于土耳其安卡拉大学，长期从事土耳其研究，1978 年即有译著《土耳其共和国史》问世。他的《土耳其现代史》是继柳克述之后，又一部由我国学者撰写的系统的土耳其共和国历史。本书资料丰富，论述客观，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他是在新的形势下，和柳克述怀有同样借鉴土耳其经验的情结而著述本书的。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目前，我国上下正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土耳其所经历的道路，虽因国情不同、制度各异而应有所选择外，然而他山之石，可以为鉴，吸取外国经验，借鉴他国得失，仍属极端重要之举，本书之作，中心意图，即在于此。"